

目 录

序 言.....	1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3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3
《社会民主党人报》.....	13
施韦泽和保守党.....	39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42
施韦泽的独裁.....	45
巴門—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58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64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	73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73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以后.....	84
施韦泽的結局.....	100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114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114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議會中.....	124
策略上的分歧.....	134
德法战争.....	136
宣战前奏曲.....	136
意見分歧.....	144
声明和布告.....	148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150
吞并和皇冠.....	156
我們的被捕.....	167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 莱比錫叛国案及其他.....	176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會議.....	176
第一次德意志總工会談.....	185
薩克森的其他事項.....	187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187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190
莱比锡叛国案	199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205
我的演君案	208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209
胡伯图斯堡	209
哥尼斯坦因	224
兹维考	225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229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229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232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239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242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249
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268
合并工作	268
余痛	276
国会工作	278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283
新的迫害	303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306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311
一八七七年的国会	314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316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318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319
内部事件	324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327
在莱比锡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329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330
第一个非常法	333
诺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336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340

序 言

以前我自己曾希望能够把《我的一生》第二卷写完，现在能如願以償了。最近一年半以来，我的健康情况显著好转，因而工作能力提高。可惜，这时我的亲爱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妻子患长期的重病，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底她逝世才解脫了她的苦痛。

第二卷的篇幅比我原来預料的多得多；它在我的笔下发展成一种党史，以我在党内所达到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书信和文件，我原以为已經遺失，却又找到了。在我所经历的一世代以上的不安定的、过劳的生活中，为了小心起见，曾把許多东西丢掉和忘記，而在彻底清查时又找到了。此外，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遺囑命我共同继承他的著作遺產，数十年来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馬克思往来的信件多半又回到我的手里。这些信件主要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它們的主要内容我将在第三卷中加以利用。

假定一般說来我还保有生命和必要的力量，第三卷在較长時間以后才能出版。准备工作还在开始。我也許必須把第三卷分为两部分。它的內容包括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即人所乐道的党的“英雄时代”的一段時間。我想以此来結束我这篇幅很大的著作。

最后一卷将附一人名表和内容索引*。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九月二日

奥·倍倍尔

* 原书第三卷并未附有内容索引。——譯者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 馮·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7

让·巴蒂斯特·馮·施韦泽

在拉薩尔逝世后几个相继领导他所创立的联合会的人物中，让·巴·馮·施韦泽特别杰出。

联合会得到了施韦泽，就得到了一位很好地具备許多大有益于他的职位的特色的领导人。他具有必要的理論修养，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冷靜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新聞記者和鼓动者，他能够把最困难的問題給最純朴的工人讲解清楚；能像他那样懂得如何激发群众热情，甚至使群众着迷的人是很少有的。在他当記者期間，他在他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批通俗科学論文，这些論文都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他对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批評和后来印成小册子的論文《死的舒尔采反对活的拉薩尔》，至今还不失其全部价值。作为国會議員，他也表现得十分干练和精明。他迅速掌握现状并加以利用。最后，他也是一个深堪重視的优秀演說家，使群众和敌人都受到感动。

但是除了这些良好的、有些还是出色的特色外，施韦泽也有一系列的缺点，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初期的工人党的領袖來說，这些缺点对党是危险的。他走过了种种錯誤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一看出自己在资产阶级中沒有发迹的前途，他这个在生活方式上早就堕落的人只有到工人运动中去充当一个所謂他的野心同他的才能注定他充当

8

3

的角色，才有希望發迹，他就參加運動。他不僅想當運動的領袖，而且想當運動的統治者，並且竭力為他的自私目的加以利用。他曾在阿沙芬堡一個由耶穌會主辦的學院里學習，後來又從事於研究法律，於是從耶穌會的詭辯和法律上的強辭奪理獲得了精神武器。這就使這個本性詭詐狡猾的人成了一個政客，他肆無忌憚地設法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代價來滿足他的野心，滿足他的縱情享樂的需要，這些非有充分的財力是不可能滿足的，可是他沒有這種條件。況且在一切民眾運動中證實了一個歷史性的老經驗，即有縱欲習慣而因缺乏財力不能滿足的領導人物，容易屈服於向他襲來的引誘，尤其是當他們同時還相信，除了滿足他們的野心以外還能夠獲得虛偽的成就的時候。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組織賦予它的領導人以獨裁地位，這是非常有利於施韋澤的企圖的。但協會中比較有獨立思想的會員也自然對獨裁者的這種欲望不斷進行鬥爭。有時反對派好像被他那蠻橫無理的行為壓制下去，並從聯合會中排擠出去，但不久又有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起來，重新開始對他作鬥爭。由於聯合會的唯一報紙——除此以外他也不容許有第二個——《社會民主黨人報》在他的掌握之中，這也非常有利於他的統治企圖。他既握有工具，並毫不猶豫地使用它，對會員的精神統治變成專制的統治，他於是強暴地壓制每一個異議和每一個使他不快的意見。同時，雖則施韋澤內心里瞧不起群眾，他却懂得如何討好他們，而且像他那種阿諛諂媚的樣子，我從沒有再遇到過。他把自己裝扮成群眾的工具，只聽從“至尊的人民”的意志，而這至尊的人民只閱讀他的報紙，並受他的意志的暗示。誰敢反抗他，誰就被指為動機卑鄙，被譏蔑為愚蠢低能，妄想爬在善良、誠實的工人頭上，以便濫用他們為他們的敵人謀利益。

像施韋澤逐漸扮演的角色當然只有在運動的幼年時期才有可

能，因此我們原諒他的那些狂熱的追隨者。今天不論是誰要想在運動中扮演施韋澤那樣的角兒，即使在短時間內也是不可能的。

施韋澤是一個頭等的煽動家，這種人如果當了國家的領導人，就會成為馬基雅弗利（他本來醉心於馬基雅弗利的無原則的理論）的高足。多年來他用上述方法在聯合會中所保持的專制統治，只有天主教堂的某些現象可以比擬。他不枉跟耶穌會士受業一場。

我們（李卜克內西和我）所控訴施韋澤的是：他按照俾斯麥政策的利益領導全德工人聯合會（自然是違反該會的大部分會員的意志和心願的）。我們認為這個政策不是德意志的政策，而是大普魯士的政策。這個為了霍亨索倫王室利益而進行的政策，力求贏得全德意志的統治權并用普魯士的精神和普魯士的統治原則來統治德意志——這原則是一切民主政治的死敵。

在當時的一般情況和俾斯麥同自由資產階級處於激烈鬥爭的情況之下，他利用一切能有助於他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最陰暗的手段。我在本書第一卷里已經敘述過，還在拉薩爾上台之前，俾斯麥就有一個干練的代表——油漆匠艾希勒，在工人界中宣傳他的政策。拉薩爾不是以奴僕而是以同等的身份，作為一個掌權者對另一掌權者來同俾斯麥談判的，但是他給與俾斯麥這種企圖的支持比他自己大概願給與的還要多。他同俾斯麥的談判固然表面上在一八六四年二月間中斷而且直到他（拉薩爾）逝世也沒有恢復，但是使工人運動為俾斯麥政策服務的努力則依然如故，並且取得一定的效果，而在俾斯麥的代表洛塔爾·布赫爾邀請卡爾·馬克思為普魯士《國家通報》的撰稿人時遭到嚴詞拒絕，也未改變這種情況。

海倫·馮·拉科維查（海倫·馮·達尼格斯）是拉薩爾的舊情人，他就是為她而被卷入決鬥喪命的，在她的《別人和我》一書中（柏林，一九〇九年），敘述說，在一次夜間談話中她問拉薩爾道：是

真的嗎？你同俾斯麥有種種秘密勾當？他回答說：“關於俾斯麥，和他想要從我那里得到什麼和我想要從他那里得到什麼？——沒有這種事，也不可能有這種事，你可以放心。我們倆都夠老練的——我們清楚彼此的老練，結果不會是我們（始終是政治上的語言）當面彼此嘲笑的。在這方面，我們受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只不過是拜會和富於機智的談話。”

這段敘述可能是真實的。如果他不像他的舊情人在這里所敘述的這樣想法，就是瞧不起拉薩爾的聰明和他的見識。一般說來，聰明有見識的人（也包括施韋澤在內），都不會誤認社會民主黨人能从俾斯麥那里得到什麼和得不到什麼，並且，也不會誤認，如果俾斯麥與社會民主黨人發生什麼關係，也只是為了他的利益想來利用他們而已，以後就會像丟掉擠干了的檸檬似地丟掉他們。或者是另一種情況，他們把自己出賣給他，為他服務，這在拉薩爾是不可能的。

事實首先說明了我的看法，即當副主席F.W. 弗里茨舍代替伯恩哈特·貝克爾充當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時，前任副主席達麥爾博士向弗里茨舍建議，在薩克森王國進行鼓動時除了社會主義的要求以外還要替普魯士霸權游說，並且把報紙上所發表的有關這些集會的报道直接寄給俾斯麥，也把集會情形直接向他報告。11 這是在一八七八年秋季談到反抗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草案時弗里茨舍親自告訴我的。我當時在國會中發言反對俾斯麥時也利用過這個資料。

所以想使全德工人聯合會有利於俾斯麥的大普魯士政策的企圖很早就有，而且長久存在。我的分析是為了要證明，施韋澤有意識地為俾斯麥這種企圖服務。

如果施韋澤內心里真誠喜愛他表面上所擁護的事業，如果黨內每個同志都可以確信他只抱著熱情和最純潔的努力為工人階級

服务，如果他能避免他的政治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十分可疑的暧昧态度，总而言之，如果他的全部行为能令人信赖，那么，他就会无可争辩地终身担任党的领导人。每一个诽谤他的尝试，不论攻击来自何方，到他身上都会失去效用。他却不是这样，他必须维护他那不断下降的威信，最后，在他放下主席职位后，当每个人都敢于自由地说话，没有被开除的危险的时候，遇到了正是那些曾经对我们方面的攻击狂热地捍卫他的人对他提出了侮辱最甚的控诉。所以那些听得他死的消息漠然置之的无动于衷的人，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直到最后一刻还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对于他的纪念就会永远恭敬万分。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根据他的祖先来判断，他的血统是意大利—法兰西同德意志的混血种。他的家庭在一八一四年由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封为贵族，属于所谓老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

幼年的施韦泽在他的家庭中所耳濡目染的是不很高尚、并且发生很成问题的教育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一度充当不伦瑞克的声名狼藉的卡尔公爵（这位公爵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免于牺牲在民愤之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本国）的侍从，是一个浪荡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的母亲是和丈夫分居的，独立门户，过着同样的生活。无怪乎年轻的让·巴蒂斯特由于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榜样下步着父母的后尘，只是他的双亲已把钱财挥霍净尽，他没有钱，于是负债累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约在五十年代中叶，他也曾到柏林求学，在这里同克鲁马赫家族来往（克鲁马赫的妻子是他的祖母的亲戚），并认识了普鲁士反动派的领导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耳。后来他在写作中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能作出尖锐和中肯的批判，就是从

在柏林居住期間同权威的社会阶层的交际得来的。当时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立場不仅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老法兰克福的市民阶层中是占优势的立場，这种立場使他的观察力特別銳利。他現在認識到那个作为奥地利的死敌的国家最內在本质的。他的这种大德意志—奥地利的立場也表现在政治論文中，其中第一篇是一八五九年施韦泽在法兰克福（他于一八五七年定居在那里当沒有主顧的律師）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战争期間，以惹人注目的《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为题，并且要求全德意志支援奥地利。第二篇論文具有同样的傾向，题目是：《駁卡尔·伏格特对于欧洲現势的研究》。文章結尾說：奥地利的事业是欧洲公理和欧洲秩序的事业，是文明和人道的事业，而首先是德意志荣誉和德意志独立的民族事业。

13 第三篇論文在一八六〇年出版，题目是：《全国統一的唯一途径》，他显然左傾了。他自认是共和主义者，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下面的革命导致德意志的民主統一，德意志才会有幸福。然而，后来他又沉溺于他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的同情中，直到他同拉薩尔認識后，才终于轉入小德意志陣营并认为唯有俾斯麦政策才能解决德意志問題。

一八五九年民众运动的开始和民族联盟的創立及其小德意志方面的努力，不能使施韦泽无动于中。与他当时的立場相合，他起而反对民族联盟。他认为（一八六一年一月），民族联盟只有声明拥护共和主义，也就是拥护革命，才可望得到工人的帮助。普魯士并不比奥地利好些；必須在二者都粉碎以后，德意志才有可能統一。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由于他的协助，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創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泽当选为该会主席。他在这里代表着同样的激进思想。一八六二年初，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論德意志問題》，他在这里再次自认是霍亨索伦王室政策和普魯士在德意

志的领导权的无情敌人，并且痛斥中立政党的拙劣。他现在显然是政治上非常忙碌的人。他还兼任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主席；那些虽然表面上不是政治性的协会，在当时却一起展开了热烈的政治活动。射击协会运动就是这种情形。施韦泽在这个运动中也显得很积极，并且在德意志射击同盟成立后，还担任该会的核心委员会委员。当一八六二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德意志第一届射击大会时，施韦泽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大会报纸的编辑。他当时同科堡公爵，即“射击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会场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当然同他以往的激进态度相矛盾，也同他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因部工人会议上所作的彻底社会主义的激进演说相矛盾，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个时期施韦泽同时怀着几种企图。但是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后不久，他被公开控告犯了两件罪行，这些罪行在他后来生活上投下一个阴影，并且作为他性格的标志是重要的。

首先他被控告侵吞了法兰克福射击大会账房的二千六百古尔盾。委员会方面对此并未提起控诉，这就使人认为，这件事大概还有争辩。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参加射击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哥达司法顾问官斯特尔泰，曾署名在科堡《德意志工人总汇报》上发表一篇声明，证明侵吞公款是事实。几年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展开对施韦泽的反抗时，哥达支会派遣会员一人到司法顾问官斯特尔泰那里问他，对施韦泽提出的贪污罪状是否属实。斯特尔泰证明属实。于是哥达支会又转与施韦泽接洽，把斯特尔泰的话告诉他并请他控告斯特尔泰。施韦泽拒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还忙得很。

另外一件更讨厌的事件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曼海姆的皇宫花园内发生的。一天上午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

他被控訴，並被判監禁十四天。如果能肯定哪一個是當事的兒童，處罰會重得多。這一點卻沒有辦到。但也許找到些別的、施韋澤也會對之作同樣非禮要求的兒童。他的判決就是以此為根據的。施韋澤當然主張自己無罪，人們在想為施韋澤洗刷的努力中，企圖證明他無罪。為了歷史的真實性，這種企圖應該中止。不管人們對於同性愛看得怎麼隨便，無論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公園里，企圖對一個學齡兒童滿足同性愛，卻是件寡廉鮮耻的行為。還應說明，如果施韋澤自己覺得無罪，他就會留意對第一級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

15 這兩件事迫使施韋澤離開法蘭克福一個時期。在工人界它們自然也引起了他對他的異常憤恨。次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後，當施韋澤認識了拉薩爾並成了這個聯合會的會員時，法蘭克福的會員要求拉薩爾告訴施韋澤，請他不要再參加聯合會的集會。拉薩爾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這是胸襟狹窄的表現，這個加在施韋澤身上的罪行與他的政治無關。寵愛變童在希臘曾經是一種普遍盛行的風氣，政治家和詩人對此都有嗜好。此外，他對施韋澤的才能推崇備至。他給施韋澤寫信說，受罰的那種嗜好是不合乎他的興趣的。他並沒有表示懷疑，說施韋澤沒有這種嗜好；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原故。

一八六三年初，施韋澤在萊比錫的奧托·維甘特那里發表了一篇新的論文，題目是《奧地利的領導地位》。他為表示“尊敬和友誼”把這篇文章獻給他的朋友巴伐利亞的一個舊軍官馮·霍夫斯台登先生；序言是一篇沉悶的浮夸文章，有如亞爾西巴德^①對他所喜愛的一個人的談話。文章內容不只在一個方面有趣味。他在文章里完全正確地描述了普魯士國家的性質，並且說明普魯士完全

① 公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將軍。——譯者

不适于统一德意志。此外，他不顾一切民主的约束，仍然支持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说，普鲁士国家根据它的历史发展同德意志全体对立，……这种发展迫使它在同一国土上并通过同一致富之道继续扩张，因而以吞并为出路。但是普鲁士的这个使命不是德意志的，而是普鲁士的。普鲁士按照它的内在性质，必然会注意到，不使程度不等地渗入一切细节的精神，国家的古代历史上的、特别是普鲁士的、主要是霍亨索伦的性质消失掉。

他强烈反抗这个同真正全体德意志不相容的普鲁士。他以下的纲领方式说明了一个我们以后在别的地方还要遇到的观念。他说：“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不论它是共和国还是个帝国——16即使比现在德意志同盟的领土仅仅短少一个村庄，那也是民族的一个耻辱。说德语的最遥远的村庄的最小茅舍都有受全体保护的神圣权利。”

但是以后不久，这个庄严的声明并没有妨碍他去支持那导致、想导致、而且照他自己的理解必然导致民族耻辱的政策。并且这不仅关系着单个村庄或一座茅舍，而是关系着上千万德意志人的国土，这些国土较之霍亨索伦家族给他们王国命名的普鲁士省早几百年，就已属于德意志国家了。最后，他要求奥地利占领导地位和整个奥地利邦加入同盟，如果别无他法，就以粉碎普鲁士来做到这点。因此，他要求，大德意志派毅然拥护奥地利的领导地位，并且不要把阵地让给小德意志派去鼓动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所以施韦泽在一八六三年初还是黑与黄的^①大德意志派。几个月他就变成另一派。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拉萨尔。他马上体会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在前途上得到一个符合他的野心的、并且在上述事件之后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永远被剥夺的地位。

^① 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译者

在資產階級世界中，他成了一個大家必然向他關門的人。

17 當一八六三年春天拉薩爾來到法蘭克福時，他們二人顯然不久就做到情投意合。一同去遊萊茵普法爾茨，也給這點造成機會，在出遊中拉薩爾還發生一件趣事。參加這次出遊的除了拉薩爾和施韋澤之外，還有哈茨費爾德伯爵夫人、漢斯·馮·畢洛夫和當時還年輕的我們的已故同志文特林·魏斯海莫同志。他們先到萊茵河畔的歐斯特霍芬，要從那里往以濟金根的故居著名的埃柏恩堡去遊覽。由於魏斯海莫的慫恿，他的住在歐斯特霍芬的父親邀請這群人吃午飯。拉薩爾在筵席上和魏斯海莫夫人并排而坐。在談話中間，夫人像婦女們常有的那樣好奇地問拉薩爾，他是否相信他那些計劃可以實現，拉薩爾擁抱她，並且一面說“您是個可貴的夫人”，一面吻她的嘴唇。於是他確實地封住她的嘴。對於這個違反一切社交禮節的侮辱，老魏斯海莫激動得喘息了幾秒鐘，而其餘的人們則哈哈大笑。

在拉薩爾影響之下施韋澤的思想變化，立即鮮明地表現在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三日他在萊比錫所作的以《進步黨是停滯不前的支持者》為題的演講中。這個演講表明他完全改變了他迄今對普魯士的態度，同時為拉薩爾政策作辯護，並且鮮明表示反對自由主義的態度，這在當時就是袒護俾斯麥和封建制度。在那個演講中他說道：

“不過，我的先生們，如果您們聽我的話，您們就會認識到，現代專制政體連同它那些成幫的貴族和牧師確乎與我們相敵對，因為專制政體一點也不願理解革新；不過，您們同時也會認識到，我們真正的、頑固而激烈的敵人却藏在另外地方——即藏在資產階級政黨及其代理人中間。必須徹底坦白和肯定地說明，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在於所謂自由黨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的鬥爭，即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首先是針對自由黨的。如果您們

坚持这一点，那么，我的先生們，您們自己就会說：为什么拉薩尔不應該求助于俾斯麦？”

根据这个理論，工人的主要敌人不是痛恨每一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者，时髦点說，即上帝意志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工人的主要敌人宁可說是自由主义者，他們中間即使是最右傾的分子究竟还是近代发展的代表，是一定程度的文明进步的拥护者，沒有他們，資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成立，資本主义制度才为无产者創造了提升自己为自由人和消灭人压迫人的可能性。施韦泽知道他所宣传的观点是极反动的，是贩卖工人利益的，但是他还是宣传它，因为他相信，可以借此飞黄騰达。

不言而喻，俾斯麦和封建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最左翼的帮助觉得称心滿意，并且对于代表这种理解的人也斟酌情况，予以支持。但是这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游戏——沒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比游戏更为重要——却不失为一种巧妙手法，把不太有胆量和見識的自由资产阶级吓得不知所措而墜入俾斯麦的专制政治的罗网中。这种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越激烈地装腔作势，他就会越圓滿地达到目的。也因此，布赫尔才要求馬克思——这件事还須永远重提——为《国家通报》写甚至共产主义性质的文章。

但是，这个政策是和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恰好相反，这个我先不必加以证明。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八六四年七月，施韦泽迁居柏林，并在那里入了籍。他的目的是从事于出版一个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他的朋友馮·霍夫斯台登供給資金，这个人同斯特拉赫維茨伯爵夫人結了婚，頗有些財產。令人詭異的是，拉薩尔在他的遺囑上一分錢也沒有撥

給他所贊成的事業。

尽管下列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对施韦泽怀疑，可是施韦泽除了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是赢得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斯托夫上校、乔治·海尔维格、菲利浦·貝克尔、弗·賴謝、摩里茨·赫斯和烏特克教授为撰稿人，当然是根据一个由施韦泽起草的，以鮮明、确切和簡练著称的激进綱領来撰稿。这个綱領发表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試刊号的第一版上：

我們的綱領

決定我們党的努力和活動的是三個大觀點：

我們反對創造那種從封建的中世紀延續到十九世紀的、把各民族不自然地分离和結合起來的歐洲國家組織——我們要促進世界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業的團結一致。

我們不要一個軟弱的、四分五裂的、對外無力而對內則十分蠻橫的祖國——我們要的是完整而強大的德國，一個自由的人民國家。

10 我們拒絕迄今為止的資本對於社會的統治——我們希望爭取到勞動治理國家。

這三個重大的依據一個共同基礎的觀點，在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題上，以強制的必然性指引我們走上我們所要走的道路。

我們的原則是簡單而明了的——我們永不害怕從中得出結論。

毫無疑問，如果自此以後把這個絕對無可爭辯的、黨內一切領導人物所公認的綱領當作黨報的準則，就決不可能發生分裂，而會進入一個健全的繼續發展的時期，並且非常可能使黨早在幼年時代就有意想不到的擴充。

但是施韦泽是別有用心的。我在這裡不談他的同伙和《社會

民主党人报》的共有者馮·霍夫斯台登先生。霍夫斯台登是个软弱的人，对于事物的本质没有深入的洞察力。他受施韦泽的摆布和利用，而几年以后，当霍夫斯台登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經年累月坐在他的餐桌上的施韦泽花光他的财产以后，他就像一个榨干了的柠檬似地被施韦泽抛弃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确态度并没有保持好久。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期那篇《俾斯麦内閣和中、小各邦的政府》的文章里已经含有转变，施韦泽在文中对俾斯麦政策表示同情，虽然表示得还很谨慎。他在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发表《俾斯麦内閣》一系列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揭下了民主主义的假面具，结果使刚刚拉拢到的撰稿人多半又公开谢绝了。

在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里說：

“議會制度就是平庸的統治，就是无力的空談，而专制主义至少是勇敢的創制，至少是有所克服的行为。人們喊道，‘可耻呵，那些现在为反动派服务的变节者’。但是奇怪的却是，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我們亲見他們很快的身敗名裂。——奧·倍·），不是在普爾頓和博伊斯特那里（当然不是。——奧·倍·），而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恰恰是在俾斯麦那里。”

他所指的变节者，正是一切自以为革命不是他們分内事的人們，那些同資本主义制度（假設他們一般來說曾是資本主义的敌人）妥协的人們，并且他們自己說，資本主义在勃兰登堡容克保护之下是不会吃亏的，在这事上他們沒有搞錯。

施韦泽的第二篇文章是对普魯士发展的观察：

“由这个基础开始（由选侯国开始），这个比較年輕的国家，特别是通过一个伟大的国王兼雄勇的常胜將軍、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值得崇拜的人的伟大天才，于是扩展成一个辽阔而强大的王国。”

在这种西培尔或特莱赤基也不能更响亮地頌揚弗里德里希大帝之后，他也給一八一三年的人民起义一番贊揚，說这是普魯士历史規律上的一个輝煌的例外。“总之，主要的是，普魯士之为普魯士，就是通过领导它的那个王朝形成的。”

随后他描写普魯士忠君主义的本质。

“这样的精神，在有些德意志国家里固然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终究缺乏高度的政治严肃性和深厚的威信，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却成为对人們所谓的忠君主义的諷刺，这种王者精神在普魯士却是一种确有根据的政治見解和政治方針。因为这个王朝和它每世的君主，都有內在的權利被认为是传统因素增长度數表的頂点、是旋轉在习惯道路上的力量的重心、是国家整体内有机体的心和腦，只有这样和在这样假設之下它才获得并且才能获得它特有的实质和它現时的地位。”

此外他还认为，普魯士国家在当时情况下还带有明显的未完成性、一个还未結束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因此就有了叫鷲要吞并的情况。普魯士在德意志所負的这个使命，并不是人們要想使我們相信的德意志的使命，而是一个普魯士的使命。

所以沒有人能比施韦泽对普魯士国家的本质認識得更加清楚，他的結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但是下列問題也就更加要紧了：他怎么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照他自己所承认的，是非德意志的，因为只是大普魯士的，并且如果它胜利了，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失敗？这样一个政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場是不應該支持的，是必須对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因为推行这个政策的就是民主主义的死敌。

施韦泽这样結束了他的第二篇文章：

“一个真正普魯士的内閣，一个致力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导源于普魯士邦的历史的本质的内閣，既不能像保守派历届内閣

在普魯士久已做过的那样，按照一味依样画葫芦的保守主义仅仅打算呆呆地维持现状，也不能像自由主义派在否认权力重心从国王转入议院的情况下所意图的那样，力求在取消国家内在性质的情况下谋求实施由它的历史向国家指出的对外政策。”

这用明白的德語譯出来就是：普魯士国家的特性在于禁止普魯士政府实施議會制度，如果你们自由主义者还要向这方面去努力，那么你们所要求的东西就是与普魯士国家的本性相对立的。所以你们满足于在国家机构中做个点缀品吧。在議會与政府处于对立的地位的形势下，这种表示就意味着干脆是攻代議制之背和支持俾斯麦的计划。

在他的第三篇論文中他首先說道：他的第二篇文章的推論和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引起了許多誤会（！）。所以現在他要說得更明白些。他說：

“由于普魯士遵行必定导致吞并两公国（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政策，这就把普魯士历史的光荣传统由长期睡眠中喚醒，而致力于普魯士国家精神最里面的核心。

現時在普魯士所行的政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策！……誰开始吞并，誰就必须把吞并贯彻到底。还有其他。

一个从十九世紀下半期开始吞并德意志土地的普魯士政府，一个面对着公开的、由皇帝、国王和公侯声明不能維持的德意志政治状况，于是又拿起了‘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政策’（如同一家大德意志派报刊所說的）的普魯士政府，就不能在小胜之后停止前进——它必須在所走的道路上繼續前进——，如果必要的话，用‘铁与血’前进。

既同一个历史上已經长成的国家最自豪的传统相結合，而又在决定性的行动面前胆小退縮，就是扼杀这个国家最深处的生活力。

22

人們可以使这样的传统停止活动——但是不能接受它，以便加以毁灭。

一个普魯士的大臣如果为普魯士制定这样的政策，他一定会遭到弗里德里希大王亡魂的愤怒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大笑。”

每个善良的普魯士人讀了这样的文章，他的心該如何跳动；可是照这种說法，普魯士似乎注定要做德国的統治者了。而封建主义者的心該如何喜爱这个比他們全体能更好地闡明和贊揚普魯士国家的“历史任务”的人。这难道不应该加以注意和奖励嗎？

施韦泽在这里所写的东西，也是預告俾斯麦进一步的政策，是真正鼓励（如果还有鼓励的必要）俾斯麦在已路上的道路上繼續前进。

施韦泽在第四篇文章里談到同盟議會和奥地利。因为沒有比德意志問題的这两个因素被处理得更愚蠢更违时代需要，所以他批評起来也毫不費力。此外，施韦泽在这篇文章里对奥地利所持的态度，有如他后来的整个策略，是跟他早在一八六三年（就是一年半以前）在他的小册子《奥地利的领导地位》里为歌颂奥地利所說的話，以及跟《社会民主党人报》表面上代表的綱領都恰恰相反的。

第五篇文章談論国家的地位和德意志問題。他的結論是：

“在德意志有行动能力的还只有两个因素：普魯士和民族，普魯士的刺刀或者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我們看不到第三个。

……普魯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也是德意志目前当局的敌人。

民族穩固地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如果普魯士想起弗里德里希大王曾是它的国王，德意志公侯們的宝座就必定动摇。”

23 普魯士王位的情况如何呢？

讀者定会承认，写的是再簡炼、再富于煽动性沒有了。他在表明态度方面像鱗魚似地曲折蠕動。他只让人揣測，但不說出他要

干什么。显然他对讀者大众有所要求，他們被他袒护普魯士的詭辯所俘虏，这就是他的目的。此外，第五篇文章里洋溢着的方向，浸透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整个政治内容。在整个德意志报界中，俾斯麦沒有比这更巧妙的手笔为他的政策作宣传。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俾斯麦的文章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期上所登載的綱領有最尖銳的矛盾。极精明的施韦泽决不会沒有預見到，他这些文章对刚才拉攏到的絕大多数撰稿人是最粗暴的当头棒。这簡直是无与伦比的侮辱。所以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海尔維格、約·菲·貝克尔和弗里德里希·賴謝当然同这刊物断絕关系。

关于辞去撰稿問題，施韦泽在他的报刊第三十一期上的一篇文章答道：有几个褊狭的头脑因为我們的社論《俾斯麦內閣》而发怒。他得意地叙述，奥地利自由派的两个主要机关报——《新聞报》和《东德意志邮报》都站在他那方面，并且把上述报刊中的文章轉載了几大段。此外，他还引用宗納曼的《新法兰克福报》上的話，說施韦泽所奉行的政策无非是拉薩尔政策的延續而已。

这是正确的！若沒有拉薩尔的关系，施韦泽就很难把他所喜爱的政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生作用。但是拉薩尔和他之間却有所不同。拉薩尔在經濟上是完全独立的，对俾斯麦是可以分庭抗礼的，施韦泽却是債台高筑，并且根据他別的方面的品质，都談不上与俾斯麦分庭抗礼。他的登場表现为俾斯麦政策的工具，表现为一个得到拉薩尔主义表面的益处并巧妙地加以利用的人。

此外，施韦泽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他們一旦看到自己不能 24
在党内充当头等角色，就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拉薩尔同他們正相反，不是一个不生效果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不是一个耍笔杆的空談家，而是一个做实际行动的人。

在这里，又不应该忘記，后来施韦泽对这个“不生效果的抽象”

的人、“耍笔杆的空谈家”卡尔·马克思百般献媚，想把他争取过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搁置不答复。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答复中，他们发表了下列声明：

“下列签名人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閣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騙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第七十三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二〇六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的声明是：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八八页。——译者

想像的完全不同。无产階級不会問，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們根本不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們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問題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階級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統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階級統治。他們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階級的政治地位跟他們在德国的地位比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階級的統治不仅使无产階級在反对资产階級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嶄新的武器，而且还給他們創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們已成為一种公认的力量。”

接着說：“无产階級当然不会对等級的權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議會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議制的要求，假如議會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議會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階級最热情的支持的。”^①

三月四日，乔治·海尔維格和威廉·罗斯托夫都明白表示同意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三月五日，弗·賴謝在《萊茵报》上声明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同时提到，他曾一再要求編輯部，应当对容克們不顾一切地作斗争。罗斯托夫在二月初曾給編輯部送去一篇詳細批判軍事問題的文章；虽然罗斯托夫一再催問，可是这一篇文章，还有他送去的一篇反对普魯士国王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未見发表。一会儿說是为篇幅所限，一会儿又說在等候适当的时机。三月十一日日內瓦的让·菲力浦·貝克尔在汉堡的《北极星报》上声明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行动。李卜克內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〇七、二一〇、二一五頁。——譯者

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同时与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絕关系的。烏特克教授在萊比錫虽未发表公开声明，但是他停止了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关系。在全体撰稿人中暂时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只有巴黎的摩里茨·赫斯。他到一八六六年年底才脱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篇声明注有伦敦三月十五日字样，刊登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柏林《改革报》上。这篇声明针对着施韦泽从《新法兰克福报》轉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想证明“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沒有根据”。馬克思证实：施韦泽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知他《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时順便写道：

“我們向大約六——八个經過考驗的黨員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們撰稿……但是我們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創始人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幫助我們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們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間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①

在綱領中从沒有拉薩尔的名字。綱領中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統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資本的統治”。因此，他和恩格斯才答应合作……施韦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信給他說，他和恩格斯的允諾，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馬克思繼續叙述，他在一月間如何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策略提出抗議，施韦泽虽然写信安慰他，但是刊物上的策略依然如故，他就重新提出抗議，于是施韦泽在二月十五日写給他下面的一封信：

“如果您願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說明一些理論問題，那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訓誡。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

問題，那末請您注意，為了要判斷這些情況，必須處在運動的中心。因此，您不論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對我們的策略的不滿，那對我們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確切了解情況的時候才能這樣做。另外，請不要忘記，全德工人聯合會是個團結一致的組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傳統的約束（當時聯合會成立還不到二十二個月，只有幾千個會員。——奧·倍·）。要知道，事物 in concreto〔實際上〕總是帶有某些複雜性。”^②

那麼，不言而喻，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同志必然像他們所做的那樣去做。施韋澤好像認為，他對他的撰稿人，可以像洛塔爾·布赫爾在俾斯麥同意之下要求馬克思參加《國家通報》那樣要求他們充當的角色。他們應該充當撰稿人，可是即使策略已經同他們作為同意撰稿的基礎的綱領發生了最尖銳的矛盾，他們也沒有權利提出意見。要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寫得盡可能激烈，越激烈越好；然後，你們就是供我掩藏我的私貨的旗幟。施韋澤差不多就是這樣論辯的。所以他聽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報刊態度所提的指責，就宣稱他們在國外不能判斷德意志國內的事，這就是無恥。其實對於德意志國內的事，甚至絕不能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的人都能作出十分正確的判斷。那時還不能指責俾斯麥說他掩飾他的政策和玩弄陰謀手段。

後來在一八七八年秋季，當透植反社會黨人法即將降臨，布赫爾邀請馬克思為《國家通報》寫稿的事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的時候，布赫爾反駁馬克思對這個邀請的說明。馬克思為此在《每日新聞》上回答說：

布赫爾先生為《國家通報》拉攏我的那封信是一八六五年十月八日寫的。信中有一段話說：“至於內容，不言而喻，您將只依照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九五頁。——譯者

② 同上書，第九八頁。——譯者

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讀者的圈子是 haute finance [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說，他“问过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談起过”。

此外，布赫尔的信里还說道：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場(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場，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們問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說，沒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們就請我写信給您。”

布赫尔的邀請书的結尾是典型的，馬克思的那个声明也把它抄录下来：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換好多次壳；所以，誰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①

那么，这就是使布赫尔投到俾斯麦怀抱中的原因，也就是使他向別人作同样嘗試的原因。

28 按照李卜克内西在三月二十四日《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施韦泽在拉薩尔死后曾建議由馬克思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馬克思拒絕使自己同他一个他认为策略根本錯誤的运动相一致，而且他也无意于在那时政治状况中迁回德国。施韦泽曾約定，使新的刊物不奉行拉薩尔的策略，并避免任何向反动势力献媚，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并且假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参加，他才表示願意作撰稿人。最后，二人只是十分勉强地对此取得諒解，并且只是在反复保证之下，他才相信施韦泽(他曾听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一——一六二頁。——譯者

到这个人最坏的事)的誠意。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很快得到了預期的效果。一八六五年二月初，全德工人联合会一个會員彼得·萊克斯，在科伦的一次演講中已經說：他覺得現今的政府較之一个进步內閣更可愛。《社会民主党人报》未加一字的批判就把原話登載出来。三月十二日，巴門的萊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會議声明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并且完全贊成，在对普魯士政府作判断之前，先等候看看它在各种时机所允諾的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階級地位的建議結果如何，在这中間，它不是不可能取消三級选举法而代之以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的选举法，这种选举法就是德意志工人党的創始人拉薩尔所規定的現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首要目的。

这決議的形式和内容证明，这是施韦泽起的稿，并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倡到处都拿这个決議付表决，这等于为普魯士政府来一次信任投票。

但是联合会中的反对派也已开始惹人注目。《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第三十八期上攻击公开的敌人和企图在党内散布分歧的假朋友。因为反对派也开始攻击联合会章程中独裁式的組織規定，于是必須把組織当作拉薩尔独有的事业用一种灵光圍繞起来。²⁹从那时起，有系統地促进对拉薩尔的崇拜，每个敢怀其他意見的人，都被加上一种亵瀆至上神灵的罪名。尤其是拉薩尔遺囑上这句话：“我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推荐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貝克尔，选举他做我的继承者。他应当坚持組織；它将引导工人階級走向胜利”，这些话竟成为区别真假拉薩尔分子的口号。施韦泽却支持这种渐渐接近愚蠢最后将变成宗教信条的見解。可是过了几年，竟至于把《基督和拉薩尔》这个題目列在許多次人民集会的議程上。一八六八年，弗里茨舍在柏林党因为作了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說而被控訴，檢察官认为它有瀆神之处。但因无从证明他是恶

意，弗里茨舍才被释放。

至于施韦泽对于他所促进的行动在内心中以为如何，那就无需加以分析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同論俾斯麦的文章非常相反的論奥地利国家关系的总结論文，其中說道：

“德意志人民党，同在一切問題上一样，在德意志統一問題上也是激进的。这就是說，它想把公认为又好又正确的思想完全没有例外地予以实现。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統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

我們是說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場、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

一个沒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和它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原文也有着重点。）

一个統一的德意志——无条件，无例外！”

30 这是一种两面手法，施韦泽的目的是想借此使反对派缄默，因为反对派趁着論俾斯麦的文章的机会在联合会内外逞威风。他看出自己过于冒进。每逢他的举动受到公开的攻击，他就照例又要一次这样的手段。于是他又左倾了，并且以完全令人滿意的激进主义写文章。他能这样，但也能那样。

他并不是孤独的，他还有一两个追随者。就在上述登載論奥地利的文章的那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尔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国王寿誕庆祝会的整栏报道，庆祝会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在伊塞隆举办的，特尔克在会上还祝賀普魯士国王万岁。特尔克在祝賀中表示，要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毁灭的心願（如伊塞隆市长用无限残酷的鎮压手段所企图的）是徒劳无功的。

“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普鲁士内閣，与其說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說由于国民經济上的原因，显然非常注意于联合会的努力——这是終久不会成功的，因为我們人人景仰的国王陛下是工人的朋友。”

由于特爾克的慫恿，竟打电报向国王拜寿，并接到下列的答复：

“伊塞爾工人联合会。陛下对于您的祝賀至为感謝。奉圣旨：斯特魯堡，陸軍中校兼侍从副官。”

在宣讀这件公文的时候，如特爾克所繼續报道的，大声高呼陛下万岁。在庆祝会大厅中挂起一张透視画，画着普魯士的鷹站在交織的櫟树和桂树枝上，上面題詞是：国王，穷困人的保护者万岁！……爱国的歌声响彻远方。一个退伍軍人协会也不能比这做得更爱国了。

施韦泽把特爾克的长篇报道登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没有加一个字的責备或不滿。特爾克正是照施韦泽的意思来办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評論罗素爵士的一个通电时（通电中罗素对普魯士和奥地利之間的加斯泰因协定作了最尖銳的批評）說道：加斯泰因协定同我們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普魯士政府的事情，普魯士政府的政策是最明显和最彻底地违反普魯士人民的意志的。并且他轉过头来对着《十字报》（这报纸是用干預德国事件的外国来恫吓人民的）回答說：德意志民族的世仇不在法国，而在德国。他在这里指的是誰，他让讀者自己去闡明。当时的工人在这种意义曖昧和两面手法中如何能够彻底明白？工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写这些东西的人才智高高在他之上，所以必須跟着他走。

《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的流传面很小，它只有几百个訂戶。所以这个报需要很多的津貼，并且談不上給編輯人員一分錢的薪資，虽然两者都是靠这來維持的。更令人詫异的是，在这样艰难的

經濟狀況下該報竟從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起改為每天出版，因此
亏空几乎加倍，却沒有任何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把訂戶增加到僅僅
能彌補值得掛齒的一部分開支的程度。於是自然發生這樣的問題：
錢從哪裏來呢？如果不是有希望從任何一方面取得巨額津貼，則
刊物改為每天出版的計劃就等於癡癡。

聯合會並不需要把刊物這樣擴大，可是保守黨的報刊把《社會
民主黨人報》對進步黨及其政策所不斷進行的尖銳攻擊，快意適情
地大大傳播，並且迫使自由黨報刊也大大重視《社會民主黨人報》。
這樣，這家報紙就獲得了一種與發行額不相稱的意義。錢從哪裏
來呢？這問題對於自由黨報刊也是現實的，於是施韋澤和霍夫斯
台登認為有必要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十七期《社會民
主黨人報》上發表一篇對《萊茵報》的聲明，該報在第一三九期上
說：《社會民主黨人報》同俾斯麥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在第一三九期
上繼續責難說，《社會民主黨人報》接受了最頑固集團的經費，把
每周三天增加為每天出版。施韋澤和霍夫斯台登對《萊茵報》的聲
明說：

“《萊茵報》編輯雖然在這兩段話裏有點謹慎（？——奧·倍·）
而且措詞婉轉（？——奧·倍·），但總的看來頗無疑義地是指責我
們《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編輯，說我們抱有一般在政治上可能的最
可耻、最卑鄙的態度，說正是有使命在報刊上代表社會民主黨的我們，
把自己出賣給一個敵對政黨或者政治力量。

如果《萊茵報》的編輯部在获悉這個聲明後不立即撤回它的
誹謗，我們就要就這種誹謗向主管法院提起訴訟，其餘我們暫時
保留。”

《萊茵報》編輯部在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對此作了答复：

“致《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

馮·施韋澤先生親收，柏林。

《萊茵報》編輯部面對送交他們的聲明，認為它不能使我們撤回任何東西，任憑《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提起用以恫吓的控訴。”

施韋澤對此的答复是：

“據此，則預約的訴訟即當舉行。”

但是訴訟並未舉行，施韋澤對這沉重的斥責同他對以往的斥責一樣，置之不理。這就說明得夠了。

在這時和其後幾年，在柏林的工人界有一個人，因為有受政府雇用的嫌疑而非常惹人注目。這就是所謂工人普魯斯。事實上這個人是以每月五十塔勒的工資受人雇用的，直接為政府樞密參議瓦格納服務的。同時普魯斯還為几家報刊供給警務消息，由此他可以得到一筆額外收入。普魯斯也就是那個在一八六六年秋季李卜內西回到柏林時，以違反禁令罪向警察告密的人，李卜內西因此被判了三個月監禁，這在本書第一卷內已敘述過。普魯斯特別喜歡參加全德工人聯合會的集會，並且時常在會上發言。李卜內西和其他當時在柏林的同志們確認他是施韋澤和瓦格納的居間人，但是施韋澤却大概同瓦格納有直接關係。

33

瓦格納，那個狡猾的擅長一切陰謀詭計的人，盡人皆知，他在一切社會政治事件中是俾斯麥的得力助手，同時他是管報道的參議，並且與俾斯麥和國王保持着最親密的日常關係。所以施韋澤—瓦格納—俾斯麥這根鏈條沒有其他環節就連接起來，這對所有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至於說施韋澤曾經同俾斯麥本人有來往，我認為是完全不會有的。施韋澤不是拉薩爾。我永不會忘記，俾斯麥有一天在國會里裝做好奇的样子，拿着長柄眼鏡放在眼前，把正走向講壇的施韋澤從頭到腳仔細地觀察，他好像在說：“原來就是你依附於我的膝下。”

我們必須在摩爾肯馬克特認出施韋澤同瓦格納和更高級的關

系。所以当“博士”(这是施韦泽在那里的亲密简称)日常进谒领导时,官员和军官都对他非常客气,这是忘恩的特尔克若干年后同施韦泽决裂时所供认的。柏林警察总局显然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热心为施韦泽恢复名誉,借此也可为瓦格纳和俾斯麦洗刷。由于这个原因,当古斯塔夫·麦耶尔博士写他的作品《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时(由古斯塔夫·费雪尔在耶拿出版),柏林警察总局非常乐意地让他引用秘密文件里关于施韦泽的材料。早在十五年前,弗兰茨·梅林同志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警察总局也曾同样地提供材料,但是梅林拒绝了。

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认为通过施韦泽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还嫌不够,曾于一八六四年将信时致函海尔维格夫人,企图为这种政策作辩护,她在信里写道:

“下列两件事真正相差天渊:卖身给敌人,明地或暗地为他工作;或者像一个大政治家那样把握时机,从敌人的错误中得到利益,使一个敌人与另一个发生摩擦,把他逼上一条险峻的道路上并且会利用不管是谁造成的、只要是对这个目的有利的局势。坦白诚实的人们,那些永远只站在未来事物的理想的、悬在空中的立场并只能凭着这种立场来确定眼前行动的人们,可能暗自以为是很杰出的人,其实他们什么用处也没有,完全不能做真正起些作用的行动,总之,他们只能在广大群众中跟着才智较高的领袖走。”

伯爵夫人在这里安排了一个甚至使拉萨尔也遭毁灭的纲领,因为首先,以她所描述的方式来侈谈政治所需要的权力尚付阙如。我确信,拉萨尔若是同俾斯麦共事,就必遭失败;他的表演将以当众大出丑而结束。认为一个俾斯麦能够或者愿意对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死敌,认真地让步,这证明是欺騙,这种欺騙完全不是现实的政策。因为俾斯麦必须专心致志的是同现

代资本主义势力取得谅解，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于必要时利用社会民主党作工具。但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群羊，糊里糊涂地跟着领袖跑，由他随便率领和欺騙。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她那时代和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相信这些，但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没有群众自觉的合作和走诚实、正直的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群众不能容忍机詐的外交手段；一个领袖，如果他另有打算，他不久就会认识到打算错了。

一八六五年夏季，施韦泽又乘机扮演激进主义者，希望借此推脱对他所提出的责难。这就是我已在第一卷所述的俾斯麦对之施加暴力的科伦議員联欢会。施韦泽用他那巧妙的慣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文章。当他在文章里因为进步党在科伦事件中的懦怯态度而加以嘲弄时，他也强调为普魯士人要求完全自由的結社权和集会权。尽管他有出色的新聞記者技巧，现在竟写得非常尖刻，以至《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相当长的日子每天都被沒收。当俾斯麦于十月到比阿里茲会见拿破侖，要求拿破侖同意他的“民族”政策的时候，施韦泽也把这种敌对态度轉移到外交政策的批評。在这次談判中，如一八六六年以后所证明，拿破侖是个受騙者。檢察署对施韦泽的各种违反出版条例的罪行提出控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反对派也刺激檢察署繼續进行迫害。于是通过柏林和馬格德堡的法院决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封闭，因为这些支部是按普魯士結社集会法第八条不准互相联合的独立政治团体。

但是这些迫害阻擋不住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同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同时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一旁极力挑撥，因为他不让联合会和他的政策受她所期望的影响。联合会中开始了真正的混乱，这是爭权夺利的斗争。拉薩尔在他死前不久推荐施韦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但是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大会却使

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伯恩哈特·貝克尔也同施韦泽不和睦，企图对他摊出王牌，所以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使施韦泽由于他的过去最讨厌的地方。在这时，无能的貝克尔也遭到了很厉害的反対，使他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辞去了他的职位，于是特耳克当选为继任人。但在他的选举由基层組織认可之前，应由接替弗里茨舍为副主席的希尔曼(爱北斐特)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希尔曼原是施韦泽最坚决的敌人，现在利用他的地位，声明貝克尔和施韦泽之間所訂立的使《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的合同完全无效，并取消它称做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从那时起，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把它改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在这期间，施韦泽进了監獄。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其中还有褻瀆君王罪和誹謗当局命令罪，被判处監禁一年。后来又增加了四个月，而且现在他的公权也被褫夺了。他在第一次判决后不久即被逮捕。但是施韦泽的新聞記者活动絕沒有因被捕而停止，像他在監獄中所享受的自由，是一个在柏林被判徒刑的政治犯过去和以后都享受不到的。他从監獄里以編輯的身份，后来又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发号施令。他的通信毫无限制，也时常接待訪問。当一八六九年他在魯迈尔堡受几个月的監禁时，他竟能从事于在魯迈尔堡湖中划船取乐。他也同样被許可自备伙食，这是柏林監獄里的政治犯在許多年后，即十九世紀末叶才得到的。

人們曾援用这些次徒刑，作为反对施韦泽是俾斯麦的代办这个指責的一种证明。这种理解完全錯誤。政府同它的政治代办所維持的关系是不必告訴檢察官和法官的。再說，把一个有反对行为的政治代办暂时判刑，也是很适于破除对有关人員的猜疑，增加对他的信任。人人都知道，在拉薩尔把俾斯麦当作“融洽的旧舍邻

人”而同他进行数小时之久的政治谈话的时候，柏林法院并不怕把他判处一系列苛刻的徒刑，虽然当时俾斯麦和拉萨尔相互的关系是各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以拉萨尔的健康状况如何经得起这长期的监禁，这倒使他很耽心。

在一八六六年六月战争决定胜败的前数月中，《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为俾斯麦政策服务，而且同以前一样狡猾巧妙。要想从一切的附带条件和矛盾中看出他是在推行诡诈的政策，就必须具有熟练的眼光和犀利的理解力。

一八六六年三月将终时，就是当他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讲的话比较清楚一些：“同盟尸身在法兰克福的毁灭，就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如果这样，民族的诞生或许会从这一天开始。”他的一个汉堡信徒，沙尔迈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给工人以普遍选举权，他们将是拥护战争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民族联盟、三十六人委员会掀起连续不断的激烈攻击。此外还发表一些文章，其中对于鲁斯托夫的论民兵制度一书予以好评，并称赞民兵队伍为最廉价地提供最多战士的制度。

在三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藐视普鲁士的改组同盟草案，说它仍是“珍贵的材料”。到四月下半月，它却坚决拥护普鲁士的同盟改组。现在不再提起以往所提的保证，即新的德意志国家不能短少一村一庄。它也忘记了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下半月还写过，“我们最珍贵的宝物是，我们不知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不知有巴伐利亚和黑森—洪堡，而只知有德意志、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语言。”

在四月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意志民主》里，终于说出了赞成取消奥地利，这样就把同盟中人口减少一千二百九十万人。然后才算是组成了德意志，这就是说，然后普鲁士就得势了。

施韦泽以健康受了损害为理由一再请求给假，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准假出狱。相反地，如果请假原因与真像相符，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这个理由却显系说谎。施韦泽刚刚被给假出狱，就展开广泛的政治活动，这不仅证明了，狱中的安静使他的健康又好起来，而且也可见主管机关对他的政治活动也未加限制，虽然在政治犯请假出狱时主管机关照例有个当然的要求，即请假者既因此项活动而犯罪入狱，他在请假期间就不准再去进行这类活动。

五月二十一日，施韦泽在汉堡出现，在那里“进行整顿”，六月十一日，在爱尔福特，六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他在那里的一次演说为俾斯麦的改组同盟作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不妨碍《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中说：哥达派说要有一个自由的普鲁士居于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但是其实这就是说：所說的普魯士并不存在，也不能存在。

但是和这种有关普鲁士本质的确实的、十分正确的理解相对立，六月十六日施韦泽在莱比锡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演讲时结尾说：

“但是如果能够推动普鲁士政府在对我們让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原文如此！——奥·倍·)……那末我们就尽全力来做我們这方面的事情，则胜利不是在奥地利旗帜之下，而是在普鲁士旗帜之下，不是在贝尼狄克^①旗帜之下，而是在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的旗帜之下。”

还有比这更加自相矛盾的吗？

这些话作为施韦泽的政纲条文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大概也得到了柏林高级人员的响应。但是，关于推动普鲁士政府对我們(就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让步，我們把乌托邦主义完全置而不论，

① 一八〇四——一八八一年，奥地利陆军司令。——译者

这就是希望俾斯麦让步（当然这是施韦泽自己也不相信的），整个谈话都是瞎吹，因为施韦泽最后还亲自在六月三日，即他在莱比錫演說之前十四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联合会中的混乱暂时使它在社会政治事情上什么都不能做。

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想，而且事实上施韦泽应負全部責任的联合会中的混乱，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就使联合会解体了。

如果我们在今日还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在那个时期对于革新事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普遍选举权的获得，那也是与施韦泽的这些再三声明极为矛盾的。俾斯麦的改革方案遭到各界极其广泛的反对，所以俾斯麦当然必須欢迎任何对于他的方案的支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他之所以批准普遍选举权，那只是因为他非如此不可。这是自然的，用不着暗示和煽动。早在一八六三年夏季，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才建立的时候，面对着奥地利的由各邦議會派代表組織德意志議会的改革草案，他要求在一八四九年在圣保罗教堂所決議的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議會。俾斯麦把他所以如此和必須如此的理由，不仅后来在北德意志国会中闡述过，他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战前三个月，一个通电中也曾写道：

“我认为直接选举和普遍选举权对于保守态度，較之任何一种人为的、旨在制造多数票的选举法是更大的保证。根据我們的經驗，群众比他們那些通过任何人口調查特許其有选民資格的群众的領袖們更真誠地关心于保持国家的秩序。”

俾斯麦又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写信給在伦敦的白恩斯多夫伯爵說：

“根据我由长期經驗所得的信念，我可以說，那种人为的間接选举和多級选举制度是一种危險得多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阻碍了最高当局同构成人民核心和人民大多数的健全分子的接触……”

革命的支柱就是选民团体，它們供給进行顛覆活动的党一个布满
40 全国和容易操纵的网，就像一七八九年巴黎选民所表现的那样。
我毫不犹豫地声明，間接选举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并且我
相信，我对于这类事情实际上已积累了一些經驗。”

除了由于普魯士三級选举制結果造成的烦恼所显然暴露的理
由以外，特別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那一批后来凑成北德意志同盟的
国家中，除了普遍选举权之外沒有其他选举权可作共同的基础。
此外，应当顾到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届德
意志議会实施普遍选举权的传统，因为只有普遍选举权才能够稍
稍排除甚至存在于北德意志广大民众中間的对于成立北德意志同
盟的仇視。必須进一步附帶說明和一再提醒，在那些年代，实施普
遍选举权的思想，鉴于三級选举的后果，即使在保守主义的各界
里，也是受欢迎的，而且樞密參議瓦格納早在一八六二年夏末，因
而就在拉薩尔公开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已提倡实施普遍选举权
了。萊比錫的激进派工人也早在一八六二年初提出此項要求，并
且从一八六五年以来成为不分党派的全体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一个
綱領要求。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冬季，俾斯麦的改革草案还
沒有发表，还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个草案之前，在无数的民众集会
中已經传播了这个要求。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全德工人联合
会本身对于批准普遍选举权不可能发挥显著的影响。

俾斯麦在五月九日把邦議会打发回家，因为他害怕会像在什
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时一样，不通过他的作战經費。但是俾
斯麦需要錢，他就用命令方法，毫无法律根据地发行了四千万塔勒
的紙币，并指令設立公債处。全部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
都理直气壮地对这个违法行为开了火，但是施韦泽把它結束了，他
41 对进步党作极不合理的攻击来卫护俾斯麦的措施。当战后俾斯麦
要求撥款二千万塔勒建立国庫时，直言不諱地說在战时首先不必

靠議院撥款，施韦泽又为之引证了一大批理由，但是不敢肆无忌惮地为那个计划作辩护。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起由每星期出版六次又减为三次。因为战事临近，已经没有人再需要继续负担每周六期的重大牺牲。該報的訂戶已不滿五百了。六月十七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錫举行全体大会，仅有十二个代表参加，这表明了当时联合会的作用如何渺小。据说这十二个代表，包括施韦泽在内，是代表九千四百个会员的。在选举主席时，希尔曼（爱北斐特）败于波尔（汉堡）之手，这是施韦泽间接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又玩弄在他的莱比錫演说后必然在意料中的把戏。当奥地利在停战谈判时把威尼斯州转让给拿破仑，以便可以不必割给可恶的意大利，施韦泽同自由主义报刊一样发现这里奥地利背叛德意志，于是以此为口实，大张旗鼓地投入普鲁士的阵营，说它的“惊人的组织力量”证明了，德意志要站在它那方面。从他这个立场出发，使他十分痛苦的是，当八月底奥古斯特·约翰·雅可比借着讨论呈国王的请愿书的机会，在普鲁士邦议会上发表一篇出色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新组织，即北德意志同盟，因为这是以排斥德意志—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为先决条件的。雅可比进一步声明，反对政府现在向邦议会所提出的对它战前和战时的违法行为免于追究的要求。施韦泽固然充分赞扬了雅可比的勇敢和理想，但是也用了婉转的詞句为新事态作辩护。当后来九月二十日宣布大赦时，没有人能比自五月九日以来为政府作工作的他更应该遇赦了；他被赦免了十个月的徒刑。

一八六六年八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突然以忧郁的语调承认：“德意志人民没有想像到德意志的统一是这样的。”当时所披露的有关北德意志同盟的未来宪法草案的东西确是令人忧郁的。俾斯麦，真正的现实政治家，现在达到权力的绝顶，趁热打铁，制订了

一个在宪法权利方面还远逊于普鲁士宪法的宪法草案。如果人们以为，施韦泽会因此大失所望，就是瞧不起他的聪明。谁要是像他那样认识现在统治着一切的普鲁士国家的本质，以及俾斯麦的本质和性格，谁就不会存其他的期望。但是他怎样对联合会为他的普鲁士政策作辩护并使这种政策适合于他们的兴趣呢？他断言联合会是一种力量、所以“它能迫使他（俾斯麦）让步”这种主张究竟怎么样，现在表现出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沉溺于幻想，所以我们也不失望。可是施韦泽继续唱着老调。他首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贯彻一个选举纲领，其中第一点必为柏林权威方面所欢迎。这一点是：“完全取消一切形式的邦、各邦同盟。所有的德意志各族人民结合为一个由衷的、完全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只有通过这种结合，德意志人民才能有一个光荣的民族前途；通过统一达到自由！”那就是说经由俾斯麦政策的道路达到自由。这和民族自由党所提出的口号相同，意味着继续吞并；不进行新战争，继续吞并是办不到的。纲领的第二点是关于国会和邦议会的普遍、平等选举权以及发给议员日俸的要求。保证人民权利。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全民武装的要求被施韦泽删去了，因为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普鲁士已经证明，“只有它通过惊人的组织力量才适于领导德意志国防力量”，所以现在不应当向它提倡全民武装。第四点要求是按照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通过国家资助的自由组织来准备解决工人问题。所以也就是出自俾斯麦的恩典。爱尔福特的选举纲领终于促使摩里茨·赫斯，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批撰稿人的最后一人也宣布脱离了。

施韦泽的这种态度可以同他在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联合会中受反对派逼迫时，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的态度来比较一下，那声明说：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

一八六五年的施韦泽就是这样把一八六六年的施韦泽判决了。但是他在一八六五年所写过的和所断言的东西，他的追随者却忘记了。只有根据他以前的另一种言论，即解决德意志问题要在德意志无产阶级拳头和普鲁士之间来选择，而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还嫌过于软弱，不能按民主的意义来解决德意志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工人党领袖让自己充当按专制意义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理由。姑且假定施韦泽的忠良，那么，他的策略仍然是对于民主主义的一种背叛，因为他支持了民主主义的最暴虐、最凶恶的敌人的政策。

施韦泽和保守党

在为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选举北德意志制宪国会所展开的鼓动的时候，施韦泽开始了第二期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令人毫无疑问地看出，施韦泽不愿损伤与保守党的友谊。他公然倚赖同保守党交易来反对自由党，这也一定合乎俾斯麦的愿望。44 于是施韦泽又对进步党很激烈地开火，年老的摩里茨·赫斯把这个策略当作叛逆。赫斯认为最重要的是竭力加强议会中的左派，借以完成一个还过得去的宪法，这是十分正确的立场，但不是施韦泽的立场。

施韦泽在他的追随者所提供给他的各候选资格中，决定充当巴门—爱北斐特的候选人，他认为这个选区胜利的希望最大。莱比锡的拉萨派想在莱比锡提出李卜克内西，我们则把他提为萨克森的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我们原希望他在这里可以获胜，可惜

竟未如願。在萊比錫，當羅斯梅斯勒教授謝絕後，我們宣布烏特克教授為候選人。施韋澤努力反對李卜克內西的競選。他說：李卜克內西的競選的出發點是始終以拉薩爾事業為眼中釘。那些暗中為李卜克內西的競選活動的人們是同奧地利的反動派有聯繫的。李卜克內西在二年前還在公開的報刊上誹謗拉薩爾。誰若是選舉李卜克內西，誰就是公然自絕于拉薩爾和他的事業。他就這樣以他的追隨者對拉薩爾事業的盲目成見來投機。選舉李卜克內西，就是對拉薩爾的一種罪行。施韋澤一般對這事如何看法，表現在《致我的西里西亞和萊茵省的朋友和同志們》的號召中，其中激昂地說道：“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一個比較賢明的政府來到了！”一月底，施韋澤在巴門—愛北斐特又作了一次他那種巧妙的演講，他並沒有一字提到他在政治上和有時在國會中所站的立場。《社會民主黨人報》對選舉的結果抱着愚蠢的妄想。例如二月三日在第十五期上所披露的，說選舉出來的代表們將在柏林過同居共炊的生活。人們談着飲食共產主義等等。施韋澤甚至在還沒有當選之前，《社會民主黨人報》已把他當成勝利者來歌頌了。他在巴門—愛北斐特競選的對手，在保守黨方面是俾斯麥，自由黨方面是馮·傅爾肯貝克先生。選舉那天帶來了重大的失望。俾斯麥得六千五百二十三票，傅爾肯貝克六千一百二十三票，而施韋澤僅四千六百八十八票。他連複選也沒有達到。在德意志其他地方的選舉結果對於全德工人聯合會也是件失意事。在這次巴門—愛北斐特的複選中，社會民主黨人有決定性的作用。在二月二十六日一個選民大會上施韋澤首先講話，但是他聲明在听取大會意見之前，對於複選不發任何口號。最後他又講話，他說：

“在大会上曾多次喊出俾斯麥的名字，由此可知一般的情調是傾向哪方面了。他不便對各個人規定他應該決定選舉誰，每個人可依其內心的傾向來選舉。”

因此，每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誰。但为完成这出喜剧起见，他不惜与自己的讲话相矛盾而使大会通过一个声明弃权的決議案。事实上俾斯麦在複选中几乎取得了施韦泽派全部的票。他以一万零一百九十六票对傅尔肯貝克的六千九百四十四票而当选。

施韦泽在一个声明中設法为这次的投票辯护，他說，

人們想使自由資產階級由于它在竞选中所运用的卑鄙斗争方式而受到教訓。“也許，工人们”，他繼續說，“你們的投票并不是致敬于保守党候选人，而是致敬于首相，他主动地把自由党反对派很固执地忘記为你们要求的一种人民权利奉还给你们了。”

善良的、人民之友俾斯麦呵！

俾斯麦在爱北斐特选区当选几天以后，我在薩克森第十七选区（格劳紹、美拉内等）的複选中和一个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竞争。拉薩尔派的領袖在这里声明說（《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地报道），一个純粹的拉薩尔派不能选举倍倍尔，按照拉薩尔派所采取的立場來說，倍倍尔是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是工人的恩人，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是工人的叛徒。这是施韦泽教育方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当选了，拉薩尔派的那几百张票不能有什么决定作用。

此后不久，俾斯麦因为在两个地方当选而辞去了巴門—爱北斐特的委任，所以必須在巴門—爱北斐特再举行一次选举。在重选时施韦泽得四千九百一十九票，自由党格奈斯特教授四千二百九十一票，保守党馮·德·海特二千五百九十四票，市长布萊特一千四百九十七票。于是又須进行复选，这次是施韦泽对格奈斯特。《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公开地爭取保守党的——工人的票。施韦泽在三月十七日的一个集会上更无人格、更不自重地獻媚，在会上他要求保守党两害相权取其輕者小者，那就是他。在社会基础上，工人党有許多事情能够同保守党携手。他为此引证了政府高級樞

密參議瓦格納的講話、凱特勒主教的著作、俾斯麥的言論。

“保守黨可以合作，以便工人通過他在議會中講話。當保守黨呼喚工人時（不管什麼原因都是一樣），他們都是全軍出動。現在工人在呼喚，如果保守黨不來響應呼喚，就是沒有盡到道義上的責任。它若是不願為自己惹起極正當的憤慨，就應當前來。”

隨後他對進步黨發出恫吓。

但是這種無與倫比的無人格、不自重的行為仍舊沒有得到報酬。施韋澤又失敗了，是以七千九百二十三票對八千零一十九票敗於格奈斯特。

施韋澤在北德意志國會中

北德意志制憲國會議員討論了北德意志同盟的憲法並把它公布以後，第一屆的立法機關選舉定於一八六七年八月底舉行。施韋澤仍是巴門—愛北斐特區的候選人，這次成功了。施韋澤在初選中得六千一百一十票，勒維博士（卡爾倍，進步黨）三千五百八十八票，馮·西培爾教授（杜塞爾多夫）三千四百七十八票，所以在復選中是施韋澤對勒維，結果施韋澤以八千九百一十五票對勒維的六千六百九十票獲勝。這一次又有大部分的保守黨員投了施韋澤的票。他在謝詞中認為必須提出，保守黨的工人正確地認識了情勢，所以投了工人候選人的票。這個說法的正確程度如何，有後來人所共知的事實來表明，即保守黨的領袖馮·古塞羅夫先生為了施韋澤的競選親手交給他四百塔勒。當這個事實被傳播出去以後，在柏林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無情的要求，要施韋澤把錢退回去。人們如何會那麼天真。

但是施韋澤認為還必須做另一件事，應當對保守黨提出他在國會中品行良好的保證，於是他就於九月十一日的聲明中繼續說道：

“我的社会立场是无人怀疑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无需说什么。在政治方面，我遵照我所隶属的和推举我为领袖的党的原则，在自由和人民福利的问题上，不可动摇地同极端左派（进步党）是一致的。如果有从外国来的严重危险威胁德意志祖国，我就尽个人所有的一切力量在议会内外支持现在是德意志民族威力地位的顶点的普鲁士国王及其政府。”

施韦泽的当选当然在他的追随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兴奋，于是他就加以利用，他乘坐四匹白马驾着的车子在巴门—爱北斐特两城中作胜利游行。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领袖要安排这样的胜利游行，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可是他爱好这个。这种通常是驾着白马的胜利游行，后来也还屡次举行，例如在汉堡—阿尔托那，又一次在巴门—爱北斐特，又一次在卡塞尔。可是于此也要有必要的民众在路上，例如施韦泽由柏林往卡塞尔的旅行在明顿中断，从那里改乘火车于夜晚七时后才到达卡塞尔。在工人联合会开代表大会期间的许多天，他也是乘驾着白马的车，却要求他的党徒负担为此付出的高额费用。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支付由车站到市中的胜利游行费用，其余的必须由施韦泽自己负担。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48

北德意志国会中现在除我之外，还有李卜克内西，由于施韦泽的参加，我们同他之间就时有争论。特别有趣的一次是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的会议上，那次列在议程上的是关于义务兵役的法律草案。李卜克内西首先发言，发言非常尖锐，时时被多数派和议长猛烈打断。他特别对俾斯麦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攻击，在结束时说了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将大踏步离开这个北德意志国会，因为它不过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盖布而已。”后来由我发言。我异常镇静地阐述我们拥护民兵制的立场。在这中间施韦泽也登记发言，旨在发挥他那对立的立场。在提出休会建议时，议长按当时的章程宣读赞成和反对法律草案的登记发言人的名单，其中施韦泽被列为

43

反对者。因而他按議事規程解釋說，他自己登記的并不是反对，而是贊成法律草案。

施韦泽随后在专题討論时发言說，照李卜克内西先生所采取的立場，則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也必須放弃了。附帶說，我們二人还打算提出一个要求实施民兵制的決議案，也就是实现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瑞式^①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得不到必需的連署人。李卜克内西希望北德意志同盟完全不存在。他和他的朋友想按自由主义来改造北德意志同盟，因此他們是同进步党站在一个立場。这样，他就又請教于他从一八六三年以来当作反动派的支柱来斗争的，而且不断攻击的那个党。他（施韦泽）不願同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朋友，以及失去土地的公侯們和外国，致力于破坏和毁灭普魯士和北德意志同盟。

49 “我們認識到，普魯士的权力核心使我們这长期被輕視的德意志祖国，终于在外国面前取得威望和光荣，并且将来还要如此，所以我們絕不打算否认和挑剔普魯士的那些去年使敌对世界不得不景仰贊佩的特征。”

他們站在新形成的祖国的里面，我們是站在外面，并且願意站在外面。

李卜克内西在一次私人談話中回答說：

“議員馮·施韦泽对我施了一个大恩，因为他給我一个我直到現在沒有找到的机会，使我得以声明，我同瓦格納先生的替身根本沒有关系。”

施韦泽沉默，瓦格納也沉默。在表决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条之前，施韦泽离开了会場。他既不敢投票贊成，又不願投票反对。

国会里的这些事件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支会不久举行了两次集会。施韦泽在会上建議下列決議：

^① 二人都是普魯士的爱国將軍。——譯者

“會議承認，在普魯士所樹立的威力中含有建立德意志統一的可能性；其次，會議于此與進步黨彼此同意（再靠左施韋澤就不敢了。——奧·倍·），即必須用極大的力量並且不顧普魯士政府的威脅，硬把普魯士和北德意志同盟按自由主義加以改變，因為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能把德意志事情作有效的確實的解決；第三，會議聲明，與心懷嫉妒的外國抱同樣觀念來批判普魯士去年的措施，並且據此力圖和期望破壞普魯士和北德意志同盟，這是很不對的。”

擁護俾斯麥創造的事業不能比這再露骨了。與這個議案相對立的是施韋澤的兩個反對者——提奧多爾·麥茨諾和賴曼的建議。

“會議決議，馮·施韋澤先生在國會中以及他在今天會議上對激進派的猜忌，使他在柏林工人中間所享有的一點點信用喪失淨盡。”

第三個議案是進步黨的安德里克機械工程師提出的，它要求：

“會議決議，它在德意志問題上聲明只能同意德意志進步黨的立場。”

現在怎麼樣呢？當施韋澤覺得，他遭到了尖銳的反對，他的議案可能要失敗，他就像以往每逢感到要失敗時那樣怯懦，把議案撤回，並且聲明贊成進步黨的議案，說該議案所申述的和他的一樣。任主席的霍夫斯台登要討好施韋澤；把安德里克的議案先付表決並宣布予以通過，於是在反對派方面惹起暴風雨般的憤怒。

施韋澤的獨裁

施韋澤急欲把全德工人聯合會完全掌握在手里，也就是想當主席。他的這個欲望在波爾（漢堡）厭倦了主席職務、聲明要辭職時得以實現。一八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不倫瑞克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十八人，代表二千五百票。施韋澤代表阿波爾達的二十二票和里姆巴赫（在薩克森）的三十票。聯合會是大為衰

落了。經常的冲突；由于施韦泽的政策使人对他不信任；尽管施韦泽大言不惭而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結果仍然不利；危机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波尔的开幕詞就是現存沮丧情緒的表现。萊比錫的人們还抱着的把联合会整顿好的希望，沒有实现；联合会的财务状况也异常不順利，只有少数地方繳納会费等等。在會議繼續进行时，波尔請求不要再选他連任主席；他不能再忍受这个职位加在他身上的牺牲了。施韦泽批評了波尔的业务管理，但是他，如他所說，决不願对波尔本人有所冒犯。他說明，代表大会对联合会有决定作用，并且据特耳克說，他竟要求主席职位，并且威胁說，若是他不能当选，他就馬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他答应提出正确处理业务的保证，因为他知道人們不信任他。會議不能决定如何办理；于是依白拉克的建議，暂时休会，以便疏通意見。經過休会后，特耳克建議由施韦泽任主席。但是各方面表示，对施韦泽还有怀疑；并且认为联合会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編由一人兼任也是件不合理的事。特耳克設法来消除顾虑。施韦泽声明說，他知道人們对他不信任；但只有人們信任他时，他才接受这职务。他建議第二次休会，以期取得諒解。休会后許多代表声明放弃对施韦泽的不信任。然后，还把特耳克的保留条件：他可以选举自己，告訴他以后，他以二千三百八十五票对九十七票和四十一票弃权，当选为联合会主席。他为了获得信任，在大会上提出一个激进的綱領并使之获得通过。現在他对于他更进一步的良好品行也提供了所謂保证，他当着全体代表以握手来郑重約定，尽他的能力所及，促使联合会前进。代表們反过来也照样当着施韦泽握手表示效忠于組織和主席。其情形就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国民會議在网球场中所举行的宣誓一样，其区别只在于，不伦瑞克的宣誓活剧的导演施韦泽知道这不过是一出滑稽戏而已。

在柏林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二

十五日)施韦泽又提起,在政治問題上联合会是可以同进步党一致行动。但是这絕沒有妨碍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国会补充选举的复选时(进步党候选人《莱茵报》主編柏尔格对一个保守党一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投后者的票,因而柏尔格落选。他这样既可討好俾斯麦,同时也报了《莱茵报》控訴他从极端保守派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領取津貼的仇恨。

施韦泽另外一件不大光荣的、可以說明他的个性的事件是他同他以往的朋友霍夫斯台登的爭执。霍夫斯台登提供他的錢財来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七年中叶,这笔錢用光了,霍夫斯台登成了一个穷人。一八六八年初,施韦泽企图把霍夫斯台登赶到維也納去,要他在那里办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但是霍夫斯台登在維也納遭到失败,又跑回柏林。这时施韦泽拒絕他重回到报刊編輯部,并且也不承认霍夫斯台登还有任何其他权益,把他逐出門外,他这样做,是依据一个他向善良而不够机警的霍夫斯台登勒索来的合同。霍夫斯台登在一八六九年春季巴門一爱北斐特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当施韦泽的面对他的行为作了很长的控訴发言,所报道的事实激怒了亨利希·孚格尔代表(他現今还住在沙罗登堡)。他声明說,施韦泽对待霍夫斯台登,无异于一个卑鄙的资本家,这种描写在施韦泽的追随者中間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结果是后来孚格尔被开除出了联合会。霍夫斯台登也控訴施韦泽的揮霍无度;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許多錢。在他指責施韦泽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时,施韦泽回答说,关于这一点他沒有向他申辯的必要,施韦泽的债务并不要他来归还。在这点上,施韦泽确是对的,但是事实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一八六七年底,《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有一千二百个訂戶,因而还远远不敷它的开支;那么,这个問題就很可能被认为正当;“这报纸和施韦泽揮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费用从

哪里来的呢？”不停的举债总也有它的止境。他的债权人有时也要看看金钱。一八六八年底他的父亲死后给他留下的遗产也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施韦泽当国会开会期间还是乘着华丽的车马，后面跟着穿制服的僕从。

53 古斯塔夫·麦耶尔(前面我提起过他論施韦泽的书)认为应問問在施韦泽下台后常与他往来的保尔·林道，是否觉察到施韦泽有放蕩行为。林道予以否定。我以为保尔·林道的意見不能作为定論。这位现今还活着的老先生也有很大的享乐习惯，所以他对于“放蕩”所定的标准也与别人不同。而且施韦泽同林道結交时，他已經生病而且結了婚，这两种情况妨碍了他的放蕩。在那时我們由柏林得到的关于施韦泽生活方式的情报另有說法。据說他是个第一等的享乐者，尤其是在克罗尔和柏林的夜酒馆里也常常同那些暗娼之流往来，这大約就是他对他那多年的未婚妻所表示的“忠实”，人們誉为美德的行为吧。他也有时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举行香檳酒会。施韦泽天生是收入一个錢总至少要花两个錢的一类人，这些人的口号是：“需要不是按照收入而定，收入却是根据需要而定”，因此，这些人看到錢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夺取。一八六二年施韦泽从射击大会賬房里取去二千六百古尔盾，后来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任內，以主席身份支配着賬房的錢財时，就照样侵吞从工資低微的工人收集来的毛錢来满足他的嗜欲。这里所談的数目并不大，但是原因不在施韦泽身上，而在賬房太穷。在联合会的各次大会上，譴責了并且证实了他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曾任联合会司庫多年并且遵照施韦泽的指示支付款項的白拉克，公开指責施韦泽这种可耻行为，施韦泽却不敢分辯一句。但是誰能做出这一类事情，那就不應該认为他不会在政治上出卖自己，这对他是唯一的还算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究竟到手了多少，沒有人能提出证据，因为这类生意不会在公开的市場上成交的。这里只能談談一些迹

象和許多不能作別種解釋的事實。這裡我要特別提出，俾斯麥在一八六六年以後支配着漢諾威國王共四千八百萬馬克的私人財產的利息，他可以將這筆利錢隨心所欲地用於政治目的。這個基金是以“機密費”的名稱而臭名昭著，俾斯麥不必對任何人申述理由即可動用。因此，奇特的是，當整個反對派報刊對這個賄賂基金作鬥爭時，《社會民主黨人報》從無一字提到這項基金。

此外，足以說明這個人特性的還有，當一八六八年初我們出版《民主週報》時，他有意識地對這個名字諱莫如深，如果他不得不同它爭辯時，他總是說成李卜克內西先生的報刊。他想用這個策略防止他的追隨者聽得報刊的名稱而引起訂閱《民主週報》的念頭，以免讀者由此知道許多使他（施韋澤）感到不舒服的事情。這種戰術是小氣的、可笑的，但是他卻使用它。

一八六八年春季，施韋澤又有了了一個奇怪的轉變。《社會民主黨人報》現在也照《民主週報》的樣子，在說到北德意志國會時加上一個引號。一八六八年六月中旬，他還在國會中與馮·奇爾希曼辯論的發言，發揮了與迄今對普遍選舉權的評價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一向崇拜普遍選舉權，並且大家知道，他企圖為他的追隨者在巴門—愛北斐特選舉俾斯麥作辯護，說他們選舉他，是想借此對普遍選舉權的授與者表示他們的謝意。現在他聲明：

“我為了選舉我的人們的利益，為了民主事業的利益，必須確認，這個議會只是好像而不是真正由普遍選舉產生的。”

他所根據的理由是缺少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結社與集會自由。然而這些自由從一開始就沒有，可是那時他的意見却不如此。現在他對於現行選舉法所表示的意見，卻與《民主週報》早已屢次發表過的意見完全一樣。這種驟然的奇怪的改變意見顯然是因為在他的聯合會中反抗日益增長的緣故。

在七月十九日第八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施韦泽通告說，他因为一个传单被爱北斐特高等法院判決在市監獄里監禁三星期。他委派杜塞尔多夫的W. 雷阿尔为副主席，哈赛尔曼为联合会机关报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参加，报刊的語調遂流于粗暴。通告在結尾时悽然地說道：

“在我要开始服刑的时候，謹向全体同志致最誠摯的告別敬礼。我希望联合会在我离开后照旧繁荣，或者在再会时更加繁荣（在整整三个星期后）。”

一八六八年夏季約翰·雅可比作了一个关于《社会問題》的演讲，演讲中他大大地左傾了，并且远远离开了进步党。在不伦瑞克的阿塞山崗上举行的一个民間节庆会上，白拉克对雅可比的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并致賀。白拉克对于这个演讲提出以下論点：第一，約翰·雅可比的民主綱領获得了德意志人民最高度的注意；第二，根据这个綱領，坚决的民主党和原来的工人党在目标上沒有原則性的区别；第三，两个政党必須在雅可比所提出的目标上意見一致，即，在一切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以自由的意义来改变現存的国家和社会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混乱”为题对这答复說：

“雅可比所提出的工資应力求在資本与劳动之間公平分配这句话，是一句极端錯誤的、无理和空洞的詞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中竟有人咀嚼这种卑劣詞句，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有人认为在雅可比的演說中竟还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就希望各方面都高呼：沒有！那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資本家的无理的、空洞的胡說罢了。”

这种忿激的粗暴的語言表明了，施韦泽一发觉联合会会员似乎想同相近党派的代表接触时，他就会多么憤怒。联合会必須在外面用中国的万里长城包围起来，这样他就能夠绝对地統治它并且照他的意思操纵它。

联合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是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在汉堡召开的。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仅代表会员二千五百零八人，柏林代表大会代表会员三千一百零二人，现在是三十六个代表，代表八千一百九十二个会员。所以联合会基本上壮大起来了。人们把这个发展完全归功于施韦泽的活动和领导，这是不正确的。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危机的压迫已不存在，而代之以一八六八年的繁荣时期。所以在工人界中重新兴起了乐观情绪和政治生活，这不仅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对工人协会联合会也有利，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由我领导，会员超过一万三千人，他们当然没有像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具有的纲领所造成的紧密性。施韦泽现在设法争取卡尔·马克思。他要理事会表决为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而向他表示感谢，他也曾邀请他出席汉堡的代表大会，马克思却因工作繁忙而谢绝参加。他也同意盖布提出的下列建议：

“大会声明，因为在一切文明国家，资本和反动派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只有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们，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们的努力才会成功，所以德意志的工人党和一切文明国家里受同一原则领导的工人政党的责任是共同行动。”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但是不管施韦泽装作如何激进，对于他的独裁的不满却有增无已。于是爱尔福特的会员提议，施韦泽应把从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以来由账房支取的金钱开出详细的报销单。理事会应该审核结算。杜塞尔多夫的会员要求，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两职要分开，这种安排容易导致专制；其实这种安排已经导致专制。此外，在各届代表大会上激烈地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扣压它所厌恶的信件，又任意修改、甚至捏造别的信件。一个建议主张联合会方面接收机关报，大会认为办不到，把主编与主席分开也被宣布为不适当。相反地，决议把联合会的分散

在许多地方的二十四人理事会集中起来，并将移驻汉堡。这是施韦泽的独裁所遭到的第一个有力打击。在讨论这事的时候，他作了一个不得已而揭发自己的通知。他说：“这是我們最后的一次大会了。普鲁士政府的敌视日益增长。联合会将被解散。”瞧啊，刚刚三个星期以后，莱比锡的警察厅（因为联合会的地址是莱比锡）就由于地方财务管理处而把联合会解散，可是这一机构是从一开始就座落在联合会里的。

毫无疑问，施韦泽事先就知道这次的解散，这甚至是他和柏林警察厅商量好的，而莱比锡警察厅是按照柏林的意思把联合会解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施韦泽当然不会向地方政府和内阁控诉莱比锡警察厅的这个措施。施韦泽在他一篇有关解散联合会的文章结尾说道：

“我們之所以服从，只是因为按事势这样做最为合理。所以我也借此声明：

‘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了……’

全德意志的工人们！我們今天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坟前。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生存在我們中間。

我們也这样站在拉薩尔的坟前；但是他自己还存留在我們中間。

我們的联合会被解散，这就使他，使我們获得荣誉。联合会对于工人事业尽了自己的职责——所以它被解散了。

旧的形式毁灭了——我們会為我們所努力的工作覓得新的形式。”

接着他感謝所賦与他的信任。

“我們曾經同斗争、共患难——将来我們还要同斗争、共患难。”

他这样对多情善感投机，把会员們感动得落泪，于是继续信任他。

如果普魯士政府像施韦泽作违心之論所写的那样对联合会曾抱敌意，那么现在他的义务和职责就是尽可能使联合会不受普魯士政府的影响，比如说，把它迁往結社集會法不禁止联合的漢堡。此外，联合会在漢堡—阿尔托那的会员最多，这对联合会以及报刊的财务都是真正的支柱。在漢堡也不缺乏精神力量。施韦泽却不这样做，而在柏林警察的注視之下建立新联合会，把柏林作为會址。但是，普魯士同薩克森一样有对于联合的禁令，而且当时普魯士的結社和集會法还規定，联合会必須把全德国的會員名单呈繳警察局。并且他又一次洩漏了他同柏林警察厅的关系和他对于解散联合会的贊同，因为他在第一一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說道：

“人們所以选择柏林作为党的地址，是借此使警察可以不断地有机会来证实，党是根据和遵守現行法来进行它的鼓动的。”

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对亲爱的警察是多么令人感动地恭順呵！

如果施韦泽同柏林警察厅之间的亲密联系有可以证明的一天，那么现在就证明了。但是不仅是联合会现在处于柏林警察厅监督之下，而且施韦泽也利用新建联合会的机会完全取消漢堡代表大会上使他感到不舒服的決議，并且通过新組織巩固他的比以往更无限制的独裁。他公布新計劃时說：

“無論如何要設法保护党在全德意志的統一。因为这个統一是我们最好的珍宝——它是拉薩尔組織的基本思想，这是我們永不放弃的。”

所以，这样經常引证拉薩尔，无非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和蒙蔽會員們。

联合会的新建事业是由少数选拔出来、曾和他同甘共苦的人們不公开地进行的。新章程包括了一些簡直令人吃惊的規定。根据这些規定，主席要在开正式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由联合会會

59 員在基層單位中選舉出來，也就是還在代表大會討論和考核他的業務管理以前，於是代表大會上的不信任票就沒有效用，而對於他的活動的討厭的批評也同樣無效。此外，章程的第五條說：

“如果主席認為迫切需要，他就可以採取一切措施，但限於三個月內由理事會批准。”

與漢堡代表大會的決議相反，理事會本身又可以分散在德意志各地。代表大會只能在這樣情況下着手改變章程（第七條），即如果這個建議是由六十個會員署名並且在代表大會前三個月送達理事會的。關於聯合會究竟在哪裡和如何重新建立，人們從來沒有得到確實消息。但是警察廳必定得到了通知，否則它不會承認這個聯合會。我們這個時代有組織的工人在閱讀這些會議錄時會質問，這種事情如何可能，並且聯合會的絕大多數會員難道不會一致起來抗議這種罪大惡極的行為，把主犯立刻撤職嗎？這一切都無蹤跡可尋。施韋澤用他的報刊絕對地統治着聯合會；任何人胆敢辯駁，他的申訴書就被丟到字紙簍里，誰敢在集會上出面，他就被斥為拉薩爾組織原則的叛徒，予以開除的處分。在聯合會中這個人算是完了。如果有人被覺察到，他同情李卜克內西和我，大多數會員就把這看作一種罪行，如果可能，把它看得比血族通奸或謀害人命還重大。這是他有系統地進行挑撥的結果。

但是一部分聯合會會員的見解卻轉變迅速得出乎我們當時所認為可能的程度以外。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施韋澤在從十月十日起擴大的《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時有三千四百個訂戶）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通告，在通告中說明了他對聯合會財政狀況的看法，由於聯合會的發展，財政情況基本上已經好轉。他在結尾時宣稱，他因為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工資和資本紅利》，將要“進入監獄過孤獨生活”三個月。文章的結語是：

“关于組織，拉薩尔曾說，必須把一切单个力量集中成为一把铁錘。党所以选拔我做它的領袖，是认为我的臂膀有足够的力量来抡这把铁錘。我希望，我的这种力量永不衰竭。”

在自負上，这种說法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十二月初，他进了監獄，但是十二月將終时，因为他的父亲病重，他又从獄中被放出来，他的父亲死于年終以前。施韦泽請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家务。可是当他請假出獄后，又耍起一八六六年的那种把戏。一个星期的假变成了許多星期，現在施韦泽又开始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好像給他的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宣称，主席还有好些天不能执行党的业务领导。一月十四日，施韦泽在警察的監視之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談話，并定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巴門—愛北斐特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按正常手續，施韦泽决不能参加这次大会，因为这期间他的徒刑还未滿期。但是他却早已知道，他在这件事上会有自由的。他还指示，主席的选举应当按照他所欽定的新組織章程，在大会前六个星期，即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月七日之間举行。

此外，他宣布将在中德意志一个城市中召开理事会會議，會議上将对南德意志和薩克森的鼓动活动作出決議。《社会民主党人报》現在对我们采取了更加尖銳的态度，因为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間受奥地利政策的指导。这里应加說明，在这期間，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对奥地利所屡次采取的策略，我认为是彻底錯誤的，因而在我們之間一再引起意見分歧。李卜克内西正是个走极端的人。他常常过份地仇恨俾斯麦和北德意志同盟，他也过份地倾向奥地利，他过份地信賴奥地利自由資產階級內閣有成就。施韦泽自然会利用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弱点。在这里我要附帶說明，在一八

六七年施韦泽也有个时期，有意支持那个资产阶级内阁。他显然要想在维也纳为霍夫斯台登铺平道路。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們用最猛烈最沉重的攻击继续进行我們以往在《民主周报》和人民大会上对施韦泽所进行的斗争，暂时停止攻击是因为我們被邀请到爱北斐特—巴門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以便对施韦泽提出控訴。关于这件事的序幕，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經詳加叙述了。

这里要来夹叙一下，一八六九年初，哈森克莱維尔在杜伊斯堡的复选中也被选入国会。因为我认为哈森克莱維尔不同意施韦泽的活动，并且誠心誠意地要与他联合，所以我募集了十二塔勒給他寄去作为支持选举之用。当时我們双方在选举上，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用成千上万的馬克来计算。每一塔勒都当作一笔巨款。关于这，我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民主周报》上宣布，哈森克莱維尔对于給与他的同情和支持表示非常欣幸和滿意。他对于工人党的各派中間发生的分裂表示遺憾，并且希望，我們同他自己的党的其他領袖之間存在的或者會有的只是导源于个人的分歧不久即可消灭。他十分确信，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团结的队伍在一个旗帜之下进行斗争的时期已經不远了。

哈森克莱維尔的这个声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我們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来讲話，这样的承认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直到施韦泽失势之时所不給与我們的。至于统一的完成自然是后来在哈森克莱維尔继任施韦泽的主席职务后，还又經過了几年，才实现的。好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皇儲，都比后来作在位君主时要开明些。

二月十四日施韦泽宣布选举結果；他又以約計五千票对五十

四票当选为主席。如果人們考虑一下，在几星期后巴門一愛北斐特的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會員是一万二千人，那就有四十个地方根本没有投票，所以那次选举无异于一个道德上的投不信任票。在施韦泽的政治休假达到了目的以后，他在二月十八日又进入监狱，但在三月四日，即国会开会的前一天，又被释放出獄。

这次的开释再度证明了施韦泽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会成立，即从一八六七年到今天，在国会开会期間，从来没有一个国會議員，包括資產階級的議員在內，为了参加會議而被释放出獄。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开会期間，甚至有一个阿尔薩斯議員必須开始他的两个月監禁。政府，首先是普魯士政府，同国会的多数派一样，始終认为宪法上有关議員免刑的第三十一条并不包括徒刑在內。与普魯士也早就使用的几十年的慣例相反，現在施韦泽竟被准假出獄，这不得到主管部长的同意是办不到的，而部长如果没有俾斯麦的許可也是不敢同意的。

此外，俾斯麦对于这类事情怎么想法，鮮明地表现在四月二十八日，即施韦泽請假出獄后几个星期的国会辯論中。門德曾在慕尼黑一格拉巴赫举行了一个集会，会后发生暴动，門德被捕，因为据说这场暴动是由他而起，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施韦泽提議释放門德。在討論中俾斯麦也发言，并以他那专橫的口吻反对开释。但国会根据当前的事实必須违反俾斯麦的意思来作決定。于是他就采取报复手段，他发給那些指示和执行拘捕門德的官員們奖章。而且門德的情形并不是像施韦泽那样已經发生法律效力的徒刑，而只是拘押待审。

在那件事以前不久，我无意中亲眼看見施韦泽和阿尔伯萊希特亲王(国王之弟，国會議員)的会見。我順着走廊走过来，看見阿尔伯萊希特亲王同几个保守党議員在走廊那头一起站着。施韦泽由側面走廊走来。亲王一看到施韦泽，就招他过来，向他伸出手去

让他紧紧握住，并且很亲切地问：我亲爱的施韦泽，您好？施韦泽：谢谢，殿下！亲王：您昨天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施韦泽：我出席的，殿下！亲王：那么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人们都期望您讲话……我赶快进入会场，以免像个偷听者。谈话表示出，施韦泽已经常常同亲王往来，而且还表示出，国会中右派的“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施韦泽激进的言论意味着什么。

巴門—愛北斐特的代表大會

當我們在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到達巴門—愛北斐特時，一批全屬於國際方面的同志在迎接我們。關於我們當天晚上的討論，我在夜里還寫信給馬克思說：

64 “李卜克內西和我正在愛北斐特和少數同志準備明天的戰鬥計劃。我們在這裡聽到了這樣多的施韋澤的無恥下流行為，真令人毛骨悚然。也明明白白證實了，施韋澤所以推薦國際綱領，只是為了給我們一個主要打擊并把一大部分的反對派分子打倒或者拉過去。所以我請您，同時也以李卜克內西和此地全體朋友的名義請您，對於通過施韋澤的代表大會決議暫勿理睬，或者至少只是極其慎重地予以答复。

詳細報告不久就寄上。

關於明天辯論的結果還沒有什麼可說，只有一點可以奉告，施韋澤用盡一切陰謀詭計來煽動反對我們，我們決不能希望有徹底的成功。為了消滅他自己聯合會中一切反對派的組織工作，已於數星期以前在這裡非常干練地完成了。舉個例說，昨晚施韋澤來到時作了個真正的勝利遊行穿過愛北斐特—巴門。（坐着用白馬駕着的華車。）就此擱筆。”

施韋澤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宣稱，敵人已逼到主席（即高干一切的人物）跟前來了，代表大會必須比以往更加嚴厲和堅決地把

对組織的，就是說把对他所欽定的組織的一切攻击打回去。

在預備會上违背了施韦泽的意旨（他本来想把同我們的会見，如果不能避免，就向后推延），以三十票对二十七票決議准許我們立即出席。次日下午，我們在施韦泽的狂热追隨者的怒視之下进入了拥挤不堪的會場。李卜克内西首先作了約一小時半的发言，我接着发言，說得基本上簡短些。我們的控訴总结了我迄今对施韦泽所提出的控訴。发言遭到多次猛烈的打断，尤其是当我把施韦泽叫做政府的代办的時候。据說我应把話收回。但是我拒絕了。我认为，我有权利自由說出我的意見，而听众們可以不相信。

《社会民主党人报》把我們的发言作了极不完全而且一部分捏造的报道，借以欺騙讀者。李卜克内西过份地守信义。他不作任何报道，而仅限于在《民主周报》上宣布說，我們出席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并提出了我們对施韦泽的控告。施韦泽以六千五百票对四千五百票（这些代表在投票时弃权）得到了信任決定。因为我們把希望即使不建立在社会民主党各派的联合上，也建立在各派的妥协上，所以《民主周报》不再发表攻击施韦泽的文章，假如对方也保持这种策略。但这并未实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而繼續攻击我們。 65

当我们发言时，施韦泽在讲坛上坐在我們的后面，一言不发。我們离开會場时，几个代表走在我們前面和后面，以便保护我們免受施韦泽的狂热追隨者的暴行。不过，当我们走过夹道的人群时，还是听到了許多恭維話，如“流氓，叛徒，黨三，应该打得你們粉身碎骨”等等。會場中有一个人企图趁我步下讲坛时照我的膝弯里一下把我打倒。我們的朋友在門前迎接我們，权充卫士把我們送回旅館去。

施韦泽向代表們要求信任投票。在热烈辯論后他取得了上述的票數。代表中弃权的有白拉克、布劳埃尔、魯道尔夫（汉諾威）、

馮·达克、盖布、希尔施、波尔、拉斯貝(埃森)、石拉德、路易·叔曼(柏林)、斯皮尔、亨利希·孚格尔、維尔克和約尔克。

这些人因为拒絕投信任票必須受严重的惩戒；《社会民主党人报》對他們的攻击密如冰雹。信任投票的決議說：

“鑒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先生的講話中并无任何新的和重大的东西，代表大会聲明，联合会主席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拥有德意志工人党的完全信任。”

对于施韦泽，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意味着一連串的黑暗日子。在萊比錫警察解散联合会后的秋季，他給新組織所拟訂的独裁条款，現在被代表大会決議牺牲了。首先決議联合会领导由一个十五人的理事会来代替以往二十五人^①所組成的理事会。除了主席、司庫和秘书以外，其余的十二人必須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經常接触，并且能够随时召开會議。理事会會議由該会主席召集，不像以往由联合会主席召集。而且联合会主席不再是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选举，而是在大会以后才由联合会會員用直接选举的办法来选举，会后应将记录公布，使得會員知道大会上完成了些什么。关于主席的权力，他发出的指示本来可在三个月內由理事会追认批准，現在限为八天，于是权力就变成空洞的东西。此外，理事会只要多数通过，就可以决定联合会的內部組織、业务程序、奖励办法、文牘和會計事宜。更有进者，遇有政治的騙局或重大的侵吞公款情事发生时，理事会也有权停止他的职务，并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或举行基层投票来作最后决定。由于这些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規定，施韦泽的权力受了大大的限制。这些決議证明了对他还充滿了很强烈的不信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規定，虽然遭到他的反对，仍被通过。此外，还設置了一个由三个柏林會員組成的

^① 理事会的人数前面說是二十四人，此处作二十五人，恐系笔誤。——譯者

監察和申訴委員會，接受一切對編輯部的申訴並對此作出決定。這些決議為聯合會奠定了徹底民主的基礎。施韋澤的全能受到限制，他非常沮喪，回到柏林後竟想向我們靠攏。四月八日，我寫給我妻的一封信里說道：

“施韋澤，雖然我起首沒有理他，在我同另外一個同事談話時，却悄悄地來到我跟前。會議結束時，他請我同他、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萊維爾一道吃飯。不顯得粗暴，就無法推脫這個邀請。於是施韋澤派他的漂亮馬車和穿制服的仆從來把我們送到吃飯的飯館（我們在歐爾布里希飯館吃飯，這當時是一家巴伐利亞的啤酒館，在菩提樹街附近的萊比錫街）。飯後他堅持派馬車把我送到我要去接李卜克內西的安哈爾特車站。”要附帶說明，他這餐飯費是各自付賬的。 67

在吃飯中間還商談了有關停戰的條件。我同他們事先聲明，李卜克內西不在座的時候，我不能作絲毫的決定。他們三個對我一個人來談判，使我不無疑慮。隨後的幾天我們在國會繼續開會。施韋澤要求，雙方不僅在報刊上和會議上停止互相攻擊，而且兩黨成員也不得互相作政治性的往來或從事共同的活动。我們拒絕了後者，且則一般說來我們屢次很激烈地互相爭吵，對施韋澤沒有絲毫退讓。雙方互相敵視，對於我們是一種侮辱，對於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也是一種侮辱。所以既不准個人互相攻擊，也不准組織互相攻擊，乃是理所當然。我們也約定，將來在國會里由這一黨或那一黨提出的建議要互相支持。《社會民主黨人報》為此在四月十六日第四十五期上發布通告說，今後它既不對李卜克內西和我，也不對我們的黨進行攻擊，並且要求聯合會會員依此行事。另一方面，我們在《民主周報》上發表了相似的聲明。

這樣，一切好像是在最美好的和諧之中。但是施韋澤不能適應這種新秩序；一個像巴門—愛北斐特代表大會所造成的民主組

68 織，等于断絕他的政治生命。这个組織像是給他戴上枷鎖，以往用慣了的政治两面性将来行不通了。特別足以說明他当时的态度的还有，他命人照他去年夏季对汉堡代表大会記錄那种办法把关于爱北斐特的詳細會議記錄加以扣留和消灭。凡是揭穿他的真象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让联合会會員和大众知道。

六月十八日第七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像晴天霹靂似地发表了一篇公告，标题是：恢复拉薩尔党的統一，由施韦泽和門德署名。这里要重述一下，自一八六七年初以来，有一部分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影响下脱离了联合会，而以“拉薩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另行組織，由門德任主席。这个联合会的机关报是《自由报》。从此两个联合会互相爭吵不休。現在这些敌对的伙伴，只就他們的主席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而言，突然言归于好，在他們的党徒之前携起手来。

发表的通告是一篇非常富于詞藻的文章，以歌頌拉薩尔为开端。又引证拉薩尔的話：“你們要保持組織，它将引导你們走向胜利”。继而夸大其辞地說：

“两个联合会所选出的領袖彻底地認識到这一点；今天他們兴高采烈地出現于两联合会會員之前，并且要求他們协助建立伟大的事业……一个威震整个德意志的真正全德工人联合会……我們把我們的建議提交給两联合会全体會員，就是說給至尊的人民，由他們自己直接地即時作出決定。（原文也有着重点。）

这是拉薩尔的旧章程，我們昔日曾團結在这章程之下，我們必須再回到这章程之下，以便这次在統一发展这个基础上共同迈步前进……”

然后要求应在本月二十二日之前（通告的日期是十六日，六月十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十九日或二十日才能到大多数會員的手里）把他們的建議付表決，而且必須在二十三日把表決

結果送達柏林。

通告還聲明，如果表決結果同意門德一施韋澤的建議（施韋澤故作謙虛，退居庸碌的門德後面），應在六月二十四日把兩聯合會解散，就在當天由幾個同志集合在一起，遵照拉薩爾的舊章程議決恢復原先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應在六月三十日選舉主席，七月三日宣布結果。在選出主席之前，門德應執行主席職務，特爾克執行秘書職務，白拉克執行司庫職務。通告的結尾說：

“同志們，請促這事的實現，在拉薩爾的逝世紀念日，我們大家要全體在他的墳墓上攜手，並且要說：我們表現得無愧於這位巨匠。”

兩主席的這種行為是個政變。這樣一來，愛北斐特代表大會所給與施韋澤聯合會的民主組織一下子被毀滅了。施韋澤也一舉而粉碎了加在他身上的枷鎖，又成為絕對的統治者和獨裁者。施韋澤擔憂駐在漢堡的理事會的反抗，為了打破這種反抗，他派他的親信特爾克前往，他對理事會的勸誘成功了。蓋布打電報說：“理事會考慮了特爾克所陳述的理由以後，一致擁護恢復統一。會員大會同意。”

但是現在關於施韋澤、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爾和我們之間的協定也算取消了。為了這個目的，施韋澤在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十二期《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聲明說：我們撕毀了這個協定，因為我們重新故意地而且惡意地企圖干涉我們所憎恨的全德工人聯合會這個組織。因此，我們把有關的協定解除了，他們現在也不再受它的拘束了。

所犯的这个“罪名”首先落在我的头上。我在六月間在十二個屠林根的城市中舉行了集會，其中也有阿波爾達、愛爾福特和哥達。這里由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召集開會，他們也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全權代表擔任主席。一切集會都是人滿，而且經過異常良好。

70 在那些集会上通过了一个決議，決議是，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原則能够改善劳动階級的处境，并且必須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工人归于統一。

我的鼓动旅行以爱森納赫的代表會議为結束，除了我們的信徒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會員和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这里应加說明，当时在屠林根有相当数目的资产階級民主党人，他們全都采取雅可比的立場，其中有阿柏教授和他的岳父斯乃尔教授，此外还有在耶拿后来加入了党的徐博士，爱森納赫的克略茨納赫律師等。此外在魏瑪、哥达和阿尔登堡也有这个党的信徒。在爱森納赫的一个決議中声明說：

“为了共同解决社会問題，不仅要求停止民主的工人党各派之間的分裂，而且民主的工人协会也要同整个的民主党團結一致，尤其是在共同的政治事务中，特別在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要一致行动。”

那么，这就是促使施韦泽进行反对我們的罪行。

再者，不論鼓动工作取得多少成績和贊揚，我对它仍不滿意。六月七日，我由隆乃堡写信給我妻說：“即使人們向这个人表示热爱和友誼，鼓动工作仍不是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后来还是干了那么长久。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施韦泽和門德的政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會員中惹起了憤慨。一部分較有知識的會員看透了，不能再同施韦泽和睦相处，他是團結的障礙。白拉克經布雷麦尔(馬格德堡)的介紹通知李卜克內西和我，他們希望同我們会一次面。我們欣然滿足了这个願望。六月二十二日夜間，我們——白拉克、布雷麦尔、斯皮尔(沃尔芬比台尔)、約尔克(哈尔堡)、李卜克內西和我——在馬格德堡的

一个三等旅館里会面。談判了很久。白拉克和布雷麦尔主张立即向施韦泽进攻，并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斯皮尔和約尔克則有很大的顾虑。他們认为必須試一試“由里向外”来改革联合会；我們回答他們說，巴門一受北斐特事件正足以說明由里向外的改革是什么样子。在施韦泽充当主席并掌握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期間，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們一致了。杰出的白拉克伏在旅館客厅里的弹子台上抄写一篇宣言，然后为了这个宣言征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签名，这时已經半夜。我們把宣言又彻底詳細地討論一遍，到將近三點鐘才就寢。然而，真倒霉！我們躺在臭虫窠里了。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入睡。四點鐘就起來，搭早晨第一班火車回家。決議要在一个中德意志城市——哥达或愛森納赫——召开代表大会，并邀請德意志—奧地利的工人协会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派人參加，也請求國際的德意志支部派代表出席。

因为會議的历史意义，我把白拉克及其同志們的宣言原文抄录如下：

給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們

同志們！我們联合会的主席在一大堆虛偽的套語之下，采取了使每个有思想的會員必然滿心憤慨的手段。署名人应这种事态的要求，匆匆忙忙地（所以對於冷待也沒有人想抱怨）舉行了一次集会并一致同意一个對於党将有深远影响的步驟。我們請求你們，同志們，慎重地、毫無成見地審查我們的意見。

不久以前，施韦泽和門德先生，这两个極其激烈地以反动派的走卒互相指責的人，还不願与聞工人党各派的合并，忽然在今天（取得了哈茨費尔德伯爵夫人的同意）在他們的联合会會員之前，以动人的詞句来要求會員們导致单单党的这两个派別的统一，而對於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團結却一字不提，并且这一切都在蔑視所謂“至尊人民”的權利的情況下进行。不仅表決期限那么短促，使会

員對於問題不可能真正作出判斷，所以一切都完全好像是突擊；不僅表決的形式簡直像用手槍抵住會員的胸口逼着他說是或否，這樣，要末順從那最可恥的條件，否則放棄所最渴望的統一，哪怕只是零碎的統一；不僅是這種表決形式與一個懷有民主思想的人不相稱，而且就是主席也那麼專權獨斷地辦事，這幾乎是沒有先例的。就是對待美洲奴隸也絕沒有比這裡對待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更橫行霸道的。那麼，在採取這種極為重要的步驟之前，為什麼還要徵求會員或理事會的意見呢？！等到事情完了，就用幾句花言巧語逼出會員的“自由”同意。施韋澤先生一吩咐，會員們就只有聽從，然後稱他們為“至尊的人民”。對於一個人，沒有比這更大的侮辱了。如果施韋澤先生認為是好的，就責成會員們親手把多年來辛勤締造的改革事業一下子毀滅掉，並且立即接受以往造成最激烈的分裂的章程；這章程使主席掌握最漫無限制的權力而理事會毫無影響，除此種種之外這個章程還可以這樣解釋：在整整三年內章程不可能有任何改變！主席在這種情況下的行為——小型的政變——使許多聯合會會員多年來的懷疑得到證實，馮·施韋澤先生只是利用聯合會來滿足他的野心，並且想把聯合會貶成敵視工人的反動政策的工具；否則，他現在就會設法使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全體工人團結一致。誰只提倡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團結，而不盡力從事唯一能使黨獲得權力和影響的全黨團結，誰要是用這種形式使一部分團結而使全部的團結成為不可能，誰要是這樣做的時候嘴里還說着動聽的、洋溢着兄弟友愛的詞句，他就是個十足的偽君子；而且誰要想把那些不服從提出的可恥條件而願致力於某些較偉大的、某些較高尚的事業的人們都污蔑為團結的敵人，他就是一個蓋世無雙的陰謀家。

每個誠實的社会民主黨人必須為導致德國全體社会民主黨工人的團結而努力。面臨運動的日益壯闊的浪潮，面臨世界上一切

文明国家里暗示着政治和社会情况很快就要有重大变化的预兆，73
拖延这个团结就是叛逆。

但是，这个团结却只能是真正至尊的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你们，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不能让几个领袖任意把你们当作一群羊出卖，你们要作掌握自己命运的好汉！

我们深知，一个组织中个别人物的意志竟能蔑视联合会的一切成就，甚至能随时使联合会本身成为问题，能使联合会随时被解散而后再按照与他相宜的形式恢复起来，在这个组织中，这位个别人物用工人的几块钱去贿赂可耻的流氓，一个这样的组织里面没有丝毫民主的精神。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要想以后有所作为，那就是白白浪费我们最好的力量；我们不要它！

我们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只有党自己能够决定它的组织，此外还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要造成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以及职工会的团结，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一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就能奠定与国际运动相结合的党的真正民主组织的基础。同志们，我们指望你们的支持！以往总是满心怀着人为的互相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并能给自己一个把他们的原则精神同他们一切力量的集结统一起来的组织。

同志们，你们决不要被那些从不把党的团结放在心上的人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你们不要容忍那种只敢拿来对付无廉耻的或无思想的人们的手段；你们要表现你们的本色，——不要作个劣性主人手下没有意志的奴隶——，而要作独立决定创造自己命运的实在和真正至尊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原则，为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冒险干一次英勇行动吧！让我们不要白白高举写着全党团结的旗帜！只有团结起来，工人才是一股力量！分散开来，我们就永远是敌人笑柄，但是统一和真正民主地组织起来，我们

就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你們同意我們——我們非常盼望你們如此——，那就請把你們的同意通知署名人中的一个，以便我們共同进行召开代表大会。

74 我們要(我們沉痛地下此决心)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曾是我們所最关心的，但是为了事业，人們就必须懂得不惜最重大的牺牲；并且除此之外，沒有办法！

那么，同志們，在爭取我們伟大崇高事业的神圣斗争的新道路上前进吧！热誠和坚持保证了胜利。

J. 布雷麦尔(馬格德堡)。霍夫曼(紐斯达—馬格德堡)。W. 克莱斯(馬格德堡附近的布考)。太·約尔克(哈尔堡)。C. 穆勒、S. 皮尔和 A. 費維希(沃尔芬比台尔)。W. 白拉克(小)、H. 艾勒斯、E. 吕台克和 A. 石拉德(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埃尔乃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民主周报》上我們发表了上述的宣言，在同一期上也发表了我們給同志們的一个声明，其中駁斥了施韦泽說我們破坏与他成立的协定的指責。然后我們对門德—哈茨費尔德—施韦泽的联合喜剧进行了尖銳的批評。我們声明：“我們將进行决战，并且用一切力量和信心同明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个决战。”我們結尾說：

“究竟是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賄賂，还是我們这里的誠实和目的純洁得到胜利，將見分曉了。

我們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們的原则而行为上背叛我們的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我們在这个声明和以后一再使用我們的誠实意图对施韦泽的不

誠实意图作斗争，所以后来对方给新建的党起了一个绰号“誠实派”。

由于我的建議，中央理事会一致決議，贊同白拉克等同志主张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并且要求工人协会的理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通告，要求最迟在七月一日午时答复，必要时可打电报。我也写信告诉日内瓦的約·菲·貝克尔，国际的德意志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样可以寄来一份贊成团结事业的声明。我希望，这一次我們这个总攻击能够成功。六月二十六日，盖布、普拉斯特和欧克尔曼（汉堡）也声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同意白拉克等同志的意见。

75

《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遵行的策略是，經常宣称我們的群众不是由工人构成，而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和其他资产者組成。

施韦泽繼續設法用他所具有的巧妙手腕抓住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由他系統地培养出来的弱点。他在一篇文章里关于反对派这样写道：

“单只一点就可以决定一切。你們是不是民主主义者？你們断言：是的？你們知道不知道，民主主义者要服从多数——如果这个多数近于全体一致，更要加倍服从！那么，好吧！全德工人联合会，即以往的两个联合会几乎全体一致說：是。你們现在服从人民意志嗎？哦，不！在你們的浮夸中，你們‘民主主义者’說人民是一群羊，說你們的意见不会錯誤。去你們的吧，你們这些吹牛皮的伪君子，你們自以为比全体人民、比斐迪南·拉薩尔还聪明些！

比斐迪南·拉薩尔，比你們伟大的导师和宗师还聪明——是的，是的。因为，你們的絆脚石，即拉薩尔組織又完全建立起来了……”

耍弄拉薩尔組織的文字占滿整栏篇幅，并且几乎是一期又一期地繼續下去。

另一方面，《民主周报》一期又一期地刊载着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发出的反对施韦泽的声明。这种声明来自哥达、汉堡、希尔得司海姆、爱尔福特、汉诺威、索林根、威斯巴登、爱北斐特、开姆尼茨（末一个反对門德）。还有一向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秘书的H. 罗洛尔，也声明反对施韦泽。

工会的领导人们，卷烟和烟叶工人协会主席弗里茨舍、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叔曼、德意志木工联合会主席特·約尔克和全德裁缝协会主席邵布都声明与施韦泽断絕关系。

76 七月五日，門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說，施韦泽以絕对多数当选为主席。他自己（門德）虽曾屡次声明不接受推选而仍得到相当多的少数票。数目沒有宣布。参加选举的人数比预期的人数相差很远。在門德宣布施韦泽当选为主席的夸张的讲话中說道：

“如馬拉^①——他那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很恰当地描述的：主席要像腿上釘着一个球的独裁者那样领导联合会，而且这个球应该是：原則和組織。”

大家知道，这个球证实是件冒牌貨。并且門德又一次引证說：

“对組織要忠誠不渝，它定会引导我們达到胜利”，在結尾說：“斐迪南·拉薩尔万岁！他所創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組織万岁！”

施韦泽在他致謝当选的讲话中也同門德一样夸张和強調。結尾时說：

“那么好吧！以把你們大家、你們工人由睡梦中喚醒的去世宗師的名义——以我們党的选拔我为領袖的至尊人民的名义，——

① 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家，人民領袖，学者。——譯者

以你們全世界的受苦兄弟們的名義，我張開旗幟，舉着它前進。緊緊集結的行列，你們這些工人的隊伍，跟隨着逃出來的領袖吧！

拉薩爾的精神不死！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工作萬歲！”

這麼兩個占卜家，後來很快地就顯露出來是兩個受騙的騙子。所以七月十日，施韋澤下令選舉二十四人理事會的成員，他預先提出了候選人名單。當選的理事會仍舊照以往那樣分散住在德意志各地。

施韋澤在七月十四日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宣布，全德工人聯合會將參加我們所召開的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並公布一系列的決議草案，要由他的信徒在會上提請討論通過。在上述一期中還說，整個自由資產階級中各色各樣的人作我們的代表大會的後盾。所以我們在文人、鄉村教師、商人的領導下當然談不上緊密的、統一的組織。這些人每個都必然找機會以重要人物自居。他進一步扯謊說，全部的資產階級報刊都由我們支配。他要留意派遣相當數目的代表去參加愛森納赫會議，但他們決不是文人和資產者，而是真正的工人。 77

他從現在起說我們的黨只是由文人、鄉村教師、商人等所構成，與他以往所說的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知識分子沒有兩樣。

《民主週報》在七月十七日要求施韋澤不要只派遣他的工具往愛森納赫，而要他自己來。若是施韋澤大人為禮貌起見還會讓自己被禁閉起來，那麼，只要到柏林警察那里說句話，就會准他的假。

施韋澤選取了入獄的辦法。他發表一篇填着七月十七日的長篇《告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書》，書中又概括地敘述一下存在着的混亂并作了一些將在他從監禁里開釋後去實行的諾言。宣言的末尾說：

“請把我牢記在心，就像我在監獄圍牆里面對你們念念不忘一樣。我向你們告別，高呼：在古老旗幟下再行歡聚吧！全德工人聯

合会万岁！”

他现在应在“监狱围墙里面”服刑的期间还有八个星期，他可以在鲁迈尔堡湖上划船和作其他娱乐来消遣。

现在来想一想下列情形。十一月底，施韦泽为服三个月监禁而入狱。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准他请假八天去处理家务；但是他自由了七个星期，在这期间，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着紧张的政治鼓动，到了二月十八日才又入狱。三月四日，政府又一次帮他的忙，为了国会开会准他请假出狱。国会到六月二十二日闭幕，但是施韦泽仍然自由，并且又一次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紧张的政治鼓动。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走进监狱。

78 这种情形，无论在施韦泽以前和以后，在普鲁士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八六八年基多·威斯博士以违反出版条例的罪名被判了十四天监禁，几个警察在早晨六时袭击睡在床上的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在大清早把政治犯从床上拖进牢狱的残暴方式是柏林警察数十年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革除到现在还没有几年。施韦泽从来没有因为受这样或类似的虐待而诉苦。他入狱出狱，就像他进旅馆和出旅馆一样。他可以接见一切他愿意接见的来访者。由此可见，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正当的。

在爱森纳赫会议前不久，特尔克希望在政治方面伤害我，认为必须向我的头投掷一颗臭弹。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八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说，我由前汉诺威国王那里每年领到六百塔勒的薪俸。这种指责是愚蠢的，但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竟有人相信。于是我决意以诽谤罪控告特尔克。我请求威廉·艾希霍夫同志同当时柏林最早律师希尔塞门采尔谈谈并问他可否接受这个案件。希尔塞门采尔不肯接受，他认为这个官司打不出什么结果来。法官从断言我领受一个王侯的津贴这句话里看不出有什么败坏名誉，

而拒絕为此提取证据。特尔克充其量不过被判誹謗罪，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此外，希尔塞門采尔还认为，我若去請前汉諾威国王的宫廷大臣普拉頓伯爵来作证人，来证明特尔克所說的是否属实，这样，伯爵单由于前后一致就会拒絕作证，因而特尔克的主张就好像是有根据的。艾希霍夫曾为此两次写信給特尔克，要求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证据，因为他断言我为前国王服务是“确有证据”的。特尔克保持緘默，我为此也同样要求他公布证据。他不公布证据而只是重复他的指責，并要求我控告他。于是我称他为卑鄙的誹謗者，并且要他在萊比錫法院控告我，因为在柏林这官司难有結果。事情就这样毫无結果地算了。特尔克对白拉克解釋說，他这个主张他自己并没有证据，但是这意見是一个政府顧問(!)提出的，只能在我这方面提出控訴时，他才能迫使那个人前来作证。

79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 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在我們商妥于八月七日在爱森納赫召开代表大会之后，于七月十七日在《民主周报》上刊出了宣言，署名的有：各地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六十六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會員一百一十四人（其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一批拉薩尔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員，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协会会员；代表奥地利工人的是H. 奥伯溫德、H. 哈同、B. 貝善、A. 馬赫尔、A. 斯特拉塞（格拉茨），还有代表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德意志支部的約·菲·貝克尔。

73

宣言上說：

告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

同志們！最近在我們黨內所做的事情必定使每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滿心欢喜。迄今加在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束縛被打破了，过去像一个尖楔子插入我們黨的骨髓、心臟中的个别人物的自私自利，現在被揭穿并被粉碎了，現在要赶快行动，以免我們的胜利果实又被夺去，并且可由刚刚完成的有益革命中产生纯洁的原則和統一的組織，沒有这些我們黨就不能发生应有的影响，不能發揮固有的力量。

80 长期以来（可惜太长了），个别人物的自私和恶意使得黨內自相敌对。但是新时代开始了；它坚定地指示我們，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政党本身有必要團結起来，引导黨走上伟大工人运动的正确的、建立在国际基础上的唯一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个思想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能够对这种必要漠不关心嗎？誰能不預料到，由于这样的統一，即在一个共同的組織、一个共同的綱領、一种在政治界社会界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統一，对于我們黨有不可估計的利益？——我們毫不怀疑，我們大多数，絕大多数的同志都尊重較好的意見，他們高兴而且乐于为这最后将使我們黨能够达到伟大有力的权力发展的宏伟事业貢獻力量！

我們既抱着这种信念，于是在今年七月六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一次會議上，关于对此首先必要的步驟完全达成協議，并遵照那次的決議訂于星期六（八月七日）、星期日（八月八日）和星期一（八月九日）在愛森納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會。

代表大會的議程包括下列各項，但是并不妨碍其他建議：1. 黨的組織。2. 黨綱。3. 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4. 黨的机关报。5. 职工会的統一。

有关这五項議程的特別建議，例如有关黨組織的提案等的原文最迟将在本月底印就发出。

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須持有写明他所代表的地方、以及他所代表的选举人的数目的委托书(全权)以证明其資格。这种证件可以用协会或分会的名义的委托书，或者是由为了派遣代表出席會議而举行的群众大会所出具的委托书，最后或者是由在某一地方出席的黨員同志所签证的委托书。有些地方在一地单独派遣一个代表有困难时，可以由許多地方联合起来，以期至少共同委派代表一人。

因为有迫切的必要使代表大会在星期六，即八月七日，晚八时开幕，以便能选出办事处和規定办事規程，所以代表們務必也在这天(八月七日)到达爱森納赫。

我們抱着很愉快的希望，伟大的全德意志的一切地方，凡是有劳动同資本势力作斗争的地方，凡是有人民意志为了自由天天同国家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地方，都委派代表来参加會議——我們希望代表大会将增进党的福利和发展，党用如火如荼、永不磨灭的文字在它的旗帜上写着被压迫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起来，同志們，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通过大会为党的**壮大和統一而努力。**

此外，我受中央理事会的委托以該会主席的資格在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納赫召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議程是：1. 理事会报告。2. 討論問題：联合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新組織应抱什么态度？可能解散联合会。

代表大会召集人委派我为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作必要的准备，此外，还要写出一个綱領草案和一个組織草案，以便提出来共同討論。白拉克和盖布认为，我們必須把认为适宜的建議提出来。李卜克内西忙于編輯《民主周报》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作笔战，于是

这项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

不仅薩克森王国的国有铁路管理局，而且当时私营的屠林根铁路公司董事会都应我的請求回信說，它們对于参加愛森納赫代表大会的人們也按照优待参加會議者的通例减低票价，到今天我还以頗为愉快的心情閱看那些文件。現今不再有这样的事了。

82 約·菲·貝克尔在《先驅》报上闡述他对于新的党組織的意見的一篇文章却使我有点为难。年老的約·菲力浦是个出色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惜舍身、日夜工作不倦，是一个老战士，同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他在巴登革命中担任义勇軍团长一样，現在又准备出馬了。他也能讲述他那飄泊生涯中的許多故事、笑話和軼事，他非常生动活泼地讲述它們。我常常几小时以听他讲故事为乐。但是对于党組織，他懂得的并不太多，而且由于他长期离开德国，他对于国内情况也生疏了。貝克尔不想要一个严密的、尽可能集中而又民主地組織起来、能作有力行动的党，而想要一种虽然能够宣传社会民主原则，但是沒有牢固的党組織的联合；照他所說，这个联合必須保持一种可以不断改变和能够发展的特点，而且这个联合應該隶属于日内瓦。他在《先驅》报上发表了一个有关的草案，并且希望愛森納赫代表大会对它同意。馬克思为了貝克尔的这篇文章写信告诉我說，他們和这篇文章毫无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它的观点。我为这在七月三十日回信給馬克思說：

“刚刚接到尊函，使我很喜欢。我也讀到了《先驅》报上貝克尔的建議并且必須承认这些建議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貝克尔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有关国际的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抓到手里。所以我也决心在大会上同这不切实际的、甚至无法实行的、耗費时间和金錢的方案作斗争。我現在能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感到欣幸。請您不要担心，我决不会在任何毫无裨益的

情況下把您或總委員會牽入辯論中；而且當貝克爾自己或者日內瓦其他代表來到時，我還要設法私下給他分析一下原因。我也可以預先向您擔保，貝克爾的建議既不能由我們方面，也不能由全德工人聯合會反對派方面、也不能由瑞士或奧地利代表方面得到支持，否則就是我很不了解他們的心情。至於我們對於我們同國際的關係如何想法，您在本星期的《民主週報》中我起稿的并由不倫瑞克和漢堡會同商討的組織草案一文可以看出。我認為，那是唯一正確和可能的形式。”

我寫給約·菲·貝克爾一封同樣意思的信，信中我也提出對於施韋澤的意見，而且我也同貝克爾談到施韋澤想派代表參加愛森納赫代表大會的計劃：

“施韋澤的一切都是弄巧成拙，他自己把他的詭計洩漏了。不論在巴門—愛北斐特或柏林，我一般同他在一處的時候，曾經觀察出來，特別是當有人當面反對他的時候，他就很容易不知所措而做出愚蠢的事來。他每逢被人掐住咽喉，他的壞良心就使得他心中無主。” 83

我在這裡也把施韋澤的外表略加描述。施韋澤身材瘦長，面帶蒼白，酒色過度的樣子。棕色的頭髮，兩腮和唇上的胡鬚都較稀少。鼻子相當長，末端彎曲而尖銳；眼鏡後面是一對冷酷的、閃爍的眼睛。他在站立或者行走的時候，總是把雙手放在背後而把頭部縮進兩肩。他一定是非常貧血，在巴門—愛北斐特事件以後，有一次在柏林我和他握手時我吃了一驚。我好像握着一個死尸的又冷又潮濕的手。

參加大會的代表為數很多。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九十三個地方。其中有：約翰·菲力浦·貝克爾（日內瓦）、格羅伊里希和拉頓道夫博士（蘇黎世）、奧伯溫德和安德阿斯·邵烏（維

也納)、霍夫斯台登(柏林)。宗納曼(法蘭克福)也出席了，並參與了幾次辯論。但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出席過工人代表大會；他希望在工人黨和人民黨之間還能達成協議，但未如願。黨的階級性排斥了他。“施韋澤分子”(我們現在這樣稱呼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出席的人數顯然大減，還不及從前的一半。這些代表集聚在“船舶”中，我們的代表在“金熊”。由於各方面的消息說施韋澤分子要想用暴力破壞代表大會，我往市長和警察那里探聽他們對於這種局勢的看法，因為對於我們最關重要的當然是使大會得以舉行，不能讓巨大的犧牲白費了。據稱，我們完全可以隨便在何時何地舉行集會。在薩克森—魏瑪沒有結社和集會法，所以集會是沒有限制的。此外，我還得到保證，萬一我們的安排受到暴力攪亂，警察就準備加以干涉。我們要求“船舶”中的施韋澤分子交委託書來換取紅色出席證，他們拒絕了。隨後他們在晚上將近七點鐘的時候，約有一百多人在巨人特爾克領導之下闖入“金熊”。特爾克後來在他那《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目的、方法和組織》一文里談到他當時的任務：

“馮·施韋澤先生愛用的手法一般是不管在哪里，如須激烈斗争，他就派別人前去，而在偶然失敗時，使他負對黨的責任。”

這是完全恰當的；勇敢不是施韋澤的優點，反之，在當時，施韋澤要想利用特爾克來干什么，特爾克無不聽他使用。

施韋澤分子進入“金熊”後，發現在樓梯上站滿了我們的人，他們寧願把委託書交出來。下午在一個籌備會上預定由蓋布和我擔任主席，奧伯溫德和奎克(日內瓦)為候補主席。此外，大家還一致同意我的建議，如果晚上會議受到攪亂，蓋布就宣布閉會。隨後就在星期日上午召開新的會議，只准持黃色出席證的代表進場。

果然不出所料。在推選辦事處人員時就已經發生激烈的吵鬧。我們因為光線太差，在辦公桌上放了半打瓶子，瓶口上插着洋

蜡。这些蜡烛随时都有傾倒的危險，必須用手扶着。吵鬧越来越厉害，最后盖布只得宣布閉会并訂于次日上午十时在“摩尔”召集另一个代表大会，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參加。

我們的策略成功了。夜里，我們（白拉克、盖布和我）检查委托书，把施韦泽分子的委托书都挑出来，由盖布在早晨送交特拉克，請他轉給各有关代表。此后，會議的进行再沒有任何扰乱。 85

我和白拉克被选定为綱領和組織的报告人。約·菲·貝克尔不顾我的一切反对理由，仍提出一个冗长的建議，說党應該叫做“全德社会民主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組成部分”。这个建議沒有人贊成。綱領和組織仅把召集人所拟的詞句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新党命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綱領条文是：

社会民主工党綱領

一、社会民主工党为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而努力。

二、每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有責任尽全力保证下列原则：

1. 現今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是极端不合理的，所以党员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反对它。

2. 工人階級的解放斗争并不是为了取得階級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了消灭階級統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資本家的經濟依賴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在废除現在的生产方式（工資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社性质的劳动使每个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

4. 政治自由是工人階級經濟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社会問題是与政治問題分不开的，它的解决是以政治問題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里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階級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解放只有这个階級共同一致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要有一个統一的可是使每个人都能影响全体的福利的組織。

6. 鉴于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在结社法允许的范围內把自己看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分支，并与它共同努力。

86

三、实现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下列最近的要求：

1. 赋予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去参加议会、各邦的邦议会、省和地区代表会议以及其他一切代表团体的选举。供给当选的议员和代表充分的日俸。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权（即建议权和否决权）。

3. 取消一切等级、财产、出生和宗教信仰的特权。

4. 建立民兵代替常备军。

5. 教会脱离国家、学校脱离教会。

6. 国民小学实行强迫教育，一切公共的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

7. 司法独立，推行陪审法庭和劳资仲裁法庭，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和免费的司法。

8. 取消一切出版法、结社法和劳动者联合法，实行标准工作日制；限制妇女劳动，禁止童工。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并实行一种单一、直接、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

10. 由国家促进合作事业，并且在民主的保证之下由国家贷款给自由的生产合作社。

四、每个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一格罗申（合三个半南德意志的克略采，五个奥地利克略采，十二生丁）。党员同志订阅党的机关报并取得可靠证明者，在订阅期间免纳党费。至于个别地方党费的减免，由委员会处理之。

五、党费应按月向党委员会缴纳，邮资付訖。

80

六、对党三个月未履行其义务者，即不再视为党员。

七、每年至少举行党代表大会一次，会中讨论和解决党所接触的一切问题，并决定党的总部以及监察委员会的会址和下届党代表大会会议的地点。——代表大会并规定常务委员会以至个别委员的报酬。

八、如果常务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绝对多数决议，或者全体党员中六分之一建议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九、每次代表大会至少要在会期前六星期由常务委员会在党机关报上公布暂定的议程。在公布后的十天內党员同志方面交到的建议应至少在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程来发表。单独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成始能交议。 87

十、每一代表一个投票权。已在一个地方参加了代表选举的党员，可以派遣五个有投票权的委员参加大会。非代表的党员只有讨论权。

十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必须在会后三个星期內按成本价格使所有党员都可得到。一切有关修改党章、党的原则和政治立场以及党费的决议必须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內通知所有的党员基层组织。表决时以单纯多数作决定。投票结果在党机关报上公布。

十二、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秘书一人、司库一人（他应具有相当的保证金）、助理一人。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必须居留在一个地方或在它周围一哩的区域内，他们是由居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党员通过特别的选举手续以绝对多数的票选方式选举出来的。党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都不准参加委员会。如果在本年內委员会里出缺，中央——除了上述第七条所列情形外——就照这种选举方式来补充选举。

十三、委员会必须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內选举出来；在这次选举之前，如大会未作其他规定，则事务仍由以前的委员会处理。

十四、委员会共同作一切決議，并且只有在至少有委員三人出席的正式召开的會議上才能有所決議；委员会可以就代表大会所未作决定者自訂办事規程。

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对党代表大会負責。

十五、为了尽量避免常务委员会的专权，党設置一个十一人的監察委员会，所有因常务委员会疏忽而引起的申訴都可向該会提出，該会同时应对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进行检查。

十六、監察委员会应由党代表大会規定的監察委员会駐在地的地方及其周围一哩范围内的党员选举。选举采用票选，最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举行。

88 十七、監察委员会有责任至少每季审核和检查一次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案卷、賬册、金庫等，如果有确实理由，而常务委员会拒絕糾正越軌行为时，它就有权停止个别委員以至全体委员会的职务，并采取临时管理业务的必要措施。这种決議必須由監察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作决定，而且如果常务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委員被停职，就要在四个星期內召开党代表大会，对該項事件作最后的决定。

十八、党創辦一种报纸，名为《人民国家报》，作为机关报，即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机关报在萊比錫出版，归党所有。編輯部与发行部职工、印刷工的人选和薪給、报纸的价格均由常务委员会規定。关于这方面的爭执由監察委员会判断，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裁决。报纸的态度要严格符合党綱。党员同志适合党綱的稿件，只要报纸篇幅够分配，可无偿接受。有关不刊登来稿或給来稿塗上傾向性的色彩，可向常务委员会申訴，第二級向監察委员会申訴，由該会作最后决定。

十九、党员有义务在各处根据党綱着手創設社会民主工人协会。

在會議進行中，我傳達了蘇黎世的革命基金管理人拉頓道夫博士及其同事答應由基金撥給我九百塔勒作鼓動費。這就是使特爾克及其伙伴很感痛苦，並把它歸在漢諾威國王希奈格爾身上的財源。

我們決定以《民主週報》為黨報，並從十月一日起改名《人民國家報》，作為社會民主工黨和國際職工會聯合會的機關報，每星期出版二次。並選定不倫瑞克—沃爾芬比台爾為常務委員會的地址，維也納為監察委員會的地址。起初，人們想把萊比錫定為常務委員會地址。我堅決勸阻了。完全就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先前會員而言，如果把象不倫瑞克這種地方作黨領導機關的所在地，我們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的宣傳就容易得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安置常務委員會，我們在新黨中的勢力就得到鞏固。事情就這樣辦了。⁸⁹下次代表大會地點規定為斯圖加特。九月初，在巴塞爾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由李卜克內西代表出席，嗣後斯皮爾（沃爾芬比台爾）以常務委員會的代表身份偕同他前往。

代表大會的輝煌歷程使施韋澤陣營中產生極不愉快的印象。在我們拒絕了施韋澤派往愛森納赫的代表出席大會以後，他們在“船舶”那邊開會，並作了一系列的反對我們的決議。其中一件針對李卜克內西和我個人的決議說：“鑒於所聽說的事實，代表大會決議，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兩位先生已不配使代表大會繼續與他們共事。”特爾克在八月十五日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一篇《告黨員同志書》，開頭說：“愛森納赫代表大會已經過去。我們回顧大會的經過和結果對黨的前途可以感到自豪和充分信心。”

在代表大會閉幕後，德意志工人協會聯合會舉行聯合大會。我被選為主席，柏爾格（哥平根）為副主席，莫特勒為秘書。克里米朝接受委託檢查中央的業務管理，並在黨報上提出報告。我所作的報

告指出，由于紐伦堡的分裂，联合会落得只有七十二个协会，在本年度又有五个协会脱离，但又有四十二个协会加入，所以联合会最近共有协会一百零九个，约有会员一万人。收入計四百七十塔勒，支出四百五十七塔勒，由革命基金补助了九百三十四塔勒，其中撥了八百塔勒补助《民主周报》和作鼓动之用。接着會議一致決議解散这存在了六年的联合会，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現有的存款移交社会民主工党，現有档案（案卷、书信、记录）交給我保管。在向中央理事会热烈致謝其劳心費力后，大家表示希望在斯图加特再会，就分手了。

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以后

人們很容易想像，現在两个社会主义党派之間发生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斗争。一篇一篇的声明飞来飞去，在許多集會中所演出的活剧不是任何笔墨所能形容。特别是工会，在双方肉搏中受害最大。例如，在五金工人团体选举主席时就因为选票完全被撕毀而未成功，此外，在选举投票时只有二十三次被承认，有十七次被否决了。

从現在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弹奏以往所少見的声調，捏造事实和虛伪报道，使讀者对于我們这方面的运动获得完全錯誤的印象。

九月十日，施韦泽出獄。九月十二日，他在一篇較长的宣言中宣布，他将环游德意志，与他的党徒閉門相見，“以便使各处秩序井然和严守法律”……他在宣言中說，“害怕見我的面的，是那些自知心怀惡意或者負損害工人事业之罪的人們；至于那些充当全权代表、鼓动者或其他职务而忠心守着旗帜的人們会欣然欢迎我的。”

人們能不感到所听見的是某一个耶穌宣告审判好人和坏人，要把綿羊同山羊区别开来嗎？

在这次环游中，施韦泽仍遵行旧策略，即不管在哪里如有人对他提出责难性的质问时，他或是沉默，或是加以嘲笑了事。

他对《人民国家报》所采用的策略还是同对《民主周报》一样。他从没有称呼过《人民国家报》的名字，就是对于党他也只把它说成爱森纳赫人民党。 91

他在环游时也到了奥格斯堡，他要求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把他们所出版的周刊《无产者》停刊。当他们拒绝他的要求时，他就威胁说，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毁灭这周刊，即使因此巴伐利亚的运动倒退五年亦所不惜。随后在一八七一年的新年，施韦泽创办了一种小型刊物《鼓动者》，售价每季仅十五芬尼，而首先就拟在巴伐利亚大批推销，为的是使那里的倔强分子就范。

他在环游归来时声明说，“党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强大、团结和繁荣”。这种见解的虚伪在他和门德—哈茨费尔德又发生吵鬧时就暴露出来了。门德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声明反对施韦泽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其中刊载了施韦泽的种种丑行。这种事情的发生原是意料中事。但当施韦泽宣布，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将扩大篇幅（这是痲病患者假装强健的努力），门德就宣称，如果到一月十五日他的机关报《自由报》不能得到一千个新订户，他就把它停刊。施韦泽方面的势力却是大些。施韦泽订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五日起在柏林召开他的联合会代表大会。

事先，十一月七日，进步党和拉薩尔分子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爭吵。議員維尔周教授在普魯士众議院提出一个縮減軍备的建議，后来被众議院多数派否决了。进步党想凭借一个在上述日期召开的民众大会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这个建議。但拉薩尔分子大批出席并要求担任大会主席，使討論不能进行。现在既发生了巨大吵鬧，議員勒維（卡尔培）终止了大会。于是特尔克立即重新召开大会。他預先料到进步党的會議要被攪散，曾向警察方面登記在 92

原会场召开第二个会议，警察对于在同一会场、同一时间的会议接受了双重的登记。而且会议也违反了一切以往惯例，没有警察监视。特尔克主席，施韦泽讲话。在所提出的决议中没有一个是反对政府的，反而把进步党判断成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敌人和标准工作日制的敌人，并且要求取消常备军和实行以青年军事训练为基础的民兵制。

这样，施韦泽又一次设法使人忘记他以前在军事问题上所屡次采取的立场。

附带说明：那时期在萨克森下院以五十五对二十一票通过了缩减军备的建议。

九月九日，巴塞尔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幕，讨论的要点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多次会议都充满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最后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五十四人，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斯皮尔，赞成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利取消土地私有制，而改行土地公有制。”

他们二人同样也赞成决议的第二部分，即：

“会议又声明，必须使土地成为集体所有。”

93 这决议在德意志轰动一时，特别是人民党民主派的报纸攻击这决议，把它叫做怪物。李卜克内西没有反对攻击来捍卫大会的决议，却在末期《民主周报》上声明说：

“人们问道：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表示什么态度？”

回答说：完全没有！每个个别的党员能够而且应该表示态度，党本身无权过问，因为它不管在哪方面都不受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工人协会本身不受束缚一样。”

对于这个高明的见解，党内发生了很是混杂的感觉。它没有改善党的地位，却反而恶化了它的地位，于是施韦泽利用了这个情况，他得意洋洋地指出爱森纳赫派的不彻底性，说此派在社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并且让自己受本党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最足以证明，我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实在这时出版的第四期《人民国家报》上曾说过：“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决议是否适当，可能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决议既作了之后，党如果不否认它的基本原则，就不能否认这个决议。”我们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不能比这再清楚了。这个声明比第一个正确些，但是和它相矛盾。所以党有必要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我建议，这问题留待下年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也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还计划在十一月初往南德意志作大规模的鼓动旅行，我决定在必要时，就为巴塞尔决议作辩护。我的旅行是十一月八日开始，二十八日结束。这期间我共计举行了十八次群众大会和在艾尔郎根和慕尼黑两个地方作了私人讨论。我依次访问了：科堡、班堡、纽伦堡、佛尔特、艾尔郎根、累根斯堡、慕尼黑、奥格斯堡、拉文斯堡、图特林根、雷特林根、麦森根、斯图加特、艾斯林根、哥平根、阿伦、海登海姆、金根、斯瓦比亚的哈尔和海尔布隆。我只在四个集会中遭到反对。在所有集会中都收到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斯图加特，人民党的全体干部和《民主通讯》的出版人尤利乌斯·弗雷塞都出席了集会。在会上我和人民党的党员浩斯迈斯德之间发生原则上的争辩，当然是我的对手失败了。前一天晚上，94在一个交际会中，当时的人民党领袖卡尔·麦耶尔问我，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如何，我声明，党将在斯图加特的下届代表大会上表明态度，并且无疑地会同意巴塞尔的决议。我又加上一句话安慰他说，不过决议的实施只有获得了舆论界的拥护才有可能，所以

还用不着着急。加上了这个糖衣，人們就吞下了药丸。在次日的集会中，拉薩尔分子賴克哈特反对我，他质问我，我們对于施韦泽的态度如何，我作了彻底的回答。总而言之，我直讲了三个钟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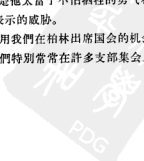
弗雷塞和大部分的人民党人都被我的分析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弗雷塞在《民主通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来驳我。我在《人民国家报》上用一系列的文章答复他，这些文章集成一本名为《我們的目的》的小册子，至今还在出版。在这些文章中，我自然也捍卫巴塞尔的決議。弗雷塞同一般纵欲者(享乐人)一样，他一旦感到主张自己的原则不再能满足他那纵欲无度的需要时，他马上就昧着良心，牺牲原则，后来他給奥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大人服务去了。

我由南德意志回来后，开始了我的这时在法律上生效的三星期监禁，前面已經說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以被判处这次监禁，是因为《告西班牙人民书》犯了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說的罪。



95 現在面对着全德工人联合会，我們必須十分努力地爭取新党员。所有能够筹措起来的人力和财力都利用到这个目的上。在这里，約尔克作为鼓动者首先成了問題。他旅行的效果不是常常令人滿意的。他在一八六九年底因往莱茵区所作的鼓动旅行失敗而向我訴苦。他对这事十分悲观。他写信告訴我說，当个鼓动者是一种悲慘的生活，这是正确的，鼓动者在那时代所得到的金錢报酬簡直是可怜得很。他又想在一个师傅那里找个位置当工人去。約尔克是个細木工。他若沒有家室，事情就会另个样子，单独一个人他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可是他太富于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不能实行他所表示的威胁。

李卜克内西和我利用我們在柏林出席国会的机会来在那里爭取越来越多的同志。我們特別常常在許多支部集会上演說，成績极好。



不伦瑞克的委员会经常诉说会员缴费不踊跃。这个申诉是很有理由的。从前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会员特别难以养成按月有规律地往不伦瑞克向委员会缴费的习惯，它们的习惯是重视把钱用于当地的需要上。

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和在莱比锡的我们展开了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把监察委员会由维也纳移往汉堡后，在汉堡开业当书商的奥古斯特·盖布也加入了这种通信。白拉克和常务委员会对《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不断提出责难，说它在政治方面谈得过多而在社会主义方面又谈得太少。在党内，这样的责难更厉害数倍。

使我非常愤慨的是吕特这个人，他放弃了大学不读而到党里来充当鼓动员，由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上了编辑员。他对于职责漠不关心，而对于报酬（自然也不高）则经常预支。这是同我那关于成绩和报酬的观念相抵触的。在工人党里如果有人接受了职务，而不一心一意地履行所接受的义务，拿了工资而不相应的工作，那么，我不论何时，至今还是如此，总认为这是对党最严重的损害和不可原谅的不义行为，必须加倍处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里担任了专职，照我的理解就是达到了一种理想。他可以照自己的信念去工作，他不用害怕处分，他如果尽了责任，就会得到同志们的充分表扬。

有一天，我向白拉克严厉地控诉吕特（这封信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还占着重要地位，并印入有关的报告中），白拉克在十月十七日答复我说：

“吕特并不坏，至少我不相信他坏。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完全同吕特一样，而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这种人与庸俗人相反，但是他们常在片面性中迷失路途，直到经过长期的多半是艰苦的阅历后才会变得明智。我自己同这样的性格越不相似（如果考察一下

我的“品行”，我常自以为是俗人），我就越爱别人的这类性格。总之，我承认，我对吕特认识太少，不能断定他是否同我那个朋友一样。不过我猜想如此。你读过莱辛的传记吗？他在一个较长期间是多么轻浮！我常盼望着，也能够轻浮一下，可是难以办到。环境把我束缚在我这辛勤的、严肃的、简直是庸俗的生活上！天生的快乐情调在我实在是非常少的。”

我对白拉克这封信怎样回答，现今已记不清了，但是一定不会同意他对吕特的意见。

白拉克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脱离了极端的唯心主义而参加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党，他当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听弗里茨舍的劝说，为烟叶和卷烟工人生产合作社作担保，在合作社破产后，他必须偿还巨额赔款，陷于异常不幸的地位。白拉克曾在给我的许多信札里诉说他的苦恼，因为我们二人相识后不久即成莫逆之交，
97 无话不说。这个最可怜的人奋斗了多年才摆脱这个因为好心肠和愿牺牲而陷入的窘境。他逝世时（一八七九年在他还很年轻，即还不满三十八岁时就死了），全党认为这是件不可补偿的损失。

一八六九年十月，卡尔·马克思到汉诺威拜访他的朋友库格曼博士，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白拉克和委员会秘书彭好斯特曾前往汉诺威去结识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白拉克因会晤了马克思而非常欢喜；他写信给我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二人非常融洽。我到一八八〇年同伯恩施坦一起作“卡诺沙^①之行”才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这事以后再谈。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奥地利政府同我们开了一个很讨厌的玩笑；它停止了《人民国家报》的邮局经销。当时《人民国家报》的情形是不能缺少订户的。这个行动却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诬蔑

① 卡诺沙，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公元一〇七七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此向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悔罪，由此著名。——译者

李卜克内西为奥地利政府服务的最好反证。

本年将終时，在西里西亚的瓦尔登堡发生了矿工大罢工，这是德意志前所未有的最大罢工。这个罢工最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地区的工人，凡是有組織的，都属于希尔施—邓克尔的职工协会，而且矿主要求他們退出这个协会。希尔施—邓克尔的資本和劳动之間利益一致的学說因而遭到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別都极力贊成并支持矿工。我打算叫人在莱比錫張貼通告为罢工者募款，但是警察禁止張貼通告和募損款項，因为根据一八四二年的貧民条例为“灾民”募捐須呈請警察局批准。为了貧民条例的这种奇怪解释的原故，我一直上訴到內閣，但馮·諾斯提茨—瓦尔維茨先生（他当时已任內政部长）却同意萊比錫警察的決定。

98

因为缺少足够的財力，瓦尔登堡的罢工失败了。

一八七〇年春季，有个任务本来是进步党人或者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应尽的义务，却落在我的头上。齐希尔諾律師死在萊比錫，他在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頓五月起义时同豪布諾和托特曾充任临时政府的成員。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齐希尔諾逃到瑞士去，到一八六五年薩克森大赦后才返回萊比錫，但已成殘廢的人。他需要救济，我为他募捐，捐款由我轉交齐希尔諾在德累斯頓的同志沙夫拉特律師。

齐希尔諾于一八七〇年春季在萊比錫去世，他的老同志，也包括沙夫拉特在內，沒有一个肯为他致悼詞；人們耻于或者怯于明显地、公开地以往昔革命家的同志身份出面。所以我虽同他本人并不認識，而且只由傳聞知道他的活动，却不得不去致悼詞。德意志的民主党早就失去了丈夫气概。

一八七〇年度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月五日开幕。施韦泽的兴致并不高。在人们质问他，他在同门德达成所谓联合时是否缔结了秘密条约，经他否认后，人们又质问他关于现金出纳的事项。他把联合会的钱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刊物是他私人所有的。甚至曾作成一个决议，来明白制止他这样做。对这个决议和对加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批评，施韦泽异常忿怒。他回答说：就信任而论，根据大会的表示，他必须承认他没有取得大会的信任；无论如何，他已失去代表们的大部分信任……人们似乎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怎么回事。不是党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造成了党……要求一个编辑人必须保证报刊的内容原是容易的，只要人们自己没有担负什么责任，而且也用不着承诺薪金。在这种情形下，他起先同联合会的敌人，继而同联合会的会员纠缠在气恼之中，也真够了。面对那关于钱财事务应由理事会决定而不像以往那样由主席来决定的要求，他声明说，那么，就选举一个委员会而不要主席好啦。大会于是对财务支出进行详细审查。以五千零九十七票对三千四百零九票通过了如下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年度财务结算完全满意，并且认为我们党的敌人的一切抨击没有理由，应予驳斥，并且希望财务永远这样。

施韦泽有一次说，鼓动员和代表们已经成为联合会的贵族，联合会里的混乱总是由他们而起，这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建议表示反对主席，因为主席曾根据汉堡会员的建议无理地宣布说，凡是同时属于全国烟叶和卷烟工人协会的会员，直到这次柏林代表大会为止，失去会员的权利，这建议以二十四票对十二票，两票弃权，被否决了。这些事情又一次使施韦泽认为应当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一月九日，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人参加的公开会议，议程的主题是“军国主义”。施韦泽

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德意志国会中曾報名贊成軍事法案，並且他當時在發言中曾經說，他絕不願否認和挑剔普魯士的那些特質，即去年使一個敵對世界佩服和承認的特質，現在他却提出下列決議，請求通過：

“代表大會聲明：常備軍是現今反动統治的主要支柱，同時是社會剝削的主要支柱；民主的原則要求，各處的常備軍全由全民武裝來代替。”

100

這完全像是我們原先的開姆尼茨綱領和現在的愛森納赫綱領。經過施韋澤沒有參加的較長時間的討論，這個決議一致通過。此外，代表大會聲明擁護把土地轉為社會的公共財產。施韋澤以極其激進的發言結束了這次會議。

在進一步討論中，有一個把《社會民主黨人報》收歸黨有的建議，以六千四百九十二票對二千五百八十五票被否決了。在討論中間，施韋澤說道，《社會民主黨人報》在它存在的七年間耗費了大批款項並且現在也還需要捐獻。這大批款項由哪裏來的，沒人知曉。如果黨肯把報刊所耗費的款項償還一小部分，他就準備出讓所有權。有一個發言人表示顧慮，認為如果有了分歧，施韋澤將會創辦新報刊。聽了這個解釋之後，多數人把接收報刊看做是件危險禮物。施韋澤還宣稱，從一月一日起，哈森克萊維爾和哈賽爾曼加入編輯部。很多會員提議，要詳細而真實地編纂代表大會的記錄。

一個較長而且激烈的關於各種建議的辯論開始了；例如，照會章規定，主席應由代表大會選舉，施韋澤相反地卻堅決主張選舉要通過他用他的報刊來掌握着的人民。他貫徹了他的意見。屢次提出的要通過一個申訴委員會來監督編輯部的建議，由於這次決議對聯合會機關報編輯部的一切責難都要向主席提出，被取消了。在理事會作為監察員的特點方面，理事會對編輯部和主席的工作效率，行使最高的監察權，並可以對它作出規定。在有關的討論中

93

普范古赫說，編輯部迄今的措施把許多出色的會員逐出協會去了。

101 二月十二日舉行主席選舉，施韋澤又以四千七百四十四票對二百四十九票當選，這票數如與柏林代表大會代表的九千名會員相較，就不能看做是特別的信任投票。

一八七〇年初，在三個現有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之外又有第四個出現，不過不甚重要而且壽命不長。施韋澤對奧格斯堡出版的《無產者》及其主辦人所表現的頑強敵意，使他們非常憤激。柏林代表大會現在既然也聲明反對巴伐利亞，他們就決定退出全德工人聯合會，並且在一月底在奧格斯堡召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這個分離出來的組織的領導人是弗朗茲、奈夫和陶舍爾；三個人都是排字工人。弗朗茲後來寫了一本出色的小冊子：《伯麥爾特先生與其冒牌科學。一個工人著。一八七三年》。弗朗茲幾年前死在美國。奈夫死得早得多，陶舍爾至今仍是黨員，住在斯圖加特。不倫瑞克委員會方面派我做代表往奧格斯堡，以便使巴伐利亞的同志們參加我們的黨，並預防成立第四個派別。會議只有九個代表出席。我所代表的立場如下：

“成立新派別只對工人事業的敵人有利。他們又要為這種分裂而歡欣，並且指出，沒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工人，作為政黨是無害的，因為他們雖然原則完全一致，却不能團結起來，而且純粹為了形式上的和個人的考慮而互相殘害。另一個主張團結的迫切理由是防止工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的分散。對工人來說，這兩者都不豐富。派別越多，必須設立越多的管理機構。管理機構耗費金錢，這樣，單是這些管理機構就把工人辛苦得來的幾文錢浪費掉了。人們不把錢用來對資產階級和反动派作鬥爭，却用於自己人的互相鬥爭，把本來不充分的精力消耗在自相廝鬥中，而對於整體毫無裨益。我深知，人們對於合併主要有兩種顧慮。一

个顾虑是我们的所谓联合，简直就是同人民党混合，另一个顾虑是认为我们的组织太不一致。这两种指摘都是由于成见，这些成见是由那些为了自己的地位害怕工人同民主资产阶级接触（施韦泽、门德），并且想在‘对激进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姿态下隐藏他们同反动派的妥协的人们，巧妙地加以传播并在群众中生了根的。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两个完全分立的政党，各有各的纲领和组织。我们党的纲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也作了这次大会的基础，所以不用我再来阐明，不过我们纲领第一部分还更进一步，它还包含着国际纲领的精华，并且也又清楚又精确地表述了它对于现有国家的态度。‘人民党’把我们的政治要求和我们的几个社会要求（标准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列入它的纲领，因而有某一段路可以和我们并肩前进，就此而言，它同我们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如果对它的那些和我们相同的主张作斗争，那就是愚蠢；但是，不言而喻，在它和我们之间有分歧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范围内，我们要处处反对它。人民党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政党，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它是由大德意志的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少数基本上也承认我们纲领的人所组成，不过后者为数极少。人民党在反对大普鲁士倾向、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并且从这个观点看来也与我们一同对敌视我们的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进行斗争。所以除了由于双方立场的性质自己发生的关系之外，我们同人民党并无其他关系。拉萨尔在一八六三年还劝工人党对进步党发生这种关系，拉萨尔甚至在他论《立宪政体》的著作中许多地方把自己称为人民党人。反对我们的组织的抗议，正像经常责备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的话一样，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在德意志是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则不言而喻，我们在筹划组织时就只须着眼于实际的理由。但是德意志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是由大多数十分反动的邦国所组成，各邦中不受喜爱的人

民团体非常清楚地感到法律的威力。薩克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被解散、普魯士許多地方社团的被封閉、普魯士最高法院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选举协会(这是个类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組織)的决定、巴伐利亚的最近事件等都足以证明,法律如何能够随时消灭这个組織。如果施韦泽把低級法院对他那联合会的判決繼續訴諸一切上訴法院,則最高法院无疑地会认为这个組織是非法的,因而宣布在普魯士加以禁止。施韦泽慎防此事,他的联合会所以还能存在的唯一原因,尽人皆知是他享有柏林警察局和政府的恩惠的緣故。我們必須創設的組織,是要既有統一性,同时又使各个地方的黨員能在法律面前有形式上的獨立性。党的統一性表現在党的常務委員會中,这个委员会是由党选举出来的,它的权限受严格的限制,同时它还可以受监督,因而消除了任何‘領袖集团’,并且一劳永逸地結束了个人統治;此外,还表現在每个黨員按制度按月繳納的党費;最后表現在党的机关报,它是党的所有物,所以不至为私人所利用。通过这样的安排,才可能为党的扩充作有力的鼓动和在一切問題上貫徹党的意志。在地方协会中黨員同志可以毫无拘束地討論党务和进行地方性鼓动,法律无法干涉。我們所采取的組織不仅是在想像中好而是实在好,尽管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一直受到迫害,組織却没有受到损伤,因为他們就是做不到这点,这就是证明。如果来一个像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組織,我們早就垮台了。

警察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沒有引用最高法院的判決,这最足以表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領同普魯士警察的非常和睦的关系。我們沒有享受这样的恩惠,我們也不想要它,因此,我們必須把組織安排得不怕警察的侵犯。此外,形式對我們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原則和它的应用。我們不属于那种以正統自居而把外表形式看得比事业还重的人,我們絕不认为組織已經沒有改善的余地。每个

黨員對於組織的改革都能發生影響，他如能獲得多數人贊同，他們的願望就起決定性作用；一句話，黨的整個制度是民主的。”

我的講話是不幸的。召集人不喜歡我們對人民黨的態度，正是因為該黨有個激進的綱領，所以必須認為它是危險的而對它作最嚴厲的鬥爭。我們的組織他們也認為不適合。

一八七〇年，在第十期《人民國家報》上我所發表的報道里，我還說道：

“我雖一再發言並反駁所提出的顧慮，但立即看出，一切話都是白費，因為人們已經毅然決定組織一個具有完整的官僚主義機構的第四工人黨派。于是我聲明，我認為我的任務已了，所以還要參加公開辯論，只是為了向代表大會聲明我的態度而已。” 104

此後不久，又舉行公開集會，我說明了我不能繼續參加會議的理由。同時我利用這個機會又公開地堅決反駁了大會上可能還存在的由施韋澤教導遺留下來的反對我們黨的成見。我說完後，取回我的委託書，同我們的同志們離開會場。

如果說我所正式負擔的使命失敗了，我從奧格斯堡卻帶回了道義上的信念，即工人大眾已厭倦於因為瑣碎的、個人的或者形式上的顧慮而互相爭吵不休。工人們了解，只有緊密團結、集中一切力量，才可以保證他們勝利，而且儘管組織了社會民主黨第四派，如果全體加入社會民主工黨的時刻不是近在眼前，那我必定就大錯特錯了。”

這裡所說的希望很快地實現了。在六月間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上即已達成協議，巴伐利亞派轉入我們的黨。我由奧格斯堡的歸程中，在慕尼黑舉行了一個群眾大會，在聽眾中有年僅二十歲的格奧爾格·馮·福爾馬爾，這是他後來順便告訴我的。

一八七〇年一月，我感到特別有趣的是，萊比錫市參議會因為工人教育協會聲明贊成愛森納赫綱領而決定取消每年給協會的城

市津貼余額二百塔勒。數日後市參政會經過激烈的辯論後以二十七票對十六票附議參議會的決議。在當天夜晚，我又以一百二十一票對二十票當選為協會主席。

105 自從愛森納赫以後，我們用全力把為了發展黨而進行的鼓動推行到全德意志。在許多次我所召開的集會中，在福格特蘭的普勞恩反對麥克斯·希爾施博士的兩次特別有趣，因為我的講話內容造成控訴我散布危害國家學說的又一根據。在這個控訴完結之前，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法典發生效力，其中未包含薩克森刑法的這個規定，這個材料到後來在對我起訴的叛國案中被利用了。這兩個在兩晚接連舉行的（因為在第一天辯論沒有終了）集會，結果是麥克斯·希爾施博士（他當時是北德意志國會中普勞恩選區的代表）完全失敗。比這早二年，我也曾同麥克斯·希爾施博士在他的故鄉馬格德堡對抗，在那裡他同樣遭到一次大失敗。在馬格德堡後來的一次集會中，我尖銳地批評了施書澤的行為，一個狂熱的建築工人對我擲來一個啤酒杯，緊靠著我的頭邊飛過去，打在牆上粉碎。如果我被擊中，很可能打破了頭。那麼這些字句就會寫不成了。這正是當時敵對的兄弟們用以款待的盛意。

社會民主工黨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在六月四日至七日舉行。出席代表七十四人。來賓中也有那時我才認識的愛德華·法蘭特同他的朋友穆爾貝爾格博士。按照北德意志同盟憲法的規定，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底必須舉行新的國會選舉（後來因德法戰爭爆發而中止），所以選舉中的策略問題成為討論的主題。李卜克內西和我在實際出席議會的問題上意見分歧（關於這點我將在別的地方另行敘述），但是對於下列決議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社會民主工黨所以參與國會和關稅議會的選舉，只是為了鼓

动的原故。党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代表应尽可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大体上保持否定态度并利用每一机会指出两个议会的毫无用处并且当作喜剧来揭穿它。 106

社会民主工党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或者妥协，不过大会建议，在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时，凡是党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就投那些至少在政治见解方面基本上采纳我们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大会特别建议，在党不打算提出自己候选人的那些地方，可以支持其他政党提出的真正工人候选人。”

魏尔特(巴门)建议，宣布不参加竞选；上述决议是矛盾的。这个建议被否决，我们提出的决议通过了。

接着讨论土地问题，由我作报告。我所建议的决议是：

“鉴于生产的需要一如农学(土地的科学经营)法则的应用，都要求大规模经营农业，因此也有必要像现代工业那样采用机器和组织农村劳动力，并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发展力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鉴于根据上述，农业和大工业一样，小农中农将被大地主逐渐排挤，有利于少数人的绝大多数农民的不幸和依赖关系日益增长，这是与人道和正义的法则背道而驰的——又鉴于土地的生产性能不要求劳力就可以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有用东西的资料，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形成一种社会的必要，即农田将转化为公共所有，而土地由国家方面租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以科学方法加以利用，把劳动所得根据合同约定的办法分配给合作社社员。为使土地能得到合理的、科学的利用，国家有责任设置相应的教育机构，在农民中间传授必要的知识。大会要求，作为把农田从私人经营过渡到合作社经营的过渡阶段，可从国有土地、君主私有土地、世袭地产、教会财产、行政区公地、矿山、铁路等开始，因而声明反对任何上述的国家财产和地方财产转化为私人财产。” 107

決議末句會反復爭論，謂不應涉及細節。但決議最后还是通过了。

因为当时面临在維也納对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烏、約翰·摩斯特等奥地利工人領袖提起的叛國控訴，而且奥地利政府对工人运动領袖进行着瘋狂的迫害，《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繼續攻击李卜克內西，說他是奥地利政府的代办，我就建議以下決議：

“大会声明，奥地利政府由于它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对被監禁的工人的一切蔑視人道的待遇，已引起一切國家的工人对它的仇恨和鄙視。”

會議在暴风雨般的掌聲中通过了这个決議。

德累斯頓被选定为一八七一年度代表大會的地点。

施韦泽的結局

当上述事件发生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毫不減弱的力量不擇手段地对我們繼續进攻。例如，它现在的习惯是經常从民族自由党的《法蘭克福杂志》(据它說是我們党的一个机关刊物)轉載文章，用以反对我們。謊話說的几乎是难以为继。可是还有更妙的。

七月三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号召书，书中要求为国会和关税議会的选举作准备，并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在我們自己没有提出候选人的选区，可以考虑能否用我們的票帮助其他工人政党的候选人获得胜利。不伦瑞克委员会当时沒有预料到，早在前一天，七月二日，在汉諾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會議上已經通过施韦泽所提出的建議，其内容如下：

1. 在一个反动分子(保守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之間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2. 在一个反动分子和一个人民党员(誠实派，他的意思是指我

們)之間復選; 弃权。

3. 在两个自由主义者之間復選; 投比較进步的候选人的票。

4. 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人民黨員(誠实派)之間復選; 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前三項一致通过, 第四項有四票反对也通过。

人們不难想像当我们讀到这个決議时是如何愤怒, 我們认为这是无耻透頂。这显而易见是施韦泽和特尔克想利用理事会成員对我们的无比憎恨, 使无耻的決議得以通过, 来对付这个反对俾斯麦政策最力的政党。李希特尔(王茲貝克)后来声明說, 因为他知道施韦泽是受政府的委托而提出这个建議, 所以他投了反对票。我姑且写在这里。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決議是符合俾斯麦的願望的, 这就够了。

我們队伍中获悉这个決議后, 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立即于七月十一日发出号召, 其中說道: “我們的同志們不要理会那个決議, 只要对工人的事业有利, 就應該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 要忠于一种思想, 即組織所以存在, 为的是使所有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团結一致。”然后繼續說道:

“但是馮·施韦泽先生以极其令人憤恨和极不可原諒的方式企图挑撥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我們为了工人的事业, 有責任用全付精力来反对他。所以我們要求巴門一愛北斐特(这个斗争的典型地点)的黨員們, 在这方面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步驟; 党应当并且必須把这个在激进思想伪装下一向为普魯士政府的利益做尽一切事来損害运动的人, 从公众运动中清除出去。党将給巴門一愛北斐特的黨員同志們以支持。奋勇前进吧!”

七月十三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所要求的五百个新訂戶沒有爭取到, 不得不宣布縮小篇幅。这是对去年年底夸口要扩充

109

篇幅的回答。增加的数目还不到一百。但是不久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底有二千个訂戶）都必须继续缩减篇幅。因为德法战争忽然爆发，两派的许多党员都被征入伍，其余的也因突然失业而生活无着了。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和发展，我将在别处再讲。李卜克内西和我认为拿破仑和俾斯麦应对于这次战争负同样的责任，我们在表决所要求的战时公债时弃权，关于这事，我们以一个对国会议案的声明说明了理由。施韦泽及其伙伴则不如此。施韦泽认为这次战争不仅是一个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并且每个反对破坏和平者的德意志人，不但要为祖国而战，而且要为反对未来思想的主要敌人，为自由、平等和友爱而战。

把社会主义和战争联系到一起，固然是愚蠢已极，但是在那种情绪激昂的时候，即再荒唐透顶的话，只要是针对我们，也会有人相信的时候，这一举动是有点用意的。

在战乱中，由维也纳传来消息说，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摩斯特和巴普斯特因叛国罪，第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其余三到五年监禁，每人每月还要加罚素食一天。此外还宣告说，奥伯温德和摩斯特在服刑后还要被逐出奥地利各地。其余被告判刑较轻。一个主要罪状是参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奥伯温德和邵乌）和承认那只有用强力才能贯彻的爱森纳赫纲领。

110 现在差不多整个新闻界都因为我们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我们进行迫害，其中《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演得最为突出，给我们加上“卖国贼”一类的徽号。这还不够，施韦泽还派遣他的各种鼓动员到莱比锡煽动群众起来反对我们。哈森克莱维尔首先前来，他张贴开会布告，其中说道：“我们亲切地邀请本市全体工人、市民和居民们参加这个集会。当我们的军队已站在战场上的时候，对于个别的、在这里还很可注意的非德意志分子，我们的居民似乎有迫切必要

来公开表示一下真正德意志的意见。圣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

但是哈森克萊維爾把事办坏了；在集会中我们占了多数，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在哈森克萊維爾之后，由沃尔夫（汉堡）和阿姆包斯特（斯德丁）讲话，情形就更糟了。会场立刻发生乱嘈嘈的吵鬧，很快就变成格斗，受惊的店主熄了汽灯，才算完結。当我们会后聚集在我们的会所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說，施韦泽分子拥向李卜克内西的住所去了，要想打毁他的窗戶。我们立即抄最近的路飞奔前往，可惜到迟了几分钟。果然，李卜克内西家的一些窗戶被打得粉碎，李卜克内西夫人毫未提防，正坐在房里給她的第一个婴儿哺乳，因而受了极大的惊吓。我们在盛怒之下前去追赶暴徒，在市中心附近追上他们，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頓。此后不久，《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它的党徒的英雄行动时說道：

“对人民党的卖国行为的民憤来了一次爆发。李卜克内西的窗戶被打毁了。”

几天后，有一批大学生也想对我来一个类似的敬礼。捣毁窗戶之外还有一陣嘲笑的叫骂。幸而我住在院子后面一个大商人的房子里。那天晚上守門人一看出来前来的大学生要干什么，他就飞快地关上大門；他们只好毫无結果而退去。

这一切騷扰迫害本不值得再加叙述，却激怒了我的选举人，他们多半都是穷汉，却认为应当送給我一个銀质的桂冠，配上烏朗特的格言詩句。如果我料到这件事，我一定会使它不至实现。 111

一八七〇年八月底，特尔克在《伊塞羅区报》上宣布，他暂时把政治高高挂起而专作人民代言人。于是施韦泽最有力的台柱之一破裂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忽然转变，它和上面的联系显然是断了。战争和德国军队的不断胜利，使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差不多整个资产級都拜倒在俾斯麦的脚下。甚至在南德

意志人民黨人中間，沙文主義也猖獗起來。現在施韋澤對俾斯麥已是害多利少，再保留着他也無益了。

八月三十一日，《社會民主黨人報》轉過頭來反對武力吞併阿爾薩斯—洛林。九月初，俘虜了拿破侖以後，該報表示贊同締結停戰協定和反對使拿破侖復位的意見。因此也就與我們在《人民國家報》上所說的正相同。九月十四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文中反對常備軍，並且援引了格奈塞瑙的意見。

不倫瑞克委員會的委員被人們加上鐐銬牽往呂森要塞，奧古斯特·蓋布也遭此難，在漢堡被捕，當《社會民主黨人報》報道這個消息時，它憤憤地說，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這兩個主要煽動者叫別人代為火中取栗，自己倒安然無事。過了不久，我們被捕，它也就如願以償了。後來當約翰·雅可比和海爾比希（哥尼斯堡）被捕，同樣解往呂森的時候，《社會民主黨人報》又轉過來反對這次逮捕了。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初，該報報道，它的狂熱黨徒之一培曹爾特（萊比錫）退出全德工人聯合會理事會。他不願再理施韋澤了。

112 為了決定一筆新的繼續作戰的撥款等議案，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召開國會。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宣布，這一次黨的議員要投票反對撥款。戰爭在開始時原是防禦戰爭，現在發展為侵略戰爭了。所以該報在這裡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在李卜克內西和我們在國會中所經常挑起的非常激烈的辯論中，施韋澤及其伙伴始終保持沉默，對辯論不置一辭。只有當李卜克內西在一次發言中反對隸屬問題時說，我們與其說是德國的朋友，不如說是法國的朋友，並且認為：我情願做法蘭西人民的好兄弟而不願做流氓拿破侖的好兄弟，在這中間施韋澤高呼好呀！好呀！這是他在戰爭辯論中唯一的表示。

十二月十七日，李卜克內西、赫普納（《人民國家報》的助理編輯）和我的住宅突然被警察闖入和搜查以後，宣布我們被捕並帶去拘留待審。我們被一直拘留到一八七一年三月底，對於在新年后

开始的竞选，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是这并无碍于馮·施韦泽先生于一月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再次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去年七月二日联合会理事会关于他们的态度的决议，是在复选时要反对我们——爱森纳赫的诚实派。这时我们被关在严密的隔离监狱里，检察官和法官正共同对我们酝酿着叛国案，这个人却做出了这件事。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的会员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不服从他的指示。他们同我们的同志合作，推选我为莱比锡的候选人。还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拒绝在一篇决定在复选时采取反对我们的策略的声明上签名。馮·施韦泽先生又一次所望太奢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即签订和约的那一天，也是打算选作选举日的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社论，表示了极大的胜利信心。但在当天晚上，消息传来說施韦泽在对巴門一爱北斐特保守党的候选人馮·古塞罗夫先生在复选中并未取得胜利。这个馮·古塞罗夫先生就是一八六七年秋季付给施韦泽四百塔勒作为保守党对于他的竞选的津贴的那个人。在复选中施韦泽以八千四百七十七票对九千五百四十票失败。这个失败使他下决心，退出社会生活，这最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个性。他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献给党》的长文中宣布，今后他不能继续领导了，他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他在提到选举事件时说，这虽然不是他引退的原因，却实在给了他机会，使早就打算引退的念头实现了。在他周围的许多同志都能证明，他近一年来早已下了决心。他把他的职务维持到下次代表大会，等党把他的职责卸掉以后，他把大权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

他说，他引退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为工人政党牺牲了时间、劳力、心神安宁和金钱。没有人能再要求他继续牺牲下去……他尽

了他的力量，在崗位上站得也够長久了，應該請求退休了。

114 这个通告使联合会以及施韦泽的敌人都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在行动上表示过对联合会所赋与他的职务感到厌倦。他的一切措施都与此相反。不过应该承认，他一年来存着可能下台的想法，并且曾对他周围的人说过。但是大概没有人当真相信他。引起他这个决心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巴門—愛北斐特的經驗和一八七〇年一月柏林代表大會的經過，在大會上证明了，他要想获得联合会的完全信任是永远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对于他的领导和他的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滿意却是有增无已。他所提供的控訴材料实在太多，他的許多行动太令人不滿和厌恶，以至到了最后，人們不能像以往那样因为他特别具有作党魁的出色本領，而寬恕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些本領的原故，人們已原諒了他許多在其他情況下联合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这种寬容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他認清了，他對我們的斗争長久进行下去，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尽管我們的党当时在組織上和和它的各單位的緊密團結方面還有許多缺點，但是党不断地壯大，党在道義上的威信就是在它的敵人眼裡也是无可否認的。所以他不久就会有一天不得不設法與我們媾和，这无异于一个对他以往整个行为的判罪。他认为这对他是莫大的耻辱，他不願忍受。这种可能性迫使他宁願放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已失去上面支持的职位。

施韦泽已經作了試探來博得一个属于資產階級的地位。一八七一年一月，他有个三幕剧《卡諾沙》在柏林舞台上演，他借这个表示他也具有戏剧才能。从这以后，他就在这个領域內干下去。

四月三十日，拉薩尔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一部分會員決定脫离該会并轉入我們的党。当时在不來梅的奧古斯特·曲恩在一封《公开信》中也主張各种党派的團結，这对于工会运动尤其是絕對

必要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由四月三十日延期到五月十九日召开。但施韦泽在四月底就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所以该联合会现在没有机关报了。

在大会上特别关于财务情况的讨论占了很多的时间；末尾通过了佛罗梅的建议，建议说，“因为一部分的钱很不适当地用于鼓动，主席应受谴责”。在会议继续进行申述，他因为财政上的原故被迫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四月底停刊。同时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任何时候都是入不敷出，所以他也沒有得過編輯薪金。有一个代表指出，自一八七〇年十月一日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約一千七百个訂戶。《人民国家报》在同一时期失去三百个訂戶。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照原样复刊，但为联合会所有。该报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于七月一日出版。此外，还決議設立一个由三个會員組成的管理和申訴委员会。哈森克莱維尔当选为主席，接替施韦泽的职位，哈塞尔曼为主任編輯，德罗席为秘书。从现在起，主席每月支薪五十塔勒。

最后，大会对施韦泽給党的有力领导一致表示衷心感謝，并对他不再在这个崗位和领导地位上表示惋惜。显然人們在敷衍他的面子，而把他从前許多信徒对他的引退所感到的滿意藏在心里。

次年（即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却与这次一致同意的信任投票有鲜明的矛盾。在这次大会上宣讀了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汉諾威的理事会會議记录，在会上，施韦泽以往的亲信特尔克发言說：

“如果考察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出，每逢联合会上升时，就随便来一个小小試驗，又使它降下来。”

对于这一点，人們有理由来回答他：他是共同搞这些試驗的， 116

但是他对此一直不说出来。特尔克进一步說：

“施韦泽不让印制联合会卡片，因为他把收进来的錢自己立刻花掉。他(特尔克)却不能写信把这告訴宣传員，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党里不断发生新裂痕。当时奥林曾說过，联合会金庫不守制度；这是对的，因为施韦泽曾从联合会金庫取去五百塔勒，送到一个銀行家那里。因为顧慮到党，所以人們沒有說出来。”

特尔克繼續說：

“施韦泽与警察局有联系，凡有什么事发生，就向那里告密。施韦泽在魯迈尔堡服刑之前不久曾对他說，他(講話人)在任何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求助于警察局，施韦泽也曾同他一道去到那里，并且向他介紹这个地方，这时施韦泽显出对那里各房間都很熟悉。随后他陪他在整个院子繞了一遍，那里警官等站立着向博士亲切地問候。施韦泽也告訴他，他(講話人)随时可以到内政部长那里去。”

关于这一点，还是有理由答复特尔克說，他总是使党在暗中摸索，上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在为施韦泽辯护。另一个发言人认为，根据他的自供特尔克是远較施韦泽更为恶劣的叛徒。第三个发言人說道：

“他发觉施韦泽博士出席，就质問說，是否准許非會員出席，施韦泽既不能以會員身份，也不能以監視的警官身份出席，那他就必須立即离开會場。”

經过证实，施韦泽自从辞去主席职务以来，即未再繳付会費，因此，不再是联合会會員了。于是施韦泽离开了會場。

接着林格諾建議，決議不再接受施韦泽入会，他希望把他开除。

这个建議，即不再接受施韦泽进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議在表決时以五千五百九十五票对一千一百七十七票，一千二百零九票弃权，被通过了。

于是施韦泽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竟被那些多年来对他几乎是绝对信任的人或者是像特尔克那样的帮手所抛弃和判决。麦耶尔在他那我曾引用多次的论施韦泽的书里认为，联合会所以把施韦泽开除，是因为他对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有文学上的友谊。这是错误的，在那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没有这样敏感。果若是，则哈森克莱维尔也必定被开除，大家知道，当时他同样与鲁道夫·梅耶尔有往来。这种往来当然也不足以构成开除出党的理由。后来弗·恩格斯和我也同鲁道夫·梅耶尔有过私人关系，一八九三年在布拉格他曾作我们游览全城的向导。我认为，联合会对施韦泽的决议并不缺乏最重大的理由，用不着另外去找。

施韦泽的下台就等于这样一个人物脱离政治生活，这个人如果除了其他性格以外也具有工人党领袖所绝对必要的性格，即无私、诚实和完全献身于所代表的事业，他就无可争辩地会像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终生充任党的第一领导人。人们可以惋惜他人格上的这些巨大缺点，但是不可忽视这些缺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是那理想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那些消耗了时间、力量、健康和金钱而毫无结果，为共同的敌人所快意，又阻碍了无数要参加运动的力量们的多年奋斗。施韦泽所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结果。不错，他懂得如何把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清楚和生动地带给群众（这是他的功劳，并且这种活动同他所扮演的两面政治角色毫无矛盾之处），但是他在政治上播下了不幸的种子，滋长了狂热，并且企图用这个争斗的根源来保持工人运动的长久分裂，因而削弱了工人运动。

我确信，这就是他真正的任务。其正确性可由上面所引用的特尔克在柏林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证明，他说：“看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到，每逢它上升时，就随便来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关于这，联合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职工会也完全如此。当

职工会应时代的潮流非创办不可而创办起来以后，就来一个荒謬透頂的組織阻碍它的发展。如果說施韦泽在这里沒有达到他的目的，那是因为运动过于健全，不容人摆布，它已发展得超乎他之上。

他的活动的真正目的，即在俾斯麦心目中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創造一个政治上馴服的工人运动。因此进步党的立場被坚持当作工人运动反对派的分界綫，照施韦泽的話，那个进步党在社会的事业上是个退步党。根据我在这里所綜合的事实，施韦泽为俾斯麦服务，已經毫无疑問。至于人們不知道他充当这个角色領到多少款項，那不能作为任何证明。这类事情，如我所反复提及的，必定不会在公开市場上商議，而且对施韦泽这样的人，也决不会由低級官員經手办理此事。我确信，连柏林警察局长也不会知道此事的詳細情形。

他經常并且終生不得不同債权人糾纏不清，也不能作为他受賄的反证。因为在俾斯麦統治普魯士的初期，对于像施韦泽所做的那种服务，不会付太多的代价。机密費到以后才受俾斯麦的绝对支配。对于被全部反对派報紙所攻击的机密費，施韦泽从沒有彰明較著地写过和說过一个字。他在另一方面是属于纵欲无度一类的人，即使有銀行經理的收入也不难把它花光。他也可能希望，并且他的野心也表明，到适当时期在一个部里或国家机关里搞个相当的位置，如社会政治樞密顧問之类，俾斯麦自己承认他当时的樞密顧問們什么也不懂得。

119 但是，就施韦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能够自由、独立、随心所欲地处理他所领导的联合会，却也是绝对必要的。独裁制就属于此类。独裁制使他摆脱一切监督，容許他为所欲为，他沒有必要把他的阴谋詭計告訴別人或甚至征求別人的同意。如果那样，他就不能独裁并且演不成这个角色了。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大大小的改变，又摆脱了代表大会刚刚給他帶上的桎梏。并且因为拉薩尔

自己有独裁欲，于是創設了一个容許領導人有独裁权力的組織，所以必至于把这組織變成不准觸動的水金鳳，攻击这个組織，就被加上叛國一类的罪名。主席的絕對權威必須保持不可侵犯。此外，必然有助于此的是对拉薩尔和他所創辦的組織的經常崇拜，这种崇拜为玩世不恭者所窃笑，并使他对那些願受他領導的人們更加蔑視。

因此，施韦泽像在别处一样，也曾对魯道夫·梅耶尔抱怨工人的忘恩負义。这种怨言是符合他給我們的印象的。对于他在运动中的地位，他正是抱着完全錯誤的观念。一个党的領袖只有老老实实为党尽他的力量和才能，才会成为真正的領袖。一个参加并属于民主运动的人的义务和責任，就是尽共所能做最大限度的工作。他通过他的成績获得群众的信任，而群众因此拥戴他为領袖。但是，这只是把他作为他們最信任的人，并不是当作他們所盲目服从的主人。他是保卫他們的要求的战士，他們的渴望、他們的希冀和志願的表达者。領袖只要适合这种任务，他就是一个党信任的人；但是党一旦发现它受了迷惑和欺騙，并被引上歧途，那它不仅有利，而且有責任撤消領袖的領導权和收回对他的信任。一个党不是为領袖而設，領袖却是为党而設。因为任何权力地位都含有被濫用的危險，党就有責任对領袖的行为加以严密的監督。

120

但是施韦泽对事情的認識，却与他所必須認識的正相反。他觉得自己是个慈善家，把党只看成他向上爬的脚架，看成滿足他的野心的手段，滿足他的享受欲的机会。但当他这一場賭博失敗时，他就抱怨別人忘恩負义。但是群众只要相信他們的領袖是誠实的，就決不会忘恩負义。如果他們先对某一个人加以信任，就很难使他們相信他們受了欺騙。这一类的例子很多。誰抱怨群众忘恩負义，誰就是告发自己。他应自負其咎。

在施韦泽不得不放弃賭博之后，他忽然认为應該把他在位时

一直竭力阻撓的事情向他的党徒提倡。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他发表了一个题为《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的传单，十分坚决地拥护两个党派的合并。当然，如果不先试行为他以往反对我们的行动作辩护，就不能这样作。据他看来，我们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但这种局面首先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多的活动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所造成，这些活动分子，他起先把他们和我们一律看待，并且都称之为文人、教师、商人、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反对最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使他不得再当联合会的会员，而他却是那个联合会多年来受人称颂的主席。他认为这决议和一年前代表大会所给他的信任投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慷慨地保证他的勤勤恳恳为党服务的志愿。然后他分析了两派分裂和互相斗争的害处，并要求召开一个联合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一个集中的组织，按他现在的理解，这个集中的组织就是拉萨儿组织真正的本质。他要求同那些

121 “愿意联合的领袖”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同他们联合；如果他们反对，就抵抗他们”。人们看到，他也能这样说。

施韦泽起初想把他的传单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但被拒绝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团结思想，而特别是因为李卜克内西不相信施韦泽。他认为传单是个圈套。我从这个建议所得的印象是，施韦泽想借此激怒他的后任，并使他陷于进退两难。施韦泽要求团结的呼声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完全无效。在某种意义上，他现在亲身体验到多年来煽动反对我们的后果了。必须又经过多年之后，在内外情况逼迫之下，才实现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团结。

最后我还须叙述一下施韦泽的几种行为，借此更足以正确地说明他的性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件，自然也为资产阶级新闻界所知晓，于是他们对被提出的对施韦泽的忘恩负义，作了各种各样的刻薄评论。施韦泽为这在《柏林交易所

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在结尾时说道：

“如果您认为这事是有特点的，那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对于这些聚会在一起的‘领导者’和‘鼓动者’，形式问题只是个借口而已。像这种循环不已的忘恩负义的证据，很足以说明，在那些人们中间，可惜只有极小部分为新思想的热情所鼓舞，而绝大多数，使我看着不得不伤心，只是受到对上流社会的嫉妒心（没有人比他更狂热地煽动这种嫉妒心了。——奥·倍·）或其他不光彩的动机所驱使罢了。为此去掉狭隘的眼光，对这种忘恩负义或者愚昧无知就不再惊奇了。”

他在《柏林人民报》上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自从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后就决没有主动地过问社会民主党的事情，在将来也不愿与它发生什么关系。他对联合会感到十分厌倦。这个声明把施韦泽自己揭露得不能更加彻底了。

但是，他以上述方法表示他对由他多年领导过的运动的代表者的仇视，还嫌不够。差不多在他发表《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传单的同时，在柏林的一个舞台上演出他所编写的三幕七景新奇滑稽歌剧《我们伟大的同胞》。他在剧中尽情讽刺和嘲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而他们的教导者却是他。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把这种行为申斥谴责为没有人格。

施韦泽患肺结核病多年，最后他到瑞士去疗养。但是没有效果。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因肺炎去世，年四十二岁。据古斯塔夫·麦耶尔所述，他的遗体于同年十月七日葬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祖塋。送葬的只有他的家属和一个天主教神父。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以往追随他和崇拜他的人却无一送葬。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他在去世以前早就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给他的悼辞决不会是颂词，祖塋也不是致悼辞的地方。也没有身后声誉来表明人们还怀念这个以往的领导人。一个著名的德意志工人运动领袖就这

样完结了，他的命运是咎由自取的。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我一接到我选入国会的正式通知，就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启程前往柏林。议会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开幕。我面临一个完全新的政治活动。在此以前，我对国会生活一直是完全陌生的；我也不认识一个能指示我这种生活的人。施拉普斯律师和我是同一个党选举出来的，他所知道的议会生活同我一般多。然而就下了水。当我到了国会的会场莱比锡大街旧贵族院刚要推门时，门由里面开了，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走出来，他也是议会议员。我当时想，最高层社会的人在这里遇见了最低层的人。我到办公室报到后，就往沙夫拉特律师和维加尔特教授的住宅去打听一下国会里的情形。我带有罗斯梅斯勒教授给他们的介绍信，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他们两人都埋怨他们的普鲁士同志们（进步党人），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立场。还有分立主义的萨克森，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及其伙伴也已被俾斯麦弄得惊惶失措，不敢再主张他们的立宪观点了。

我想说明一下，当时保守主义的萨克森、汉诺威诸邦已经有过一段比普鲁士长得多的宪法生活，它们拥护甚至自由主义的普鲁士也不敢主张的立宪观点并且在它们国内已经实现。

我被分配在第一组。对不明内情的人要说明，国会议员是用抽签方法分为七组，在当时他们还要经过最后的选举审查，并且像现今那样选出专门委员会。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必须是用七除得尽的数目。

三月八日，我写信給我妻說，施拉普斯和我构成了最左翼，我們坐在相应的地方。再向左去就被墙擋住了，我們却不願用头碰壁。

議員中間当时有北德意志政治家的精华和議会的权威人物。在那里我又看到馮·本尼格森，他去年主持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議員會議；还有卡尔·布劳恩博士（威斯巴登），他是国会中的滑稽家，又据說是国会中最精于品酒的人；紅色貝克尔，我与他重叙一八六三年的友誼；麦克斯·邓克尔，他以自己的鬍髮自豪；馮·傅尔肯柏克，他后来是辛孙的继任人，是国会中从来偏見最深的議長；古斯达夫·夫賴塔格，著名的小說家；魯道尔夫·格奈斯特，后来有一天陆军部长馮·隆恩在全院面前恭維他，說他是一个能够证明一切的人；短小的拉斯克尔，当他匆匆上讲坛时，两条短腿常常像鼩鼠那样跑；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員米凯尔，一个头脑精細的人和演說家；普兰克博士，后来是民法法典的主要編輯和注解人；欧仁·李希特尔，他看起来还是同一八六三年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認識他时那样冷淡；辛孙博士，曾任法兰克福議會議長，现在在国会里仍任这个职务；因为他在主持會議搖鈴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大家戏呼他为雷神；石威林（普查尔），曾当过“自由主义时代”的内閣大臣，他后来实行了国会每星期指定一天（照例是星期三）討論議員的提案；所以至今在国会隱語中称这一天为石威林日。舒尔采—德里奇（特維斯登），他因为同馮·曼托伊费尔先生决斗而特別出名；馮·翁魯，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动分子；瓦尔德克，进步党原来的領導人；梅克林堡的維格尔斯兄弟，两个以往的革命家，其中一个属于民族自由党，另一个属于进步党。联邦立宪派中除了温德荷斯特以外，馬林克罗特最为突出，他是后来中央党中头脑最精細的人。中央党团当时是由老自由主义者組成的，其中有乔治·馮·文克，是国会中講話最快的人，为速記員所惧怕。最后，站在



极右派而且是它真正的領袖的高級樞密參議海爾曼·瓦格納，一個又瘦又長的官僚形象，他的面孔精瘦無情，他的聲音招人厭惡。

125 一個重要人物，卡爾·麥耶爾·馮·羅特希爾德，是由被合併的法蘭克福以《法蘭克福報》的支持而進入國會的。他是一個矮胖而寬肩的人，漆黑的頭髮和鬍鬚理得非常整齊；他在相當大的肚子前面佩着一條重金鏈並且服裝總是非常考究。以往我從沒有見過他的照片，可是見一面我就認得他了。我在下屆國會遇見施韋澤時也是這樣。國會里還有孚格爾·馮·法爾肯施泰因和馮·施坦因麥茨兩位將軍，他們是因為去年的戰績而當選的。

但是比上述所有這些人更使我感興趣的是以前我沒有見過的俾斯麥。當時他出席國會，幾乎總是穿着黑色禮服、黑背心和樞密參議式的黑領帶，露着白色的硬領角。他還剩下的幾根頭髮和剪得很短的鬍子也都是黑色。所有漫畫家都把他那三根頭髮畫在光光的禿頂上，好像廣闊的原野上長着三棵白楊樹，我倒是沒有看出來。這也許僅是存在於畫家的幻想中，或者是在制憲鬥爭中成為他敵人手中的戰利品了。我急於想聽他講話，但是這個大人物站起來，不發出獅吼或宏大的聲音，卻尖聲尖氣地向議院講話，令人大大失望。他的語句又長又很複雜，有時稍帶口吃，但講得始終引人入勝，並且井井有條。

俾斯麥固然已同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民族自由黨人言歸于好，但他總還是不相信他們，並且害怕他們可能又陷於渴望議會權力的錯誤，又要為他惹麻煩。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擬定憲法草案，但是這個草案如果不作一些比較大的修改，即使十分安分的自由派也是不肯接受的。最後他對他們作了相當的讓步，但在主要的兩點上，即鐵的軍事預算和拒絕議員日俸，他們對他讓步了。關於日俸，他後來曾一度承認，如果在第一次表決時以大多數票通過日俸的自由派加以堅持，他也一定會准許的。但是早在那

时，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习惯于变节。不可想像，如俾斯麦所威胁的，如果宪法中存在議員日俸，他就把宪法付之流水。他不能当着全世界出这种丑。此外，在立宪国会中，除普魯士、梅克林堡和南路斯各邦的議員外，其余諸邦的議員都支領日俸，例如我們薩克森的議員是由邦金庫每天付給四塔勒。

相反地，俾斯麦在三月二十八日會議上討論将来的国会的选举法时，却須为这种选举法进行辯护。民族自由党右派議員馮·西培尔、格隆勃萊希特(哈尔堡)和迈耶尔博士(托伦)以及各种右派的发言人說出了对这种选举法的顾虑。西培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独裁”。俾斯麦对这解释說：“普选法有几分是我們致力于德意志統一而得到的一份遗产；这在法兰克福所草拟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中就曾有过；我們在一八六三年曾用这来对抗奥地利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企图，我只能說：至少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举法。”

然后他闡述如何在这个行将建立的二十一邦的同盟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选举法的其他共同基础。难道人們还想要三級选举制嗎？“是的，誰要仔細观察一下三級选举制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状况，誰就必定說，在任何国家里再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坏的、更不合理的选举法了。”他对这选举法任意和苛刻地加以指責說，如果它的发明人能想像它的实际效用，就决不会制作它。他自然也感觉到，一个人若被这种选举法列在低級的选民阶层里，就会把自己看成公奴，看成政治上的死亡。

我的第一件議會行动是使国会做了一桩不合法的事。因为这件事沒有記入史册，在这里略加叙述。当我第一次参加小組會議时，适逢議程上列着萊比錫議員馮·韦希特尔教授的选举問題。韦希特尔在复选中以五千四百三十四对四千四百零三票当选。但是萊比錫市參議會犯了个大錯，該会不是照选举章程第七条所規定的那样，把选区划为若干选举組，每組居民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人，

而是把全市选民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列，分为八个位于市中心的选举地点。所以一个人的当选不是以选举组而定，而是以选民姓名的字母次序而定。报告人貝图苏一胡克伯爵述说了这个情况，据他了解，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在讨论选举是否有效的时候，我也发言说，我居住在莱比錫已經六年，对该市的政治情况認識得很清楚，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按照法律规定来划分选区，选举結果也不会两样。我这个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理解竟被通过。委员会以十四对十一票決議选举有效，全体會議未經辯論即一致同意这个建議。

如果选举被宣布为无效，莱比錫市參議會就会大大出丑，我这样就使它免于出丑了。但是我也拯救了該市的代表，因为国会会在四月十七日就要閉幕，如另訂选举名单重新选举，時間就来不及了。不过这种决定，当然也只有在不稳定的情况下，象新国会开第一次會議期間，才有可能。

我在上文曾提到貝图苏一胡克伯爵的名字。这位先生是那时期的一个肤浅而多言的人，并且特别喜欢讲些荒唐話。例如，有一天他这样说，“人們必須把時間的河流縛在前額头发上”；又一次他談到議員时说，“他們滿心渴望，想回家到他們的父亲的耕牛那里”，一句話惹得全議院哄堂大笑。

既然当上了国會議員，我有必要在全体會議上作个长篇的发言。在我的选区里，人們也渴望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了相应的质問。但是討論終結时的建議非常頻繁，并且在宪法草案的总辯論中我的发言又被打断。我终于在第十四条，南德意志諸邦对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上，获得了发言机会。我讲道：

我确信，普魯士在創設北德意志同盟时决不是为了德意志的統一（右翼激烈反对），相反地，人們所注目的只是普魯士的特殊利益，霍亨索伦王室权力的加强。（右翼激烈反对。議長要求安靜下来，說人們应当在我发言后再来反駁我。）細看一看同盟，就可見其

余諸邦陷于对普魯士完全不正常的关系中。同盟只是一个由附屬国圍繞着的大普魯士，而各邦的政府不过是普魯士王治下的各省总督而已。（右翼激烈反对。）

我繼續讲道：

如果普魯士願意把南德意志諸邦收进同盟中去，这本来是能够办到的。有人說法国会反对，我以为不然，因为由于同南德意志諸邦的軍事协定，在战时德意志的軍事力量就統一在普魯士的手里。因此，法国将注意避免声明反对北德意志同盟吸收南德意志諸邦。法国方面如果干涉德国内政，結果将使全德国一致起来反对法国。

如果可以說布拉格和約只是一个国际訂立的南北德意志之間的联合，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普魯士对这个问题如何想法，因为普魯士强定了布拉格和約，如果普魯士政府发现和約对他有害，就要毫不延迟地把它撕毀。（右边：啊！啊！）我也确信，一旦奥地利能够洗雪去年的失敗和耻辱时，也会照样做的。普魯士政府所以不願吸收南德意志諸邦入北德意志同盟，是因为害怕被多数票所压倒。普魯士通过軍事协定把軍事力量抓在手里就滿意了，此外是力求通过关税条約在存在着的鴻沟上架个桥，但是并不把它填平了。我們不支持这样的政策。我反对把这样的政策叫做德意志政策，我反对这种不是宣布德国統一而是宣布德国分裂的同盟，我反对这种把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軍营（激烈反对）而把自由和民权的最后残余毁灭净尽的同盟。

民族自由党議員魏柏尔（斯塔特）认为我的讲话会使会議发生不和，但是他希望，把这些不和讲出来，可以提供解决这些不和而归于和的机会。

議員米凱尔也反駁我，說我惋惜北德意志同盟强夺了小公侯們的權利而使他們处于总督的可怜地位。这是对我的話的曲解，

我只是想用譬喻來說明，北德意志同盟是个怎样特殊的产物。即使当时所有的中小諸邦全被吞并了，我也会袖手旁观。米凯尔另一句格言是：普魯士邦不是军事国家而是个文化国家……奇怪的是，那些敌人用怎么样的联合来反对这个新的国家形式。一方面是最坚决的民主主义者，他們的倾向却不过是对于小公侯們的威权特别感到兴趣，与他們联合的是（如果要公开說）那认为我們的祖国不在别处而在羅馬的山南党。

請看，在我們的議會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已出現誣蔑，我們成了当时在北德意志国会中还没有有組織的代表的山南党的同盟者。这样，米凯尔就是他的同志至今还用来说对待我們的誣蔑的創始人。此外，他也表示希望，願普魯士国王将不再与倍倍尔这类的敌人打交道。这个希望至今尚未如願，还有三十年后所說的：社会民主党只是一时的現象，也是如此。

議会的媒姆拉斯克尔对于我的发言自然也難安緘默。他見第一个发言人（我）就这样激烈攻击我們的政治領袖，很感驚訝。据他所知，我所隶属的那个党，在爱北斐特—巴門曾有力地支持了首相的选举。（他意指俾斯麦的选举。）此外，他一定要我承认，我是把在酒吧間里常說的閑話照样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这时議長打断他的話，說他（拉斯克尔）无权对同事的发言作这样的批評。在一次私人談話中我回答拉斯克尔說：由于他的攻击使我能够把我的党的态度解释一下，倒是很合我意。我并不属于在巴門—爱北斐特帮助俾斯麦伯爵当选的那个党，那个党名叫拉薩尔党。他（拉斯克尔）从我在这里反对俾斯麦伯爵的政策这个事实，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我不属于拉薩尔党，而是属于激进民主党，或者如果願意，也称为人民党。关于他对个人的攻击，議長既对他斥責过，我就沒有必要重提了。

我的发言也在院外引起重大的轰动，特别是我的选举人感到

非常滿意。相反地，自由派的《格勞紹日報》发泄它的怒气写道：“莱比錫的年輕旋工師傅倍倍尔幸运地发表了他学得烂熟的处女演說詞，因此猪肉跌价三分。”次日，在也是格勞紹出版的《順堡公报》的一个广告上对这回答說：“所期望的猪肉跌价没有实现，但因东普魯士的牛（暗指作者）大批涌到，所以牛肉大概要大跌价了。”

关于我的处女演說还有两个余波。《凉亭》杂志那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談論到国会里出色人物的姿态。我也荣幸地被列在文章里。作者描述，当我发言时，好像是革命的海燕在會場中颯颯飞过。这种称赞，在《凉亭》出版人艾恩斯特·恺尔看来（我以前同他曾为政治事件会晤过多次）太过份了。該期的印刷因而临时停止，并且修改了那句話。

几星期后，我又回到家里，有一天两位仪表軒昂的先生到我的作坊里来，我正站在作坊虎鉗床前鏽牛角。其中一位先生探問旋工師傅倍倍尔。我回答說：“就是我。”发問的人有点惊愕地看着我，并且說：“我說的是国會議員倍倍尔。”我有点憤怒地答道：“是的，是的，就是我！”他惊讶地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自我介紹說，他是罗塔的馮·弗里森男爵。他是部长的兄弟。他讀了我的国会发言，喜欢其中某些章节。我以鞠躬来答謝他的恭維。接着他問，誰是約翰·雅可比博士，他在普魯士邦議會中作了那么好的发言反对吞并和反对俾斯麦所要求的賠款。我向他作了他所希望的說明。然后两人离去。

131

在那时代我們的分立主义者对俾斯麦怀着极大的怨恨；他們为了消灭他，不惜与魔鬼結盟。国会开会期間，大部分薩克森議員住在貴族院对面的莱比錫花园。我們与店主商定，每天在开会后为我們准备午时会餐。有一天我坐在議員哈柏康旁边，他是齐滔的市长和薩克森下議院的議長。在談話中間也談到俾斯麦，俾斯麦在当天上午會議上又作了激烈的发言。哈柏康对此还是非常激

动，他用最激烈的言語来反对他。

会期將終时，国王邀請全体国会議員到宮中赴宴。我和另外几个議員沒有参加这次宴会。次日午前，在国会遇到与我已成好朋友的紅色貝克尔。貝克尔还帶着酒意，大片外露的衬衫胸部还帶着酒漬。当时他还是个光棍。“喂，貝克尔”，我問他，“昨天在威廉那里怎么样？”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站在我的面前，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輕輕搖着回答說：“小倍倍尔，真了不起呀，威廉有美酒儿呀”，說着他还嘖嘖咋舌，“我背后还站着一个人，我的酒杯一空，他馬上斟上。”我笑着問他：“那么今后您是宮中有請必到啦！”他也笑着回答說：“我的亲爱的，这是您可以料到的。”

貝克尔和米凱尔是北德意志国会中两个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发迹。貝克尔当过多特蒙德的市长，后来是科伦市长，由于这个資格也成为贵族院議員。米凱尔爬得还高几級。他起先是欧斯納布魯克的市长，以后是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市长，逝世前是有名的受封为贵族、领恩俸退休的普魯士财政部长和农业党的紅人。

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若干盟員一般都有了特殊的发展。除了貝克尔和米凱尔之外，有以往的排字工人瓦劳，他逝世时是美国因茨的市长，还有柏尔格，曾长期担任《莱茵报》的主編，在立法时期当过一任德意志国会議員。他和当时的貝克尔同属于进步党。

四月十六日，举行对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記名投票。出席議員二百八十三人（国会議員合計二百九十七人），贊成者二百三十票，反对者五十三票。反对者除施拉普斯和我之外，还有**全体进步党**、波兰人、温德荷斯特、韦希特尔、哈柏康和若干汉諾威人。根据当时进步党的見解，北德意志同盟宪法中沒有包含着制宪議會必須由它批准的权利。沒有基本民权、沒有认可捐稅权、沒有部长責任制、沒有議員日俸。而代之者却是铁定的軍事預算和同盟首相

的巨大权势。从一八七一年起，同盟首相称为帝国首相。国会在四月十七日闭会；共举行会议三十五次。

会期将近结束时我叫我妻来柏林游览一下。那时的柏林不能同今天相比。又长又直的大街上没有装饰的屋面，使柏林显得单调乏味。房屋像一队兵士整齐地排列着，毫无使人兴奋的色彩。交通比今天也差得多。有时两匹乏马拖着一辆公用马车在石块路面上来往颠簸。出租马车很少，那时柏林人还嫌它太贵。唯一现代的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由铜穴到沙罗登堡。卫生情况恶劣。还没有下水道。各家的污水汇聚在沿着人行道的水沟里，热天臭气熏人。街道和广场中没有公用厕所。外乡人，尤其是妇女，有需要时，毫无办法。就是在房屋里面，这类设备也简陋不堪。有一天晚间，我同我妻往王室剧院，当我在两幕间休息时进入男小便处时，吃了一惊。里面正中间放个大桶，沿着墙放几十个便壶，用过自己提起倒入大桶里。这真是舒适并且完全民主的。实际上柏林这个大城市到一八七〇年以后才由野蛮状况进入文明状况。

133

我养成了习惯，每次国会会期过后到我的选区去旅行，并在主要地点举行几次选民大会，会上我作关于国会辩论和我的活动的报告。因为我们到处都有大会场可供使用，估计听众必然踊跃，并且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我开始鼓动起，妇女就占到会人数的一大部分，后来她们竟成了我们热心的女鼓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在选区内所散发的几张党报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而敌人的报界却不断地特别反对我，所以这些集会是有必要的。我与我的选举人渐渐形成融洽无间的信任关系。敌人在各种选举中曾力图使我下台，终属徒劳。十年后（一八七七年），我因在两个地方当选而放弃这个选区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不这样做，党就要把

新赢得的选区(旧城——德累斯顿)又失去了。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134

第一立法时期的北德意志国会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日开幕。新当选的議員中特别突出的是馮·霍維尔柏克男爵、弗兰茨·齐格勒尔和馮·奇尔希曼。三个人都属于进步党！奇尔希曼同齐格勒尔一样也经历了一段較长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时期。他在一八四八年普魯士国民大会中是属于抗稅派的。他也是受迫害最多的普魯士法官之一，反动派对他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最后他被撤去拉提布上诉法院副院长的职务而无退休金，因为他作了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共产主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限制人口增加，以求文化的更高发展和取消經濟的不平等。他对听众說：“人类在幸福和健康方面逐渐平等的理想，深藏在每个人的胸怀，所以人們用不着灰心。您可以确信，向这个目标的移动和接近是規定了的。即使要用四千年之久才仅仅赢得高度的平等权利，我們也不要气餒，因为財富的平等，这个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在两世代内是不能达到的。”这个演讲竟被认为“不道德”，而且这样不道德的高级法官是普魯士这个一贯虔信宗教和讲道德的国家所不能任用的。奇尔希曼誠然是国会中最具有哲学修养的人，無論如何他在修养和学識方面远远超过那些撤去他职位的法院官員。除了上述三人以外，議員中还有毛奇元帅。此外，議院里还有后来声名狼藉的史特魯斯貝克，他极善于拉攏許多普魯士高等貴族人士做他那投机公司的誘餌，他們的签名也光耀着他的计划书。可是史特魯斯貝克的外表即已給人以极为可厌的暴发戶的印象，所以这种现象就更令人难于理解了。他是自夸豪富的面貌出現。他所举办的宴会，在那时的柏林轰动一时。柏林报界为此刊载了长篇的报道。像他那样的揮霍无度，在柏林私人方面是空前未有的。大資本主义的紀元由

135

史特魯斯貝克开始了。貴族和財閥結成了親眷。

我在這次會期中的第一次發言是對九月二十四日關於請願的討論。我對這提出異議，因為國會向同盟首領（即普魯士國王）請願，自稱為德意志民族代表。議長打斷我的話說，並沒有其他的民族代表。我對此回答說，國會只代表民族的一部分。人們遺棄了一千八百萬德意志人（一千万德意志—奧地利人，八百萬南德意志人），還有盧森堡也被排斥在同盟之外。此外，根據布拉格和約第四條也會有一天把北什列斯維希地區轉讓給丹麥的危險。這不是民族政策。

俾斯麥為此發言。他不是反對我個人（他說時稍帶惡意），而是因為我成為廣泛流行的錯誤的喇叭筒。盧森堡並未被遺棄，他企圖用一連串的詭辯來作證明。難道我希望因盧森堡而掀起戰爭？這當然是我絕未想到的，我只想證實，該邦同德意志的老關係將因俾斯麥的“民族”政策而被解除，而且是由於拿破侖的要求。盧森堡以前是德意志同盟各邦之一，在法蘭克福的同盟會議中有席位和表決權，並且盧森堡城是德意志同盟的要塞，且因盧森堡大公是荷蘭國王，所以荷蘭的利益也是同德國利益高度相結合的，這在國際糾紛中是有利的。

十月十七日，在討論有關兵役義務的草案時，我第二次發言。這個法律草案所要求的只是表面上的普遍兵役義務，因為這樣長的服役期限，不可能讓所有適齡的人都來服兵役。但是一切適齡的人受軍事訓練，卻是一件公正的舉動和對國家有益的事情。這只有施行由於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瑙的軍事改編而在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一三年在普魯士所施行的那種國防制度，才有可能。較短的兵役期限也同樣能提供善戰的士兵，一八六六年在絕大多數士兵從軍不過九個月的薩克森證明了這一點。普魯士現行的一年志願軍制度也證明了這一點。

非常反对我的汉斯·布鲁姆对我大发雷霆。說我哪里有脸作这种发言？（議長斥責。）在私人談話中我答复布鲁姆說，他的父亲曾有脸在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議会中作与我类似的要求，我的脸就从他那里得来。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法律草案的发言，在外面引起震惊。我們收到三十多封贊成信，几乎全是由普魯士各城市发出的。莱比錫的同志們送給我們一只九磅重的火腿作为表揚，这是我們这些現在还无薪給的議員們深为欢迎的。

在討論护照法时，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一个建議，說警察无权把人驅逐出境。关于迁徙自由法，我們建議，警察不得給任何人以居留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根据法院的判決。这条法令一发生效力，以往实行的一切驅逐处分，应一律取消。李卜克内西在申述建議的发言中提到了他一八六五年被逐出普魯士，并在一八六六年秋天又因违反禁例而被判处的那些事件。这些建議当然被拒絕了。

會議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行結束。

一八六八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開幕的国会集会被中断；在耶穌复活节后，四月二十七日，在柏林召开关稅議會。會議是在普魯士邦議会的會場（当时在端侯夫廣場）举行，因为貴族院的會場容納不下一百人左右的議員。筹办人在分配席次时曾稍怀恶意地把罗特希尔德的座位放在李卜克内西的旁边。全場都笑了。但是这位法兰克福的世界銀行家不久就不能忍耐这个危险的邻居，他让人給他安排另一个座位。

在南德意志关稅議会的議員中間，不少人已經在政治上起过作用，例如路易·班伯格、法律教授布隆赤里、天主教的社會政治家約尔格、統計学家科尔伯博士、霍亨卢恩侯爵（希金斯福斯特，他后来任首相）、馬夸特森教授、麦茨一达姆斯塔德的律師摩里茨·馮·莫尔、律師奧斯特伦（斯图加特）、前部長馮·罗根巴赫、沙夫

萊教授、塞浦教授、斯陶芬堡男爵、塔弗尔博士（斯图加特）、馮·汪比勒尔部长、律师斐尔克（春天的百灵）等等。

我因为参加了关税議会的開幕會議，所以我同議員汉斯·布鲁姆、馮·瓦茨多尔夫和图比阿斯一起作年輕的秘书。那时国会的办事細則中还規定着，在會議開幕时由出席的最年輕的四个議員会同高齡的議長組成临时办公室。人們怀恨于这样使社会民主党人得以进入办公室，后来就把办事細則改变了。现在是由高齡的議長选拔临时办公室的四个秘书。对于反对派，国会总是不乏斤斤計較小节的。

南德意志的議員中同李卜克內西和我結成較亲密的关系的也有几个，阿迈尔弥勒、弗賴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塔弗尔等。其中許多是属于民主党的，例如科尔伯和塔弗尔。大多数南德意志議員在新秩序之下只觉得很难。关税議會是两年前进行的內战的后果，在南德意志还是創痍未复。人們总觉得自己是战敗者。加之，关税議會也是个政治上不得已的办法，非驴非馬，是一个应急的产物。自由派以現代資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人的身份，想把关税議會造成一个完滿的議會；这不仅是俾斯麦考虑到对法国的政治关系和南德意志的情緒而加以反对，就是南德意志那些看不到北德意志同盟及其宪法和組織中有政治理想的一切其他政党的代表，也都反对。另外，那时候南北德意志的人民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特別尖銳的对立；因此，南德意志人对于維也納和巴黎比对于柏林还熟悉些，那时期南德意志人很少去訪問柏林，所以人們了解到，一有相当的机会，双方的精神就冲突得很厉害。在这里却也表现出，南德意志人在坚韧性方面不及北德意志人。李卜克內西和我时常为和我們接近的一部分南德意志議員竭力撑腰。

民族自由党人想通过致普魯士国王的請願书的嘗試在热烈辯論后以一百八十六票对一百五十票失敗了，这使建議人完全莫名

共妙。在这次會議期間我作了两次較长的发言。第一次是反对征收烟叶稅的法律草案，第二次是关于關稅同盟和奧地利之間的關稅條約。在这个辯論中，我同議員拉斯克尔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他又一次以各种各样迂腐論調反对我們，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攻击各小邦中的情况。我有力地反駁他那迂腐論調，并且說，我听得由他嘴里攻击小邦，更觉惊奇，因为他原是由一个小邦（迈宁根）得到他的委托的，由于这一点，胜利属于我了。

139 五月十四日，由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和黨員同志們在音乐大厦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书商琼納斯（他后来因为營業失敗而移居美国，在那里合夥創辦了《紐約人民报》，他任主任編輯）、路德維希·勒維、保尔·辛格爾、弗·斯台法尼、铁尔德等。南德意志議員有弗賴斯勒本、科尔伯、奧斯特倫、沙夫萊和塔弗尔，此外还有李卜克內西、萊因克博士（他是由倫內普—麥特曼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出来的）和我出席。李卜克內西猛烈攻击进步党的政策，尤其激烈攻击瓦尔德克及其伙伴，而且他是那么尖锐地反对北德意志同盟，致使委员会中部分委員惶恐不安。我发言說，現在在德意志統一的形式下所着手的東西絕不是也永不是統一的德意志。我們希望有一个由全体人民的意志支持的德国，領導它的是一个由人民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政府，只有在这么一个德国，才能期望为人民，尤其是为劳动人民，謀求真正的福利。我并且批評北德意志同盟的軍国主义发展的情况說：結果不是減輕負擔而是加重負擔。

麥克斯·希爾施博士帶領着他的黨徒參加會議，意欲引起吵鬧；我們之間早已絕交。这是很早的事了。他那吵鬧的黨徒被斥責得安靜下來。

在五月間的一个星期天，柏林裁縫协会邀請李卜克內西和我參加宴会。我們照他們的意思邀了奧斯特倫、沙夫萊和塔弗爾諸議員同往參加。在跳舞会上來了个所謂女士邀舞的节目。女士們一齐冲向我們五个人。每人都要同我們跳舞。但是四位同事声明不会跳舞。于是她們都向我这倒霉的进攻。四次舞都順利地过去，到第五次，我的头和胃都不好过。我病了，只好逃到庭园里去。次日午前，有个妇女代表团到我的寓所来慰問。我請她們放心，这点艰苦我是可以克服的。當我們那天夜晚回家时，沙夫萊对于舞会的美好风格和全部情調极为惊讶，认为是不能再好了。他认为，在南德意志的工人舞会中不可能这样好，在那里会演成斗毆。我反对他这种理解。我固然还没有参加过南德意志工人舞会，但我确信，在一个有組織的工人的宴会上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五月二十日，柏林商界宴請关税議会的議員，每份餐費計二十五塔勒。我没有参加。有些赴宴的同事第二天向我断言，宴会布置得非常不好，以至相当多的客人簡直都没有能吃饱。 140

南德意志人大半都以他們在柏林参加了四个星期无薪給的會議后得重返家乡而感到高兴。再說，會議大多很少人参加，致使柏林人有一句笑話，說关税議會等于空虛議會。中断的国会會議的閉幕会，我没有参加。

北德意志国会的下次會議于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开始。會議的主要討論事項是工商业管理条例草案。我于第十次會議时才出席，并立即参加条例草案的总辯論发言。我同別人一起駁斥樞密參議瓦格納，由于他在討論中的行动，我称他为普魯士王室的宫廷社会主义者。此外，我反对那激烈攻击我們的施杜姆男爵。我为我們的鼓动和組織辯护。他曾指責工人們的組織是国际性的，而对資本主义的国际性，这是必然的結果。对議員米凱尔，我也同样

应战，他认为我們德国的社会事业比英国和法国进步。我回答说，无论如何，在英国和法国再不会像我們这样为了营业自由和迁移自由爭吵几个星期之久。此外我还說，議員瓦格納曾对議員舒尔采—德里奇說，他（舒尔采）所要求的，因为由此得出导致反动的经济制度的最后結論，所以适合他（瓦格納）的意思。我认为，他（瓦格納）把結論弄錯了，最后不是反动而是革命到来，而且必然到来。

我在发言中声明反对由委员会討論該項草案，因为議院沒有选我們一个人入委员会。这話起了作用，我被选派到委员会去。

141

我想在这里夹叙一下，出席国会和关税議會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巨大的牺牲。我們的选区，尤其是我的选区，固然尽力在经济方面接济我們。但是我們俩对选民的經濟接济感到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最穷的人。当时还没有党的津贴，又没有錢来发議員生活日俸。由党发给生活日俸是一八七四年才开始的，不过也够菲薄的。我們往来柏林的旅費也必须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們就常常缺席，甚至在为了我們党的利益应该出席的时候。施韦泽及其伙伴在这方面就好些。他們住在柏林，只有莱因克例外，但是他在—八六八年即已辭职，由弗里茨舍接替；他們不必費力，也用不着較大牺牲，即可参加每次的重要會議。但是时常缺席的并不仅是我們。大多数的法律都是由不足法定人数的會議来通过的。大家知道，这情形一直持續到一九〇六年春季实行日俸制的时候。

第二次討論工商业条例时我們提出了一批建議，但其中只有个别的侥幸通过。我們建議作一些規定，据这些規定凡有关預告期限等的爭执应轉交劳資仲裁机关处理；此外，我們要求禁止实物工资制；所有超过十个工人的企业有义务訂立工厂規則，拟訂时应听取工人意見；我們还建議規定学艺合同的条款，取消工作簿，禁

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做工。另外，我們还要求禁止星期天工作，超过十个工资工人的企业每个标准工作日为十小时，职工組織有完全的联合自由，实行工厂监督。施韦泽及其伙伴的建議大半与此相同。 142

我的取消工作簿的建議获得意外的成功。这是这样来的。莱比錫警察局公布一个規定，各旅館主人，遇有漫游的艺徒到来，应在他們到达后立即索閱他們的漫游身份证，并把它送交旅客事务所。但如有艺徒不肯出示漫游身份证时，应把他帶到旅客事务所，不得延誤。此外，旅館主人应注意，凡是迁移来此的或者失业的艺徒不經警察的許可不得在莱比錫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

这个規定同护照法有尖銳的矛盾，护照法已經取消了国内的身份证限制。于是我发言說，薩克森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工作簿的規定，将因护照法而失其效用。拉斯克尔支持我的建議，因而建議得以通过。十年后保守党山南派的多数派审查工商业条例时，又对二十一岁以下的人們实施工作簿。

我那取消工作簿建議的被通过，激怒了独立經營的手工业者。我提这个建議时所用的所謂全部詭計，C. 罗設尔博士（已故的著名国民經济学家、馬克思和拉薩尔都討厭的 W. 罗設尔的儿子）在一篇題名为：《德意志工商界怎样失去工作簿。一部社会小說的未完稿》的文章中作了叙述。根据 C. 罗設尔的说法（他現今还在薩克森政府的一个高級机关中工作），我的詭計是我同我的“朋友突比克”（这人誠然从来没有过）搞起来的；有一天晚上当他到“我的凄涼的房間里”来找我时，我正在为我的建議起草一篇（附帶說）很短的发言。于是我（都按照罗設尔的说法）在同突比克的傾談中把我明天将在国会中如何愚弄別人的打算詳細地告訴他，以博取他對我的建議的贊同。我讀着罗設尔硬加在我身上的欺騙尊敬的同事們的狡計，不无驕傲之感。这个行动自然是完全如同我所計劃 143

的那样成功了。当議長宣布建議获得多数票时，有人听到在讲坛上有忍耐不住的窃笑声。那就是我的朋友突比克，他¹为我的計劃成功而暗自欢喜。我确信，有些人讀到了这个描写会信以为真并且自言自語說：“这个倍倍尔原来是个混賬东西！”但是这个描写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的第二个得到通过的建議价值較小，就是把条例上凡是用“閑暇”一詞的地方改为“休息”。政府自己也看到“閑暇”一詞不适宜，遂接受我的建議。此外，我們的其他一切建議均遭拒絕。

在这次會議中也規定了国会的选举法。施韦泽和哈森克萊維尔提議把二十五岁改为二十岁，并規定选举日必須是星期日。我提議在整个同盟范围内在同一天选举，选举日必須是星期日或假日。此外，我要求删去凡現在或在选举前一年曾接受公共团体或者地方团体的济貧金的人丧失选举权的規定。

不用說，我們虽費尽言詞，这些建議还是被否決了。而今現役軍人也失去現在的选举权。热烈拥护这点的是民族自由党人。各邦政府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

144 在討論預算案时(四月二十四日)，議員馮·霍維尔貝克主张裁減軍备。我对此回答說，我认为，像现今欧洲的情况，到处是专制政治当权的时候，竟真以裁軍为可能，那就是愚蠢。我們的专制君主們每个都在伺机襲击别人和打倒别人，会想到贊成裁減哪怕一点点的軍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正像寓言中所說的两头獅子相扑，相吃得只剩下尾巴。这对于我們只能有好处。

五月十三日我发言，反对公侯們免付邮資的特权。我的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我的講話伤害了部分議員的“忠义感”。但是我却得到选民的紛紛贊成。

六月三日，关稅議會又開幕了，但在六月二十二日即行閉幕。我没有参加討論，因为那些辯論对我不甚重要；再說，我的营业也

需要我回萊比錫。

一八七〇年北德意志国会春季會議的主要討論題目是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草案。在這個討論中我只發言一次，那是在關於死刑的第三讀討論的時候。在第二讀時，國會的大多數表示反對死刑（在一八六八年公布的薩克森刑法中取消了死刑，在巴登也同樣取消了），而現在在俾斯麥的威逼之下又以一二七票對一一〇票贊成死刑。薩克森議員中唯一贊成死刑的是漢斯·布魯姆博士，即一八四八年秋季在維也納附近的布利基特瑞被槍斃的羅伯特·布魯姆的兒子。當布魯姆表示贊成死刑時，我們在最左翼大聲噓他。

漢斯·布魯姆是社會民主黨的最卑鄙最陰險的敵人；為了同我們鬥爭，他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不言而喻，他是俾斯麥的熱烈崇拜者，俾斯麥也厚待他。但他卻無法挽救他的可恥的沒落。布魯姆因為無恥行為而被撤銷律師職務。以後他到瑞士開設了一個雪茄煙工廠。他作為一個富翁，死於一九〇九年。

我在一八七〇年春季會議中的第二次發言是附議拉斯克爾的建議，他要求修正軍事刑法。建議以一一七票對七十三票通過。

一八七〇年關稅議會的會期還是很短，僅約三星期。會議開始時議員科爾伯博士（巴伐利亞）辭去關稅議會的委任。關稅議會是個只為普魯士的權力地位服務的欺騙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資產階級如何厭惡鬥爭。可是這樣一來，就無法維持黨的生命，更不用說加強黨的力量了。在當時聰明人就已經看出，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是沒有前途的。日益增長的階級對立越來越加劇精神的分歧。

一八七〇年的春季會議是關稅議會的末次會議，因為數月後大悲劇開始，德國的政治情況也起了巨大變化，使關稅議會成為多餘的了。

策略上的分歧

在我叙述德法战争的悲剧之前，必须先简单谈一下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因为我们对议会的态度而形成的策略上的分歧。

早在讨论俾斯麦的同盟改组建议时（一八六六年春季），李卜克内西就已经在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上表示反对选举一个这样的国会。但是这个刊物在我们党内几乎全未看到，而且因为（就我记忆所及）李卜克内西既没有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也没有在民主协会，也没有在其他集会中想提出他的否定立场，所以也没有进行对于这种立场的辩论。后来在一八六六年圣诞节当我们在格劳绍的邦集会上毫无异议地认为当然参加选举，并且推举李卜克内西（他那时正在柏林市警察局受三个月的监禁）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提名。一八六七年盛夏在他第二次候选时，他也当选了。起初他自己还提出了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但是不久，他反对议会制度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并且我们之间在关于应在国会中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李卜克内西看来，北德意志同盟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手段把它斗到消灭为止的结构。依照他的意见，参加同盟的议会，如果不是表示否定和抗议，就是放弃革命立场。因此，绝不妥协，绝不和解，也就是说绝不企图以我们的意见来影响立法。

这样来理解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不能同意。在适当的场合，首先在反对一切恶劣的和有害的东西时，要抗议和否定，然而同时也要作有积极意义的鼓动，我们对各个法律草案都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借以表明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由于我们提出了这些建议并作了对此有利的发言，这些言论即使被割裂删节，因为登在报上为千万人所阅读，我们就发挥了最高度的鼓动宣传作用。

我們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我對工商業條例和其他法律草案提出許多建議時，李卜克內西僅僅勉強地投了他的一張票。最後他認為應當作一次演說來說明他的不同立場，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柏林民主工人協會中就這樣作了。後來這個演說印成小冊子，題名是《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立場，特別是對國會的立場》。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中說：社會運動是一個革命的改革過程，不是一兩天內就能完成的……但是，新社會和舊國家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新社會的首要意圖是謀求消滅舊國家……為了社會實踐，社會民主黨必須先創設國家基礎……國會中的鬥爭只是一種假鬥爭，只是一幕滑稽劇……只有在有共同基礎的地方，才能進行協商……原則是不可分割的，必須整個地保持或者整個地犧牲……面對着國會中幾乎是唯一代表的統治階級，社會主義就不再是理論問題，而簡直是實力問題了，它同其他實力問題一樣，不能在國會中，而只有在大街上、在戰場上來解決……一切認為國會中發言有價值的話，都是站不住的。難道人們會相信談話能夠把國會感化過來嗎？這種談話是无用的，說无用的話，乃是愚人的一種消遣。

147

他接着反對過份重視專制國家里的選舉權，沒有公民自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結社自由，則普遍選舉權不過是專制主義的玩物和工具而已。

國會也沒有實力；即使我們在那里占了多數，一連軍隊就可以把這多數趕出神殿……革命不會是取得高級主管當局同意後進行的；社會主義思想不會在現代的國家內實現；要實現社會主義思想，必須推翻這個國家。“同現代國家決不和平相處。”

李卜克內西的這種純粹否定的態度，儘管他屢次爭取使它在黨內成為準則，卻沒有成功。不過當八十年代在反社會黨人法統

制之下，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各地得到发展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利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把我们当作“议会党”来斗争。党的第一领导人的言论经常被利用来反对党的活动，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持久下去的。关于这，在八十年代中叶的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上我提请他注意。李卜克内西立刻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再版时加上个序言，说明他在小册子中的立场只是指帝国建立之前那时期而言。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在圣加勒代表大会上（一八八七年十月）公开不讳地声明说：现在他才看到在议会中的实际活动对党是必要的和很有益的。因此我们之间在议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消除了。

148 李卜克内西的言论还在司法上有个余波。柏林市法院因为他传讯不到而缺席判决他诽谤当局的规定，判了他三个月的监禁。柏林市法院根据法院互助条例要求引渡李卜克内西到案。人们抓住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共同的刑法和共同的诉讼程序。萨克森法院拒绝引渡，因为根据萨克森新刑法，没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所被判决的那种罪名。现在普鲁士政府又要求萨克森政府以诽谤同盟制度罪迫害李卜克内西。萨克森政府也做出了应允要求的姿态。事情却长期拖延下去，后来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言论和我在普劳恩的言论一样，都被当作珍贵的公诉资料，列入我们将来的叛国案文件中了。

德法战争

宣战前奏曲

在这次战争爆发和进行的期间，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内外所持的态度成为几十年的议论和猛烈攻击的对象。起初，在党内

也是这样。但是不久以后，大家就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承认，我们当时的态度毫无可悔恨之处，而且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时即已知道随后几年内根据官方和非官方发表的文件所获悉的情况，那么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起就会更激烈得多。我们就不会在第一次要求战争拨款时弃权，我们必然直接投票反对。

今天已毫无疑问，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所願望的，并且他事先早有准备。如果说，他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两次战争时期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被迫应战的人而没有成功，那末，这一次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中他完全如願以償了。除了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人（连当时的国王，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也不在内）知道俾斯麦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从事于对法战争外，俾斯麦欺瞒了全世界，竟能使世人相信，战争是拿破仑煽动起来的，而他，爱好和平的俾斯麦，以他的政策处在被侵略者的地位。官方和半官方的历史記載直到今天还在广大人民中維持着这个法国是侵略者而德国是被侵略者的信念。

无论如何，拿破仑在形式上宣了战，俾斯麦政策的可欽佩处就在于他能把手洗得这样巧妙，使拿破仑不論願意与不_得不打出宣战这张王牌，于是他看来是破坏和平者。

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人物，虽然他们对于判断欧洲政治站在比我们高明得多的立场上，却也在短期内有这种见解，并且公开表示，拿破仑是和平的破坏者。宣战以前的经过非常使人迷惑和惊讶，以致人们竟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法国虽宣战而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相反地，德国虽好像是被迫应战的一方，却有战争准备，连炮架钉子都已备齐，并且动员工作也顺利完成。

就我的记忆所及，公开控诉俾斯麦为德法战争的祸首，是我在党内于一八七三年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期《人民国家报》上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文章的标题是“九月二日”。我把两篇文章交给李卜

克内西，他只作了一点形式上的小小修改就登在报上，并且把两篇文章转载在他后来出版的小册子：《埃姆斯的电报或者战争是如何造成的》的前面。

德法战争早已甚嚣尘上。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一旦操在内阁而不操在人民之手，则由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德意志和欧洲的局势，就恐怕要受外国的干涉，首先是受当时由儼然以欧洲审判官自居的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干涉。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敌对，以及当时德意志同盟的整个形势，使拿破仑容易充当这种角色。俾斯麦也照顾到这种角色，他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拿破仑进行过各种可疑的谈判，其中涉及到割让德意志某一部分土地作为普鲁士吞并德意志诸邦的补偿。这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说过了。

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俾斯麦都欺骗了拿破仑；在改变德意志状况有利于普鲁士的时候，拿破仑毫无所得。但是他对一八六六年和谈的干预，却足以使普鲁士不能实现吞并萨克森的计划；而且布拉格和约第四条的规定也要归功于拿破仑的影响，该条规定，北什列斯维希说丹麦语部分应划归丹麦；此外，普鲁士必须放弃吞并美因河界线以南的企图。还有，次年卢森堡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德国，也应归咎于拿破仑的影响。

显然，拿破仑这样扰乱俾斯麦的天下，使俾斯麦产生了报复的思想，急欲破坏拿破仑和法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新普鲁士—德意志的政策的目的，只要有利的机会一到，就对法国开战。狂热地进行军事改组和扩张军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无微不至地布置一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就向法国挑衅。

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确信下次战争将是一个对法国的战争。在军队中，也把这看做当然的事，并渴望其到来。因此，我们控诉俾斯麦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给德意志造成了自

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它所沒有的局势。一八六六年战争結果所导致的同奥地利的紧张关系，使这个问题对德意志倍加危险，因为深恐奥地利为了报一八六六年的仇会乐意同法国結盟。事实上，法国和奥地利之間也进行过有关的談判，但是沒有結果，因为战争意外迅速地爆发了，而且德軍以几次胜仗击潰了法軍，使奥地利聪明起来，避免干涉。由于这种情形，人民对于德法战争感到极大的不安，而因为在广大人民中間还认为法国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安更甚。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确实的，由于拿破侖充当干涉角色沒有取得积极的利益，他在本国的威信大为降低，并給资产阶级反对派提供了大批党徒。这种情調在一八六九年五月的选举中很清楚地表現出来，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只获得約四百四十六万九千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得了三百二十五万九千票。关于这次选举結果，当时有人从巴黎写信給《法兰克福报》說道：“不仅欧洲的精神利益而且物质利益，都使共和政体在改造我們的状况上成为绝对必要。”

議院中反对派增长到一一六人。这促使拿破侖在一八七〇年一月初提名反对派的成員奧利維为穩健自由派內閣总理，并且为了支持他的政策，在五月八日举行了一次所謂公民总投票，虽然投票結果为七三五万票贊成，一五〇万票反对，但是很可忧虑的是陸軍和海軍在票柜里投进了五万张反对票。此外还有許多城市，首先是巴黎，投了很多反对他的票。

巴黎对拿破侖的敌对情緒，早在一月間作家維克多·諾依尔出丧时即已显露出来，諾依尔是因为私人爭端被比埃尔·拿破侖亲王陰謀枪杀的。浩浩蕩蕩的人群示威似地伴送維克多·諾依尔的遗体。情况已經和爆发革命差不多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使拿破侖精神頹喪，他当时已經患着疼痛的膀胱結石症，最后也因此喪命。这个病症使他喪失了精力和活

动力。

而且就法国的军事情况看来，和强国作战也有危险。当普鲁士一德意志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倾其全力扩充和训练军队的时候，法国却没有这样做。虽然拿破仑有一个武官斯托菲上校驻在柏林，进行密切的注意，不断把普鲁士在军事发展上的巨大进步报告上去，并促请作类似的措施，然而一切都是白费。斯托菲上校在对聾子說教。斯托菲的一些意見，由于具有历史意义，可以在这里叙述一下。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这样写道：“据我看来，在法国的人们对于有关普鲁士的一切，不論是普鲁士国民还是普鲁士军队，都毫无所知。”他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預言說：“普鲁士敏銳的眼光足以认清，它所不希望的战争还是要发生，所以它竭尽一切力量准备应付任何意外的事变所引起的战争。”另一次，他又提到：“普鲁士的远见和法国的昏庸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使我恐惧的主要原因。”他非常憤恨一八四八年阻撓在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梯也尔。“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來說是一种比打二十次敗仗还要坏的厄运。”在战争爆发时，他称这次战争从法国方面来看是以无預見、无知和愚蠢来对有預見、有訓練和有才智的战争。拿破仑生了病，革命已迫在眉睫，又加上皇后的愚蠢。

153 在巴黎没有人相信对德国作战。一八七〇年七月初，即战争爆发前十四天，法国下議院还決議把征兵限額由十万人减为九万人。陸軍大臣列伯夫声明，他贊同减低名額是因为想为內閣的和平倾向作证。并且內閣总理奧利維解答議員茹尔·法夫尔的质問時說，無論何時，維持和平沒有比現在更有保證了。沒有发生任何使人发怒的問題。

但是战争还是突然到来了。

“远在南方的美丽的西班牙”无意中给这次战争造成机会。自一八六八年秋季以来，西班牙是个共和国，但是统治阶级却渴望君

主政体。所以他們在物色一个国王。事后得悉，早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卡尔·安敦·馮·霍亨索伦侯爵已經得到通知，說希望他的儿子，当时做普魯士近卫团少尉的列奥波德来做西班牙国王。普魯士駐慕尼黑的大使魏尔特恩男爵曾参与此事。俾斯麦是否知道？俾斯麦不承认他与聞此事，但是誰相信他？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做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这不仅对霍亨索伦家族，而且对拿破仑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拿破仑和法国感到，如果除在东面与霍亨索伦家族为邻之外，又在南邻加上一个当大国统治者的霍亨索伦家族，他們的利益就受到极大的危害。如果对德国作战，则法国必須防范由南方来的突襲，这就大大削弱了兵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威廉对于把一个霍亨索伦亲王提升为西班牙国王这样重大的計劃竟絲毫沒有聞知。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底，他才得到消息，并在二十六日写信給俾斯麦說道：

“附件对于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靂！又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做王位候补人，而且是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我没有回复一个字，并且最近还同王儲拿以往他被提名的事开玩笑，二人在同样开玩笑下抛弃了这个思想！您既然已从侯爵那里获悉詳細情形，我虽然向来反对这件事，我們也必須商量一下。”

您的威廉”

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被国王这个意見所迷惑，他仍坚持他的計劃，而且終于在一个由国王主持的，由王儲、霍亨索伦侯爵、他和毛奇都出席的會議上通过了列奥波德亲王的候选。

拿破仑起初听到霍亨索伦亲王当候选人的消息时沒有特別反对，这表現在他的淡漠和怠惰上。但是当七月初西班牙临时政府声明贊成霍亨索伦为候选人，并且这个决定传到法国时，法国的大部分报纸都大声疾呼起来，因为一个霍亨索伦登上西班牙王位对于法国就意味着危險。現在拿破仑也必須行动起来。他派遣使

154

臣貝內德梯去向俾斯麥了解情況。這個人回復說，內閣對此毫無所聞。在《紀念和回憶》一書中，俾斯麥自己就這樣敘述這件事。在這部書第二卷第八十頁上他聲明說，在政治上他對於這問題無動於中。但是在次頁上他卻說道：“如果格拉蒙特公爵（在一本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小冊子里）力圖提出證明，說我對於西班牙的建議不會持拒絕的態度，那麼，我也找不到理由來反駁他。”

一個崇拜他的人說得對：“當俾斯麥寫歷史時，他是在製造歷史”，這就是說，他把事實歪曲成對他合適的樣子。

繼法國報界的喧嘩之後，德國的報界也喧嘩起來。不過起初還不普遍。七月十二日，《科倫日報》還為歐洲的安定很堅決地表示反對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選。那時資產階級對於軍國主義如何想法，有七月十日科倫的萊茵普魯士進步黨受託人大會的決議為證。大會決議：

“我們期望並且要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人，在國會下次開會時要特別保證減少平時兵額和縮短兵役期限以減輕軍事負擔，如果這個要求遭到拒絕，則行使憲法權利拒絕同意同盟政府提出的一切軍事撥款。”

今天在資產階級政黨中誰還會想到這樣的措施，雖則此時海軍和陸軍的裝備已發展到那時沒有人認為可能的規模。

155

七月十三日這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到來了。根據官方和半官方關於貝內德梯伯爵在埃姆斯會見國王威廉的敘述，據說貝內德梯無禮地要求國王聲明，他永不再讓一個霍亨索倫家族的人做西班牙國王候選人，於是就在當天由於國王的督促，霍亨索倫親王取消了他的候選。國王吩咐一個副官把這事告訴貝內德梯，說他認可棄權。貝內德梯再度請求與國王會談，如侍從武官長拉契維爾親王後來在一個聲明中所說，國王叫“我在飯後六點鐘左右，第三次回答貝內德梯伯爵，陛下堅決拒絕就對將來有約束力的聲明進

行繼續商討。今天早晨他所說的話就是對這件事情最後的話了，他只能以此為憑。貝內德梯聲稱，他那方面聽得這個聲明就放心了。”於是這個意外事件事實上告一結束。但是對俾斯麥來說沒有結束，他那同法國衝突的計劃被國王的聲明打消了。他自己在《紀念和回憶》中敘述，那一天他正同毛奇和羅昂一起吃飯，他們聽得霍亨索倫親王放棄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而沮喪萬分。俾斯麥惱怒得簡直要想辭職。不久以後，由埃姆斯打來一份長電報；阿伯肯奉了國王的指示，敘述他同貝內德梯最後會談的經過。這封電報的內容打消了同法國發生衝突的最後希望。俾斯麥敘述說，羅昂和毛奇大吃一驚，放下了刀叉；因為戰爭的希望消失，使他們食不下咽。於是俾斯麥——仍然照他自己的描述——坐在旁邊的桌前，拿起筆來把電報改得性質完全不同。當他把自己的措辭念給毛奇和羅昂聽時，二人的眼睛馬上光芒四射，沉默寡言的毛奇並且叫道：“這樣一來，這是另一種聲調，從前是個投降號，現在是個進行曲了！”於是三人興高采烈地在桌前坐下，食欲極盛地進餐。戰爭是靠得住的了。

156

這個電報傳遍全世界，並且官方分送到巴黎以外的所有外國內閣，這對法國政府是件莫大的侮辱。在篡改過的電報里寫道：

“埃姆斯，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三日。在西班牙王國政府把霍亨索倫王儲放棄副位的消息正式通知法蘭西帝國政府以後，法國大使在埃姆斯還向陛下提出要求，要國王陛下向他保證將來永不同意霍亨索倫家族重提它的候選。國王陛下拒絕接見法國大使，而派遣值日副官告訴他，國王陛下沒有別的話可同大使說了。”

俾斯麥的這份電報得到了所期望的效果。電報一公布，馬上在法國和德國以及兩國以外的廣大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騷動。七月十四日下午，我在前房我的理髮師那里，當時由卡爾·比得曼教授博士編輯的《德意志總匯報》拿進來，上面登載着那個電報，我于

是得到了消息。我一讀到那个电报，就把报扔到桌子上說道：“这就要发生战争了！”理发师聞言大驚，我不得不对他分析电报为什么有这个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七月十五日，法国議会在很少的少数票反对之下批准了高达七亿法郎的战时公債，七月十九日，法国就对德国宣战了。

意見分歧

上述事件又一次引起了李卜克內西和我之間的意見分歧。李卜克內西认为拿破侖想要战争，而俾斯麦則沒有勇气接受挑战。于是他在七月十三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波拿巴的法国对俾斯麦的普魯士提出了战争問題，如果后者不是决定作可耻的退却，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七月十六日他又写道：“勇者在更强大者的面前退让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在波拿巴的威胁之下退却；和平保住了，伟大的北德意志同盟应当为德国爭取国外的尊重，而竟像往昔在卢森堡事件中那样恭順地屈服于法兰西帝国之前。”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虽然是拿破侖宣战，但是依我看来，他是落入俾斯麦为他布置的陷阱；后者想要战争，他达到了目的。我对《人民国家报》的說法极为憤激，李卜克內西和我之間遂发生激烈的爭論，直到盖布来調解，我們之間才取得諒解。自七月二十日起，《人民国家报》代表我完全同意的見解。

沒有預料到战争的爆发，我們訂在七月十七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邦會議。当然，我們現在必須对战争問題表示态度。这就由李卜克內西和我提議而一致通过的下列決議表示出来。

“全邦會議反对任何不是为了自由和人道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认为那是对現代文明的侮辱。全邦會議反对只为王朝利益而

进行的战争，反对只为满足几个当权者的野心而把数十万人的生命、数百万人的幸福来作孤注一掷的战争。会议以愉快的心情向法兰西的民主党，特别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态度致敬，会议声明，完全同意它们在反对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盼望，德意志的民主党和德意志工人也按照这种精神来大声宣告他们的意见。”

巴黎工人已在我們之先表示反对战争。许多城市的工人在公开集会上作了和我們类似的声明，其中有巴門、柏林、紐伦堡、慕尼黑、哥尼斯堡、佛尔特、克累腓尔德。

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却是另一种想法，它在七月十六日召开民众大会，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与会者的观点是，拿破仑和法国人民代表的多数派都是破坏欧洲和平和扰乱欧洲安宁的妄人。相反地，德意志民族是被侮辱者，被侵略者，所以会议把防御战争看做不可避免的灾难，然而要求全体人民千方百计地争取人民自己像一般的完全自决那样决定战争与和平。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拥护党委员会的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北德意志。所以党内存在着强烈的意见分歧。

国会訂于七月十九日开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八日由开姆尼茨起程时，铁路已为军运所占用，致使我們在郭斯尼茲車站等了許多小时以后才繼續开行。我們在这里商談了在国会中所应遵守的策略。李卜克内西认为，我們必須严厉拒絕索款的要求，因为双方都应負战争的责任，我們不应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錯誤。按照事物的情况，我們誠然不能偏袒交战的任何一方。但是我們如果投票反对公債，則所引起的印象就正是偏袒一方，而且会有利于拿破仑；所以我們只有弃权，别无他法。最后，李卜克内西請我草拟一个声明，次日帶到柏林去。我照办了。李卜克内西把我的草稿略加修改就同意了，并且要我把声明交到国会去。在七月

二十一日的會議上，我發言說，“因為，我們聽說，希望能不經過辯論而把議程了結，我們雖然對議會的這個觀點絕難同意，但仍願表示一致，不挑起辯論。我們決定在當前的問題中弃权，我們的動機將以書面聲明存入議會的檔案中。”

159 辛森以議長身份認為：我們這樣做，他不能加以阻攔。我們採取這個立場的動機是：

“目前的戰爭是個王朝戰爭，是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作戰，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戰爭是為了霍亨索倫王朝的利益作戰。

我們不能同意為了進行戰爭而向國會請求的撥款，因為如果同意，就是對以一八六六年的措施準備這次戰爭的普魯士政府投信任票。

我們對於所請求的款項同樣也不能加以拒絕；因為這樣會被理解為贊成波拿巴的凶惡和犯罪的政策。

作為原則上一切王朝戰爭的敵人，作為不分國籍對一切壓迫者作鬥爭而力求把一切被壓迫者團結成一個兄弟大同盟的社會共和主義者和國際工人協會成員，我們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間接表示贊成目前的戰爭，所以我們弃权，同時我們確實希望歐洲各族人民通過現在的不幸事件獲得教訓，竭盡全力來爭取他們的自決權，並且把今天的武力統治和階級統治當作國家和社會的一切災難的根源而加以鏟除。”

所要求的一億二千萬塔勒的戰時公債被國會批准了。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爾、門德和施韋澤投票贊成，福爾斯台林早在春季已辭去開姆尼茨的委任。在補缺選舉時哈茨費爾德派失去了該區。但當認購公債時，德意志的資本家卻對全世界表現了一種可憐像。雖則公債有百分之五利息，而且認購一百塔勒只須付出八十八塔勒，將來仍可還本一百塔勒，但是只認購了六千八百萬塔勒。這是莫大的丟臉。在法國卻不然。那里募足了所發行的七億法郎，而

且給与和德国同样的利息。

我們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使我們与党委员会之間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在书信中发生了极其激烈的爭論，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与委员会之間，因为李卜克内西不願按照委员会的意思編輯《人民国家报》。虽曾劝李卜克内西服从理性，但是无效。七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給白拉克等說道：“我并不以为你們的爱国热忱是坏事。但是，您們也要有容人之量，即使您們不同意倍倍尔和我在国会中的态度，現在也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消除这种不睦，或者至少避免公开的决裂。在現在这时刻，党内不应该发生看来像是不团结的情形，我恳求你們，对一切足以加剧分歧的，都加以克制。”

160

这个請求无效。最后李卜克内西憤怒之下，以出走相威胁。他厌恶这种糾紛和民族主义狂。我也厌恶不伦瑞克的唠叨不休。我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給那里說：“如果委员会繼續反对李卜克内西，我們就不再为《人民国家报》写稿了。根据您們的来信（信是針對李卜克内西写的，并对他进行威胁），好像您們已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狂，好像您們不惜任何代价想使党丢脸和破裂。您們不能指出我們在国会中的态度对党的原则有什么抵触。您們不以冲突沒有尖锐化为滿足，反而要求那些主意坚定的人們改变和否认这种观点。《人民国家报》正是在最近几星期严格表现为党的机关报。我們的敌人异口同声地瘋狂叫囂就是证明。难道您們也附和民族自由党的叫囂嗎？您們談到薩克森的分立主义。而我們却恰好在薩克森是十足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并且我們都把全部战争看做是一个王朝的战争。馬克思也曾表示贊成我們。”

九月一日，李卜克内西写信給白拉克說：“我所以有离开的願望，不是因为害怕那些热中官职的人，而是由于厌恶那种爱国主义的迷醉。这种病症必須經歷它的过程，在这期間我留在这里是十

147

分多余的，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到美国去，可能甚为有用。毕竟不至于遭到这种程度，那我也就用不着走开了。”

奥古斯特·盖布(汉堡)又设法调解。这次却比历次的调解较为顺利，我们不久又站到同一战线上去了。

声明和布告

161 七月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普鲁士—德国战争的前途如何，从毛奇的同时以罗昂的名义发出的声明表明了：“普鲁士所进行的战争，关于它的军队组织、装备、给养等方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成功的把握的。关于法兰西装备的进步(他倒应该说落后。——奥·倍·)都有十分详细的情报，据此，不用害怕来自法国的军事袭击。”这个见解的正确性马上就被证实了。德国一般人都以为，在拿破仑宣战以后，法国军队马上就会侵入德国领土。但是人们枉然等候着。宣战把法国弄得手忙脚乱，没有一个军团作好战争准备，从上到下都一团糟。八月初，已有三十八万德军与二十五万法军对垒。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这情况如何看法，表现在莱比锡的比得曼教授在大学生宴会上祝词中，在七月底他已经说：“我们要把法国打倒，使它在—一个世代中不再想打仗。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注意使法国的躯体稍稍消瘦一些。”

162 这里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经暗示着吞并土地了。所以人们预计胜利绝对可靠。这时候官方文件却说得完全不同！七月十九日国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说，“我们号召全民力量保卫我们的独立”，“德国本身具有抵抗法兰西重来的暴行的意志和力量”，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德意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发出保卫德意志人民的光荣和独立的号召。”结尾时说，“我们将按照我们祖先的榜样，为了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作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除了追求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上

帝會像保佑我們的祖先那樣保佑我們。”

按照这个庄严的声明(由洛塔尔·布赫尔执笔),则进行的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保证将来的和平。

国王的御前演说中还有一句有趣的话;那句话是:

“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一日的宣言也足以说明官场的情调,他宣布,他进入法国并担任了总司令:“我是同法兰西的兵士作战,不是同法国的公民作战。”

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的布告在我们各界获得好评:

“第二军的士兵们!

你们踏上了法兰西土地。拿破仑皇帝毫无理由地对德国宣战,他和他的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并没有问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他们的德意志邻人进行血战,所以没有理由来和他们敌对。因此要记着,对于法国的和平居民要表现出,在我们这个世纪两个文明民族即使在战争中,彼此之间也不忘记人道主义的诫条,要常常想着,如果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上帝防止其如此),你们的父母在家乡会如何感觉。对法国人要表现出,德意志人民不仅伟大和英勇,而且对敌人也是讲道德、有义气的。”

并且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国王就在众所周知的布告上发表了一封感谢书,其中说道:

“由于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以及德意志各族人民及其公侯们的一致奋起,使一切分歧和对立都结束了、和解了,并且空前团结一致,德国才能同心协力地、有理由地保证:战争给它带来持久的和平,并且从鲜血的种子里长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这一上帝恩赐的果实。”

要注意的是，这个感謝书的結束語把自由放在統一的前面。
163 我在許多公开的大会上提到了这句话，这在后来造成了我的恶运。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七月三十日，党委会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宣言，表明了当时它和我们不同的立场。它在要求党进行有力的活动之后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是，当这个如我们所希望的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诞生的时候，坚决地共同努力，如果可能，从而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奥·倍·），而不是王朝的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也许新成立的国家在诞生时还带着王朝的色彩），用严肃的、艰苦的斗争给它打上我们的理想的烙印。”该会希望，我们的同胞用热情和勇敢不久即可在法国得到胜利，但是人们也不要让自己陷于胜利的陶醉之中。人们必须以两个民族的兄弟交战为遗憾，可是德国在战争上是无辜的，有罪者会很快地遭到惩罚，然后我们才能够保持强大，为世界一切被压迫者进行光荣的联合斗争。若是拿破仑失败，法兰西人民就可以较自由地呼吸，于是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哪些东西是因上帝和正义之故而理应属于人民的，哪些东西是战争的无限牺牲和痛苦使人民加倍地和双倍地有权利来要求的。

委员会当时在乐观情绪中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作为胜利光荣的代价的第一个牺牲者。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在紧紧相連的几次战斗中被打垮了，整团整团被俘的法军俘虏出现在德国各行政区，这些俘虏的膳宿问题不久就成为一种讨厌的负担。在色当战役中，看拿破仑作这一战的情况，人几乎要相信，他有意这样调动，以便往德国去当俘虏，而不想回法国作战败的皇帝。当他被俘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到处欢腾，我们也一同欢腾。全世界渴望着战争结束，它的伤亡惨重的战斗已令人对战争产生憎恶的心情。普鲁士国王
164

在麦茨战役后写信给王后說：“我不敢詢問伤亡的情形。”他打电报給符騰堡国王說：“最近一次战斗(八月十九日)的损失同前次一样非常重大，使胜利的快乐大为減色。”基多·威斯所編的柏林的《未来》报上写道：“那些生来就披紫袍的貴族們在死者退色的紫袍前面鞠躬。甚至无所畏惧的人也感到恐怖：镰刀伸得太远了，原野上施肥太多了。”

可是战争还在继续。巴黎对拿破侖在色当被俘的回答是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件事变特別使德意志司令部很不愉快。进行战争，原不是为了把法兰西弄成共和国。人們毫无理由地害怕这个表现出来的恶例。当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来到德国时，李卜克内西极为激动，含着眼泪冲进我的作坊来报告这件事。他見我对于这消息所持的冷静态度，吃了一惊。但是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这个消息也像个晴天霹靂，引起了思想的急速转变。現在我們之間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們現在共同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媾和，要求賠償一切战費，但是放弃任何吞并領土。同时，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比得曼早在七月底即已暗示的，在連續多次胜仗以后，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报纸的普遍要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論这次战争的宣言，登載在八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宣言說：“一八七〇年七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政变的修正版。”^①这个战争显得这样无意識，連法国也不相信它，甚至资产階級反对派也拒絕付款。加入国际的法兰西工人认为战争是王朝战争。“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魯士的战争的結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經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結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样剧。”^②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

165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頁。——譯者

② 同上書，第五、六頁。——譯者

誰把德国弄到必須处于防禦的地位呢？”^① 这里接下去一段是对俾斯麦政策的批評，《人民国家报》必須刪去。“如果德国工人階級容許目前這場戰爭失去純粹防禦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無論胜利或失败，都同样是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② 总委员会然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有利。

不伦瑞克委员会现在按照总委员会宣言的意思，在九月五日发表了一篇《給一切德意志工人》的号召。提到法国最近事件，委员会期望，新的共和政府应設法同德国达成和議。德意志工人必須支持共和政府的这种意图，要求同法兰西人民成立光荣的和平，并且工人群众要为此大声高呼。

然后委员会引证了卡尔·馬克思(但是没有提出他的名字)的一封信說，如果人們坚持吞并阿尔薩斯—洛林时，将会而且定会有什么后果。引文說：

“誰沒有完全被当前的叫鷲震聾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聾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應該了解到，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間的一場战争，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孕育着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一样。……這場战争已經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階級肩負着更大的責任。”^③

委员会接受这种解释，要求宣布反对吞并阿尔薩斯—洛林，并拥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和平。号召結尾說：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怎样又把它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們今天不仅看到在瑞士的和在海洋彼岸的共和国，而且也确实看到了在西班牙的共和国，在法国的共和国，那么讓我們厉声高呼，即使德国今天还不能是个共和国，自由的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六頁。——譯者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二八三、二八四頁。——譯者

光也有一日为德国透露出来，让我们大声欢呼：共和国万岁！”

九月十一日，《人民国家报》转载了上述的号召，而在十四日的下一期上就发表了李卜克内西和我对党员同志的谈话，谈话中我们指出，汉诺威的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已证实是不顾公理和法律）下令逮捕党委员会委员，即白拉克、彭好斯特、斯皮尔、曲思和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在军队森严戒备下押往东普鲁士的吕森要塞，囚禁在那里。被捕者所遭到的待遇，即使说不是残酷的，也是极端粗暴的；只为送往哥尼斯堡，就用了三十六小时。在旅途中公众到处都把他們当作捕获的美国贼，也就按照对待卖国贼的方式对待他們。我們要求，在监察委员会还未另作指示之前，请把信和錢寄到汉堡的盖布那里去。结尾說：

“同志们！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也许随后还另有打击。

要立定脚跟，不要气馁；在危难中才显得出真正的信念，才证明出真正的好汉。

努力传播党和我们的原则，但是言论要小心，写作也要小心——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在设法利用一切来反对我们。

努力推广机关报，在这精神斗争的时刻，我们的威力和我们的优势就在那里。

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社会民主组织万岁！”

在我们的谈话中提到了盖布的名字，这就足以使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有把他也送到吕森去的借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在哥尼斯堡集会上演讲反对吞并的约翰·雅可比，和担任那个集会主席的大地主海尔比希。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以北德意志总司令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事，他的任务是在北海岸防备法国人的万一登陆。他在军事上无事可做，就忽然想到做保安处。

雅可比和海尔比希的被捕在自由主义报界造成了不愉快的印象。一家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认为：“这种行动是和伟大的胜利不相

167 称的，并且因而引起疑問，是不是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外部的荣誉，却丧失了内部的自由。”

我们认为当权者的这些行为和活动是当然的事。但党委员会却抱有幻想，以为新秩序具有自由的模样，而据说给与这个新秩序的却是一个素来表现为任何自由主义发展（姑不论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大敌人，现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带刺馬靴踏新帝国的脖頸的人。

在哈尔堡的約尔克和許多同志，在哈尔伯斯塔特的納特尔斯也都被捕入獄，以他們散播党委员会宣言的罪名起诉。薩克森第十二军团司令在九月底发布一条命令，禁止一切討論战争最終目的的民众集会。这时期的一綫光明是，在奇尔希堡和米特維达（两个都在薩克森）的市議員选举中，我們党取得輝煌的成績。克里米朝虽在战时，却在八月一日出版一种每日出版的党报《市民和农民之友》，由卡尔·希尔施編輯，接着在次年二月一日出版了《开姆尼茨自由报》，也是每天出版。我們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区别也在于，我們不阻撓創刊新的党报。

十月初，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惋惜李卜克内西和我沒有像不伦瑞克委员会、約翰·雅可比等人那样被捕。它不久就如願以償了。

168 監察委员会把新的临时委员会迁往德累斯頓。新委员会是由克尼灵、科勒和奥托·瓦爾斯特等同志所組成的。因为我們知道，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时，大批函件被沒收，所以我写信給新委员会的秘书瓦爾斯特，应以不伦瑞克事件为戒，不要保存信件。但是瓦爾斯特不听忠告。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他那里也被搜查，連我的劝告信也落在警察手里，然后列入即将到来的叛国案的文件中。

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底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十月三十

一日是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論綱张贴在維登堡皇宮教堂門口的宗教改革日，这一天在薩克森是个节日。在这节日的两天之前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說因有十分重要事件，悬請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三十一日到米特維达去。我們接受了这个邀請。下車时在車站上有人秘密地迎接我們，繞了半个城市把我們引到一个飯店里，我們吃了一惊，看見里面聚集着上厄尔茨山区和下厄尔茨山区的全体受托人。于是一个发言人質問我們，为什么袖手旁观而不要追求动起手来，军队仍在國外，在國內的不难战胜。我們对这种幼稚說法只是搖頭。我首先講話，指出发言人的要求是荒謬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发言。我們沒有費很大力气就給与会者讲清楚了我們立場的正确性。与会者同我們一样也是被两位党员同志請到米特維达来，而不知道这里要干什么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党员同志举行一个公开集会，当时充任检察官的党员同志福莱尔在会上发言，他論证下列的議案：

“1. 我們同情法兰西共和国！希望它能努力反抗，来削弱霍亨索伦家族的軍事力量，使它不得不立刻接受和平。

2. 我們向德国和英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們表示最热烈的崇敬。

尤其是你們，在德国的兄弟們，不管迫害和鎮压，不管枷鎖和牢獄，以男兒的气概捍卫你們的原則；我們坚决地信任你們，你們要尽你們的責任，并且表明你們无愧于你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历史任务。”

当时苏黎世同志們的贊揚使我們深感滿意，我至今还有此感。当时的发言人福莱尔同志現在在伯尔尼，是瑞士联邦政府的成員，并曾有个时期任瑞士联邦的总统。当然他不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达到这个高位的。瑞士也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正是随时代而轉移，同許多別人一样，从左翼轉到右翼并因而取得了高位和尊榮。

169

吞并和皇冠

在色当战役以后，对法战争以毫不衰减的力量继续进行。帝国的军队诚然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了，现在是以甘必大和弗累西奈为首的国防政府来组织新军。这支军队可说是在战争中间从地下铸造出来的。关于这个伟大的成就，有一本有趣味的书《雷翁·甘必大和他的军队》，馮·哥尔茨男爵著，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但是主要的功绩不是甘必大的，而是原先的工程师弗累西奈的。对帝国的战争历时还不到六个星期，现在对共和国的战争却持续将近六个月。而且新政府虽然作过媾和的尝试，只因俾斯麦志在吞并领土而未成功。俾斯麦始终想使拿破仑复辟，也声明说，国防政府不是一个可与谈判的稳固政府。可是最后他还是必须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

十月底，巴赞以麦茨连同十五万大军和大批军事物资投降了，这对德意志军队指挥部是件幸运的事，它可以用全力来对付新成立的法兰西的罗亚尔军和北方军。

十月二十六日，雅可比、彭好斯特和海尔比希都由吕森释放出来。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已到眼前，所以不便把违反公理和法律所逮捕的公民拘押不放。几星期后，十一月十四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又带着镣铐由吕森运回不伦瑞克。在这里要上演一出控诉他们叛国的案件。最后在十二月初，在汉堡市政府的催促下，盖布终于也从吕森释放出来了。对他提不出公诉材料。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德意志国会召开非常会议，会开得固然短促，但是很激昂。会议是关于批准继续作战的军费，同南德意志诸邦讨论凡尔赛条约和新宪法的问题。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凡尔赛条约的消息，在自由主义人士中引

起了极大的反感。根据那条約，給与南德意志諸邦，特别是巴伐利亚，以所謂特权，这样只会給国家的統一添麻煩。北德意志同盟憲法必須根据凡尔賽条約进行一些极为必要的修改而成为帝国宪法。国王在七月底的感謝书中所預先許下的自由，仍在原处——营房。議員日俸仍未批准。这些事件就足以使人情緒沮丧，何况又加上战争延长、造成各种莫大的牺牲、还不知何日結束等等事实。九月初，毛奇写信給他的兄弟說，他希望十月底可以回到克萊索（他在西里西亚的田庄）去猎兔子。但是兔子并没有被毛奇的猎枪所惊扰。

戰場上的消息在国会中造成了十分忧郁的气氛。人們沒有想到战争竟有这样的进程。《科伦日报》的战地記者馮·維开德还在十二月底就写道：

“这个可怕的战争是以巨大兵力进行的，规模之大是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历史所未有，事实上无法預計。人們认为，战争终于到了結束的时候，而现在却发觉，月底还是同月初一样。我們一再打败法国人，成千地杀伤他們的兵士……而他們的败兵总是再集合而又再集合……并且常常以不顾死活的勇猛气概向我們突击……現今在許多被我軍榨取得特別厉害的地区已經发生可怕的饥荒，在盛夏中人們像蒼蝇似的成批倒毙，到了严冬，这种情况将更可怕地变本加厉。”

国会开幕，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宣讀国王演說詞，演說詞中說，法国現在的当权者宁願使一个高尚民族的力量牺牲在一場无望的战争中。同这句话有一定矛盾的是說：法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談判的政府；也由于人民的态度，持久和平的希望毁灭了。一旦法国的力量恢复起来，或者由于締結联盟而自觉足够强大，它必将重行掀起战争。由此可见，吞并領土的欲望将把未来的发展推到哪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議程上列着要求繼續撥款案（一亿塔勒）。我發言談論这个要求。在我之前有議員萊欣斯波格表示贊成。我的發言不長，但引起了我的演說从此沒有再引起过的風波。我說，我是同前一位發言人一樣好的德意志人，雖則我在研究問題之后却得到了相反的結論。我摘要敘述了到帝國滅亡為止的法國簡史，並且指出，在拿破侖被俘后，戰爭的根源就已消除。對此我所依據的是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說和八月十一日普魯士國王宣言。我的講話引起巨大的騷動和激烈的反對。斷言法國沒有政府可與談判的主張是錯誤的。我在講話中證明它的錯誤。使和約不能締結的是吞并土地的要求。然後我對那不准我們在公開集會中說明我們關於吞并土地問題的立場的禁令，進行尖銳的批判。我詳細說明了我們這個立場。講話又被屢屢打斷。然後當我指出德意志資本家階級在發行第一次戰時公債時扮演的可憐角色而法蘭西資產階級在同樣情況下却完全不同的時候，風潮就完全爆發了。議會中一大部分人都真正發了瘋；他們用最粗野的話大罵我們，幾十個議員高舉拳頭向我們沖來，並且威脅着要把我們轰出去。我好幾分鐘說不出話來，最後，我建議大家通過李卜克內西和我所提出的建議。這個建議是：

“國會決議：

否決有關為作戰而繼續籌款的法律草案，並同意下列建議：

鑒於在七月十九日由當時法國皇帝路易·波拿巴所宣布的戰爭在路易·波拿巴被俘和法蘭西帝國崩潰后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鑒於根據普魯士國王在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說和八月十一日對法蘭西人民的宣言里自己聲明說，在德意志方面這個戰爭只是一個防禦戰爭而不是對法蘭西人民的戰爭；

鑒於從九月四日以后所進行的同國王的言論極相矛盾的戰爭，已經不是對那已不存在的帝國政府和帝國軍隊的戰爭，而是對

法国人民的战争，它已不是防御战争，而是侵略战争，不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的战争，而是为了压迫高尚的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根据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法兰西民族是有资格‘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国会决议否决所要求的作战拨款，并且要求同盟首相力求放弃吞并法兰西领土，尽快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

在我之后是由议员拉斯克尔发言，他用极为义愤的声调痛骂我们和法兰西人民。妙的是他如何为金融界辩护而反对我们的指责。他说：“不错，广大的金融界没有踊跃参加；那里没有获利的希望（一旦胜利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奥·倍·），这是商人的作风，如果看来无利可图，就不愿以商人身份来参加，商人的本性原是如此。现在，那里还有些人（用手指着我们），他们譏笑利润与报酬，可是他们从事理想活动却是为了报酬（大笑），并且使他们被称为使徒的行为，结果是为了议员日俸。（大笑。很好！）这些先生们，按他们的行为的性质也许只要一笔较小金额就会满意（会场的笑声震撼屋宇），却又嘲笑追求利润，这是怎样糊涂的想法！因此，大金融界认为这个时机不适于做有盈利的生意。”

173

替德意志资本家做辩护，实在不能比这更无聊和更充满矛盾了。（我在第二次发言时给了拉斯克尔适当的答复。）继拉斯克尔发言的是布劳恩（威斯巴登），继布劳恩的是李卜克内西。他有力地抨击前面的一个自由派的发言人。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议长高呼遵守秩序。

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说道：

“在七月间宣战的政府已被消灭，它的领袖与威廉平起平坐而且是普鲁士国王的好弟兄；当德意志战士在外面流血并且在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中忍受极其可怕的艰苦的时候，他却沉溺于帝王穷奢极欲之中，而法兰西人民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兄弟民族，而

且他們是願意同我們和平相處的。(騷動，高呼。)做法蘭西人民和法蘭西工人的弟兄，實在比做那個與威廉平起平坐的流氓的親愛弟兄更光榮些。(議員馮·施韋澤博士：好啊，好啊！)”

李卜克內西結尾說：

“要求發行的公債是為了吞併領土，這在御前演說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吞併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因為就在和平以後它也會經常製造出戰爭的危險，所以它在德國鞏固了軍事獨裁……由於這些理由，我當然反對戰時公債，並且和我的朋友倍倍爾一起建議予以否決。”

這個建議只有五票贊成，被否決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着戰時公債的第三讀，由我們黨所選出的歌茨博士(林得瑙，他在同年三月間還擁護約翰·雅可比的國會競選)在会上發言擁護戰時公債，雖然他斷言，這對他勉強，並且由御前演說中他也看出戰爭不能帶來和平，也沒有希望減輕軍事負擔。他的發言非常雜亂無章。表明特征的是，在這次會議中當我們對攻擊採用大聲打岔來自衛時，拉斯克爾就問議長，可不可以立刻改變議程來結束這種“胡鬧”。李卜克內西在回答時指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會議上我們所聽得的無禮喊叫和言語。當李卜克內西想就戰時公債的法律草案第一章方面答复所聽得的攻擊的時候，議長打斷了他的話，說他不能重提一般的辯論。李卜克內西以充分理由不承認這種觀點，因為第一章中包含着為繼續作戰而籌款，這時在議長建議之下，議會剝奪了他的發言權。第三讀中反對戰時公債的有：埃瓦爾特博士(漢諾威人)、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爾、李卜克內西、門德、施拉普斯、施韋澤和我。

幾天以後，在議程上列有議員鄧克爾及其伙伴關於在戒嚴時期憲法條例執行問題的質問。他們反對孚格爾·馮·法爾肯施太因將軍的措施。我們因為得不到所必須的三十人連署，所以就不

可能提出这类质問。如果說，資產階級人士不反对那对我们党委会的暴行，却非常憎惡約翰·雅可比的被捕，这很不符合人們对創設新国家的期望。雅可比在被捕后直接向凡尔赛司令部的俾斯麦申訴，因为他的被捕是非法的，所以請求将他释放。俾斯麦在答复雅可比的信里間接地认为他有理由，可是他沒有做什么事使他获得释放，表面上是因为他与司令部的軍人已很不和，不願再多增惡感。但是根据忠实地报道俾斯麦的公私言論的他的随身記者摩利茨·布士的記載，他在十月二十日談到雅可比被捕時說：“我对于这事决不感到愉快；党人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滿足他的报复心情；政治家、政治沒有这样的心情；政治只問虐待政治上的敌人是否有好处。”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国会中的质問以前不几天，又談到这个題目，俾斯麦說（仍根据同一来源），軍人征求他的意見太少了。“在委派孚格爾·馮·法爾肯施太因時也是如此，而他現在处分了雅可比。如果我必須当着国会議論此事，我可以推卸責任；人們不能拿討厭的东西来打擾我。我已成为战斗中习于炮火的馬，将来我还要参与国会活动，如果他們再使我生气，我就让人把我的位子放在最左翼。”

可惜他沒有使这个恐吓成为事实，如果在下次开会时有他站在我的一边，作为我的战友（在那次会议上只有我代表最左翼），那我就将非常高兴了。

十二月三日的討論异常激昂。邓克尔指出雅可比和海尔比希是非法被捕的，他认为我們那些被解往呂森的不倫瑞克的同志也是如此。他要求（这中間有如上述，被捕的普魯士公民因为当前的普魯士邦議會选举而被释放了），将来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代表俾斯麦講話，并企图为这种处分作辯护。溫德荷斯特答复他，尖銳地攻击他，并且尖刻地說，他今天听了秘书長的講話以后，他就不甚相信能实现战争开始时所承諾的“德意志

国家将是一个敬仰上帝，有良好风尚和真正自由的国家”。他諷刺地建議，在同法国的和約中規定把开云和兰貝薩也割让給我們，这样可以有个合适地方来安置不服管束的人物。然后温德荷斯特严厉斥責孚格爾·馮·法爾肯施太因对被捕的汉諾威人的虐待。在討論过程中，我也发言来描述我們的被捕同志在往来呂森途中以及在呂森拘留期間所受的待遇。我也控訴了薩克森的禁止一切集会。这些措施是对公理与法律的蔑視。米凱尔，不出所料，不仅同意孚格爾·馮·法爾肯施太因的措施，而且竟认为我們在德国的态度会使法国加强反抗。我立刻指出这一主张的荒謬。人所共知，質問照例是白費口舌的，这次也是如此。

在后来的一次會議上討論同巴登、黑森、符騰堡和巴伐利亚等邦所訂的条約。我声明我反对这些条約和任何新宪法。人民不久即可判明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究竟如何。德国十年来所进行的三次战争在自由方面只有后退。人民却总有一天会要求而且获得他們的自治权，然后自己制訂专以共和为目的的宪法。

在我之后，樞密參議瓦格納发言，使李卜克內西和我大吃一惊。他說，他从方才送到的《金融消息报》上看到，我們由法国駐維也納的領事勒菲弗尔那里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感謝我們在国会中的态度的一封信。（热烈高呼：听啊！听啊！嘘嘘！）对于这个，我只能在私人談話中答复說，直到此刻为止，李卜克內西和我都沒有接到这样一封信，而且使我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刚才还听說，《北德意志总汇报》也轉載了这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是普魯士新聞局想敗坏李卜克內西和我的名譽而散播的卑鄙謠言。在下次會議上，瓦格納仍坚持他的主张，說这封寄給我的信是真的。在會議結束时我回答說，直到此刻为止，我并未接到那封問題所在的信，所以必須保留我第一次的声明。但是，我終於收到了那封写給李卜克內西和我的信。这样，信毕竟是有的，所注日期是十二月二日，用了

六天的時間才遞到我的手里。信上說：

“我的先生們！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委派我為對德國民主黨的特別代表，我以法蘭西共和國的名義認為我有責任，對您們在柏林國會中，在一個沉醉於軍國主義和侵略精神的狂熱會場上所作的寶貴發言，表示我的謝意。您們在這種場合所表現的勇氣已使全歐洲注意您們，並在自由戰士的行列中給您們取得了一個光榮的地位。德國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義的精神，正如您們，我的先生們，所雄辯地證明的，目前遭到我們在第一帝國時期所遭到的那種壓抑，並且走向同樣的覺醒。粗暴統治的欲望控制住開明的精神。不久以前放出那樣的光輝普照着全世界的思想家，今天却在俾斯麥先生的感召下成為毀滅和殺害整個民族的宣教者。我的先生們，您們和您們的黨在這普遍墮落的時節保持了偉大的德意志傳統。——在我們的眼里，您們是德意志民族的偉大代表，而我們是以真正兄弟友愛擁抱而且永遠熱愛德意志民族的。法國向您們致敬，我的先生們，並且感謝您們，因為在您們的身上看出了德國的前途和兩民族之間和解的希望。”

這封信可能是出於善意，但是在那種時候卻是非常不合時宜的。誰把信公開了，我們從未知悉。我猜想，這位領事受了要想陷害我們的那方面的煽惑，才寫這封信的。——

在討論憲法時，有一幕可笑的場面。巴伐利亞國王路易第二在長期逼迫和談判之後聲明，請求德意志同盟的公侯和自由市，把德意志的皇冠獻給普魯士國王。這個消息傳到國會後，應當有某種莊嚴驚人的事繼之而來。在該次會議上，議員弗里登塔爾起來提出與此有關的質問。於是同盟秘書長德爾布律克莊嚴地站起來，要宣讀有關的文件。但是，他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個衣袋里。在極度興奮中，他緊張地尋遍所有的口袋，這一幕引起了哄堂大笑。最後，他找到了信件，但是效用落了空。德爾布律克雖是個十分幹練的官

員，却是一個人們可以想像的最缺乏頭腦的官僚。他絕不是那種表演莊嚴宣誓的人。俾斯麥在凡爾賽聽到宣言沒有成功，大發雷霆。

在這個辯論中，李卜克內西關於新憲法和新帝國的發言惹起暴風雨般的憤怒。他回顧往日所追求的德意志統一，作為往日所追求的目的的德意志統一與現在所實現的德意志統一迥然不同。現在的這個統一是來自上面的暴行的產物，公侯們同意了，國會就必須和只得唯唯稱是。這個憲法表現出，它來自凡爾賽的軍營。在那裡和南德意志諸邦所締結的條約，卻顯示出連外表上的統一也沒有談到。霍亨索倫王室成為德國真正統一的障礙，它的利益是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對立的。新皇帝的加冕應在最適於象徵此事的（柏林的）憲兵場上舉行。因為這個帝國只能借憲兵之力來維持。議長對這個發言提出了多次遵守秩序的號令和一連串的斥責，使這個發言顯得很重要。

十二月十日，選舉代表團把國會所決議的祝賀皇帝登基的請願書送到凡爾賽去。進步黨多半會同我們一道投票反對憲法，他們通知辦公室放棄參加代表團。代表團的成員是由抽籤決定的。我們保持沉默，要看一看我們中間是否會有一人中籤而列名代表團。中籤的人當然也不會接受。但是我們並沒有這種運氣。當羅特希爾德的名字由票箱中抽出時，溫德荷斯特肅然起敬地向他走去，用力握著他的手祝賀他的當選。整個會場哈哈大笑。

179 由於旅途中遇到的許多阻礙和凡爾賽司令部的招待，代表團沒有感到快樂。這種招待與代表團對他們的“崇高使命”所作的想像完全不同。國王本人把作皇帝看得無足輕重，所以当皇儲告訴他說，在此的公侯和將軍們希望在代表團呈遞國會請願書時能夠出席，他吃了一驚。國王冷靜地回答說，如果所說的人有哪一个真的高興參加，他是不反對的。如果代表團能夠約許他一旦吞并阿爾薩斯—洛林，就使之隸屬於普魯士，他對新尊位的感情大概就會

比这好些。这是第一次霍亨索伦家族打了胜仗而没有为普鲁士掠得领土的大战争。这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所难于克制的。

所以这正像许多其他历史传说一样，竟认为国王当时渴望登德意志帝位。因此，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勃兰登堡省议会宴会上讲话所作的描述，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当时威廉二世提到德国的统一时说道：

“旧德意志国家受两方面的迫害，外面受它的邻国的迫害，内部受它的党派的迫害。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一度团结起来的人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德意志人民至今还为此感谢他。从那时以后，我们的祖国瓦解了，好像没有人能够再把它联合起来。天意创造了这个工具，并且选拔了那个我们可以靠之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大帝的统治者。我们可以注意他，看他怎样慢慢从艰苦的考验时期成熟起来，直到他将近老年成为适合于工作的熟手，他既对于他的职业有多年的准备，就已在他的头脑里完成了那使他能实现国家复兴的伟大思想。我们看到，他怎样先把军队建立起来，把从各省雇来的农民子弟编成强有力的、武功灿烂的队伍；我们看到，他怎样做到和军队一起渐渐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并且把勃兰登堡—普鲁士置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完成以后，就到了他号召整个祖国，在敌人的战场上实现统一的时候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不是老威廉而是他的儿子，皇储（后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渴望帝位，当时在凡尔赛竭力贯彻他的想望。他的朋友，著名作家古斯塔夫·夫赖塔格竟认为，霍亨索伦家族所以能获得帝位，只应感谢皇储。确实的是，除了皇储以外，俾斯麦也竭力为霍亨索伦家族攫取帝位。俾斯麦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最适当的判断者，他在《纪念和回忆》一书中说到国王对帝位的态度时写道：

在他看来，帝位显得是一个给与他的现代的职业，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种皇帝的权威曾受到过反对，这种权威曾抑制过大选侯。

在第一次討論時他說：“化裝舞會長該叫我做什麼？”我回答說：“陛下當然不願永遠做中性的‘das Präsidium’（首長）。「Präsidium」一詞是個抽象概念，而‘Kaiser’（皇帝）一詞却有巨大的動力。”

帝位問題在皇儲弗里德里希的日記中講得又詳細又富於教育意義，日記是樞密參議格夫肯在弗里德里希死後發表在一八八八年十月號的《德意志評論》上，這惹得俾斯麥大發雷霆。弗里德里希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日記上寫道：

“我同陛下談到正在臨近的帝位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沒有希望；並引用杜布依斯—雷孟特的話為證，他說帝制已倒，在德國將來只能有一個普魯士國王，即德意志公爵。我相反地指出，三個國王強逼我們以皇帝來掌握最高權威，千年的帝位和王位是與現代的帝制無關的，最後他的反對減弱了。”

一月十七日，即國王宣布為德意志皇帝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寫道：

“對於國旗的顏色並未加以考慮，它，如國王所說，並不是由垃圾堆里升起來的；他却只容許帽徽與普魯士的帽徽並存，他不希望聽到帝國軍隊的說法，但海軍則可使用帝國字樣；由此可見，明天他必須與他堅持不放的老普魯士分手時心情將何等沉重。當我提到家族史，我們怎樣由城堡司令升為選侯，而後又升為國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如何也行使假王職權，而這個職權如此浩大，使帝位現在落到我們身上，這時候他回答說：我的兒子以全副精神應付新情況，而我則對此絲毫沒有作為，只是掌握住普魯士而已。”

國會閉幕後，十二月十一日，李卜克內西和我回萊比錫。十五日，我們在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協會的公開集會上報告國會的辯論經過。參加集會的人非常踴躍，竟成了個民眾大會。聽眾中有許多便衣的法國軍官，他們是被拘留在萊比錫的戰俘。集會的經過非常好，它以很大的熱情通過一個決議，感謝我們在國會中所持

的态度。还有許多地区表示拥护我们的态度。这次是我们在一长时期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十七日，我们长久期待的打击到来了。我早在十二月一日给霍包肯的 F. A. 左尔格的信里就已写道：“爱国的”人们对我們无限痛恨；如果他们最近能够抓我們，那他們确定无疑地会这样做。

我們的被捕

我們在九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的第一版上报道，据最可靠方面的消息，我們获悉，由于德意志司令部，特别是俾斯麦伯爵的坚决要求，薩克森政府决定对我们的党采用一切强硬手段。搜查和逮捕近在眼前。几乎全体新聞界，由自由派的报纸带头，好像奉了命令似地一齐发表煽动性的社論反对我們。他們竟无耻到这种程度，以至控訴我們有把国家出卖給法国的罪行。后来十二月間，在当时出版的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訊》上，发表了从不伦瑞克委员会沒收到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中斷章取义地摘出来的詞句，以便为他們的控告我們作辯护，我于是把下列声明寄給柏林的《未来》报发表：

“我从这里的报纸上看到，在瓦盖納先生合作之下，靠着傻子打趣出版的《蔡特莱尔通訊》，为了完成它的密告任务，把在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时所查获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寻章摘句地轉載了。虽然我认为只有由于一个官員違背了就職誓詞，《蔡特莱尔通訊》才能够发表那些斷章零句，我却須表示，希望不是把我們的信的斷章零句，而是全部內容予以发表。”

我有一切理由相信，由于这样的发表，可以明白无疑地证实，蔡特莱尔先生及其伙伴寻章摘句发表的私人函件只能是由某一个喪尽天良的官員暗授給他們的，他們所以这样发表，是因为想使他們的陰险勾当在輕信的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

我对这种行为并不觉得奇怪。半官方报界的狐群狗党所做的正是本性和官方命令他们做的事情。

萊比錫，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奧·倍倍爾。”

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我正在作坊里做活，我妻忽然面无人色地冲进来告诉我，一个警官在樓上我們的住房里要找我說話。我知道原因何在。我急忙由后面的樓梯跑了上去，在我的臥室里遇到一个我認識的官員，不过还有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当我問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妻回答说，这人是刚才来此投宿的。官員接着通知我，他奉命来查封我的文件。事情发生得很快，但我已把文件清除了。官員又通知我，他还奉命逮捕我。我赶快換好衣服，同妻子和小孩告别并且安慰他們說，我不久就会回来的，乘上守在門前的一輛馬車，先到警察局，由那里再駛往地方法院。在这里的地方法院監獄里指給我一个囚舍。我不諱言，在獄吏照老規矩把門上的一把大鎖和两根铁門插上以后，我憤怒欲狂，在小房里跑来跑去，咒罵我的敌人。但有什么用呢？聰明人能让步。次日早晨（星期天），檢察官和作为地方監獄總監的地方法院院长走进来，問我有无什么要求。我請求准許給我这些书来和夜晚到十时熄灯。院长对于二者都答应了，但灯亮只到八时。檢察官告訴我，要检查我的被认为危害国家和叛逆重罪的全部鼓动活动。检查将持续很久，因为还必须向外地調查。明天我将第一次在預审官前受审。我异常紧张。法官是高等法院參議阿乃尔特，当我被引到他面前时，他面孔严厉、非常矜持地对待我。我現在才知道，我和一同被捕的李卜克內西和赫普納被控的是图謀和准备叛国罪。李卜克內西与我一同被捕，我认为是当然的事，但倒霉的赫普納，他不久之前才担任《人民国家报》的第二編輯，也应被捕嗎？他与初生嬰兒一样无罪。法官又告訴我，因为检查材料的主要部分还在不伦瑞克，所以他还不

能繼續進行檢查，這使我大為吃驚和覺醒。不過，他希望材料在新年前還可以到達，那時他將竭力進行工作。那末，嚴格說來，我們的被捕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因為法官和檢察官都不知道作為我們被控根據的起訴材料。所以顯然是司令部想盡快使我們不能為害而決定逮捕我們的。

回到囚舍時，我非常憤怒。我現在有充分時間先研究這間小屋子了。囚舍里饒有空間，因為它差不多是空的。在門側一個角落里放着一個大的帶蓋木桶，關於它的用途我不必費話。靠一面牆放着一個小書架，上面有一把水壺和一本贊美詩和新約全書。在另一面牆上安裝了一條三尺長的窄板凳，不能移動，在它前面，算是特別優待，放了一張小小桌子，那麼小，我若在上面展開一卷《涼亭》雜誌，就把桌面全遮住了；沒有床，夜晚鋪在地上的墊褥，次晨搬在走廊上的一大堆墊褥上。窗子上半半釘着鐵欄，只有爬上小桌才能及得窗子，窗前下面，日夜有一種奇怪的響聲。我爬上窗子一看，原來下面庭院里放着六個烘咖啡的大機器，在為戰場上的軍隊大量焙制咖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也許是我們數十年來所未有的嚴寒天氣。戰場上的可憐蟲——無論德意志人或法蘭西人——遭到可怕的寒冷和冰雪。壞天氣開始既早而結束又晚。就是在我的囚舍里也是酷寒難忍。這個太古時代的老鐵爐，每天早晨五點鐘用一把煤生起火來，也不會發出特別熱度。況且我也需要新鮮空氣。因此，我早晨一開窗子蓋板，那一点点溫暖立時消失干淨。我凍得非常之慘。我為取暖，坐在小桌上把腳伸到長凳上，用我領來做蓋被的白毛毯把兩腿裹起來。雖然如此，我還是得了膀胱炎。不幸，我的囚舍還是朝北的。李卜克內西在我們中間年紀最大，他們讓給他一間當時為了所謂交換俘虜所準備的房屋。這是我妻來探望我時告訴我的，她每星期可以當着法官的面同我作一次短時間的談話。我也被准許在法官監察之下與她通信。

但是不久，我很不愉快地发现，我不是独自住在这囚舍里；这里聚居着许多虫子。现在，我颇有时间来狩猎，而且收获比毛奇所希望的克莱那兔子还多。白毛毯成为陷阱。不久我的猎获达到了最高纪录。有一天我杀死了，女讀者請不要害怕，八十一个人們叫做跳蚤的褐色小虫。我渐渐把小屋肃清了，也没有用杀虫药粉，我妻曾应我的要求而送给我两次这种药粉，但都未收到，因为看守者自己也需用。我也做到了把垫褥留在小屋里，以前垫褥总是每晚爬满了跳蚤后又拿进屋来。我刚把我的“家”弄干净，就按照医生的指示迁移到西边去了。我现在迁进去的囚舍，据我的看守人亲切地告诉我，原先是个杀死嬰孩的女囚犯所住的。现在我必須重新从事于清除工作。

像我們这样的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堪的。被关在严格单人的囚舍里，不知道要关多久，也不知道当前有什么控訴材料，令人非常着急和神經錯乱。一月初，我终于又被帶到法官面前。我一进法官的房間，就看到窗前的座位上放着一大捆蓝色的文件。那是我写给党委员会的信件，党委员会把这些信同李卜克内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特别小心和热爱地保存在一起。如果我此刻把党的秘书彭好斯特抓在手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我馬上又觉得我没有理由因这些信件被沒收而发怒。法官告訴我，前两天他才收到控訴材料，但他决意尽可能赶快加以审查。他履行了他的諾言。每来一次新的审訊，法官的态度就和藹些。我們的信件当然是他所审閱的第一批材料。因为这些信件几乎全是十分亲密性质的，所以那里面我們不仅互相提到党的困难，而且也談到大大小小的私人困苦，由此可見，我們没有一个处境良好。审官一定会意外地发现我們不是叛国和弑君的犯人，而是抱着最好的意图和滿腔热血的人。二月底，法官把那数量极大的材料(单是信件就約有二千封)审查完毕，检查工作也告結束。我們后来由我們

的律師奧托·夫賴塔格那里得知法官是一個極有才有良心的人，他獲得的信念是，我們不但不能被判為企圖叛國，而且不能被判為準備叛國。因此，他建議釋放我們，但是檢察官不同意。

一八七一年二月底，奧地利的內閣霍亨瓦特-沙夫萊伯爵執政，實行大赦，釋放了維也納的叛國犯奧伯溫德、安·邵烏、摩斯特等。一天晚上在審訊時，法官一聲不響地把《萊比錫日報》放在我的面前，上面登載着關於大赦的電報。我不禁說道，這樣的好事到不了我們身上；我的看法得到證實。我之所以確信我們會被判罪，並不是因為我自覺有罪，而是因為對我們的攻擊，甚至在我們拘押期間還在對我們繼續進行，使我對於陪審員的情緒不能信任。此外，我也認為，政府要集中全力來設法判我們的罪。否則，這個案件就成了它一件丟臉的事。我甚至在一封由我妻轉交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我們大概還要在牢里蹲兩年。我妻把我的這種看法告訴了李卜克內西夫人，她大吃一驚。但是我的預言又應驗了。

我們被捕後，萊比錫的同志們請當時《克里米朝市民和農民之友》報的編輯卡爾·希爾施到萊比錫來，要他接任《人民國家報》的編輯。卡爾·希爾施情願幫忙，像他這樣在最困難的期間編輯報刊是應受到黨的感謝的。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〇二期《人民國家報》上宣布他依照我們的願望接任編輯，並且接着說道：

“對我們的朋友所進行的檢查，我希望，歷時不會很久，並且我確信，將得出他們無罪的結果。目前我將拿我們的朋友一向領導《人民國家報》所持的高尚、勇敢、不是‘叛國’而是真正愛國的態度，當作我編輯時的榜樣。”

報紙的傾向和出版都無所改變，敵人方面所抱的希望，即我們的機關報所受的打擊將使黨鹹口結舌，被毀滅了。”

希爾施剛剛參加《人民國家報》的編輯部，比得曼教授就開始

187 在《德意志总汇报》上对他进行攻讦。《蔡特莱尔通讯》报怀着同样的意图，像它故意寻章摘句地发表我们的信件那样，来对付在不伦瑞克所查获的希尔施的信件。希尔施有力地摆脱攻讦者。此外，希尔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樺树之战》转载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作为答复。

一月間，宣布国会选举将于三月三日举行。在一次党的全邦集会上又在我们的老选区提出我们的名字。莱比锡的拉萨尔派同我们的同志一致推我为候选人。我通知委员会说，为了使财力和人力能集中在富有希望的选区，我不能接受莱比锡的候选。但该会坚持这样做。资产阶级集团的人们捐款来阻止李卜克内西和我当选。在我的选区（格劳绍—美拉内—荷亨斯坦），敌人一致以舒尔采—德里奇来同我竞选。舒尔采接受竞选，但拒绝举行选民大会，因为我是无法举行这类大会的；也许是因为这样对他不利。一月底，德累斯顿的党临时委员会辞职；为了集中力量，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指示，以莱比锡为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财力自然十分拮据。如今的同志想不到当时用如何少的钱来进行选举。任何地方的选举费差不多都不超过五百到六百马克。

188 选举进行得不顺利；它在不断的钟声和炮声中举行，因为三月三日临时和约在凡尔赛签字。仅有的胜利者是施拉普斯和我在第十七和第十八萨克森选区当选。我以七千三百四十四票对四千六百七十九票战胜舒尔采—德里奇。施拉普斯严格说来已不属于党，并且本应推举尤利乌斯·莫特勒来代替他，他以五千八百七十五票对五千七百零六票获得胜利。李卜克内西在第十九萨克森选区以三千九百八十一票对五千一百三十四票失败。斯皮尔在米特维
188 达—弗兰肯堡经过复选，但以四千零十七票对五千四百三十票为比得曼教授所败。在莱比锡市我得了二千五百七十六票，而我的对手市长斯台法尼博士则获得七千三百一十二票。这个结果还算

是很順利；一八六七年秋季，我們只得到九百票。在萊比錫鄉區被提名的是約翰·雅可比，他以二千八百七十七票對五千七百一十八票為對方所敗。白拉克是開姆尼茨和第二十二薩克森選區的候選人，得了二千九百七十七票和三千四百七十七票。我們在薩克森為我們的候選人共搜集了三萬九千多票。在許多選區，例如比萊菲爾特，我們的黨員同志支持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候選人（普范古赫），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地，他們幾乎全不想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全德工人聯合會總共為其候選人搜集了六萬三千票。

由上述數字可以看出，參加選舉的人不多，到處都不見對於新帝國的热情。貿易和運輸業的沉重負擔、失業、戰爭的一切後果，再加上也使群眾受重大犧牲的又長又冷的嚴冬，造成非常消沉的情調。

我一接到我當選的正式通知，就由監獄里把下列感謝書送給我的選舉委員會發表：

“選舉我的人們！同志們！你們又輝煌地表示對我的信任，你們這是第三次選舉我做第十七選區的國會代表了。

雖然我不能到你們中間來說明我對於新形勢的立場，可是你們仍對我保持着信任。你們也沒有被敵人在競選時所使用的激烈而卑鄙的鬥爭方式所迷惑。

這個，再加以失敗的敵人可算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最有名望的大人物這個事實，使這次選舉對於我加倍光榮。請接受我為此表示的最熱烈和最衷心的感謝和我將盡力做去不負你們的信任的諾言。

社會民主黨萬歲！這是我們迎接新鬥爭的口號。

萊比錫，地方法院監獄，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三日。

此致

社會民主黨的敬禮

你們的奧·倍倍爾。”

我一生中常常幸运地受到歌咏，不论是好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在现在刚过去的竞选中，诗歌也起了些作用，虽然这作用还是有疑问的。荷亨斯坦市长就这样发表了下列当然是匿名的一首诗：

拿破仑和倍倍尔

一个坐在威廉斯赫埃^①，
一个蹲在地方法院。
一个痛风在脚趾，
另一个却痛风在头脑里。

在《美拉内周刊》上有另一篇匿名作品嘲笑我说：

“威廉斯赫埃人给倍倍尔的信

亲爱的倍倍尔！

让我们谈句合理的话！您瞧，我是个老手，您当前要做的事，我都已经做过了。哎，倍倍尔，如果《纽约论坛报》那个贪睡汉最近又给我一点希望——我担心，我却很担心，我将一无所成。我没有力量再从头开始。

但是您，倍倍尔，毫无疑问，您是有前途的。您还年轻，具有令人爱怜的仪表、好胃口、大胆量、令人生畏的言谈和慷慨的性情。再加上妇女的宠爱和教会的友谊，这样就有了一个年轻人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一切性质了。

现在，倍倍尔，我想告诉您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要紧话。如果由自己来做大总统，那末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则共和国也就与一切其他国家形式，包括教皇制在内，同样有缺点。至于如何能当上总统，倍倍尔，我要向您密谈。不过，我马上可以十分公开地对您说，由总统到皇帝只差一步。”云云。

在莱比锡，就是在我們被押期间，对我们个人的嘲笑也还在继

①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曾被囚于此。——译者

續进行，这在文化史上有几分趣味。在一个杂剧場上演了一出名為：“内倍尔和皮卜克内西”的滑稽戏；在市区的另一个較大的酒館里演出一出名為：“倍倍尔或者开明鞋匠及其徒弟”的滑稽戏。“爱国主义分子”就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們對我們的憤怒。

一部分自由主义的报刊對於我的当选極為憤怒，因而鼓動說，190
国会开会时应表示反对把我由待审拘押中釋放出来。《馬格德堡報》也為萊比錫這種思想所鼓舞。我們的律師奧托·夫頓塔格為此發表聲明說，認為我們被控叛國或圖謀叛國的說法是不真實的。我們被控由於我們的鼓動而犯了圖謀叛國的罪行。李卜克內西和我在戰爭問題上的態度絕沒有起一點附帶作用。如果說，檢察官和法官反對釋放，那也是無恥的謊話。相反地，法官曾對他說，檢查完畢後，就毫無顧慮地實行釋放。檢察官對於開釋也沒有顧慮。

三月二十七日，施拉普斯在進步黨人的支持下，在國會中提出釋放我的建議。與此相反，議員斯台法尼博士（萊比錫）和比得曼教授建議，向首相請示辦法。他們在盲目的憎恨中，竟毫不覺得他們的做法的無聊和卑鄙。三月二十九日，議長打算把這兩個建議都列入三月三十日會議的議程。對於這，議員施拉普斯在說明會議程序時說：他得到消息，我們已于昨天開釋。

事實上也是這樣。薩克森政府要避免國會討論，所以命令把我們釋放。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將近四點鐘，我們上的鎖和門被急急忙忙地打開，看守人沖進來喊道：我想，您要自由了！當我走出囚舍時，李卜克內西和赫普納已經站在走廊上。我們一句話不說，三個人就互相擁抱起來。我們自從十二月十五日那個不祥的會議以後從未晤面。我們被引到法官面前，他宣布釋放我們，但我們必須保證，決不企圖逃亡，並且不得他的同意決不越出萊比錫市區一191
步。我們把雜物收拾在一起以備來取以後，急忙各自回家來一個歡樂的團聚。我的小女孩歡呼一聲，抱住了我的脖子。

两天后，三月三十日，不伦瑞克委员会也被释放。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拒绝了所提起的叛逆和英国的控诉。不伦瑞克委员们被禁闭二百天，我们一百零一天。乐观者认为，现在对我们提起的叛国公诉也要放弃了。

一八七一年秋季，不伦瑞克委员会以犯了許多刑法条款的罪名被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判处监禁：白拉克和彭好斯特各十六个月，斯皮尔十四个月，曲恩五个月。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在撤销申诉时取消了第一审的判决，而另以他们违反结社法的罪名判处：布拉克和彭好斯特各三个月，斯皮尔两个月的徒刑，曲恩是六星期拘留。待审拘留就算服刑了。

我以后的国会活动，萊比錫叛国案及其他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期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我为行使我们so被赋予的全权前往柏林。国会这一次是三月二十三日特别隆重地由皇帝在全体德意志诸侯和自由市的代表陪同下开幕，在端侯夫广场附近的普鲁士议会大厦开会。

192 我首先往访我从前寓所的女主人，打听一下我可否仍在那里居住。她表示，非常抱歉，不可以接待我住宿。当十二月间李卜克内西和我走了以后，警察来到她那里，为了她供给我们住处而大加申斥。在那次会期中秘密警察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犯人。波兰人的遭遇也同我们一样。政治警察一旦对政权敌人进行迫害，其特性就是无聊和可恨，总而言之是卑鄙。这个我们后来在德累斯顿充任萨克森的邦议会议员时也领教过了。

当我走进国会时，左翼的座位已滿，只有最右边有空位。尽管我不大喜欢与最右翼的那些可敬的先生們做邻居，我还是坐在那里。但是，他們了解我的不幸，并没有使我因为有如扫罗置身于众先知之間而难为情。虽然我这邻居也确实使他們不舒服，他們的举动却十分像紳士。每当左翼反对右翼，我在最右边起而同情左翼时，常常惹得全院哄堂大笑。我是許多假面具中唯一有情感的心胸。

帝国宪法在作了必要的編輯上的修改以后，現在也得到了德意志国会的核准，关于宪法的总辯論已成为文化斗争的辯論。一八七〇年在羅馬梵蒂岡的主教会議上教皇永无謬誤的宣言喚醒了这些才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急欲借着文化斗争这面响亮的鼓（文化斗争这个名称是議員維尔周教授創造的），使人們忘記他們所牺牲的公民自由。天主教的政党在温德荷斯特和馬林克罗特领导下組成中央党。在文化斗争的战士中奇菲尔（巴登）特別突出，他担任着高級法官的职务。我在四月三日发言时，表示对于辯論所采取的宗教性质深感詫异。我說，看来在新德意志国家中宗教辯論挤掉了其他一切。一个像我这样已与宗教信条断絕关系的人，在这种到现在为止我所出席的两次會議中，除去宗教几乎听不到別的东西，而仍要繼續听取这种討論，是需要一定的克制功夫的。（大笑。）¹⁹³我于是攻击民族自由党人，因为他們的发言人馮·特頓奇克教授曾声称，要求宪法的基本人权，那是属于政治童年的事。我同意他的說法，如果人們在一八四九年要求普魯士国王接受包含有全部出版自由，全部結社与集会自由，教会与国家分离，保证个人自由和其他好事的宪法，那才真是政治的儿戏。向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要求这些东西，誠然是幼稚。我然后批評自由党人，他們宁願放弃一切自由，而不願同一个被认为革命的政党来往。同时我希望，在十九世紀終了之前我們能实现我們的一切要求。（巨大騷

动。)如这个期间所指出的,这种看法未免很乐观了。

米凯尔继我之后发言,他认为我的党暂时还无危险,他将不同我辩论。但是对那些在他以前发言的先生们(中央党)却不然,他们对他们大发雷霆。会议结束时我针对米凯尔作了个人发言。他对我的党有点蔑视的表示。我对这并不以为怪,但是我却颇指明,議員米凯尔(誠然有一个他既不是銀行經理也不是市长的时期)曾隶属于他现今所攻击的党,即属于共产党。这个揭露使議會大为惊愕。米凯尔沉默。会后有許多議員到我这里来打听所提出的指责的真实程度!議員米凯尔从那时起对我相当尊敬了。

194 宪法討論刚过去,舒尔采一德里奇及其伙伴就来了,建議修改宪法的第三十二章,目的在于实行議員日俸。在討論宪法时,虽则是提出这个建議的适当时机,但并未把它提出。我在有关的一次发言中說,只因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使那些先生們不敢在国会中实行在其他一切代議制团体中已經实行的日俸。俾斯麦嘲笑建議人。他不願完全确定,实行日俸后會議的組成是否还是这样。但是他不想作这个尝试,当他怀念起这逗人喜爱的會議而无可奈何时,那他就太痛苦了。(大笑。)无日俸的參議院常欲縮短会期,有日俸的众議院則情况与之相反。

四月二十四日的議程上列有进一步筹款来支付战争所引起的特别费用一案。法国国民議會固然在二月二十六日同意了临时和約,但軍費賠償問題还未确定。在法国的德国大軍还需要款項。俾斯麦首先发言,論证提案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法国还不能履行其付款义务。誠然可以干涉法国内部事情,但是还不願这样做,因此希望給法国些時間,由它自行安排。我在俾斯麦之后发言,指出他的解释表明了,他同他的政策已陷于困境。然后我再次陈述我們对于战争問題的立場。如果不坚持吞并土地,則數月前和約即可結成。我們就可以免于損失无数的人員和金錢,德国的处境也将

比现在好多了。那时二十亿的价值要超过现在的五十亿。此外，法国的任何政府，不管它是什么名称，决不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法国在寻找同盟，俄国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会改变态度。首相要愚弄俄国，是否能像他愚弄拿破仑那样成功，我很怀疑。（哄堂大笑。）可以断言，我们将来的军事预算一定远高于放弃吞并而与法国作合理的协议的预算。首相在德国的政策同拿破仑在法国的政策一样，是由资产阶级支持的。只有双方的工人拥护和平。人们现在又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受了那么多的攻击和蔑视，而处事却极有节制。（持久的大笑。）巴黎公社是从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宣布成立的。我并不完全同意巴黎公社所采用的一切办法，但比如说它对待大金融家有节制的态度，或许我们德国在类似的情况下就难以应用。（笑声。）冯·卡尔多尔夫先生针对着我发言，要证明全德意志不掠得领土就不愿和平，我用激烈的辩驳否认这种意见。

在这次国会会议上也讨论了关于伤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草案（雇主责任法草案）。我在第三读时发言并且强调指出，工界人士对于这个法律所抱的希望，曾一度被政府的法律草案打消，后来更被国会的决议打消了。我详细论证了这一点。我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斯克尔加到草案中的第四条，根据这条，由保险机关、矿工协会基金、救济基金、医病基金或类似的基金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如果企业主支付至少三分之一的保险费，就统统计入赔偿总额里面。企业主既从工人的劳动抽取利润，自应对工人所受的意外伤害单独负起全部赔偿的责任。

最后我要求，在确定赔偿时，由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以陪审员的形式参与，而且雇主与工人的人数要相等。因此，像现在这个草案，我不能赞同。

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国会中（施拉普斯严格说来是不能算数的），所以为了出席会议，就不得不比往常更加频繁地来柏林。可

是现在我的生意也迫切需要我亲临。这种双重地位使我异常苦恼，这在五月十日给我妻的一封信里表现出来，我写道：

“这里的事务是不可言状地讨人厌，我的处境因而极不舒服。我的地位和我必须而且愿意亲临生意场所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你和别人在我身上所觉察到的恶劣情绪的原因。”

196 那些当时为我在国会中的活动而欢呼的人们，想像不到我的情绪如何。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必须开火了。议程上列着关于阿尔萨斯—洛林与帝国合并的法律草案；同时还要先把阿尔萨斯—洛林的专制制度维持到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再说。我又追述一下战争的过程和普鲁士国王所作关于战争是防御战争的保证。吞并领土是和这个保证不相容的。吞并领土只意味着扩张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力。阿尔萨斯—洛林只会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治理。至于专制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汉诺威被吞并后的期间，如我所举例证明的，已经尝到了。人们在这里谈到了法国的省长制度，据说阿尔萨斯—洛林将从这个制度中解放出来；但是普鲁士的行政区长官制度丝毫不比它好，反而比它更坏。不久以前，索林根有一个人当选为市长而未被批准，原因是他作为官员竟连公文摘要都搞不好。（大笑。）首相最近在一次我所没有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必须把普鲁士的城市自由给与阿尔萨斯—洛林。是啊，他甚至还说，巴黎公社的努力基本上将达到在巴黎实施普鲁士城市规则的结果。但是为此斗争，却不值得，因为这不值一粒子弹的代价。如果首相说的对，我却无法了解，他何以能够接受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双方所同意的和约里的规定，即把被俘军队供给法国政府来推翻巴黎公社。他还在同一和约里规定，在巴黎公社垮台后三十天，法国应支付第一期的五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可是他却以如何奇怪的方式对待这些在巴黎争取普鲁士城市规则的战士。但是，如果德国方面这样对公社作

斗争，那么，我这方面要声明，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却是满怀热望地仰望着巴黎。巴黎的斗争只是个小小的前哨战，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殿作战，对茅屋和平，消灭困苦与懶惰”，就会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我结束发言时说出我的希望，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应了解他们的自由使命，即同我们一起在德国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借使欧洲人民终于有一天获得完全自治权。但是这只有在欧洲各族人民认识到共和国体是它们的奋斗目标时，才能达到目的。（骚动。）

一八七八年秋天，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讨论会上，俾斯麦侯爵说，就是我的这一篇演说使他眼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但是关于这个，在我作这个发言的那一天，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俾斯麦侯爵紧接着我讲话，开始时说：你们不要害怕，以为我是来答复上一位发言人的；你们大家和我有共同的感觉，他的发言在这个会场上是无需答复的。（同意。）这就是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就是随后的一些发言人也对我十分宽大，几乎全没有提到我。因此，在外面新闻界中，对我攻击得更加激烈。于是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断然声明说：“倍倍尔所说的东西，是他所必须说的；为巴黎公社辩护是他的责任！”在对我的怒号中间，《柏林交易所报》上刊出一篇以完全不同的很不伤人的声调说的星期日闲话。这显然是当时任《柏林黄蜂》报编辑的斯台登海姆写的。我在“柏林新闻界”协会中认识他，我曾应罗伯特·施维舍尔的邀请往那里去过几次。这协会也就是斯台登海姆在那篇闲话中所说的那个协会。其中与我有关的部分是：

“柏林是安静的！”

人们有时听到的枪声，并不意味着处决叛徒，而是台盖尔区进行炮兵演习的声音，遮天的烟雾，不是火烧皇宫的浓烟，而是由我们可爱城市的各个角落升起的、把鸽子、麻雀和其他鸟类从空气里

清除出去的各种灰尘的集结。

我們极其匆忙地把这个得自最可靠方面的消息发表出来，借以安慰柏林很多人的恐惧情緒……

198

……在《十字报》上竟钻出来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她要求柏林所有的母亲起来請求皇帝为了預防一个像巴黎那样可怕的刑庭，让人把柏林所有一切能够危害我們儿童的道德的机关、建筑、繪画、书籍等等全都加以破坏和毁灭……

……倍倍尔的演詞起了这样的作用！

我們认为我們有責任，来平息由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投向《十字报》广告栏的幻想所激起的浪潮。

倍倍尔的演詞誠然有点激烈。它与普通的宴会講話有所不同，它的恫吓和观点使胆小的人战战兢兢。‘对宮殿作战！’听起来是有些不平常。大家知道，听到这样一个号召，特别使沒有宮殿而租屋居住的人感到煩躁。柏林住在宮殿的人惯于信賴他的看門人，遇有可疑的人來訪，他就与他扭打，直到警察前來把歹人帶往崗亭为止。

倍倍尔高呼：对宮殿作战！他誠然又加上一句：对茅屋和平！但这还不能安慰一位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的流血的心……对茅屋和平！这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茅屋已經完全沒有了。人們只建筑三四层的楼房。在柏林哪里有茅屋？茅屋和平已沒有多大用处，而且倍倍尔可以許下这种和平，就像他可以对所有穿草鞋的人許下免税一样。免税固然不坏，但是今天誰还穿草鞋呢？

中午倍倍尔作了他那个火炬报告，晚上我們又在一個协会中遇見他。

这个协会并不搞政治，而是搞其他蠢事的。人們用閑談和啤酒来消磨时光。

人們想像一个鮮紅头发、雄赳赳鼻子的大力士——但这不是倍倍尔！

倍倍尔是个仪表秀丽的人，从漂亮面孔上，一双必已获得了許多妇女心的眼睛炯炯发光。但倍倍尔不是个登徒子。他誠实，甚至拘謹，絕不风流，主要是謙虛。我們曾发现，他把火柴匣推得远远的，显然他討厭硫磺气。

現在我們問每个母亲——并非每个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我們問柏林的每个单身汉、已訂婚的、做父亲的、做祖父的；人們根据倍倍尔的言論把他当作烧毁德意志的房屋和建筑物的魔王，看来他的外貌与他的言論一样嗎？我們敬倍倍尔一支雪茄烟。

我不会吸烟！倍倍尔文雅地辞謝說。

我們还应该引用点什么来安慰首都居民嗎？倍倍尔不吸烟。倍倍尔连一支雪茄烟都不点——他会放火烧宫殿嗎？

可惜我們忘記問問他，他在晚上点的是油类还是煤气。我們 199 确信，倍倍尔家中沒有煤油。那么，这样一个人会——？

不会！倍倍尔的灵魂中沒有煤油！

我們还过多把他糾纏在关于他絕不全知道的柏林宫殿和同类建筑物的談話里，我們为了慎重起見指出，柏林宫殿实在不多，所以完全不值得对它作战。倍倍尔显然沒有想到，我們会对他的話这样說，‘对宫殿作战’这句话无疑地他只是脫口說出。‘至于柏林的茅屋’，我們繼續說，‘首先要提到碎冰装置，其他一切茅屋都不及这个很不美的建筑物。’即使这个碎冰装置消灭了，柏林也不至于惊惶失措。’倍倍尔恭恭敬敬地听着，但他很难了解我們的暗示，我們是說，‘对茅屋作战’到最后仅只限于一个比任何其他破坏都更受我們欢迎的破坏，这他似乎也认为我們是正确的，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世人一样不喜爱碎冰装置。

于是我們就这样把倍倍尔和他的言論分开了。在我們的国会里所談論的东西，有許多閱讀起来要比单想付諸实施好些或可怕些。請我們敬仰的讀者回忆一下齐格勒議員的惊人語：‘文化部长必須革职！’馮·穆勒先生就坐在一旁，聳了聳肩膀。他今天仍然端坐在‘席位上’。

倍倍尔是宮殿問題上的齐格勒！

齐格勒是文化部长問題上的倍倍尔！”

这里我所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言論，將为大部分讀者所不解。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什么东西，另一部分因讀过了反对公社的东西而有成見，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知道巴黎公社的历史。但是我們对它的态度，在斗争中，特别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竞选中很是重要。甚至在九十年代，我还須在国会中为我們对公社的态度作辯护。

1876年3月，我在莱比錫同莱比錫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布伦諾·斯巴利希有一次大辯論，在辯論中我重提相当的章句，并把当时我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論付印。

200

国会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將終时閉幕。回家后結識了約翰·莫斯特，他是在大赦后被驅出奥地利而来到莱比錫的。他被释后，他写給他父亲的一封信是人所熟知的。他的父亲，我若沒有弄錯，是奥格斯堡的教会慈善团体的職員。这位父亲曾企图使儿子改“邪”归正。

莫斯特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三日給父亲的复信中说：

“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給我一个月薪一千古尔盾的位置，而要我为一个同我思想敌对的政党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党内同志只拿給我乾面包，我将不加思索地伸手要乾面包。”

这封信表现了莫斯特性格的优点。他所写的是他的真誠信

念，因为他的天性原来是很好的。如果说他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越来越走入歧途，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直接行动的代表，这个一贯刻苦节欲的模范人物，最后竟在美国落得醉鬼的下场，这个恶劣的发展应归咎于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逐出境外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如果莫斯特能留在那些懂得如何领导他和如何控制他的热情的人物影响之下，则党就能保住这个最热诚、最乐于牺牲和永不疲倦的战士。他后来做自己创办的《自由》报（起初在伦敦，以后在纽约出版）的编辑，常常对我猛烈攻击。他对付伊格纳茨·奥艾尔和李卜克内西比我更为凶狠。虽然如此，我对于这样一个秉赋独厚而竟堕落得如此悲惨的人，深感遗憾。

莫斯特到莱比锡几天后又被驱逐出境。他去到开姆尼茨，在那里担任《开姆尼茨自由报》的编辑，并领导一八七一年仲夏所发生的五金工人大罢工。

党不久就从战争时期的影响下恢复过来。现在开始的辉煌的工业繁荣时期有利于这种运动。德意志问题达到了一个结束，它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一时却也没有更改的希望，它消除了迄今争执不休的工人党派间的各种分歧之点。战场更加明显和简单化了。爱森纳赫党（这是我们党的简称）不久就出版了一批党的机关报。除了克里米朝和开姆尼茨的报刊以外，在不伦瑞克也由不知疲倦和一贯不怕牺牲的白拉克创办了《人民之友》并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印刷所，此外在汉堡—阿尔托那、德累斯顿、纽伦堡、侯夫，后来在慕尼黑和美因茨也是如此。相反地，奥格斯堡的《无产者》报在六月中旬停刊了。

第一次德意志总工会

德法战争后开始的繁荣时期，鼓舞着工界人士创立新的和扩

充旧有的工会組織。在特別受壓迫的織工群衆中也感覺到同樣的需要。我的選區發起了一個德意志織工會議，定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格勞紹開會。出席的有受八十五個地方的一百三十四個單位委託來參加會議的代表一百四十七人。代表中也有當時隸屬於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充當國會議員的哈爾姆（愛北斐特）。莫特勒有緊急事務走了，我代替他作三個問題的報告：1. 為什麼織布業的工資這樣低？2. 如何才能提高？3. 如何才能得到與目前環境相稱的工資？在演講中間，我指出，吞并阿爾薩斯—洛林以後，它的高度發展的棉紡織業將與德意志的同一工業部門展開有力的競爭，也將毫無疑問地對德國迄今的生產方式（非常普遍的家庭織布業）起一種革命作用。出席旁聽的格勞紹商人當時是通過他們的經理人使家庭紡織布業為其工作，聽到這個議論都搖搖頭。但是當我受長期監禁之後，一八七五年回到我的選區時，各方面都證實了我的議論是正確的。我的選區中的城市景象也使我確信我的正確，那些城市的工廠在幾年間雨後春筍似地生長起來。我提議同阿爾薩斯—洛林的織工進行聯繫。我還提出一個議決案，即要求禁止工廠中的童工和以法令實行十小時的標準工作日制，都被一致通過了。此外，還議決要求取消星期天工作，只有兩票反對。另一個由我提出的在激烈辯論後也通過了的議案，是有关罷工方面的，其中說道：

“全德織工會議向所有的同業建議，在組織罷工時要特別慎重，如果沒有充分的財力和支持來確實保證勝利，就絕不要舉行罷工。”

關於仲裁機構，我提出了以下的決議：

“第一屆全德織工會議認為宜組織仲裁機構，由工人和雇主以相等的比數來組成，以便由和平途徑解決有造成罷工之勢的分歧。”

最后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地点在格劳绍），掌握同业的鼓动和组织事宜，并按期发行载有同业通告的传单。在柏林举行了第二个工会议，也同样发行一批传单，但是以后这运动又瓦解了。

薩克森的其他事項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我們在萊比錫召开民众大会，議程是：“高额的地方稅和市政”。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萊比錫历次参加大会的人从沒有像这次这样踊跃。这真是向大会会场来的“民族大迁移”，会场虽能容五千人左右，却还容不下这次参加者的三分之一。大会是为了答复萊比錫报界对我们的党，特别是对我个人在国会中的行动的猛烈攻击举行的。我严厉批评了市政机关。我所提出的議案指責了捐稅制度为富人的利益而給平民加上无理的负担，此外，議案还指責了地方稅的主要为有产阶级謀利益的用途，因为只有通过现有的阶级选举法才可能有这种管理方式，所以要求实施普遍、平等、不記名和直接的选举法。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只有三票反对。自由主义的报界咆哮起来。

现在在薩克森也开始了迫害时期。当希尔施接管《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时，瓦尔特希作希尔施的代理人参加《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报，七月間他以报刊犯了褒瀆皇帝罪而被判监禁三个月。此后不久，卡尔·希尔施也因同样罪名被监禁四个月。

八月三日，檢察官宣布李卜克内西、赫普納和我被控图謀叛国，此外还控訴李卜克内西有褒瀆皇帝罪。九月二十七日，法庭决定接受檢察官的建議。十一月十日，我們为这向德累斯頓上訴法庭所提出的撤消控訴被駁回了。

德累斯頓党代表大会

大会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举行。出席代表五十

六人，代表七十五个地区的六千二百二十个党员。我担任第一主席，白拉克担任第二主席。議程富有兴趣，討論得很热烈。在开幕詞中我滿意地說，在一个对社会民主党迫害最烈的邦的首都举行會議，对會議不会有損害。当时由伯恩施坦主編的《柏林人民报》对党特别仇視，它抱怨萊比錫的預审官沒有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即禁止我們（李卜克內西、赫普納和我）出席會議。約尔克作有关法定的标准工作日的报告。他的演讲很好，并提出一个要求法定标准工作日最多不能超过十小时的議案。我作关于邦議會选举和区选举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选举法的报告，白拉克作关于新的雇主責任法的报告。他建議一个決議案，国会如果以非常令人不滿的方式制定法律，就要受到譴責。莫斯特代替臨時不能出席的李卜克內西作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的报告。討論这个問題时，引起了激烈的爭吵。在場監視的警官以上級机关的名义要求我通知演讲人，他应避免任何牵扯到巴黎公社的东西。我拒絕了。这个偶然事件却为莫斯特帮了忙。他的講話固然短，但因而更为尖銳。他說，有人打算給他套上一个道德的口罩。全世界，甚至中国人也加以爭辯的事物，竟有人要禁止我們討論。加之由于我們的態度，我們不断成为最猛烈攻击和最卑鄙誣蔑的对象。在被各方面这样用粪土沾污我們、用石头打击我們之后，还要禁止我們解释我們的立場。（暴风雨般的掌声。）警官企图辯明，他的禁令只就談論巴黎公社而言。但是我們所关心之点，正是要說明我們对于巴黎公社的立場。

在莫斯特之后由我发言。我觉得，官厅干涉我們的討論并設法影响我們的討論的方式，是与一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相称的。（暴风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我不明白，对巴黎公社发表評論会是非法的。同时，一切与会者全知道，我們对公社抱什么态度。可惜我們在官厅的措施面前无能为力，我們只能对它抗議。

我提議，因為我們不值得在加到我們身上的限制之下進行討論，所以報告人不必講話，我們對當前的議案不加討論就付表決。時代的一個悲慘標志是，現在在有關公社的正式文件發表出來並且確定數月以來反對公社的言論是謊言、誹謗、胡說以後（暴風雨般的掌聲），仍要禁止我們宣布這種鬥爭方式的罪狀。

205

莫斯特聲明，因為時代已大有進展，他對於我的建議更加同意了。他認為，當他作如下聲明大家一定會同意他的，即：如果反動勢力在國際上聯合起來，那麼革命當然也必須在國際上聯合起來。（暴風雨般的掌聲。）他結尾說：

“請看從東方到西方，
火烙熊熊好明亮；
我們堅持忠誠、我們堅持不變，
因為我們旗幟是紅的！”

隨着他的演說響起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接着我把決議付表決，決議說：

“代表大會聲明，完全同意黨機關報《人民國家報》去年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代表大會特別贊成通過《人民國家報》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同國際工人協會保持精神上的聯繫。”

決議一致通過。代表大會然後討論黨的內部事件：臨時黨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報告，修改黨章的建議等等。關於《人民國家報》的報告是，它擁有四千零二十個訂戶並負有一千六百七十五塔勒的債務。這裡應該注意，在具有最好的黨組織的地區創設地方報紙必然是非常有礙於《人民國家報》的銷路的。根據這個觀點看來，報紙的情況是可喜的。亨利希·邵烏原住在斯圖加特，後來被驅逐出符騰堡邦，他嚴厲斥責我們符騰堡的黨員同志同人民黨眉來眼去，這是我黨在那裡國會選舉失敗的原因，並且總的來說，促進黨內的混亂。容斯多夫的黨員的一個建議被接受，建議說：“國會

205

选举时只支持本党的党员并酌量支持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然后根据麦茨諾和約瑟維茨的建議，以不辯論而在原位起立来表示对巴黎公社的承认。最后討論怎样能最有效地在乡村劳动者中間进行鼓动和組織的問題。根据我的建議，代表大会決議遵照薩克森只需有限保证即可設立的合作社条例在萊比錫設立一个印刷合作社。党常务委员会的地点是汉堡，監察委员会的地点是柏林，下次代表大会地点在美因茨。在向會議办公室和德累斯頓地方委员会致謝以后，这个以极滿意的方式进行的代表大会結束了。

在德累斯頓代表大会后不久，又在萊比錫、开姆尼茨等地举行第一次妇女大会，并在开姆尼茨成立第一个妇女組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會員也在柏林向同一方向进行。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會議

會議在一八七一年十月間召开。月底，在議程上列有一八七二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第一讀。当时的財政預算年度是由一月一日开始。議員拉斯克尔和李希特尔都比我先发言。我駁斥了他俩的言論。拉斯克尔議員有一次曾反对我說，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一定是反动的。可是这一点在德国即可证明，哪里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国会就軟弱无力。国会中的一切決議，凡是不合首相意思的，不管理由如何充足，都被丢到字紙簍里。李希特尔議員的要求自然也不例外，他要求法国一把最后五亿軍事賠款付清，就立刻取消盐稅。根据和約，这要两年才能实现。但在这期間，首相又要重新拖延談判，于是我們又面临一个新的战争（事实上我們在一八七五年就接近面临一个这样的战争）。盐稅并没有取消，不仅現在，而且在两年內都没有取消。所希望的減少軍事預算也未实现。拉斯克尔議員錯誤地斥責格萊尔議員，說他誤认为人民会相信帝国成

立后将減輕軍事負擔。这种信念确实存在，而它的代表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沒有这种信念。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所造成的階級对立日益加深，已足以阻碍常备军的縮减，关于这一点就是拉斯克尔議員的发言也是毫无疑問的。但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常备军总可以认为是现有秩序的支柱，則是錯誤的。法国也曾有一支大軍，但不能阻止巴黎公社的产生。此外，无产者增加得比常备军快得多，而且随着常备军的增加，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也就增加，因为工业的无产者在军队中的比数越来越大。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军队上，凡是为军队而提出的要求都同意。

十一月八日討論毕星的建議的第三讀，他要求在每个联邦国中必須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議會。这个提案在第二讀中通过了。我对此声明說，我今天要同保守党和中央党一起反对这提案，甘冒又被說是黑紅联盟的危險。以前我們曾表示反对联邦扩大权限，是希望在中、小邦中能活动得較為自由些。这是个錯誤，例如在薩克森，人們反对我們的作为是难以复加了。因此，如果首相想囊括所有的中、小各邦，我們也不反对，如果不是这样，以后我們还要对付其中一个邦。（笑声。）我所以反对这提案，是因为它内容空虛。什么叫做在每个联盟国中必須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議會？由什么选举？大概是普魯士的三級选举制吧？說現今各邦的議會是国民代表議會，就是欺騙。（大笑和巨大騷动。）有人說，首相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更加遵守宪法了。这是錯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政党更加順从了。（巨大騷动。）人們制定了一种不能更反动的帝国宪法。（大笑。）这是伪立宪主义，赤裸裸的独裁主义。議長辛森早已冒起火来，打断我的話并且威胁說，如果我仍这样讲下去，他就要求議院授权来阻止我繼續发言。（热烈的贊成。）根据会章，他对此是毫无权利的。因此，我抗議他的威胁，并繼續发言說，如果梅克林堡的宪法也是同样的坏……議長再

208

一次打断发言。他说他把言论自由的限制放宽了，但是像我这样的演说来反对我们生活所依据的宪法，则超越了一切限度。他又一次以禁止发言来威胁我。我重又抗议，并且引证说，反对派（辛森当时也在内）在普鲁士冲突时期的讲话要比我今天的尖锐得多。議長答复说，那时如何，与他无关，而今天准许讲什么，则由他决定。

我再次抗议。我接着描述伪立宪主义的欺骗性，这样一种宪法有什么价值？我不愿在许许多多抵不得书写用紙的价值的德国宪法以外再加上一个新宪法。

議長又激动起来。这种描述是否也指帝国宪法而言？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声明，我对帝国宪法诚然也是如此理解的。（巨大骚动。）于是議長請議會授权给他，来制止我发言。多数赞同了。

209

在我以后由国会的姆拉斯克尔議員发言。据他说，我们在国会中和在帝国中享有可想像的最大限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说，这一切我们还觉得不够，我们要想用粗野的暴力贯彻一切，而使自己超出法律之外。（我大声打断发言，議長警告我守秩序。）我只是不相信，人们养着四十万人的军队为的是反抗我的努力。公民们会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还说，公民们会用棍子打死我们的。后来他在速記本上把这句话划掉了。他又说，德国公民比法国公民还要勇敢得多，说我是一个幻想家，相信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会议结束时我作了个人讲话，指出，議長没有斥责那说我是个幻想家的侮辱。我相信，拉斯克尔議員比我更是幻想家。我也没有自夸，说德意志人民站在我们这方面。我知道，我们还是微小的少数，如果人民站在我们这边，拉斯克尔議員和他的朋友就不会坐在这会场里了。（大笑。）此外，拉斯克尔議員竟敢对我的党进行诬蔑。至于他关于公社所说的话，我下次再来批驳。維格尔斯議員也駁

斥我，說我在拒絕他們建議的發言中表示贊成梅克林堡的現狀。我回答說，那可能是個誤解，他並沒有聽到我贊成把梅克林堡並給普魯士，如果這樣，倒幫助了他和他的梅克林堡的同黨。（笑聲。）

次日在進入議程之前，我發言聲明。聲明說昨天議會應議長的要求，以秩序為借口阻止我發言。但是議會本身却因此極其嚴重地破壞了秩序。我根據議事規程的條文來證明這一點。議長只能在向我明顯地招呼兩次遵守秩序以後才能阻止我發言。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議長未經招呼遵守秩序就打斷我的發言。他必須清清楚楚對我說：我要您遵守秩序！因為議長沒有注意到現行規則，所以議會的決議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因而是無效的。 210

我的抗議使議長感到不安，他明明知道他和議會錯待了我。他現在把問題歸在一點，即在他喊遵守秩序時是否必須使用“我警告發言人遵守秩序”這個公式。他認為不必，如果我另有看法，他就要把這件事移交議事規程委員會。

于是我聲明，對於議長和議會的措施我必須保持我的意見。根本沒有喊守秩序，因為僅僅由議長打斷發言，決不能當作呼喊遵守秩序。他可以把問題移交議事規程委員會。辛森聲明準備這樣做。

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驚，幾乎全體新聞界都站在我這方面。議長和國會是錯待了我。國會神經不安，失去了判斷事實的能力，只要我一講話，一家自由主義報紙馬上予以發表。（愛北斐特報）在前幾天就寫道，德意志人民的代表團體儘管有一切優點，但也有缺點，即太不能容忍它血管里点滴異己的血液。人們應該用最嚴格的法律限制來阻止個別國會議員的叫器狂，但是不應絲毫超越法律所允許的範圍……但是在星期三，這個法律慣例毫無疑問被議長和議會自己破壞了，今天拉斯克爾也是錯誤的。

後來當十一月八日會議的速記報道提出的時候，我再次在進

入議程之前发言。按那次會議的速記报道，拉斯克尔議員想要說，公正和有产的公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們（我們）打倒。這句話是捏造的；他原來說的是，用棍子把他們打死。他（拉斯克尔）固然是謹防不要帶一根棍子來領導公正的公民，但是就他來說，他的話正是有趣的很，他當着我總是，而且在上述會議上又是裝作禮貌和道德的代表，而且以文明的名義來說話反對我。因為副議長霍亨魯恩-謝林侯爵（後來的首相）打斷我的話，不許我繼續講下去，我又同他衝突起來。

隨後拉斯克尔发言，以充滿義憤的演說把我形容成萬惡之首，但附加說，他原想使他的話語緩和。我回答說，問題並不在於他（拉斯克尔）要想說什麼，而在於他說過了什麼，這無論如何必須記入速記报道中。然後我轉過來反對他又談到公社的話。我為公社辯護，並且指出，現在自由主義的報界本身也不得不把以前歸罪於公社的一系列所謂惡行，加以更正。議會又激動起來，有人打斷我的发言，並且用最強烈的詞句辱罵我，而議長却連一個字的譴責也沒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這個偉大的日子是要解決議長和我之間所爭執的問題的一天。議事規程委員會很輕易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議長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是，他在喊遵守秩序時是否必須說：“我警告發言人遵守秩序。”議長原想也使我上這個公式的圈套，他要我在他所提的建議上簽署。我拒絕署名。這種問題提法是完全錯誤的，委員會的回答也同樣不對，因為議長本來不必一定按上述格式來叫發言人遵守秩序。進步黨黨員克勞茨（柏林）是委員會的報告人。中央黨議員格萊爾（巴登）首先发言反對委員會那種根本錯誤的態度，並且站在我這方面。繼他之後是薩克森的總檢察官馮·施瓦采博士為委員會的決議作辯護。隨後我发言。我毫不留情地批評了委員會的決議。我原沒有主張議長在任何情況下必須用

“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这句话来喊守秩序。他也可以說：“我不得不警告某某議員遵守秩序！”并且还有許多这类的形式。决定性的是使发言人和議會知道，发出了遵守秩序的呼喊。对我却没有这样做。接着我引证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辛森的讲詞。他当时說，言論自由会被濫用而且常被濫用，我們中間能够免于这种指責的大概还不多——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尼布尔不是說过，凡是不能濫加利用的东西，就是沒用的东西这句真理嗎？辛森在那个演讲中也控訴政府說，政府对一切稍像自由的东西完全不能容忍；有自由的报界，它就不能統治；不能操纵法院的組織，它就不能統治，从而損害司法在国内的威信；不能左右选举，它就不能統治，而选举结果却会与人民的信仰相反；它不能用自由的地方自治来統治；最后，它也不能同一个以第八十四条实行言論自由的議會来統治！

212

我質問，議長如何能使他对我的态度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他的演說相协调。俾斯麦有一次曾說过：“必須通过議會制度来弄死議會制度。”議會以它对我的态度很好地证实了这句话。继我之后是外交家温德荷斯特发言，他說的还是他那出名的在鸡蛋中間跳舞的一套。議事規程据說是不够清楚的；最后他提議把該案交还委员会把有关的条文加以修訂。他結尾說：“我既不贊成也不反对辛孙，也不贊成或反对倍倍尔。”还有进步党的发言人霍維尔貝克男爵和弗兰茨·邓克尔也是不热不冷的。董克尔贊成温德荷斯特的建議，霍維尔貝克則相反；他认为除了擲石块打我以外，别无更好办法。温德荷斯特的建議最后通过了。老齐格勒对于国会特别是对于他的党所演的这一幕戏非常愤怒。決議刚一通过，齐格勒就气得发抖地走向我的座位来，說道：“您听着，倍倍尔，我們全都是混……，您如果取得大权，您就把我們全吊死在街灯架上！”我带笑答应說，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奉行他的亲切的建議。辛孙认

213

为議会的这次決議等于投不信任票。他辞职，自然又当选了。

这个事件以及我在最近三次會議中的态度使我在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階級中的声望大增。当时还有拥护民主的资产階級分子。例如在柏林就有相当多的以約翰·雅可比为理想的富裕资产者同情我們。他們团结在基多·威斯的周围。威五是主要由他领导的《未来》报的主編。这个报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大报，一八六七年由豪富的雅可比派（这是我們对雅可比的特別信徒的称呼）創办的，但因費用过大，不得不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停刊。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大洗染厂的創始人 W. 斯宾德勒的儿子威廉·斯宾德勒、范·德·賴頓、G. 弗里特兰德博士、毛尔頓·萊維、迈尔施太因博士、包斯、斯台法尼博士（后来充当《福斯报》主編）等。还有我通过罗伯特·施維舍尔認識的当时还很年輕的弗兰茨·梅林，也属于这班人。李卜克內西和我星期天如果住在柏林，就照例在一家酒店里会到許多上述的人們，其中也常見的有保尔·辛格尔。大家彼此默契地喝所謂廉徹的一种廉价摩塞耳酒，每杯五十分尼。随后也常到啤酒店去。我的酒量始終是最小的，但是施維舍尔、李卜克內西、基多·威五、梅林都是海量。我們曾有好多次喝到太阳已在天上大放光明才回家去。

我的威望的一个后果是使我受到敬重和招待，常常被邀請到熟人家中进盛大的午餐或晚餐。但是我不甚喜好这种宴会，总是尽可能避开。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写信給我妻說：

“我把今天这个星期日所有的邀請都謝絕了，我向各方声明，我已有約在先，但这不是实話。人能有几小时再做一个自在的人，就是快乐的了……此外，我希望能够早日离开此地，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十分厌倦，我渴念着你們和我的家庭……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吃喝，那我在这里必是很幸福的了，但我并不幸福。”——

国会中的事件在新聞界掀起了更长时间的浪潮。《奥格斯堡总

汇报》发表了一篇会议概述，其中谈到我对毕星建议的立场，非常善意地说道：

“倍倍尔又一次证明了他那辉煌的演说天才，从而证明了他是个完人。因为知道的人还不多，所以值得特别提出，这个莱比锡的年轻的施工师傅，虽则他是完全孤立的，而且他那偏激的见解受到差不多一致的指责和惋惜，却在国会中赢得了完全特殊的地位，并且在多数派中，特别在极端保守派中间赢得尊敬的赞扬，他并且利用在柏林的余暇在一个同行的手艺人那里工作，借以维持家庭生计，因而声誉更高，拉斯克尔部分无理的攻击，不能加以损害。倍倍尔同时是一个天缘凑巧的实例。如果他在童年不是过于孱弱，那末，他这个普鲁士下士的儿子一定会在军事孤儿院中教养成人，而且可以预料，现在已成为严守纪律的卫士长了。但是他那时在维茨拉受到温克勒慈善机关的教养，而且他那固有的天资和自己的勤奋，使他成为一个人数虽少而不无危险性的人民党的领袖和德意志议会中卓越的演说家。”

报道人说我在柏林的一个同行的手艺人那里为我的家庭生计而工作，这自然是一个传说。这毕竟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传说开了例；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书中又看到了这个传说。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后来还得到类似的证据。

这个时期党内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愿望的。已经大力开始对党进行的迫害，无损于党而且对它有益。每当一个人在斗争中被摧残，就另有三个来补他的缺。有一件事可算得那时的奇事，莱比锡的市政府驱逐莫斯特出境，因为理由不充足，莱比锡警察局把驱逐令撤销。我在柏林期间所召开的各次集会上，照例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来围攻我，这对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

們之間的关系，尽管施韦泽辞去主席职务而由哈森克莱维尔继任，也并未改善。尤其哈森克莱维尔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出了一种极其粗暴的声调。十一月間，当我在制革工人罢工协会发表演说时（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伊格纳茨·奥艾尔），有整整一队发言人在哈赛尔曼领导下和我对抗，想在道德方面把我打垮。这个尝试给他们造成恶果。会议结束后，当我同我的许多敌人在私人谈话中责备他们的阴险斗争方式的时候，其中二人，齐娄夫斯基和菲茵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您必須同我們斗争，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统一了，政府明天就会用所有的权力来加以干涉，而把党镇压下去！这两个是预知凶兆的人，因为后来统一实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就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哈森克莱维尔初任主席时也喜欢施韦泽的作风。因此，他在阿尔托那也乘坐两匹白馬駕着的大馬車游行。但是他不久就感到，他不是施韦泽，不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十二月間，警察局长吕得尔借口莱比錫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违背联合禁令而予以解散。在其他地方也有仿效这个禁令的。这时我們紐伦堡的党员同志在安敦·梅明格的领导下发出援助那住在紐伦堡附近、生活极为困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号召。由于地方上的争端他住在紐伦堡不可能了，梅明格后来就完全右倾了；他成为巴伐利亚农民同盟的领袖和农民同盟在新聞界及巴伐利亚邦議會中最狂热和最干练的代表之一。——

薩克森警察和法院的迫害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空前加剧，却在党内引起极好的情绪。一八七二年一月九日，我們在开姆尼茨举行全邦集会，出席代表一百二十人。全邦的每个区域都有代表参加。我担任主席，莫斯特任秘书。決議是，力求彻底改革結社和集会法律；应为邦議會选举和区选举要求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記名选举权；贫民救济应由国家法令来规定，其費用通过累进的

所得税来筹措。向受处分的协会和职工会建議，把申訴一直进行到最后的法院，如果这样沒有效果，就成立地方协会。此外，要求撤銷差役制度，并建議那些已經失去宗教信仰的党员同志退出地方教会。——

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瓦尔希被关入胡伯图斯堡的要塞监禁；以后卡尔·希尔施也被监禁了。同时，其他監獄却也住滿了被判罪的社会民主党人。个别同志还遭到极重的獄刑。

萊比錫叛國案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柏林王宮的所謂白厅举行的第一届德意志国会的開幕典礼上，俾斯麦侯爵走向馮·施瓦采議員說道：“現在，檢察長先生，控訴倍倍尔及其伙伴的案子怎么样了？”对方聳一聳肩回答說：“什么也沒有！”于是俾斯麦不高興地說：“那么就不該把这些人关起来；現在訴訟的仇恨要落在我們身上了。”薩克森財政部長馮·弗里森剛听了俾斯麦同施瓦采的談話，就走向萊比錫地方代表——議員比恩包姆教授說道：“这里我們的施瓦采做了一件大蠢事！”

不过馮·施瓦采先生並沒有做蠢事，他只是以法学家身份，对案件內容詳細了解以后說了所必須說的話。施瓦采同审問我們的法官一样，认为无法判罪，而俾斯麦完全忘記了，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逮捕我們，并不是因为有了据說我們图謀叛国的任何证据，而是因为想利用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查到我們的信件这一事实而把我們关进牢里。甚至有人告訴我們說，俾斯麦亲自在总司令部发出逮捕我們的指示。

萊比錫刑事陪審法庭被指定在春季开庭期間給我們判決。审讯于三月十一日(星期一)开始。萊比錫群情非常激昂。官方人士估計会发生暴动。因此我們在三月六日和九日的《人民国家报》的

报头上发表下列的要求：

“同志们！

你们知道，由三月十一日（星期一）起，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对我们进行叛国案审讯。你们之中大概有许多人要想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向你们恳切要求，既不要表示拥护，也不要表示反对来打断审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保持安静。我们的敌人可能用恶毒的挑衅文字或者通过雇佣的代理人设法来刺激你们，你们要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来的清算是免不了的。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

莱比锡，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这个劝告并不多余。因为害怕对我们的判决会失败，所以布罗克好斯的《德意志总汇报》、《莱比锡日报》和由汉斯·布鲁姆博士所编的《边境使者》报把送给陪审员煽动性文章而使他们反对我们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还亲自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影响他们。

218 我不想叙述这个案件的十四天审讯过程的详细情节。控诉的材料包括我们在协会、集会中的全部鼓动活动、文章和小册子以及在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没收的一批信件。此外，凡是过去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等著作，即使我们对它的出版和推销毫无关系，例如《共产党宣言》，几乎也全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还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尔·汉森的一本名为《一个欧洲士兵写给他的伙伴》的小册子，虽然我们在审讯前丝毫不知有这本小册子，却也算作起
诉材料。这小册子在党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了一本。因此，起
诉材料在数量方面应有尽有，但在质量方面，像我们在审讯期间所一再提出的，却是越来越糟了。

我们在国会中的发言，根据宪法是不能提起控诉的，但是莱比锡自由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其中最尖锐的辞句向陪审员报道。

檢察官把曾參與一八七〇年我在孚格特蘭的普勞恩城舉行的反對麥克斯·希爾施博士的兩次集會的人請了一批前來作訴訟的證人。那些演講的內容（當時因德意志刑法典生效而未能據以起訴）和李卜克內西的演說《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地位》（他因為這個演說在一八六九年在柏林被缺席判決幾個月的監禁），現在都被利用作叛國案的材料。起訴證人是曾出席監視我那兩次集會的普勞恩的憲兵隊長，此外還有其中一次會議的主席奇爾巴赫律師、一個編輯、一個首席教師和會議召集人。作為無罪證人，我們把白拉克和斯皮爾請來，他們後來一直參與這案件的審訊直到最後一場。

刑事陪審法庭庭長是馮·穆凱先生，包岑地方法院的院長。馮·穆凱先生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①，是一個魁梧的漢子，雙手像屠夫，前額很低，使人驚異地問，腦子在這個頭顱的何處。顯然，司法部長阿伯肯是在薩克森法院院長中選擇了一個智力最差的人充當刑事陪審法庭庭長。如果人們要能在一個政治案件中無論如何硬要判罪的話，那麼就應該選擇一個昧良心的野心家（這樣的人當時在薩克森好像還沒有）或者一個容易驅使的蠢材來充當這種訴訟的領導人。馮·穆凱先生絕不能勝任，他既不能掌握極其廣泛的文件材料，也沒有一個作這種審訊領導人所首先應有的公正和冷靜。而且直到那時，他對社會主義顯然還是一竅不通。常使人大笑而使他人徹底丟臉的是，當他不能了解我們講話的意義和影響而大發脾氣時，於是想扮演他毫無能力也無理由扮演的駁斥我們的角色。他可謂頭腦簡單到一無所知了。

律師奧托·夫頓塔格和伯恩哈特·夫頓塔格充當我們的辯護人，他們辯護得非常出色。他倆反復縱橫地盤問，使這常常不懂這些問話或者不知道它們的影響的庭長狼狽不堪。

^① Mücke, 是蚊子的意思。——譯者

陪審員中有六個商人，其中三個是由萊比錫來的，一個騎士地主，一個林務官和幾個地主。這次審訊在萊比錫是一件震動一時的大事。日復一日，寬敞的審訊廳里擠滿了各階層的旁聽者。司法部長和檢察長也出席了許多次。並且因為德國所有的較大報紙都有詳細的報道，它們的讀者現在第一次聽到什麼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追求什麼（就報紙可能報道的範圍來說），所以審訊發生了很好的鼓動作用。我們自然也通過我們的態度來照顧這一點，特別是原為本案領袖的李卜克內西。各式各樣的小活劇也不缺乏。比如當庭長因為拙笨的發問和言論而被李卜克內西所窘的時候，或他問我對於《共產黨宣言》起過什麼作用，我回答說：宣言出版的時候我還不到八歲；又如赫普納一再回答說，當這個或那個文件出版時，他根本還未出生。每當這種情況發生，就成了小活劇。

220 我們的敵人天天到飯館里尋訪每晚在那里聚會的陪審員，企圖影響他們。他們就把當天的經過談一談，並企圖適當地加以利用。例如有一天晚上，一個上訴法院法官穆勒說：“您們想想，我的先生們，昨夜我夢見倍倍爾被釋放了，我因而大為生氣。”他好像認為，人們只想把李卜克內西判罪就完了。至於個別陪審員的品質如何，也可由下述一事來說明：有一天我們的一個律師在街上遇到一個陪審員，問他對於所提出的文件的內容能否有個明確的觀念？這個陪審員回答說：“律師先生，坦白地說，我若不時時使用鼻煙，我就要睡着了。”最後我們以八票對四票被判有罪，為了判罪，法律上要求七票以上，就是這位先生的一票造成了有罪。

開審的第十三天，把問題向陪審員解釋明白以後，在旁聽者十分擁擠的情形下開始辯論。公訴人在結束他的發言時說道：“如果您不把這兩個被告判罪（他沒有提到赫普納，他放棄了他），那您就是永久批准了背叛國家！”



奥托·夫賴塔格律師首先答辯，他開始先聲明說，雖然在檢察官的公訴發言和他的講話之間有三刻鐘的休息時間，公訴人申述理由時引起的他的驚訝尚未平息。他在數小時的出色發言中徹底粉碎了起訴的理由以後，建議釋放我們。次日早晨，伯恩哈特·夫賴塔格律師發言。他在雄辯和法學方面的才幹并不下於他的哥哥。大約講了三小時以後，在結束時向陪審員說道：“如果您們肯定這個問題，那就是在薩克森創造和批准一個非法的局面。”為了這句話，他同庭長發生激烈爭辯。庭長斥責了這句話。

在檢察官的結束發言以後，奧托·夫賴塔格再度發言，與此相反，他的弟弟聲明，因為檢察官沒有答復他所提出的檢察官控告我們的“一定企圖”究竟何在這個問題，他在一種奇怪的紀律統治着這個大廳的情況下，放棄繼續辯論。我們贊成他這個聲明。因此，審訊較預定日期提前一天結束。當庭長宣讀陪審員的“法律訓詞”時，他同我們的辯護人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的辯護人認為“法律訓詞”是由錯誤的假設出發的，不能生效。他倆事先即已通知撤消辯訴。

221

經過兩小時半以上的討論後，陪審員宣布，他們認為李卜克內西和我犯了圖謀叛國罪，赫普納釋放。檢察官認為圖謀行為離開成為事實還遠，所以建議判我們兩年徒刑的最高處罰，對赫普納建議釋放。法院即根據這個建議判決，并把李卜克內西和我在偵查期間的禁閉折算為兩個月。

我們的黨員同志對於這個判決極為憤怒。我強顏為歡，在審訊結束後同辯護人和同案被告人說，“你們知道什麼，我們不管判決如何，今天晚上要往奧爾巴赫酒店（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酒店一場而出名）去喝瓶葡萄酒。”奧托·夫賴塔格說：“我們就這樣辦”，“而且由我們（他和他的弟弟）來會賬。”

我們的妻以大聲哭泣來迎接我們，她們對於這個建議自然是

难以同意。认为做这类事是无聊行为，我们会成为可怕的人物。但是她们是英勇的，并且最后同我们一同前往。还有白拉克同他年轻可爱的妻子（她是陪他一同到莱比锡来的）和斯皮尔都参加了这酒会。在判决以前我们的家庭特约医师还用颇为别致的方法来安慰我妻。“倍倍尔夫人”，他同她说，“如果您的丈夫被判一年徒刑，那您还应该高兴，因为他是迫切需要静养的。”

三月二十七日，即我们接到法院判决书的那天，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谈话（给党员同志），我们要求他们对事业要勇敢，尤其要设法传播现有五千五百订户的《人民国家报》。同一天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还发表了第二篇声明：《关于我们的判决》，其中说道：

222 “陪审员先生的裁判是不对的。我们所想望的和已经做的事情，我们都毫不隐瞒地承认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做刑法法典上所谓的叛国行为。如果说我们有罪，则一切在野政党都是有罪的。判决我们为有罪，就是排斥言论自由。

由于你们的裁判，我的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批准了吕森的暴行，并发给反动派一张空白的特许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个人是无要紧要的。这场官司在传播我们的原则上起了这样莫大的作用，我们甘愿领受（判决一旦生效）判处我们的两年监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超过刑事陪审法庭的权限。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但是你们，我的陪审员先生们，由于你们的裁判，也许宣布了现今刑事陪审法庭制度的死刑，这个单独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制度，无非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

全部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左派的报纸——在当时它还有作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只有《柏林国民报》除外。该报断定说：刑事陪审法庭是人民之声。人民之声是上帝之声，因此……。前任上诉法院院长台麦（他是这个普鲁士法官界中最正直的人士之一，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成为反动派的牺牲品) 为了我們的判決也在一家維也納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尖銳的文章。我榮幸地于一八八二年他逝世前不久, 在他退休後所居的蘇黎世認識了他; 他是一個特別富於同情心的人物。

馮·穆凱先生和檢察官霍夫曼因為他們的救國行動而榮獲獎章。至於檢察長馮·施瓦采則因在起訴時協助有功, 早已獲獎。四月二日, 約翰·雅可比聲明參加社會民主工黨, 作為對判決的答復。柏林民主協會——不要同民主工人協會混淆了——以大多數贊成愛森納赫綱領, 就此點而言, 它贊同雅可比這一行動。

我們的黨員同志在黨報上和許多次的民眾集會上提出反對這個判決的尖銳抗議, 結果自然又是不少人被判罪。

訴訟結束後不久, 我患了非常疼痛的肋膜炎, 好幾個星期躺在 223
床上。鼓動、國會活動、待審拘押和訴訟, 再加上要求我發揮極大力量並迫使我把我的小企業加以擴充的營業上的緊張活動, 都傷害了我的神經。我除了劇烈的疼痛外, 還患嚴重失眠症。在我輾轉床上不能入睡的許多夜里, 我常常想到俾斯麥, 據當時報紙的報道, 他也正患失眠症和神經痛, 就此點而言, 我們是同仇患者。既有同病人, 痛苦就減輕了一半。

德意志國會的第一屆第三次會議

一八七二年四月底, 國會又開會了。我病剛好就往柏林, 並在五月一日發言討論霍維爾貝克及其伙伴取消鹽稅的建議。我在發言中反對一切加於生活必需品上的間接稅。資產階級為了它的階級利益設法維持這種稅務制度並繼續加以擴充; 他們尽可能逃避對國家的負擔, 却使直接稅成為政治權利的尺度。議會是否相信, 這種情況會導致不同階級的和解? 適得其反; 資產階級也不必驚奇, 如果我們說退爾關於葛思勒所說的話: “同老天爺算賬去吧, 州

官，你必得滾，你的时辰已經到了。”（暴风雨般的笑声。）欧仁·李希特尔声明，他不願答复我，这就是說，不願給我个人和我的主义本来沒有的重要性。在这点上，我在私人談話中駁斥李希特尔說，他这鄙視我的說法只是遮盖他缺乏反駁我的理由罢了。李希特尔回答說，他完全沒有把我当作不值得答复那样的不重要，不过他至少当时沒有把我当作像首相那样的重要（大笑），所以他沒有时间来答复我。——

224

一八七二年“文化斗爭”趋于頂点，“文化斗爭”是俾斯麦在內政上最大的失策，它使德國內政向极为有害的方向发展。俾斯麦向国会提出驅逐耶穌会士出境的法令，因此掀起了激烈的斗爭。在六月十九日第三讀时，我发言說，英国文化史家柏克尔根据宗教爭論在一个民族中的重要性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們德国的文化程度是低的。很久以来，任何問題都沒有像宗教問題引起这样多的注意。当然，宗教的理解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着內在的联系。中央党在議會中所以强大，并不只是由于它的宗教观念，而特别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天主教民众中的經濟落后阶层特别喜欢加入中央党，其他资本家阶层则喜欢加入自由党。耶穌教是简单、朴实、平常、有些不拘形迹的宗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宗教。这整个斗爭，凡是涉及宗教問題的，只是一个假斗爭，实际上意味着爭国家統治权的斗爭。如果自由资产阶级誠意地要求进步，它就必须与教会决裂，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没有宗教的。宗教对他们來說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支持他們所行使的权力和在工人中培养馴順的剝削对象。

有人說，耶穌会同天主教毫无关系。这是不对的。耶穌会是天主教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中央党說，对耶穌会的斗爭就是对天主教的斗爭，只就这点來說，它是对的。該案的辯护人主张，他們想通

过該案建立和平；但是适得其反；他們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有人还说，关于永无謬誤的教条是对国家有危险的。这一点我不能了解。一切教条最后都是同科学和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由这个观点来看，同样是对国家有危险的。（大笑。）一种教条越是荒誕（教皇的永无謬誤的教条就是如此），就越遭到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也有人主张，耶稣会是不道德的。可是国家从来就毫不过問道德的事，而且首相也是最不会关心这事的人。首相所以生气，是因为人們沒有把他的政策看成永无謬誤的。（大笑。）如果耶稣会士和中央党的先生們乐意声明支持他的政策，那么他們就可以在教会方面暢所欲言了。（很对。）而且耶稣会越反动，首相就越喜欢它。他只是想把山南党变成他的工具。人們敢于把这样一个法律草案向国会提出，那就是蔑視国会的表现。（騷动。）自由派只是想通过对耶稣会的斗争来恢复他們由于牺牲一切人民权利而丧失的在人民中的信用。用特別法令同耶稣会作斗争，結果只会使它的信徒較以往增多起来。人民群眾同情受迫害的人。公布一紙法令，要把一个人弄得无家可归，像一只野兽似的从一个地方驅逐到另一个地方，那是行不通的。在德国我引作例证的压制法令已經足够；我們用不着再添新的了。是誰把耶稣会扶植起来的？国家。如果把每年用在杀人工具上的多少亿万用之于人民的教育上，这方法要比一切非常法令更能損害耶稣会。人們建立一个現代水平的教育制度，把国家与教会分开，把教会势力排出学校，不要十年，僧侶的煽动就会完結。于是这些先生們就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在教堂中讲道，而不再有人出席。（大笑。）但是人們却不願这样做，他們大家都需要权威，而教会則是这权威的主要支柱。人們知道，天上的权威一停止，人間的权威也就垮台了。人們害怕，这样一来，共和政体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在社会方面，无神論在宗教方面就要得势了。我反对这法令，但是必須駁斥那說山南主义

226 和社会主义是同盟者的主张，认为它是无耻的誹謗。如果我们执政，则对山南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不妙。（骚动。）

在辯論过程中后来担任国会議長的巴萊斯特伦伯爵也讲了話。談到我的講話时，他认为，我的发言指出了，人們如果通过法律草案就会走向哪里去。人民既失去了对天上的天堂的信仰，就要要求地上的天堂，而这个天堂是国际所允諾給他們的。我強調這句話，用力高喊“很对”。

此后不久，在国会中傳說着一个有趣的事。中央党的几位先生在一家飯館談論着教会学者多灵格和教皇永无謬誤的新教条。多灵格是激烈反对永无謬誤的宣言的。因此，一位教会的先生——慕尼黑的議員說道：“这个老蠢物既相信那么多荒謬的东西，他何妨也相信这个。”這句話在国会里尽人皆知，传为笑柄。

我的瀆君案

公訴处决定把李卜克内西的瀆君公訴与图謀叛国的公訴分开处理，并移交莱比錫地方法院。四月初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被释放。一八七二年五月底，德累斯顿上诉法庭駁斥了我們的撤消辯訴的申請，于是刑事陪審法庭的判決发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六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入胡伯图斯堡監獄。我在国会閉幕后也还有一个控訴案要了結。我同样因为在莱比錫区的两次民众大会上的講話而被控犯了瀆君罪。我曾結合着普魯士国王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感謝书的結束語，“我希望战争的結局将是德国的自由和統一”，作了各式各样的批評。我曾說，我們固然取得了統一，但是自由却落空了；而且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坏，这我用事实为证。这正是照例发生的事情。国王們在危难的时候，不免作各种漂亮的諾言，可是等到人民牺牲了自己，救了国王，諾言就被忘記，不予兌現。檢察署认为這些話里有瀆君之处，法院在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进行审

訊，审讯时由我自己辩护。检察官建议在我已被判的要塞监禁上增加刑期。法庭却不顾这建议，判我九个月监禁。因为这是一种与已判给我的处罚不同的处罚，所以附加刑被拒绝了；否则，如果这是九个月监禁，加上已宣判的要塞禁闭大约就有二十八个月了。此外，在第二点上，法院也不顾检察官的建议，剥夺了我的国会委任。

这一项决定是法院方面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因为它既不能褫夺我的被选举权，同时我的党内同志，又会推举我为以往选区的候选人，并且我一定当选，法院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判决为无效。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我的重行当选对于法院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后话。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胡伯图斯堡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白拉克写给我一封告别的信，他在信里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家庭，我几乎要庆祝我们敌人的拙笨！比如说，你可以休养身体并多多学习，于是你就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了，并且最后，你亲爱的妻子虽倍尝离别的辛酸，你如果能这样经过一个使你一生又强健起来的疗养时期，她也将感到满意。”七月八日，即我入狱之日，我发表了下列声明：

228

“给我的萨克森第十七选区的选民！”

朋友们和同志们！承莱比锡王国地方法院的厚意，以‘渎君罪’除判我九个月徒刑外，还‘剥夺我所充任的公职以及由选举而产生的各种权利’。

通过这个判决我丧失了你们付与我的委托。

朋友们和同志们！这个打击不仅是对我的打击，它也是对一

209

向我所代表的你們的打击。它也打击了我們所隶属的党。我們要表明，它所做的打击是徒然的。你們面临采取重新选举这一着。我向你們請求在重选中再做候选人。如果按照你們的意思我没有辜負所賦与我的信任，那就再选举我。

我向你們保证，所受的‘刑罰’不能使我軟化。要塞和监狱这些办法不能使我对于腐敗的社会情况发生較好的观念。倚靠这种办法来施教的社会，就应当消灭。

因此，我們要用一切我們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一切坚韧性来繼續作战；請通过新选举把工具递在我手里，使我在以后几年还能参与这一斗争。我們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告辞了！在新的斗争和胜利时刻再见！”

当天下午，我前往胡伯图斯堡。在車站上有一大批男人女人给我送行。我妻应我的請求同我們的小女孩留在家里。我所帶的行李中有一个大鳥籠盛着一只美丽的雄金絲雀，是一位德累斯頓的朋友送来做我在獄中的伴侣的。我后来为它找到个配偶，我在胡伯图斯堡的獄中养育它，它后来繁殖了成群的子孙。在我須換車去胡伯图斯堡的达兰車站，人們为我举行一个别致的欢迎会。当我走出車厢时，所有的車务員排成一长队站在列車前面，把手放在帽緣上表示致敬。火車头司机揮舞帽子，大部分乘客也在車窗上揮舞礼帽和便帽向我告别。这种同情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

229

我到胡伯图斯堡后会到李卜克内西，他笑我还是招致了九个月监禁。在这里他却是聪明些。他笑得好。他后来却因为由胡伯图斯堡秘密写給《人民国家报》的一篇文章，而給負責編輯人招来了远远超过九个月的徒刑。他自以为多么小心呀！当他起草一篇文章而在措辞上有所怀疑时，他就找我商量。他把有关的章句念给我听。如果我覺得文章中有值得考虑的地方提出警告时，他就設法证明那些章句为什么是不危险的。他照例得到我这样的回

答：“檢察官和法官如果也照你這樣想法，那你就是正確的。”於是他咬着指甲再思索新的字句。但是新的辭句時常較原來的更為尖銳。他很不願意割舍一個在發表後會使敵人發怒的思想。

在要塞監禁中除李卜克內西外，還有卡爾·希爾施和一位開姆尼茨的黨員同志。瓦爾特希的刑期已滿，法院卻正注意延緩。我們同伴多半是五、六個人，有時也有個別因為決鬥事件而被短期拘押的大學生。到我的刑期滿時，我成為寄居在胡伯圖斯堡的最後一人了。

我們覺得奇怪的是，我們必須到胡伯圖斯堡去服刑而不到薩克森的要塞哥尼斯坦因去。原因是哥尼斯坦因沒有收容平民犯人的房間，這種房間尚有待於設置。

胡伯圖斯堡是因為一七六三年在這裡締結結束七年戰爭的和約而遠近馳名。城堡是一座辯式藝術的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它的前面有一個寬大的院子，周圍是一些二、三層的樓房，往昔充作內廷官吏和僕從住宿之用。當時在那裡住並在那裡辦公的是集合在胡伯圖斯堡的各機關職員們。這座建築有些部分曾長期作地方監獄之用。這個建築的耳房設有七、八個囚舍，是留給我們這些要塞犯人的。與胡伯圖斯堡相連的有一個婦女病院和一個婦女精神病院，還有一個盲童和痴童教養院。裡面住的人，我們是看不到的。我們囚舍的窗子很高，還裝有鐵柵。隔窗可以看到我們散步所在的大菜園，牆外是森林、原野和遠處的摩次申小鎮。

230

我們囚舍的清潔由一個所謂工役來管理。為了囚舍的清潔和租費（連監獄房屋國家也不免費供給），我們每月付費五塔勒。我們的膳食取自與胡伯圖斯堡相鄰的維姆斯多夫的一個飯館。我們的生活日程如下：早晨七時必須穿好衣服，然後打開囚舍門以備打掃清潔。乘這時間我們在囚舍前面的寬闊走廊上用早餐。卡爾·希爾施利用這個空閑同一個民事犯人下棋，他倆照例爭吵不休，使

我們非常好笑。八时到十时我們又被关起来，十时后我們在园内散步。十二时起，在冬天关到三时，夏天关到四时，而后是第二次散步，自五时起或六时起又关到次日早晨。因为我們有权利在晚上点灯到十时，于是这几个钟头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時間。几个月后，我請求在上午八时到十时把李卜克内西也关在我的囚舍內，教授我英文和法文，得到許可。借这机会，我們也得以討論党内事务和政治事件。关于营业通訊，我根据我妻每天寄来的資料来处理。

231 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是很爱喝茶的人。可是我們得不到茶，因为防止火灾，也禁止私自燒茶。但是禁令的存在，就是要供人破坏的。因此，我秘密弄到一个燒茶器和所必需的配料。一到晚上看守人关闭囚舍走了以后，我就开始烹茶。为了使李卜克内西也能同享，我在园内截了一根长约二米的竿子。一端用一根小绳系上由我編織的小网，里面可以放一只盛滿茶的玻璃杯。茶烹好后，敲敲在我隔壁的李卜克内西的墙，于是他走到窗子那里。然后我把一杯茶用竿子伸出窗外，再轉向李卜克内西的窗子，他一接到杯子就說声：“得到了，謝謝！”来告知收到。我們每人都急欲閱讀的報紙，也用类似的方法来交換。我們在囚舍窗子的铁欄上橫穿一根繩子，把两头接連起来，誰把報紙看完了，就用一个鈎子把報紙牢挂在绳上，敲邻居的墙，于是邻居到窗子那里把報紙拉过去。

我刚把囚舍整顿出个家庭模样，就像一把怀中小刀似地直不起腰来了。近几年来过于努力和兴奋的生活，使我不觉得我的体力如何大为衰退。现在我被迫休息，紧张漸減，就不能支持了。身体非常疲憊，我好多天不能从事严重的工作。但是絕對休息和新鲜空气又漸漸使我振作起来。我的家庭医师曾安慰我妻說，一年禁閉对于我的健康是有益的，他这话很有道理。后来医师給我仔細检查身体时，也发现我的左肺叶患严重的結核病，并查出一个小空洞是在要塞里痊愈的。朋友們知道这情形后，开玩笑說，我应该威

謝國家把我送進監獄。我回答說，國家如果是為了我的健康而判我徒刑，那我就應該感謝。我一生常常走好運，這一次又是這樣。一件可能使我滅亡的事卻發生良好的結果。

在我確定無疑地要喪失自由三十一個月以後，我就決定利用這個時間竭盡全力來稍微彌補我在知識上的缺陷。因此，我一般能恢復工作，就用全副精力投入工作，這是渡過逆境的最好方法。我主要是學習國民經濟學和歷史。我又學習一遍當時只出了第一卷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拉薩爾的《既得權利體系》、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杜林和卡萊的著作、拉維萊的《原始財產》、羅倫茲·斯坦因的《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史》、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馮·屠讞的《孤立的國家》。在我所讀的歷史書中間，柏克爾的《英國文化史》和威廉·齊美爾曼的《德國農民戰爭史》特別吸引了我。齊美爾曼的書鼓舞我寫了一篇通俗性的論文，題目是《論德國農民戰爭，着重中世紀主要社會運動》。這本書由威·白拉克在不倫瑞克出版；後來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之下，禁止發行。第二版需要修訂，我因為無暇及此，沒有再版。我也沒有忽略自然科學。我閱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海克爾的《自然創造史》、路·畢希納的《力量與物質》和《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李比希的《化學書簡》等等。我還用一部分時間來閱讀古典著作。我患有真正的學習迷和工作迷。

此外，我在服刑期間翻譯了伊維·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羅瓦的《基督教社會教義的研究》，這譯本現今仍以《基督教真相》的書名在出版。我為此還作了一篇反駁文章，命名：《伊維·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羅瓦的〈基督教真相〉批判，附錄：婦女現在和將來的地位》。附錄的文章，我相信是黨員同志以社會主義立場論婦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來自我對於法國社會主義

和共产主义空想家的研究。我这次在监禁里也写出我的《妇女》一书的初稿，这书到一八七九年才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推銷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一九一〇年出版了第五十和第五十一版。

我在獄中能够把这时间为我自己的利益加以利用，这是美好而且有益的，然而我还是盼望和欢迎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但是，因为每个犯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从而表现得十分不安和不耐烦，計算着天数和钟点，所以我力图以此控制这种心情，即我为自己提出一项工作去完成，而这只有尽其全力，才能有成。后来在丧失自由时，我也使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效果很好。

我們的家属每三、四个星期来看我們一次。最后我們也办到了使他們能利用三天限期的来回車票。他們在这个时期住在乡村里。三位妇人来时每人带一个小孩；李卜克内西夫人带着他們的大儿子，他比我的女儿稍微小些。旅行是辛苦的，尤其在不利季节。妇女和小孩必須在早晨七时由家中动身；花錢雇馬車，三位夫人都认为是罪过。他們可以自上午九时半到下午七时留在我們的囚舍里，并可同我們一起在园中散步。这对我們是在監禁中很大的安慰。

我很需要体力劳动。因此我想我們應該为此在园里开辟几畦地。我們請求为此撥一点土地，遭到拒絕，但我們可以耕种沿着园墙几公尺宽的地边，要用多少都可以。就这样办了。我們带着必需的工具去做工。李卜克内西当时在写关于土地問題的論文，他自以为是农业专家。他保证，我們可以在空地边上垦成一块出色的良田。但是当我們用鋤头掘地时，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我們每一鋤都碰到石头上。李卜克内西看到这样結果，也拉长了臉，我們大笑不止。这块地不是肥田，而是瘠土，我們要想有收获，就必须像我們的看守人所断言的进行施肥。于是李卜克内西和我拿着

一只大筐走向园子一个角落里堆存着的混合肥料堆。凡是認識这种堆肥的都知道，若是戳它一下，就会气味扑鼻，印度和阿刺伯的一切香气都不能压倒它。但是我们不顾死活地去干，我们装满筐子以后，用两根竿子穿入提梁，李卜克内西在前我在后跑向我们的菜地。在园内做工的妇女们看到我们的动作都哈哈大笑。我在当时和以后常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这类工作，我们会勃然大怒而加以拒绝。这是强迫与自愿之间的区别。

我们在菜地内种上萝卜种子，热烈期望有所收获。种子出得很好，叶茎茁壮地往上长，但是所盼望的萝卜却不见踪影。每天上午，只要我们一出来散步，就来个向萝卜畦赛跑，每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总是一场空。有一天，我们低着头站在萝卜畦周围，并且深入研究不结实的原因，我们的看守人在那边听我们的谈话，笑着说：“你们为什么得不到萝卜，我的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施肥过多了！”唉呀！这样，我们的一切辛勤都白费了。

在一八七三年的头几个月内，国会又要开会，这样萨克森政府不管好歹就必须为我所保有的选区安排一次新的选举。选期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整个党把这看成一件荣誉攸关的事情，不仅要使我重行当选，而且还要使票数增多。一切能调动的鼓动力量都赶快来到选区。奥艾尔、莫特勒、瓦尔特希、威廉·司滔莱、瓦尔斯特、约尔克等都来做工作。敌人把格劳绍地方法院院长培曹尔特提名为对方的候选人，他为人平易近人，是选区里一位令人十分爱戴的先生。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在选举日晚上计算出，我得一万零七百四十票，我的对手是四千二百四十票。不用说，这个结果在选区以及整个党内引起狂欢。这结果也给那取消了我的委任的法院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这次比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还多得约四千票。不仅如此。在选举以后过了几天，我那失败的竞选人在选区

报纸上对我党公开表示感谢，认为党是以很公正的方式同他进行竞选的斗争的。

在选举后，奥艾尔和约尔克先到莱比锡访我妻给她道喜，而后来胡伯图斯堡见我我也向我祝贺。这是一次愉快的会晤。

随后当国会开会时，我试行向萨克森政府请假参加会议。正如我所预料，没有成功。现在施拉普斯在一批自由主义议员支持下提出建议，要求在开会期间将我暂释。这个建议被大多数所否决。冯·马林克罗特议员说，他很惋惜我不能参与国会会议，但是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没有把议员的免罪引伸到刑事犯。

我承认，我并不对这个决议感到遗憾。如果将我暂释，那么我将因请假而延长坐牢的时间。如果我在服刑期间遇到三、四次会期，则满刑之期就不在一八七五年春季，而最早也要延迟到一八七六年夏天了。

在一个立宪国家，一个在服刑的议员，一到会期开始就马上被开释，以便能够尽他当议员的責任，这原是当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德国的人们是不愿与闻的。不过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要服多年徒刑的议员，如果每遇会期就照例给假暂释，决不如一般的错误想法，认为是件愉快的事情。我至少把这看成是加重我的徒刑，因为它首先会加重损害我的经济生活。

236 李卜克内西和我当然需要至少同外面的领导同志尽可能保持接触。不过这只是在有限程度内可能。我们也可以常常秘密往外面带信，但是这样通讯有因回信不巧妙而被监狱长发现的危险，结果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要小心才行。尽管直接通信要经过官方的检查，我们还是尽可能直接写信。往来的信件有时也呈现幽默性质。有一次我接到莫斯特由兹维考地方监狱给我的回信，他因为各种出版和言论的罪名须在那里服刑一年以上。因为这信同时把莫斯特的个性表现得非常之好，所以我把它转载在这里。莫斯

特的复信是：

茲維考，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来信好像黑暗天空中的一道灿烂电光照射到我的隐修处，由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们这些用笔墨危害国家的恶棍过得很好。——你现在也想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我愿意相信，因为我可以想到，你现在所遭遇的，正是我在迁入这里之前所遭遇过的，这就是说，你听到茲維考(Zwickau)这个地名总想到茲維肯(Zwicken)^①并且猜想听到一个噢的叫声。我不得不承认，我虽具有猫的坚韧性和绝望中的幽默——却不流于战战兢兢的呆气——，当我来到此地之前想到它的时候，并不像著名的五百母猪那样对它有十分的好感，但是现在既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当然我不是像你那样过行宫狩猎的生活，而是沙特勒斯修道院僧侣的生活，不过我也没有感到烦闷，因为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补习，所以现在利用机会努力攻读。我所收到的报纸可以供我消遣，我照日常习惯的方式(饮食，衣服等)满足一切生活上的需要。总之，我所忍受的只是自由上的惩罚，而不是肉体上的惩罚，虽然我也受到了对于一个犯人除剥夺自由而外的一切。除了一张写字用的桌子而外，我没有什么使我舒服的东西。一张自己的床铺，我觉得没有需要，不过我使用自己的枕头。囚舍完全像瓦尔特希所描写的那样(他也曾在茲維考地方监狱里住过一个长时期)；这里没有别样的囚舍；此外，人们不久也就对这习惯了，特别是这些囚舍的窗子虽高，但还很亮。每天在一个半庭院半花园的空地上，我独自一人散步二小时。没有人来访问我，所以我自然也不能接见任何人。你那时是不禁止你同家人往来的。人们对我也同对你一样，不让我刮

237

① 虐待的意思。——译者

鬍子。我的灯点到十点钟。这些情况就是我从我这社会主义者隐居处能向你报告的主要事项。关于学习，你当然要好多，因为你的教授就在你身边。在语言学习上我特别感到，这里多么缺乏教师，尤其是会话没有这样一个教师简直学不成。顺便问问！你学法文用的什么课本？瓦尔特希因为我希望有一本法文文法，转送来一本十分古老、无用、繁琐不堪并且荒谬的苟肯的书（希采尔出版），我有几次在盛怒之下极想把它撕成两半。——你的关于梯也尔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个矮子是法国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个活的钱袋并且是唯一懂得如何促进君主政体的人，当然不成功，可是计划至少拟得不错，尽可能长期维持现状，然后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使共和政体消失而使君主政体出现。别的任何一个君主政体拥护者在他的地位，早就会发动政变，于是——同时折断了脖子，像一般君主政体的最后残余所遭遇的那样。在西班牙——企图使人相信——那些执政的长舌妇人只顾喋喋不休，丧失了她们那微乎其微的智力，否则她们实在不可能不与一小撮杀人放火的卡罗斯派^①决裂。现在希望那里也像在法国那样，不久就来个有力的大扫除。——我们事业在最近时期有这样进步，你感到惊讶；产生这些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千个像你这样的人，或者甚至只是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自夸）——欧洲，不仅是德国，在五年内就会社会主义化。新生力量固然是够多的，如果胆怯不那么严重，新生力量就会表现得更多，而现在却是太少了。我们应该相信，人们在出生时大都是头朝下或者甚至嘴朝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张开嘴。我们不要别的，只需要嘴和心长在正当地位的人而已。——如果说我已不抱什么大的希望，那末，我仍然非常欢喜地期待下次的选举。至少要展开宣传，使火花四射。局势正合我们

^① 指西班牙克里斯廷娜派和卡罗斯派的斗争，亦即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斗争。——译者

的要求。进步——破产、得胜狂欢——颓唐沮丧、伤兵问题、住宅问题、学校问题、几十亿问题、和平问题、投机商问题、“文化斗争”事件、厂主同盟、惩处、迫害、混乱等，这些都稍微有利于我们。因此我保养我的肺叶并磨钝我的长嘴，以便将来如果掀起选举战斗，就可以真正快乐地把许多政治海盜們打倒。——在薩克森我自然不能直接敲起鼓来，不过别处也有许多人，他们必须由人們把釘在他們脑袋前面的板子拆除下去。因为，我被警察驅逐出薩克森，虽則高等法院对于这件在法律上不可能的事情应否执行还未表示意見，不过我也不期望什么好事，至于事情結果如何，在我却也“无所谓”。对我來說，不是“无所谓的”，甚至簡直不可解的是，对于这一行为……^①可敬爱的尤利烏斯^②到现在还没有感动得作出說明。对了，最妙的事我几乎忘記了：万一我不願驅逐而又在薩克森出現，則根据条文就要把我送进反省院去！——关于这姑且不說。——那末，若是我重获自由，也就有机会去……。

一般說来我是很舒服的，并且异常乐观。祝你好，并向社会主义学院的老住客們和你謹致敬礼！

約·莫斯特

科科斯基写給我們的信，却与莫斯特这信的性质不同。科科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在哥尼斯堡出版《民主报》，但不久不得不停刊，而应白拉克的邀請于一八七二年底参加《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編輯部。他具有极为幽默的性格，在当时党代表會議的飲酒晚上常常被称道。他也遭到那时代的党报編輯的命运。他担任編輯的时间并不长久，却遭受了好几个月的監禁。但这并没有損害他的幽默，由下面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

不伦瑞克，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① 这个地方被检查官塗掉了。

② 瓦尔特希。莫斯特归罪于瓦尔特希，說他設法打消他在开姆尼茨的国会的竞选，并且不让在《开姆尼茨自由报》上发表各种通告。

尊敬的朋友們！您們好，父親般的國家照顧周到，把您們置于特別照管之下，使您們在沉思默想中体会到一个好政府的恩惠。那三个人既然能够在火炉中唱贊美歌，那末您們，如果要塞監獄的規則并不禁止的話，为什么不可在胡伯图斯堡的圍牆內也这样做呢？

仁慈的天意，也給我三个月的要塞禁閉，因此至少一个时期不必听到吓人的呼聲，科科斯基先生，稿件不够！已使思想有些安定的是，偶尔接到的几封信是必須先經過检查的，所以那些討厭的和有刺激性的消息被去掉了。这样我也就放弃一切革命的报道，虽然我很乐意为您們闡明关于軍事装备的情况，关于手榴彈和硝化甘油炸彈的最成功的制造法，这些都是产生真正奇迹的。仅仅这个消息：

汉堡，五月二十七日。煤油較稳定，当地一六·二〇——八十馬克，五月，十六·二〇馬克，八月——十二月，十七紙馬克，一六·九〇金馬克。

資產階級已經开始羨慕您們了。最近在一个資產者团体中謾罵社会民主党人时，有一个被认为很可靠的，甚至是最可靠的投机者說：“今天交易所的消息好像冰块放在我的头上一般，我要羨慕倍倍尔，他能泰然坐在胡伯图斯堡，用不着关心行市的漲落。有人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付給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以貼現銀行的三万塔勒，然后使它跌到八十五，或者使路易士地下工程超过票面价格的百分之十五，我可以告訴您們，他們受够了懲罰。”这样，您們必須学习着由这方面来观察事物，而后沸騰的蛟龙毒液才会变成虔誠的思考方式的乳汁，此致衷心的敬礼——我这封信結束了，因为信就要送往郵局——我永是

您們的忠实朋友和同志 S. 科科斯基。

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薩克森國王約翰死了，他的兒子阿爾伯特即位。因王位更替照例連帶一次大赦，我們的妻子也盼望着大赦。這也難怪她們，我們的判刑和監禁在我們認為是我們活動的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她們則受到最大的苦難。但是我們一知道她們抱這種希望，就寫信告訴她們，不可以存這種幻想。大赦將會到來，但不是為我們。我寫給我妻的信里說，新王將寧可赦免薩克森監獄里的一切犯人，也不赦免我們。大赦的結果是很有分寸的，據我的記憶，被關在薩克森各監獄中的許多黨員同志，沒有一個被赦免的。這樣倒好。國會在一八七四年初舉行普選（因為當時國會任期只有三年）所表現的一種情緒，並沒有因大赦而敗壞。

我有這樣一個念頭，雖然我當囚犯，也可以用很有效的方式來參加選舉鼓動，即編寫一本小冊子論述歷來的國會活動，為黨的候選人和鼓動者提供必要的材料。想到了就作到了。小冊子按時出版，書名：《國會及邦議會的活動和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社會民主黨》。我在小冊子里加入了國會選舉法、選舉法條例、刑法法典中有關的規定、結社法等最重要的條款和鼓動指南，作為附錄。這個匿名出版的小冊子，受到黨非常滿意的歡迎。二十年後，有一天在往漢堡的旅途中，議員歐仁·李希特爾和我在一個車廂中遇見時，他甚至還為這件事恭維我。直到那時為止，我們雖已在國會中同事二十五年以上，彼此卻還從未作過私人談話。現在我們暢所欲言了。在談話中間，李希特爾敘述說，七十年代時，他在屠林根一個城市里的民眾大會上作過演講，在大會辯論時有一位我黨同志提出他的一系列的罪惡，其中有些他早已忘記。他注意到，發言人的責難是引自一本小冊子的，他曾請求他的同黨偷偷走到發言人那里，以便認清他所引用的是一本什麼小冊子。後來他得到了這本小冊子，從它的內容看，他認為作為小冊子的基礎的想法很好。於是他決定把這種想法——雖然用另一種形式——也拿到

240

他的党内加以贯彻。这样，就产生了他的著名的政治入门一书。在这一刻，我以老师的身份坐在我那鼎鼎大名的政敌面前，有点自豪。大家知道，后来其他党派也照我们的榜样，出版这类政治入门的书籍。

241 我的小册子的另一作用是引起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旭夫市的一位副牧师霍好夫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驳斥我对于基督教和文化斗争的见解。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作答复，后来出版为小册子，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到今天已出了很多版。

选举订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举行。结果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在第一回合中被选上了六个议员——盖布(夫赖堡)、李卜克内西(司透耳堡—什内堡)、莫斯特(开姆尼茨)、瓦尔特希(米特维达—柏格斯代特)、莫特勒(克里米朝—兹维考)和我(我的老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在莱比锡城郊第十三选区，约翰·雅可比进入复选。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两个候选人当选：哈森克莱维尔在阿尔托那和莱迈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选区塞格堡。哈赛尔曼在巴门—爱北斐特进入复选并获得胜利。约翰·雅可比也以七千五百七十七票对六千六百七十四票获胜，但他又拒绝接受委任，这使全党不胜惊讶和不快。不错，在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候选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答应接受选举。他在他的信里说过：他对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看法，党内同志是熟悉的；他们由此可以推断，他多么不愿参加那些无益的国会讨论。党如果由于策略的原因认为他做候选人是有利的，他也不反对，但是他必须预先声明，如果当选，他将保留决定接受或谢绝委托的自由。在辞谢信中他声称，他对于德国的新秩序的想法，一八六七年五月六日在普鲁士下院声明过了，所以他把这次参与竞选只当作抗议性的竞选。他不相信，通过代议制的途径能够把一个军事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国家。

错误是在选举委员会，它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要求他来个干脆

明白的答复。当我们的候选人威廉·白拉克在复选中以五千六百七十六票对对方将近八千票而落选时，党内对于雅可比这一行为更为愤激。我自己也为这件事很生气，给雅可比的朋友基多·威斯博士一封信对这个辞谢委托的事加以指斥。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现在在国会里共有議員九人代表它們。候选人得票总数是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得十八万零三百一十九票，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二票。两派的追随者人数差不多同样多，得票总数约等于一八七一年的两倍，共计约增加二十三万六千票。

这次选举的辉煌成就使高级官場以及资产阶级集团非常生气。这个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这说明了，党不顾一切迫害和诡计，还在不断发展，因而权威集团中蓄意已久的以特别法规来迫害党的思想也越来越浓厚了。

一八七四年二月底，古斯达夫·拉式的访问很有趣地打破了我们在监狱中的日常单调生活。拉式是一个有点危言耸听的作家，他喜欢使他的作品有些夸张。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他在《凉亭》杂志上和许多自由派大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奥地利人在威尼斯的丑事和丹麦人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虐政的文章，引起很大的注意，因而卓著声名。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在柏林认识他的。他现在所以来訪，是想为一篇文章搜集材料。这样的访问应在办公室里当着一位官员进行，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是这对拉式是不适合的。他要求獄长让我们二人单独谈话，并希望看一下我们的囚舍。獄长拒绝了这个要求，說：他（拉式）应该站在他的地位上想一想，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了；如果他（拉式）是獄长，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拉式以他那诙谐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回答说：啊，如果他是獄长，他一定允许！这句话引得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三月間，我們接到正式通知，將于四月一日把我們轉移到哥尼斯坦因要塞去。這個消息使我們很不舒服。李卜克內西的刑期到四月中旬結束，我的到五月中旬滿期，這時我們非常不適于帶着書籍、稿件和各種家具再搬一次家。但是屆時又延期遷移，這樣，李卜克內西得于四月十五日由胡伯圖斯堡起程往萊比錫。但是我却須于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動身往哥尼斯坦因，由一位便衣官員陪同前往。我在起程的前一天向獄長辭行，並且對於他在許多事件中的盛意表示感謝，他非常感動。他親熱地握着我的手，然後放開我，說道：“上帝保佑您！”這在他看來，大概認為是能夠贈給我的最好祝詞。次日早晨五時，我要起程時，看守人全家集合起來，前來送行。這個看守人現在已調到瓦爾特亥姆監獄；我相信，他在看守我們的那個時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此後不久他就死去了。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個美麗的日子，整個易北河谷一片綠色，百花盛開，春光十分艷麗。在走上要塞時，我們遇見要塞司令馮·雷翁哈第中將，送我的人把我介紹給他。當我們一同往上走時，將軍和我談起話來。他想知道，在胡伯圖斯堡的日程和待遇怎麼樣。我把他所希望知道的情節告訴他以後，他表示意見說：“吶，您在我這里不會比那裏壞。”

指定給我住的地方是一所從前認為可以防禦炸彈的老建築物，原先的軍火庫。走廊上支撐屋頂的梁柱的粗大，只有在老教堂的地基上才可以看到。房間卻寬敞，有兩個炮眼式的窗子，上面裝着粗鐵條，好像是個關押人犯和放火犯的地方。一邊的牆上立着一個巨大的釉磚火爐，國家每天配給我的五磅煤炭在這個火爐里，
244 就會不見了。雖然冬季已過，春光明媚，可是室內還是冷得厲害。我若不願凍壞，就必須自己出錢買燃料。如果我們的全部監禁都

在那上边渡过，我們单为燃料就要耗去一份小家产。

我的看守人的为人很有风趣。他年已七十，在要塞服务已三十六年，一八四九年薩克森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托特和豪布諾，还有奥古斯特·勒克尔和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米歇·巴枯宁（他后来是一方面饒有声望而另一方面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都曾受过他的看管。

我散步的地方十分狭窄，这地方以唯一的短短路径通向要塞小花园，那里还经常站着一个人，以便把许多来游哥尼斯坦因的人同我隔开。唯一令人满意的是由要塞的一个小饭館領取的伙食。饭館主人似乎对我特别好；飲食不仅物美价廉，而且也非常丰富。当我第一天看见指定给我的一份食物时，感到奇怪，吃过以后更是不胜惊讶。高山空气发挥了它的效用。这里的一小队駐军的士兵诉苦說，他們在这上边从沒有吃饱过，都在盼望着三个月滿期后換防。

五月十四日，我被假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在来我家問候我的人中間也有爱德华·伯恩施坦，他特意为此由柏林来到萊比錫。我在一八七一年在柏林已經認識他了。通过我的律师奥托·夫賴塔格的接洽，內閣同意給我六個星期的緩刑，然后到茲維考地方監獄服九个月的徒刑。在这期間适逢圣灵降臨节，我同我妻和女儿以及几个朋友到薩克森的瑞士和哥尼斯坦因远足。这里使我很愉快的是，我所住过三星期囚舍在这期間已升格为要塞的名胜了。导游人指点着使人注意我当时所住的囚舍的窗子。后来禁止他这样做了。德累斯顿的党员同志长期开玩笑地把哥尼斯坦因叫做倍倍尔堡。

245

茲 維 考

在入獄之前，我先訪問了一次地方監獄獄長，打听他允許我作

为政治犯在拘押中做何消遣。然后在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我进入这个监狱。监狱的设备以及对大部分政治犯所允许的消遣在莫斯特的信里已经给我叙述过。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每月准许我在一个官员监视之下接见我的家属一小时。在我被监禁的第三个月，我妻来探望我一次，以后我们双方都愿意不再做这种会晤。花了路费，而晤谈中每一个字还都要忍受一个官吏的监视，这个牺牲太大。其他方面的访问，我也只是个别地接见，我对这种访问并不渴望。

我现在又以全副热情投身于工作。使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妻关于我们营业处在困难地位的报告，因为这时工业大危机极其严重地爆发了，再加上一个新兴的工厂企业又对我们进行毁灭性的竞争。谁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谁就体会不到完全无法可想的感觉，使一个被监禁的人如何抑郁。我在狱中的主要工作是前面所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史》（这书早已绝版），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参考书，所以这本书不会是杰作。我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的伟大农民战争和紧在其前的那些革命的农民起义，都是德意志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官方史籍却可耻地避而不谈。

246 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我接到一份由莫特勒转来的电报，说约尔克于昨夜亡故。约尔克虽然性情固执，却也是一个不疲倦和具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而且他非常谦逊。他在做党书记的第一年，他满足于，如他写信告诉我的，连一条新裤子也不能购置的薪水。他身后极其贫苦，党酬报他，赡养了他的妻和小孩。至于约尔克的党书记职位，前一年秋季已由奥艾尔担任了。

兹维考的九个月监禁到底也忍受过去了。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六十岁的生日），我被释放。在这里，狱长和我的告别也是亲热的。我一贯奉行的箴言是，尽可能适应不能改变的必然的

狀況，爭取有利的一面。由這個觀點出發，我在監獄官員執行艱巨任務時，只要對於我的人格絲毫沒有損失，就盡量以遵守所規定的制度去迎合他們。所以他們總是感激的。在較大的監獄中，官員們十分忙於對付那些社會危險分子和墮落分子（我們這個美妙社會秩序的可悲產物），所以他們的工作是最艱苦的；他們若能同所監守的人們以人道相交在他們就感到幸運了。

茲維考的同志們，在我被釋放那一天，集合起來表示歡迎；他們贈給我和我妻一對精美的咖啡杯，杯上題有獻辭，祝我們將來長在完全安靜和閑暇中永不分離地享受薩克森的民族飲料。這種祝賀是好意的，但實現就不行了。

在許許多多祝賀者中間，也有當時還是民主主義的《法蘭克福報》，它在提到俾斯麥的生日時寫道：

“……我們的祝賀是對另一個地方的另一個人的。他就是那位樸實的市民和工人，他在幾乎不斷的三年監禁後，明天要出獄了，他仍然同按判辭（關於判辭，即使今世還辦不到，來世也將予以裁判）入獄時一樣聲譽無瑕，他的黨內同志愛戴他，他的敵人懼怕他、注意他。我們既不是他的同黨，也不是他的敵人，但是我們不247管在哪裡發現忠於主義和公正無私的努力就加以重視，對於任何一個為這些而受難的人，我們充滿了極大的同情……因此向國會議員奧古斯特·倍倍爾致敬和祝福。”

幾個月以前，《法蘭克福報》的主要業主列奧波特·宗納曼曾把葡萄酒二十瓶給我送到監獄里，因為獄中禁止飲用，我把它轉送到家裡去，後來同我妻和友人同飲。四月一日，宗納曼還為了我的被釋寫信祝賀，信里說：“我希望你的長期苦難就此結束。”我們自一八六六年起就以你我相稱了。

我由茲維考出獄不久，接到沙夫萊教授從斯圖加特給我的一

封信。沙夫萊在脫離維也納的霍亨瓦特內閣以後，回到斯圖加特，在這裡以研究學術度日。一八七四年他出版一本小冊子，名《社會主義精義》，他在書中給與社會主義以客觀的評價，因而這本書轰动一時。他現在又把他的三卷著作《社會機體的構造和生命》的第一卷寄來，並附一信，內容如次：

他不知道，我從關稅議會以來是否還記得他。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但大概常常聽到彼此的消息。雖然我們對於人生的理解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對於社會問題我們都仍然深感興趣。所以他冒昧地把他的新書寄給我一冊，大概我對其中很多說法會感興趣。如果我願意接受他這本深費思考的書，作為紀念，他將感到歡欣。

我相應地作了答復，並且還特意補謝他在參加霍亨瓦特內閣時努力為被判為“叛國犯”的邵烏、莫斯特、奧伯溫德等取得赦免。

一八七七年夏季，沙夫萊到萊比錫來拜訪我。我們談話很久。談話的主題是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何時可以勝利。我這樂觀主義者認為這個時機已經很近，他則相反地認為至少還要等兩百年。我們因此爭論起來。我在一八八〇年到斯圖加特回拜他，我們同樣地又作一次長談，這說明，他對我們仍舊是友好地對立的。但在以後幾年，他卻完全變了。俾斯麥在開始實行社會保險法以後，認為他的那些樞密參議對這方面懂得太少，於是注意到沙夫萊。沙夫萊也很想領受德意志帝國的官職。為了不讓對他有任何不利的成見，他現在寫了一篇文章，名《社會民主主義的絕望》，這表示了和他以前的見解相反的見解。海爾曼·巴爾在幼年時代也曾同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地熱心於社會主義，他為此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沙夫萊先生的無知》，書中對沙夫萊及其作品作了中肯而幽默的嘲笑。我和沙夫萊的關係從一八八〇年起終止了。但是他想做政府官吏的希望，如所周知，並未實現。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統一代表大会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在統治集团中，巴黎公社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大恐慌。公社在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中得到了工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看做是最讨厌的，并且使厌恶繼續增强。再加上资产階級和政府对于国际的力量所作的夸张的——姑且不說可笑的介紹。例如，巴黎公社虽然有法国銀行的财力和巴黎各兵工厂貯存的弹药和武器可供支配，仍然說国际供給了公社二百万法郎、几千支枪、弹药等。此外，从九月初起，即从德国人势将包围巴黎时起，也就是还在资产階級政府执政之下，就已实行全民武装了。在德国也有不少响亮呼声要求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的措施，这要求是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們所乐于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加里波第的态度是十分公正的，他在給《羅馬紐尔》編輯卡波雷拉（一八七一年八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国际所代表的是社会中为少数特权者之故而受損害的多数部分。因此，他們必然拥护国际，如果說它的机构中有缺点，那就必須改善它。

249

虽然在这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无关重要，而且霍亨瓦特一沙夫萊內閣也沒有显出要进行迫害的絲毫傾向，可是首相馮·博尹斯特伯爵仍应俾斯麥的邀請前往加斯泰因参加两国皇帝及其首相的會議，商討取締国际的办法。沙夫萊曾劝阻这个會議，但他与博尹斯特不睦，而且博尹斯特还想借此同他多年来的密切敌人会一次面，俾斯麥則为了将来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一次会晤同他一八六六年的敌人接近一下。就众所周知的而言，这次关于

国际所达成的協議是，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局势。

但是在这期間，一个意大利的阿馬調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一八七二年二月初，他的政府在致列强的一个通电里发出呼救声，說国际努力违反人类的一切传统，消灭精神上的上帝，从生活中取消家庭和世襲制，并且通过它那可怕的組織形成莫大的危险。所以西班牙政府希望有一个大国来担任反对国际这件事。这个要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冷遇。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維尔勋爵复西班牙政府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打消了西班牙政府任何进一步行动的兴趣。250 他宣称，尽管国际是世界各地工人和职工会联络的中心，它在英国却主要仅限于給罢工事項提些建議。而且它的金錢也很少。根据英国現行法律，一切外国人都有絕對的权利到英国来居住，在居住期間，他們同英国的臣民一样受法律保护。他們只有犯了法，經過公开的訴訟程序，并有以公开审判手續提出的证据为佐证的判決，然后根据正式法院的宣判，才能予以懲罰。任何外国人，除非根据与外国所訂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約而加以遣送外，不能驅逐出境。最后格兰維尔說，直到現在还没有理由来修訂有关外国人在英国居留的現行法律。

由于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一切反对国际的国际协定都没有可能了。最后，国际于一八七二年九月間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馬克思，后者巴枯宁）之間发生分裂而告結束，国际的这个結局也向最胆怯的政府指出，所害怕的危险暂时不会发生。并且国际把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紐約，这证明它自己也认为它的改組是必要的。

既然这样没有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国际迫害的希望，俾斯麦却更加努力坚持在德国通过特别法令来迫害工人运动。这见于一八七三年四月底他在上院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声明，对付国际党（他这样称呼我們）也要像对世界性的神甫党（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

的法令的必要。

这次宣布以后紧接着就是行动。一八七三年六月初，他提交国会一个出版法草案，其中第二十条这样说：“凡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律意志或爱国热情的方式攻击家庭、所有权、普遍兵役义务或其他国家制度的原则者，或者是把法律上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描写为值得仿效的、有功绩或理当如此的行为，或者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讨论公民社会关系者，均处以二年以下监禁或要塞拘留。凡借出版物进行德意志帝国刑法法典第一六六条（违反宗教罪）所规定的行为者，处以三个月以上到四年的监禁。按照第二十一条，定期刊物的负责编辑人应与当事人同罪。

这些凶恶的规定改变了刑法的主要实质，使那些有受刑之虞的问题不可能作任何科学的讨论，此外，对一切党派都可以运用，于是这些以及其他规定使国会多数派也都顾虑重重。法律草案被否决了。

但是俾斯麦认为他的出版法草案还不够。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又建议修改和加重工商业条例第一五三条，以往最多处罚三个月禁闭的情况，现在可以判处六个月，甚至一年。此外他还建议修改工商业条例第一〇八条，根据新条款，业主和受他雇用的工人之间的争端应由劳资仲裁机构来决定，这机构的主席应由有关的联邦的最高司法监督机关选出，陪审员则通过区代表会议选举。因会期終了，法律草案没有解决。

次年继之而来的是破坏契约法草案和新的出版法草案，以及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会期中的修改刑法法典的草案，最后是在一八七八年春季在暗杀事件以后的取締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因为从一八七四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代表又能在国会里发言，我还要更详细地叙述对于这个法案的处理。

两个派别的合并問題

一八七二年以来，对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所进行的迫害的性质，按說应该喚起它們对牢固团结和統一的要求。但是对于这点，暂时还感觉不出。在一八七二和一八七三年間，两派在报刊上的互相攻击，还較以往更加激烈，报刊上的声調也蔓延到集会上。当时因为除約尔克外，奥·艾·尔是我們最热情的很有影响的鼓动者，所以他俩特别尝到这种斗争方式的后果，尤其是奥·艾·尔在柏林作鼓动宣传时，他俩常常写信到胡伯图斯堡向我訴苦。不过奥·艾·尔还讲到特尔克的学生和特尔克分子。由于这些事情，奥·艾·尔有几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討論到統一問題就采用严厉的声調，还有他在哥达統一代表大会上的态度，都得到了說明。但这并不妨碍他誠心願意合并，既至合并在他的协助之下終於到来时，却再沒有人能比他更加努力来調解在多年激烈斗争后必然存在的种种私人之間的对立。

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代表會議上，第一次正式討論了統一問題，在会上，早在全德織工會議上表現非常和解的會員哈尔姆，以愛北斐特同志們的名义建議“大会应当寻觅方法和途徑，使德意志工人党的各派別統一起來”。这个建議在对我們党进行强烈攻击之下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决定轉入議事日程。

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到十一日，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国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莫特勒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来宾中有哈同（維也納），他現在代表瑞士职工会。一八六九年，在維也納叛国案开始时，也要把他逮捕起来，他却逃脫了。他在苏黎世多年，从事于瑞士的运动，后来引退，当了大木工場的主人，在苏黎世过着富翁

的生活。哈同的亲密友人奥伯温德留在奥地利当《民意》报的編輯。对他发出的驱逐令撤消了。但是他现在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越来越模稜两可，最后导向分裂。他并不經常居住在奥地利。在反社会党人时期，他住在巴黎，我們巴黎的党内同志怀疑他为普魯士警察服务。他同党告别了。后来他回到德国担任《德累斯頓公报》（这是一个市政会的官报）的主編。一九一一年，奥伯温德辞职回到故乡兰河上的維尔堡。

我在叙述哈同时所以附带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我这个作品中屡次想到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烏也是当时奥地利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他同奥伯温德发生冲突，遭到严重迫害而逃亡国外，到英国去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的五十一个代表中，年輕的卡尔·格利伦貝格第一次露面，当时他已在紐伦堡工人运动中初露头角，因而受到他在里面做錯工的那个克莱麦一科列特工厂的处分。

大会上也曾討論了統一問題。首先是布伦諾·盖塞尔的一个长篇的建議，他严厉譴責《人民国家报》編輯部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笔战。他要求《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立即停止笔战，这类事情只有經党委会批准才可以。这个建議被否決了。此外还討論了三个全是拥护統一的建議。最后通过了下列建議，其他建議也因而解决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按照它的社会主义原則乃是社会民主工党唯一的天然同盟者；因此，代表大会向委员会建議，不断作新試探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得原則上的合作；此外应負責使所有不喜欢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組織持和解态度，《人民国家报》的編輯部应立即停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的任何論战，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有新的敌对行为，如果委员会不是例外地认为絕對需要作就事論事的答复，則仍以緘默作回答。”

此后不久，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以《给爱森纳赫党的工人的一句正经话》为题的文章，文中还是保持着老策略，对我们不称党的名字，而且在党内制造工人与非工人之间的对立。文章中（《人民国家报》曾一字不遗地加以转载）严厉指责《人民国家报》和个别党员不遵照美因茨决议而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所谓攻击。在它那方面，经常只是站在自卫的地位，然而《人民国家报》却是攻击者。于是《人民国家报》在九月二十八日一篇以《一个答复》为题的文章里作了答复，文章署名“编辑部”，把每个批评都加以驳斥。这篇文章是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胡伯图斯堡起草后送到编辑部的，结尾说：“我们愿意从现在起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止一切笔战，条件是：1. 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们的党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并且在提到它时，无论何时都要称呼它的正确的名字，2. 要停止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攻击。”

255 我们这方面仍按以往的常例声明说，1. 我们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当作我们的党内同志，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某些人物长久抱着断然的怀疑，直至我们怀疑的原因得到明确的反证为止；2. 我们声明，准备支持召开两派的共同代表大会来商谈如何统一分歧点的建议。即使统一以至合并还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并规定共同行动（在选举，鼓动等的时候）的活动形式。应由一个双方平均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监视执行议定的各点。此外，我们希望设置一个由双方平均选出的仲裁机构，以便调查和判断由两派的一方对他方各成员所提出的控诉。我们愿意指出，我们已把类似上述的建议一再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暗地提出，而且他们也同意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以极其郑重的形式正式表示了和解的心情；现在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并把和平给与德意志工人界，就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身上。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毫无意义的遁词来答复这个建议。当后来不久拉萨尔派在柏林用暴力搅散我们党内同志的一个集会时，《人民国家报》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形似宣战的文章，结语说：“必须使工人事业的公开叛徒不能为害。”

两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又燃烧起来，在两个主要报纸上互相攻击，并且双方互相控诉非常激烈，好像统一这件事较以往更加渺茫了。最后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选举时，《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它的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会员不要反对我的再度当选，这必须看做是两派在相互对待的态度上有了进步。

使我们这方面很不愉快的是，F. W. 弗里茨舍原本在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参加建立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忽然又倒向另一方面来反对我们。 236

在这次互相斗争中，驻在布勒斯劳的由盖塞尔领导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应该申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因为它擅自作了和解的建议，由此又引起了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斗争。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下次代表大会答复了监察委员会。

在那时进行的警察迫害方面，莱比锡警察局长企图使德国其他地方的同行相形见绌。他在解散狂和驱逐狂上又附加一道不准人们参加海牙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禁令，以违者处四个星期监禁为威胁。他也禁止支部发展成员和为国际募集款项。当后来赫普纳不顾禁令前往参加海牙大会时，遭到了所警告的命运。他被判处四个星期监禁，并在次年春季根据这个处罚被逐出莱比锡，后来他在莱比锡周围地区屡次遭到同样的惩罚。而且因为他同党委会也有冲突，遂决定迁居布勒斯劳，在那里设立一个出版社。

赫普纳恼恨党委会，特别恼恨约尔克的担任党书记，他只看到了其中顽固的拉萨尔分子和党里的恶劣精神，致使他通知马克思

和恩格斯說，党看来是异常阴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拉薩尔的东西都抱着过份的怀疑，所以赫普納这个叙述就足以使恩格斯，同时以馬克思的名义，写給李卜克內西一封劝告信。李卜克內西把信的内容通知我，我因此写給馬克思下列的信：

“胡伯图斯堡，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尊敬的朋友！

……自从上次写給您一封关于施韦泽的信以后，已經五年多了。这个人幸而垮台了，自从那时以来还有許多别的人也垮下来了。然而我們的党却大大兴隆起来，我希望再有五年，它能够达到发表重要意見的地步。赫普納似乎向您和友人恩格斯把我們党的情况描写得非常暗淡，非常不正确。关于这我曾詳尽地写信給友人恩格斯，他会通知您的。大致說来，我认为党的情况是完全令人滿意的；所有缺点都会在不太长的時間內克服掉，当然也有必要保持适当的和气而不要强行爭辯。我所以主张和气，是因为我深知，持异議的人也对党的利益怀着最大的好意和誠意。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严厉对待意見分歧，从而激起分裂，是不正确的。但是請您不要认为，我們會因此把和气变成軟弱，和气是有止境的；而且我們并不缺乏财力和权力来貫徹我們的意志……

李卜克內西希望您能把拉薩尔的著作当作一篇批判論文的对象，我也完全贊同。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能达到必要的作用，必須是您而不是别人来发表它。这样的批判可以在各方面为德国的党鋪平道路。

为了新版的《共产党宣言》，我曾同李卜克內西商談过多次；但因考虑到末段，我們不能冒这个險。这件事会馬上給我們套上个叛国的罪名。宣言固然当作文件印入萊比錫叛国案的册子中，也印制了几本单行本，但是这还不够，必須能够大力介紹和公开出售。这个文件再配上一篇合适的序言，就会使許多人醒悟，它将证

明拉薩尔派的建議是如何極沒有價值。請您考慮一下這件事。
友誼的敬禮

您的倍倍爾。”

我給恩格斯的信的主要部分是：

“您上月十七日給李卜克內西一信的內容，我已知悉，因而奉上數行。赫普納關於我們黨的處境所說的顯然是過甚其辭，而且特別把約爾克的影响和企圖說得很壞。赫普納這種舉動，我不以為怪，他是一個非常正直忠誠的同志，但是容易動氣，由於一系列的爭執他對委員會而且特別對約爾克非常忿怒，認為他們壞到極點，所以措辭也極為嚴厲。” 258

于是我詳細地分析赫普納和約爾克為什麼成為不可和解的對頭，繼續說道：

“約爾克除缺點外也確有優點，他十分熱心地進行鼓動和按時催繳會費，這兩件事是很必要的，而且是从一八七〇年的混亂時期（不倫瑞克委員會被捕）以來就陷入了紊亂狀態。這是他的領域，這方面他確是有功可述的。

第二點是我們對拉薩爾和拉薩爾主義的態度。如果您認為，我們可以顧一切地進行，而不至於對黨有嚴重的損害，那您將同赫普納一樣確實陷於錯誤了。對拉薩爾的崇拜必須連根拔掉，這我是完全同意的，對於拉薩爾的錯誤觀點，也必須進行爭鬥，但要謹慎從事。您在那裡對我們的情況不可能判斷清楚，而且赫普納也太不切實際。

請您不要忘記，拉薩爾的著作事實上（這是不容辯駁的）以其通俗的語言奠定了群眾的社會主義觀的基礎。這些著作傳播在德國，比任何其他社會主義作品要多十倍、二十倍，所以拉薩爾享有這樣大的聲望。這種聲望，通過您已充分知道的哈茨費爾德伯爵夫人、施韋澤等人的媒介，被提升為崇拜，雖則這種崇拜由於群眾

的健全感情和我們自己的活动，已經大大降低，而且天天在繼續降低，可是如果以魯莽的行动伤害这种感情，却是不明智的。

在我們自己的党内，对拉薩尔的崇拜差不多已經絕迹，但还有个別地方，例如萊茵区和西里西亞，这种崇拜仍有信徒，而特別使我們不可太粗暴从事的是，以前哈茨費尔德陣营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很多工人越来越同我們接近，并且部分已經加入我們方面。至于拉薩尔主义在德国会有一天再占上风，是絕不能設想的，所以我們任事物安然发展下去，哪里有打击这种特殊拉薩尔主义的机会，就在哪里打它一下。我认为，《人民国家报》一直就是这样做，如果約尔克和另外几个人为此发怒，那就随他們便吧。

如果友人馬克思依照李卜克內西的願望（我所完全同意的）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几篇持客观論調的文章，科学地证明拉薩尔的理論的錯誤和缺点，就会給拉薩尔崇拜一个致命的打击。馬克思在經济学領域的学术权威，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样一篇著作会发生莫大的作用。請您协助我們，促請友人馬克思为党做这一工作。

把以上所述簡單扼要說来，事情是这样，約尔克的影响是不重要的，他本人决沒有危險性。拉薩尔主义在党内也很少传播，只是考虑到許多誠实的但被引入歧途的工人，在适当的对待下對我們是可靠的，所以要謹慎。

我希望在这次說明以后，您不再遲疑与《人民国家报》保持合作。引退（恩格斯曾以此为威胁）会是您所能做的最錯誤的事，这样一来，您将給敌对分子一种它所絕對沒有的重要性，而損害了党……

友誼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威廉·布洛斯代替赫普納为主任編輯。布洛斯以前曾在南德意志充當很多民主報紙的編輯，后来做我們党报《佛尔特民主周

报》的撰稿人，而该报的主要读者群众却在纽伦堡。布洛斯于一八七二年加入党和国际，代替被捕的科科斯基为《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的编辑，以后为《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他于一八七四年秋季脱离《人民国家报》，以便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受任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报的编辑。

在那些年代，对《人民国家报》的司法迫害非常厉害，经常有两个，有时三个责任编辑被捕入狱。我们的其他党报大半也与此相似，当时除了《人民国家报》外，还有《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德累斯顿人民通讯》、《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佛尔特民主周报》、《侯夫日报》、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和《屠林吉亚人民通讯》等，都是党报。

那时的领导人物都或多或少和监狱结识过，很少例外。在萨克森，还加上由地方和由整个专区驱逐出境，被驱逐出境的人中间除莫斯特和赫普纳外，还有奥艾尔、达士诺、吕塞尔、穆特、吕特、乌佛特，后来还有麦克斯·凯塞尔。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260

巴伐利亚在那时也在反动势力之列。党委会定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起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七月三十一日，纽伦堡市的国王特派员援引巴伐利亚结社集会法第十七条禁止开会。并且召开代表大会亦恐违犯帝国刑法第一一〇、一三〇、一三一各条和第三六〇条第十一款。委员会立即改在爱森纳赫召开大会，所以对这个奇怪的禁令并未提起申诉。现在莱比锡的警察局长吕得尔以为不应该落在纽伦堡特派员之后。于是他也禁止参加爱森纳赫会议，违者处以四星期监禁。事实上由于这禁令，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莱比锡没有代表。

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代表一百三十二个地方的党

員九千二百二十四人。大會由蓋布和莫特勒主持。在討論過程中也曾提到梅明格的討厭事件，這事件使紐倫堡—佛爾特的黨員同志發生了許多年的分裂。站在梅明格方面的有格利倫貝格，反對他的是奧艾爾和勒文施太因。大會大多數議決，梅明格做于黨有害的事犯了錯誤，他並且通過一系列的行動置身于黨外。

關於統一問題的討論，雖同樣列入議程，但由於全德工人聯合會五月間柏林代表會議所採取的態度而受到極不利的影響。在那次代表會議上，弗羅梅、哈森克萊維爾、哈賽爾曼和其他發言人都堅決反對要求統一的建議。最後以全體對三票通過了李希特爾（王茲培克）的一個由特耳克、哈爾姆（愛北斐特）、達斯巴赫（哈瑙）連署的建議，建議說：

261 “鑒於：1. 所謂‘社會民主工黨’本來是在一八六八年紐倫堡的舒爾采—德里奇的工人教育協會聯合大會和一八六九年愛森納赫的代表大會上創立的，其目的只是想通過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之外再創立第二個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黨派，它提出一個好像在政治上更為革命的綱領，以便吸引工人並由此導致德國工人的分裂，來破壞德國的工人運動；

鑒於：2. 馮·施韋澤先生現在同所謂‘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們的合作是共同搞垮和消滅全德工人聯合會這個組織的最確實的證據，消滅全德工人聯合會是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為了這個目的不惜同那些真正無疑的反動分子相勾結；

鑒於：3. 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組織和策略是同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綱領和組織完全不相容的；

所以大會同意今年一月五日全德工人聯合會理事會的決議，決議是：

考慮到對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在原則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絕對沒有理由為了同愛森納赫黨合併而改變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組織，

还考虑到，那个党的成员原可以任意按照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正是通过它的强有力的组织以及显然多得多的会员人数提供了团结工人的最好基础，

所以理事会把爱森纳赫党的所谓统一建议搁置不谈而按议事日程进行讨论。”

代表大会收到一批有关统一问题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赞成统一，一部分反对统一，一部分想在一定条件下在当前的国会选举中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

在辩论中奥艾尔也发了言。他说：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的党已不值得再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妥协。布洛斯也表示同样意见，他更进一步要求，也不要同人民党妥协，该党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同意其成员投工人候选人的票。最后奥艾尔为了阿尔伯特（格劳绍）的建议撤回柏林的建议，阿尔伯特的建议是：

262

“社会民主党把国会选举只看做是鼓动手段和宣传党的原则的考验，拒绝同任何其他党派合作。”

这个建议连同隆斯多夫的同志们的建议一起被通过了，后者是：

“因为我党方面已经采取了使整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步骤，而全德工人联合会今年的代表会议却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统一，所以代表大会声明，同上述党派，不管是为了党的统一或是为了选举，不再作任何尝试了。”

后来当我们党内同志依照这个决议在阿尔托那提出我来对哈森克莱维尔为国会选举的候选人的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却诉起苦来，奥艾尔由德累斯顿写一篇登在第一二三期《人民国家报》上的通讯嘲笑它，结尾说：“我在结尾提一句格言，请哈色耳马拉先生和稻草人哈森克莱维尔加以考虑：先做后想，招来祸殃。”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如何进行笔战。

关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报道了。那时我们这方面用多少金钱参加国会选举，也许是人所关心的。党在整个德国的支出达一千三百塔勒。萨克森邦委员会为了在萨克森选我们候选人的九万一千票花费了七百八十塔勒。莱比锡市和郊区的选举，包括莱比锡郊区复选在内，用去了七百三十三塔勒，开姆尼茨选举用去了三百四十五塔勒，夫赖堡—奥德朗（盖布的选区）用去了一百六十五塔勒，司透耳堡—什内堡（李卜克内西的选区）用去了三百五十塔勒。这些数目较之今日为同样用途所付出的费用可謂微乎其微。可是那时与现在却有不同。如今党员同志捐款较多，而选举工作也有报酬。往昔党内同志捐钱较少（因为他们所有不多，并且比今日人数也少），但是他们从事选举工作，多半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个别同志必须拿出平均比如今大得多的个人牺牲。当然不可忽视，现今在德国敌人所进行的选举鼓动比从前规模尤其完全不同，因此我方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用费。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一八七四年二月间开幕。我们的代表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建议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他们拒绝了 this 建议。反之，双方同意在提出建议时互相支持，并且力求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双方不再互相攻击。这固然不算多，但其他的也必会随之而来。双方有相当多的党员同志已渐渐厌倦了这种只对敌人有利的互相攻击，他们希望，即使统一还不可能，也要就共同行动达成一个协议。

在我们党内，人们不满意于当选的代表们在国会中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发言太少而且讲话不够尖锐。这种愤懑也屡次表现在党报上。这次会期在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不久即行结束，所以他沒有出席会议。我接到各方面写来的信件，控诉国会中的同志们

所持的态度。这样，我在会期结束后写信给罗伯特·施维舍尔（他在迁居柏林后任《小说报》编辑，因而不能参加公开政治活动）说，社会民主党議員的态度普遍令人失望。在选举得到辉煌结果以后，人们期望有另一种态度。党却没有促进这种态度。《开姆尼茨自由新闻》的发行人吕伯诺写信给我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国会中巧妙地胜过了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人大为忿怒。”議員們自己则十分抱怨議長在通知发言时偏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种意见也有几分真实。傅尔肯貝克代替辛森的位置，这个人，如我上文所述，是国会中历来最不公平的議長了。使他这种偏袒更加方便的，是取消发言名单，以便尽量阻止社会民主党議員发言。从现在起，議員們必須用暗号先向議長表示要发言，差不多像小学生在学校里对教师表示自己能够回答问题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这种发言要求看见与否，議長願否注意和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要求，都凭議長任意安排。傅尔肯貝克肆无忌惮地利用他的职权。因此，后来温德荷斯特和他的朋友建議恢复发言名单。我們这方面的瓦尔特希为这个建議发言，却被驳回了。于是莫斯特在会期結束前不久在国会中公开检举議长的不公。他虽曾多次要求发言却只得到一次发言机会。这对他好像是一个报复行为。莫斯特在會議开始时，在往柏林以前，錯誤地在他担任編輯的《开姆尼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对国会的宣战书的文章，宣布将对国会作白刃战。他現在显然自食其果。他能作的唯一发言是关于种痘条例草案，这个发言又失败了。他結束这个短短发言时说：“目前我們要求公共浴室，在我們得到这个以后，我們也就得到标准工作日制了。”无怪莫斯特嘴里的这个結語，引起敌人的大笑。

但是从这次會議起，还有另外一件受傅尔肯貝克支持的以后越来越厉害的不法行为。有一个民族自由党人，希尔特堡豪森的議員，名叫瓦兰丁，曾以律师为业，他經常准备提出討論終結的建

議。傅尔肯貝克只要想結束辯論，他就給瓦兰丁一个約定的信号，瓦兰丁就順从地提出討論終結的建議，于是多数派——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就像奉命一样服从这个建議。这种打断发言的方法在国会中被称为：想发言的議員“被瓦兰丁了”，这就是說，精神上被斬首了。这种胡鬧最后竟发展到把瓦兰丁的終止討論的建議在办公室預先准备好，由議長随意使用。瓦兰丁的这种活动博得他的党团的敬意，如国会里所傳說的，在他的生日他們送給他一小箱印出的討論終結建議。

还有可以表示国会当时情况的是，議員邦伯格爾竟敢称社会民主党的議員为受容忍的客人，人們可以不許他們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有卑鄙的表现，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監禁期間，每当点名表决时总是在名单上注上“未赦免”字样，这种胡鬧行为直到瓦尔特希在公开會議中提出強硬的控訴才告結束。

在国会所討論的議案中，有許多是特別重要的。有一个新的軍事法案要求把現役人数提高到四十万零一千人以上（期限一年的志願兵还不計在內），而且服役期限为七年。当时自由党人包括民族自由党人在內，对于反对規定为这許多年，还觉得有宪法上的顾虑。辯論十分激烈，但是最后俾斯麥以辞职相威胁，于是民族自由党人屈服了，接受了这个法案。在第一讀时哈森克萊維爾发言，在第三讀总辯論时莫特勒发言。二人都要求成立国民軍。在这次辯論中毛奇曾为議案作辯护，后来常引用他所說的話：

“我們用武器在半年中所爭得的东西，我們就要在半个世紀內用武器来保卫它，以免它再被夺去。在这点上，我的先生們，我們不可陷于錯誤；自从我們战胜以来，我們到处贏得尊敬，而沒有一处贏得热爱。”

我們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所屢次預言的話由此证实了。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后果，即吞并阿尔薩斯—洛林，在欧

洲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局面，給俄国造成了优势地位，并且不断引起新的扩军备战。对于我们关于国民军的建議，毛奇說：“我的先生們！枪支发出去容易，但是再收回就困难了！”（大笑。） 266

議員馬林克罗特建議服役期限二年，瓦尔特希表示贊成，盖布反对，莫斯特和莫特勒弃权。哈森克莱維尔、哈赛尔曼和莱迈尔提議，准許五十四万人服役两个月，一万八千人再继续十个月，此外并实行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受軍事訓練。这个建議只有提案人投票贊成。对于这些表决社会民主党議員的活动并不突出。

第二个对工人阶级重要的議案是工商业条例的修正案，这是把上次会期的議案在形式上略加改变又拿出来了。这一次人們勉强同意把第一五三条訂得更加严厉，即违犯該条款者以往最多处三个月的監禁，今后則改为六个月以下的監禁。但是，在新的第一五三条甲款里却建議，破坏合約者处以一五〇馬克以下的罰金或禁閉。在濫設公司时期，常因破坏合約而发生罢工，在經濟危机爆发后，因为减低工資和延长工作時間以及不遵守議定的停工通知期限而举行自卫性罢工，这些罢工使企业家极为憤慨。企业家向联邦政府和国会掀起請願的风潮，以期达到对违背合約者处以刑事处分的目的。联邦政府以第一五三条甲款的提案应允了这个要求。此外还有以往已經提出的有关工商仲裁机构的条例再度提出，不过略加修改，即高級管理机关可以决定陪审員的选举是否应由参与的工人和雇主来举行。哈赛尔曼对于这个法律草案有个很好的发言。我們这方面派莫特勒参加委员会，但是他沒有参加討論，只作个沉默的旁听者，因而各方面对他都很不滿。委员会删去了违背合約的条款，同样拒絕了加重第一五三条；此外并決議，工商仲裁机构的陪审員只能通过利害关系人的普遍选举来产生。但这个草案在全体會議中沒有討論完。国会的多数派方面暫時还不倾向于訂立特別規定或加重現行法令。 267

九

第三个重要議案是出版法草案。在这个草案里包含有去年的第二十条的下列条文：

“凡是借印刷品把不服从法律或违犯法律說成是允許的事情或者是有功的事情的人，处以二年以下徒刑或監禁。凡是借印刷品从事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六六条所規定的行为的人，处以三个月到四年的徒刑。”

哈賽尔曼对这草案也作了一个好的发言，除他以外还有盖布发言。草案的第二十条在委员会和全体會議上被否決了。此外，該法令取消保证金并禁止現行的报纸印花稅和广告稅。該法令实际上只改善了普魯士、不伦瑞克和两个梅克林堡历来的情况，而对于薩克森、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邦却造成了种种恶化，一部分是严重的恶化，所以該法令是否被接受，起初还是疑問。这里也同帝国一切其他重要法令一样，改善总有恶化与之对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意味着基本改善的政治法令，国会是提不出的，它总是对政府压力、即对一切反动事物的代言人普魯士让步。

应该提一下，在会期开始时又提出了在會議期間把我暫释的建議，但結果还和以往一样是否定的。贊成建議的发言人是瓦尔特希和哈森克萊維尔。进步党认为提出也无济于事，所以拒絕支持这项建議。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国会中討論問題时常常不得不共同合作，这事实对于所有希望两派合并的人們是一股促进協商的新推动力。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五日的汉諾威代表大会上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F. W. 弗里茨舍、哈尔特曼(汉堡)、迈斯特(汉諾威)等人提出建議，要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认为德国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必須联合起来，以便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目的，并提議为了給这样的联合开辟

道路，他們在一切公开集会上以及在党报上不要再互相斗争和敌对。关于联合的确定建議，在爱森納赫派代表大会确实表示它也真诚追求联合之前，还不能提出討論。”

这个建議固然經過長時間辯論后以五十对十九票被否決了，但辯論显然是以与从前談这类事情时大不相同的情調进行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下月，即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科堡举行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自一八七一年以来第一次又出席党代表大会了。联合問題在这里也拿来討論，并提出了各种建議。盖布以常务委员会名义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事就已經說：“如果我們最后还要叙述一下我們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那么我們的叙述只須确认，自从国会选举以来，旧恨就在动摇中。对此大有裨益的事实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現在被人从上面用与衡量我党的标准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保守的，从它的代表大会上所提出关于联合的建議在六十九个代表中只有十九票贊成而被否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們要相应地保留，首先要注意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根本态度，因为由此可以为我們的联合策略的准则找出个基本的、即使不是最基本的时机。”在后来繼續討論关于联合建議时，奥艾尔也讲了話，他对这問題态度仍然冷淡，以悲观的口吻說：总的說来，我們大家都贊成联合，但是双方

269

在原則上的分歧还很关重要的时候，真正的联合是不可着想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这方面所显示給我們的希望很小，这表现在它最近的決議中，仍按宗派自称为“拉薩尔派”。我們对和解的梦想直到現在沒有多大益处。达成联合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我們的力量并使拉薩尔派感觉到我們的力量。我們仍站在二年前在《人民国家报》上公布的联合方案的立場。（參看三八八——三九〇頁。）为了討論联合問題，可以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对于這個問題比奥艾尔乐观。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已有許多會員贊成联

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經過证实了他的理解。他說，为了求得諒解，他也贊成召开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一个較长演說中說，即使合并最近还不可能，也必須为联合而努力，随后合并会自己到来，台森多尔夫先生和事实的邏輯会照管此事，如果领导者不一起来照管，就会不顾领导者而来照管这件事。莫特勒报告了关于以哈森克莱維尔和哈赛尔曼为一方而以我們的代表为另一方在柏林举行的会談的情况。哈森克莱維尔和哈赛尔曼曾宣称，因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絕對較好的組織，所以合并是不可考虑的。但对于在报刊和集会上和睦地并肩行进双方却是同意了。最后以絕大多数通过了盖布的一个建議，建議說道：

“代表大会声明，它倾向于两个德意志工人党派的联合。至于这种联合的方式則有待于下次會議由委员会和党的国會議員方面提出建議。此外大会轉而討論議事日程。”

在科堡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一事发生热烈的辯論，即有些党员同志常常以不合时宜的热心在較大地区創立財政不甚可靠的地方报纸，然后使党十分为难，因为从此以后只得不計任何代价把这种
270 报纸維持下去。大家知道，直到最近还屢次发出怨言。有不少的这类报纸难以維持，而給党的领导造成严重的忧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有些报纸被打垮，这对一方和他方可以說都是好事；它們至少是在戰場上对优势敌人作斗争而光荣牺牲的。

科堡代表大会也曾討論修改綱領的問題。关于這個問題提出了一批建議，其中也有白拉克的建議。科科斯基一格利伦貝格及其伙伴的一个建議說，大会承認綱領需要修改，但考慮到問題在目前还不成熟，所以把修改綱領延至下次代表大会办理。这个建議在長久辯論后被通过了。綱領的修改应在报刊上提出討論。

此外还举办些公开演講，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講的关

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約尔克和格利伦貝格的关于工业和乡村的工人問題。格利伦貝格讲后面一个题目，作了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富于启发性的好演說。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談

盖布和李卜克内西說得有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遭到由上面来的同对我们一样的待遇，这就促使他们倾向于同我们合并。一八七三年夏季，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由馬格德堡被調到柏林市法院，成为这种迫害最重要的实行者。他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遇到該庭庭长賴希，陪审法官馮·欧索夫斯基和基尔式这三个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对于他的“救国热情”在各方面予以支持，在长久年代里在对很多党员同志的案件中成为真正的血腥法官。

台森多尔夫在馬格德堡已經获得社会主义者的凶手的称号，271
其結果当然是，他所迫害的和痛恨的党，每次受到他所进行的打击之后就更强盛、更有力了。他是我們这个具有大量图名求利的时代中最恶劣的一个。早在一八七一年，台森多尔夫因为在我們的叛国案中沒有插上嘴，就显得那么懊丧。这有下面一件事作证明，我把这件事叙述得詳細些，因为它把这个最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的死敌暴露得很清楚。当我们被关在牢里不能自卫的时候，《馬格德堡报》曾在萊比錫的通訊中屢次对我们肆意謾罵。随后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在苏黎世一个由侨居該地的德国人假座当地音乐厅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发生了巨大的騷乱，据《馬格德堡报》的萊比錫通訊說，我们是那次騷乱的策动人，而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是执行者。附帶說明一下，后来法庭确认我們苏黎世的党员同志同那个暴动毫无关系。因此，我們的律师奥托·夫賴塔格在馬格德堡市法院和地方法院对《馬格德堡报》提出了刑事訴訟。使他吃惊不小的是，检查官台森多尔夫在一篇长文中說明他拒絕由官方采

控訴《馬格德堡報》。他在文中還對我們的一切行為作了冗長而討厭的政治性的研討。夫賴塔格答复說，他從來沒有想央求普魯士王室的檢察署來援助我們，這有他的刑事訴訟呈文可資證明。此外他應該把台森多爾夫干涉與他無關的政治事件認為是越權的行為而加以駁斥。一個月後，台森多爾夫又寫信給夫賴塔格重提這件事，在信中他輕率地承認，他直到現在還在空等着《人民國家報》發表他的信件。如果是顧慮到他本人而未發表，那他願意奉告，這是用不着顧慮的。夫賴塔格於四月二十八日給他一封尖刻的回信，結尾的幾句話是：

272 “您在當前事件中的整個態度給我證明了，即使您對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先生的那種苛刻行動沒有大肆公開宣傳，您也可以榮任普魯士王室的檢察官和警官了。您可能另找路子去印您那個信件吧。”

台森多爾夫發達了。他後來升任萊比錫最高法院的檢察長。但他沒有能實現他那作普魯士司法部長的希望和欲望就死了。當時在比萊菲爾特另外還有一個熱中利祿的檢察官，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竟公開警告居民訂閱《人民國家報》。這是無耻之尤。

台森多爾夫充分符合他的上司，特別是俾斯麥所寄與他的期望。此後幾年內在柏林經他的建議而在臭名遠揚的第七庭判刑的人為數甚眾，而且判決越來越嚴峻殘酷。但是我黨同志的反抗也與迫害同時增長，如果台森多爾夫和第七庭的法官在臨終時誠實地清算一下他們的行為，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是徒勞無功的；我們毀滅了無數生靈，破壞了許多家庭的幸福，並且以嚴酷的判刑摧殘了許多人的生命，但是我們原想控制的運動，却把我們控制了。我們是失敗者。我們想消滅的那些人依然是勝利者。

一八七四年，莫斯特在柏林因為關於巴黎公社的講話被上述法庭判處一年半的監禁。柏林最好的組織者排字工人漢士同志，

因为排印一首詩而被判一年監禁。全德工人聯合會的 A. 卡培爾被判九個月，但被高等法院減為三個月。弗羅梅也是被判九個月而高等法院減為六個月。大批其他同志也被處以同樣重的，一部分還更重的處罰，這些案件所涉及的幾乎全是些起訴無效的事情，如果在其他法院，不過處以幾個星期的監禁或者罰款而已。在某些集團里，神經過敏症有加無已。一八七四年，整個普魯士在一百零四個案件中有八十七個拉薩爾分子共被判監禁二百一十個月又三星期。在薩克森也與此相仿，判決也越來越嚴酷。以往論月就夠了，現在論年來處罰。我們黨的人在被判罪者中占主要份額。 273

與司法判刑同時進行的是警察的制裁和解散。柏林全德工人聯合會在六月底被警察封閉。以後當該會主席哈森克萊維爾把會址移到不來梅時，他因為違犯結社法，被判監禁兩個月。此外，在柏林遭解散的還有社會民主工黨的支部、勞動婦女協會、全德鞋匠協會、全德細木工協會和全德泥水匠協會。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的警察仿效他們柏林同事的榜樣，也解散了那里現有的大多數工人組織。還有漢諾威、普魯士的哥尼斯堡和其他地區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以及社會民主工黨的各支部都遭到警察解散。薩克森和巴伐利亞也不落在普魯士之後。所以在慕尼黑、紐倫堡、艾爾郎根、侯夫的工人組織也都垮了台。同時，在慕尼黑有一系列的工會組織也被解散了，其中有全德裁縫協會，畫匠、油漆匠和鍍金匠工會，全德五金工人協會和全德木匠協會。

所有這些事情都大有助於使甚至最反對的分子明白，面對着這種對兩派毫無差別地施行的強暴懲罰，只有合併才能提高反抗力量。

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李卜克內西寫給我一封寄往茲維考地方監獄的信，信里說，

“昨天特耳克在這里，他想同我們合併。弗里茨舍今天給我來

的信意思相同。根据弗里茨舍說，萊邁尔和哈賽尔曼也願意，至少是联合起来；合并还不可能。余容面談——国会開幕前八天我来拜訪你。只說这些！可以确定的是，全德組織要完全解散；特耳克（同他的会晤妙极了）后悔地承认，神圣的組織沒有表現它的优点……我們的不願立即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联合会議，使他大失所望，而我又說明，我們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薩尔綱領，即使是改革了的綱領也不行，这使他更加失望。特耳克认为，根本用不着提到拉薩尔的名字，总之，拉薩尔崇拜純粹出于策略性的原因，云云。特耳克的前来，是受了哈森克萊維尔（他在蔡茨）的委托，并且取得沃德的同意的。这是一派——另一派是哈賽尔曼—萊邁尔。两派之間的所謂公正人是弗里茨舍。特耳克非常痛恨哈賽尔曼。当我問起，哈賽尔曼是否对他——特耳克的措施同意，他回答說：不同意，但他必須同意！当我又反駁他說：如果你們反对掌握着《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哈賽尔曼，那你們就会被毁灭，像当年施韦泽对付反对派一样。但特耳克回答說：哈賽尔曼不能有所作为，报纸在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哈森克萊維尔。”

李卜克內西还写道，他向特耳克解釋說，我們在萊比錫不能作決定，他应先到党理事会所在的漢堡，在那里同盖布、奧艾尔等进行商談。在圣诞节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須先举行一次討論会，人們还是必須謹慎从事。“合并还不能考虑”，李卜克內西結尾时写道；但是已經开了端，事情就会繼續进行下去。

在漢堡大家一致建議，双方以相等人数組成一个委员会，討論联合的条件并拟訂提案。这个为联合的努力在我們党内一为人所知，就受到普遍的欢迎。当寶曹尔同志（茲維考）十月十五日給我一封寄到監獄里的信說，他听說正在进行关于合并的协商，我回信說：这我已知道。我很高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們現在向我們靠拢，并且为和解而伸出了手。如果他（寶曹尔）得到的消息是李卜克內

西“不加思索地”拒絕了建議，那是傳聞失實了，李卜克內西在漢堡的行動顯然與此相反。李卜克內西和我對這個和平建議是以滿意的心情予以歡迎的。“歷時八年的鬥爭費去了我一大部分精力、許多時間和其他犧牲。好了，這個鬥爭要一勞永逸地勝利結束了。”

關於哈賽爾曼和萊邁爾的鼓動，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特耳克由伊塞爾寫信給理事會委員沃德（他在哈森克萊維爾服刑期間擔任聯合會副主席），信裡面說道：

“據《人民國家報》的通告來看，‘愛森納赫派’正在輕快地进行聯合計劃的商談。如果我們不願被他們趕過去，那麼，我們也必須作最勤奮的活動，同時還要顧到哈賽爾曼和萊邁爾兩位先生的反感。特別請你注意的是，哈賽爾曼和萊邁爾通過他們在第一一九期《新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的講話公然說出了他們的意圖，要想毫不顧聯合會的領導而完全自由地进行鼓動；對於這些先生們似乎根本沒有副主席存在。

因此，從各方面看來，迅速協商是絕對必要的，所以我認為必須按下列方式進行：

1. 因為按照哈森克萊維爾的看法，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你或者由理事會委員在這事件上採取正式的步驟，又因為人們到處在等待着我的旅行結果的消息，所以我在我們方面為了召集聯席委員會會議作些通訊工作，直到委員會開幕為止，是有好處的……

2. 為了使某些反鼓動不生危害，我必須迅速在烏培爾河谷召開一個萊因區和威斯特伐利亞的全權代表會議……”

然後特耳克也為包括卡塞爾在內的南方作出同樣的建議並且自請到法蘭克福、歐芬巴赫、哈瑙和卡塞爾去一趟。他在信中接着說：

“哈賽爾曼以昨天的《新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社論，特別是社論結尾的話，已開始了他的反對代表會議的鼓動。”

特耳克在信的末尾請求立刻不倦地行动起来。

哈森克莱维尔贊成特耳克的办法，可是他同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在蔡茨监狱中的一次談話議妥，等到他十二月初释放以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双方代表为了討論此后的步骤在柏林会晤了。在那里商定，每方推选数目相同的会员，并各拟好自己方面关于綱領和組織的建議。而后双方代表相会，根据这两个草案再拟訂一个草案，呈交代表大会作为商討的基础。

276 哈森克莱维尔給他那协会成员的通告进一步公开了正在进行的合并努力的最初消息，这个通告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国家报》加以轉載。他在通告中說，当他知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贊成合并以后，就同也怀着合并願望的社会民主工党进行談判。拉薩尔派希望把拉薩尔的观点和要求納入共同綱領，并且創設一个統一的严格的組織，这可以考虑，但是不宜輕率討論，这一点双方代表是一致的。

合并的消息第一次向群众宣布是在柏林。在这个集会上有七个被释放的国會議員出席。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的決議，还决定把會議經過通知在普略曾湖的莫斯特和在茲維考的我。

第二次联合运动是在汉堡約尔克安葬的时候，前面已經报道过，他是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夜間亡故的。两派共五千人拿着二十面旗帜，跟在这个既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創始人之一，后来又为社会民主工党創始人之一，而且全心全意地为运动服务的人的灵柩后面。

一月十九日，爱德华·伯恩斯坦給我一封信，在信里他道歉，因为他身为在柏林举行的民众大会的秘书并受委托向莫斯特和我传达大会最誠摯的同情，到如今才履行职务：

“我不知道您对于联合如何想法，但我相信，有一点我們大家

是同意的，即这种关于联合的思想要尽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决不作幻想，但我知道，就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中，对于联合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可惜那些人都是顽固不化的拉薩尔分子，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所让步。”

规定的委员会由双方各八人組成。拉薩尔派委任了哈森克萊維尔、哈賽尔曼、R. 和 O. 卡培尔、沃德、賴因德斯、哈尔特曼和瓦尔特，爱森納赫派委任了奥艾尔、伯恩施坦、鮑克(哥达)、盖布、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拉姆和瓦尔特希。以后，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委员会在哥达开会，以便把两个非常分歧的綱領和組織草案打成一片。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最后指定由盖布、哈森克萊維尔、哈賽尔曼和李卜克内西組成起草委员会。后来該委员会宣称，参与者对于工作結果完全滿意。但在党内并非处处如此。当三月五日李卜克内西把綱領草案給我送到監獄來并附帶說，更进一步是办不到了，这对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靂。我必須順便說明，李卜克内西虽曾允諾来看我，可是並沒有來，而且他和莫特勒都不认为值得把有关談判的任何消息通知我，这已使我有几个星期非常激动，憤怒万分。我认为，可以期待会告訴我的。現在我坐下来，写了一封长达數頁的、非常刺激的信，在信里我尖銳地批判了綱領并且另外草拟了一个确实过于冗长的詳細的对案。我又一次证实了，与外界隔离后是多么有利于空想。李卜克内西請我原諒他沒有來訪我和同我商談。不过他的工作太忙，此外他还說，在一个官吏監視之下談論棘手事件不是愉快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当一个囚犯知道外面在談判抓住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觉的事件，纵然发言受限制，他还是渴望來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送給漢堡的党委会，在那里这封信当然也被拒絕接受。即使我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建議，我对綱領草案的不滿并未因而消除。除我以外，白拉克也激烈反对这个草案。当他祝賀我四月一日毕业出獄时，他非常

激昂地表示反对这个綱領。白拉克在最近几年也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謹慎。他因不断害病，曾屡次实行易地疗养。另一方面，营业关系（他是他父亲的商店的負責人，而且因为創設一个印刷和出版企业，财务上的負担很重，只有謹慎从事，才能避免严重的損失）迫使他不能参加党的許多重要事情。結果是白拉克不属于合并委员会，令人很是遺憾。他告訴我，他給盖布写的信曾提到，綱領第三部分簡直是荒謬的。拿这种胡言乱語傳染黨員同志，而把反对意見排斥出党，黨員資格也以对此同意与否而定等等，这是可耻的。我們之間展开了书信往还，白拉克在四月十九日写信給我說：

“这一次要由我这方面請求原諒了。可是我也这样沒有時間，而且必須承認，草案的第三部分使我非常扫兴，所以不乐于对这件事勉强挤出一个钟头的時間。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这个草案是无法修改的，必須另拟一个全新的草案；我現在很願意同你在馬格德堡會晤，但恐不能拟出草案，哪里有時間呢？”

最后他认为，我們既沒有時間來徹底討論，而且誰都沒有時間來草拟一个草案，所以应当把委员会的草案通过批判尽可能加以改动之后，接受它作为临时綱領。对于我拟的草案的詳細節目他也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應該归在一本小册子里。除我之外，白拉克为了綱領草案也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因而引起馬克思写出他那著名的批判，发表在《新时代》第九卷三八五頁上。

我因此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給恩格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間道：“您和馬克思对于联合問題意見如何？我不能作充分有效的判斷，因为我一概不知，我仅曉得報紙上的报道。我急欲在我四月一日出獄時听到和看到事情的情况究竟怎样！”恩格斯給我的回信如下：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于倫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經接到您二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問我，我們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們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無論是李卜克內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給我們一点消息，因此，我們所知道的也只是報紙上所登載的那些，而直到大約八天前收到綱領草案时为止，報紙上並沒有登載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們吃惊不小。

我們党經常地向拉薩尔派伸出手来，建議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維尔們、哈赛尔曼們和特耳克們的无礼拒絕，因而就連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既然这些先生們現在自己来謀求和解，那他們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們就有責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們的党在工人輿論中重新巩固他們已經动摇的地位。我們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們，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們有多少誠意放弃他們的宗派口号和他們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一八六九年的爱森納赫綱領或这个綱領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們的党在理論方面，即在对綱領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絕對沒有什麼要向拉薩尔派学习的；而拉薩尔派倒是应当向我們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們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薩尔派，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許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綱領草案证明，我們的人在理論方面要比拉薩尔派的領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誠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誠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騙。

第一，接受了拉薩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錯誤的

說法：對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這句話只有在個別的例外場合才是正確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或者是在一個不僅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國家和社會，而且繼它之後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也已經徹底完成了這種改造的國家里。拿德國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屬於這反動的一幫，那末，社會民主工黨怎麼能同他們，同人民黨攜手合作了這許多年？《人民國家報》怎麼能從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法蘭克福報》中吸取自己的幾乎全部的政治內容呢？怎麼能在這個綱領中列入了整整七項簡直逐字逐句同人民黨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綱領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一到五和一到二，這七項要求中沒有一項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①。

第二，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原則在目前實際上已經完全被拋棄，而且是被五年來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一直極其光榮地實行這一原則的人們所拋棄。德國工人之所以處於歐洲運動的先導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戰爭期間採取了真正國際主義的態度；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做得這樣好。現在，在國外，當各國政府極力鎮壓在某一個組織內實現這一原則的任何企圖而各國工人到處都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卻打算拋棄這個原則！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究竟還剩下什麼東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

① 指的是哥達綱領草案的下列各項：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自由的基礎：

1. 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在國家和地方的一切選舉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選舉權；
2. 實行人民有權提出和否決議案的直接的立法；
3. 實行普遍軍事訓練，以人民軍隊代替常備軍，由人民代表機關決定宣戰與媾和的問題；
4. 廢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關於出版、結社和集會的法律；
5. 建立人民法庭，實行免費訴訟。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礎：

1. 通過國家來實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國民教育。實施普遍的義務教育。實施免費教育。
2. 科學自由。信仰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

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一八六九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話），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而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让拉薩尔的‘铁的工資規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規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經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薩尔的論据）。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經詳細地证明，調节工資的各种規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規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規律占优势；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薩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語来了结。拉薩尔从馬尔薩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襲来的这一規律的馬尔薩斯式的論据，例如拉薩尔在《工人讀本》第五頁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論据，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駁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薩尔的‘铁的規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錯誤的論点和它的一个錯誤的論据。

第四，綱領把拉薩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

地提出來作為唯一的社會的要求。而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這個要求毫無用處之後，在我們黨的幾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發言者在同拉薩爾分子的鬥爭中不得不起來反對這種‘國家幫助’之後提出來的！我們黨是不能比這更自卑自賤了。國際主義黨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會主義黨降低到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畢舍的水平，而畢舍提出這個要求來對付社會主義者，是為了奪取他們的陣地！

拉薩爾的‘國家幫助’至多也只是為達到目的而實行的許多措施中的一個，而綱領草案卻用軟弱無力的詞句表述這個目的：‘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辟道路’，好像我們還有一個在理論上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似的！所以，如果說：‘德國工人黨力圖通過工業和農業中的以及全國範圍內的合作生產來消滅僱傭勞動並從而消滅階級差別；它擁護每一項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沒有一個拉薩爾分子能提出什麼反駁來的。

第五，根本就沒有談到通過工會使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組織起來。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因為這是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階級組織，它靠這種組織和資本進行經常的鬥爭，使自己受到訓練，就是最殘酷的反動勢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樣）現在也決不可能摧毀它。既然這一組織在德國也獲得了這種重要性，我們認為，在綱領里提到這種組織，並且盡可能在黨的組織中給它一個位置，那是絕對必要的。

這就是我們的人為了討好拉薩爾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對方做了些什麼讓步呢？那就是在綱領中列入一堆相當混亂的純民主主義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純粹的時髦貨，例如‘人民立法’，這種制度存在於瑞士，如果它還能帶來點什麼東西的話，那末帶來的害處要比好處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來管理’，這还有点意義。同樣沒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條件：一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一切職務

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

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綱領，如果它被通过，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們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們將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請您想想，在国外人們是要我們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負責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們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說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話負責。在人們的想像中，我們是在这里指揮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內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說干涉过的話，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論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綱領形成一个轉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們拒絕替承认这个綱領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283

一般說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綱領沒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綱領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綱領無論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納赫綱領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綱領将会說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薩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連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們党的优秀分子会願意不断地重复拉薩尔关于铁的工資規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詞句嗎？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們这样做，他們的听众就会向他們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薩尔派会死抱住綱領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們已經恢复哈賽尔曼、哈森克莱維爾和特耳克及共同伙的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

‘誠實的’名声；分裂以後，我們將被削弱，而拉薩爾派將會增強；我們的黨將喪失它的政治純潔性，並且再也不可能奮不顧身地起來反對它自己在一個時期內寫在自己旗幟上的拉薩爾詞句；如果拉薩爾派以後又說：他們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黨，我們的人是資產者，那末，他們是可以拿這個綱領來證明的。綱領中的一切社會主義措施都是他們的，而我們的黨除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麼東西也沒有添進去，這個黨在同一個綱領中又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說成是‘反動的一幫’中的一部分！

我把這封信攔下來，是因為您在四月一日慶祝俾斯麥生辰那一天才會被釋放，而我不願意讓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傳遞時被搜去的危險的。剛剛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對這個綱領也有很大的疑慮，他想知道我們的意見。因此，為了迅速起見我把這封信寄給了他，讓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這個麻煩東西再全部重寫一遍。此外，我同樣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朗姆，我給李卜克內西只是簡單地寫了幾句。我不能原諒他，因為關於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說太遲的時候他還連一個字也沒有告訴我們（而朗姆和其他人卻以為他已經詳細地通知我們了）。他從來就是這樣做的——因此，我們，馬克思和我，同他進行了許多次不愉快的通訊——但是，這一次做得實在太可惡了，我們堅決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設法夏天到這里來，當然您將住在我這里，如果天氣好，我們可以去洗幾天海水浴，這對於過了很久牢獄生活的您一定會有很大好處。

您的友好的弗·恩·

馬克思剛剛搬了家，他的住址是：倫敦西北區克雷森特街梅特蘭公園路四十一號。”^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一—三十四頁。

——譯者

关于我目前的态度，白拉克随后在五月十日写信给马克思说道：

“我起先曾认为，倍倍尔会倾向于坚决行动，但是一方面受了损害的健康和必要的恢复营业工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的恳切请求似乎妨碍了他。”

使我不把对于纲领草案的不满公开发表出来的，不仅有李卜克内西的请求，而且有各方面的劝说，说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把这事声张出去，因而也许使合并成为不可能。

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

由于国会复会，议员们要比较长久留在柏林，这样就基本上促进了领导人对于联合的努力。国会于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幕，可是在一月三十日就闭幕了。我们的代表参加讨论并不活跃。议员们对于党的联合谈判较之国会的讨论感到更大的兴趣，尽管国会所办理的是些重要案件。议案中有法院组织法草案、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草案，还有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法律草案，关于该草案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后来都曾发言。

请求在开会期间准许我们请假出狱的建议自然是又提出了，这次建议包括着哈森克莱维尔、莫斯特和我。在申述建议理由时，李卜克内西发言，他不肯放过机会把判我们有罪的讼案细细检查，并彻底粉碎这些判决。他特别着重当时莫斯特在普略曾湖所遭受的无理待遇。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是温德荷斯特发言，他也同样激烈地控诉老汉诺威军营对于政治犯的处理。但是关于释放我们的建议，他考虑到宪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不能赞同，不过他希望，如果一位在

押的議員提出請假，政府对此应欣然同意，首相先生并应予以支持。俾斯麦为此发言并加以嘲笑說，“首相先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將贊成犯人的請假，如果他請假是因为人們在国会中长久沒有听到像前面两位发言人的那种富有教育意义而又为我們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发言的話。（大笑。）国会沒有料到，它由于像以往一样作了否定的決議，因而不久就陷入一种尷尬的境遇。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建議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討論的，但早在十二月十二日，議員拉斯克尔在議員馮·本尼格森、申克·馮·斯陶芬堡、馮·傅尔肯貝克、海乃尔博士、温德荷斯特、馮·邓泰、施瓦采博士和霍亨卢恩侯爵（兰根堡）——即全部資產階級政党的代表支持之下认为有必要提出下列建議：

“因鑒于据可靠消息国会成員馬容克先生由于一件法律上已生效的刑事判決昨天已經被捕，議事規程委员会以急件交議下列事項：1.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在国会开会期間不經国会同意而逮捕国会成員是否為宪法所容許；2. 为了預防国会成員在国会开会期間因法律上生效的刑事判決，不經国会同意而被逮捕起見，可否采取步驟和应采取何种步驟。”

这个建議是很可笑的，議會却立即予以討論。結果像国会屢次地并且最后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决定的那样，认为宪法第三十一条不适用于議員的刑事拘捕，所以主管机关也无可爭辯地有权在會議期間逮捕議員。議員馬容克因为担任《日耳曼尼亚报》的編輯而被判一年監禁，这个案件引起莫大的惊奇。也无可置疑的是，他的拘押在国会开会之前不久不是沒有俾斯麦同意而执行的。因为事实上判決已从九月二十三日生效，馬容克的拘押既然未在會議開幕前执行，則可待至會議結束後，即一月底执行，亦无损于司法。但是俾斯麦不願这样。他显然为了十二月四日的辯論要給中央党一个警告；至于这样一来，国会在精神上也挨了一个耳光，

并且根据自己的決議而不得不忍受这个耳光，这在他看来，却是无关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出席討論也是不值得的。因此，拉斯克尔的建議被交給議事規程委员会，但該会，如所预料，对于任何建議也不能取得一致，几天后还是毫无結果，提案又回到議會。在这里，辯論经历了同样可怜的过程。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議总是被某一多数所否决。結果是使国会丧尽体面。

我叙述十二月四日的辯論，作为俾斯麦对馬容克的报复行为的理由。在十二月四日的會議上，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約尔格发言評論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不召集联邦政府委员会来监督这个政策。当时有許多法国天主教把阿尔薩斯—洛林的德国籍公民当作他們的教区居民，发出一封主教通告，在通告中他們反对德意志的文化斗争的处置，这使俾斯麦很生气，发給該国大使一个通电，他在电报里說：应该查明，如果德国不可能同它的西邻持久和平相处，那末人們将不会坐待法国人完全作好了作战准备，而要自行选择适当时机先发制人。这是以战争相威胁，引起了巨大不安。根据《北德意志总汇报》上俾斯麦所說的一个名詞，这通电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名称：浇冷水通电。約尔格认为俾斯麦的这种办法是一个輕松愉快地使国家冒大危险的不負責任的行为。他还訴不平說，庫尔曼去夏在基星根行刺俾斯麦的事件，人們也要中央党負責。約尔格說，庫尔曼是个半瘋子，对于这种人中央党不能負責。俾斯麦为此在发言中极力攻击中央党。他提出庫尔曼在獄中向他（俾斯麦）供认，讀了中央党的报纸才决定行刺，他控訴中央党是行刺的共犯，庫尔曼是处在中央党羽翼之下的。这句话引起很大的喧嚷，中央党的座位中間向俾斯麦連續发出呸！呸！声。在爭吵中的主要呐喊人是后来的国会議長巴萊斯特伦伯爵。

俾斯麦始終不忘記这件事，因为他的狂暴天性的主要特色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的忿恨总引起我的贊賞，可是他滿足忿恨



的那种卑鄙讨厌的方式，却使我极为憎恶。在报怨上，他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个开会期间，我们有个意外收获。莫斯特用一个请愿书向国会申诉他在普略曾湖所受的待遇并建议依法整顿刑事监禁。须提出关于此事的报告。请愿书审查委员会不免认可莫斯特的申诉。在全体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也发了言，以大多数通过委员会的下列建议：

“请愿书要求首相先生办理的是，在那些迄今没有依法管理执行刑罚的联邦，特别是在普鲁士王国，联邦政府要迅速整顿刑罚的执行和监禁制度，以此保证按照刑法法典，特别是第十六条的意义来执行刑罚，尤其是徒刑；

此外，请求首相先生在普鲁士王国政府办理的是，删去同刑法法典第一百六条第二段相矛盾的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司法部训令（五C）和柏林监狱规章的第三十七条。”

我在三十一个月的监禁以后于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的生日）被释放。这一天不仅是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一个喜庆日。各地党组织给我大量的贺信和贺电，所以可以说，党大部分也把这一天看作一个喜庆日。

283

我的选区定于四月十一日在格劳绍举行欢迎大会，我带着家属前往参加。我在发言中对于目前的合并说道：“我满怀快乐地向往常从另一派立场作为敌人同我们对立的另一派的成员致敬；我们此后不仅和和气气地并肩前进，而且今已为我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共同奋斗。再说，我们不久就要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团体。虽则我们以往互相斗争得那末激烈，我们此后却将更有力、更勇敢无畏地反对共同的敌人。成功是必然到来的。”庆祝会的气氛极为美好，大家在实行和解的情况之下，好像是由魔掌中得到了解放。美

拉內的同志接着在七月間舉行慶祝大會，後來還有荷亨斯坦—艾恩斯塔爾也舉行大會。

摩里茨·赫斯於四月間在巴黎亡故，他沒有活着見到合併。卡爾·希爾施致悼辭。在同一個月，喬治·海爾維格也在巴登-巴登去世，他自從拉薩爾死後就離開了黨。在同一年，《法蘭克福報》發起為以前的“囚犯”奧古斯特·羅克爾募捐，他住在維也納，生活十分困難。

從哥達合併代表大會到 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前夕

合併工作

籌備委員會訂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召開合併代表大會。在多年的互相苦鬥之後，這些歷來互相敵對的兄弟們現在面對面地進行共同的工作。至於人們不馬上兄弟般地互相擁抱，而一部分仍是心存猜忌，這又何足怪？還需要大大地互相尊重和互相小心對待，以免在仍然存在的人和事的矛盾上發生衝突。在那些日子裡，我們的共同敵人好奇地和緊張地向哥達注視，看合併工作能否成功。這個工作在一些小小的磨擦以後得到意外的成功，有了結果。

出席大會的代表一百二十七人，代表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九個黨員。其中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代表七十一人，代表會員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八人；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五十六人，代表黨員九千一百二十一人。

大會由 W. 鮑克(哥達)以當地委員會的名義揭幕并向出席代

表致辭。鮑克是愛森納赫社會民主工黨的創辦人之一，而今他第二次着手創立新的、更大的政黨的工作。

蓋布和哈森克萊維爾被選為大會主席。在審查資格時，我主張准許萊比錫拉薩爾派的一個由聯合會總部分裂出來的小集團出席。既要合併，就完全合併。奧艾爾反對。我的建議被否決，但准許各派的代表列席討論。所以我獲得一半的勝利。接着是布勒斯勞的代表建議兩派應在全體代表大會開始討論以前，先分別舉行各自的代表大會，安排各自的內部事務。奧艾爾表示反對，說這在全體代表大會以後同樣可以舉行。為這件事，愛森納赫派需要一天時間。出席代表可以證明，這個計算是對的。代表大會是在兩派的代表取得協議後舉行的。沒有人懷有隱情。在愛森納赫派方面適用“我們貧窮，但是誠實”這個口號。我們不能把大會拖長，所以反對布勒斯勞人的建議。奧艾爾的這番話顯然傷害了對方，於是弗里茨舍在次日發言，就奧艾爾所說的，“我們貧窮，但是誠實”這句話提出申訴。這話會使人懷疑全德工人聯合會是不誠實的。蓋布勸慰弗里茨舍。奧艾爾說：他認為這話在現存情況下是對的。又說拉薩爾派自己發動了這種攻擊，卻說成“雙方”了。

290

這是在談判中出現的唯一嚴重的不和之音。

綱領問題由李卜克內西作報告。綱領中有這句話：勞動者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對於工人階級，一切其他階級只是反动的一幫”。我建議把末句改為，“對於工人階級，一切其他階級都是有反动性的”。瓦爾特希更進一步，建議刪去這一整段。他的建議是十二對一百一十一票，我的是五十八對五十票被否決了。在下次的特別討論會上我提議，要求兩性國民都有選舉權。哈賽爾曼表示反對，奧艾爾贊成。這提案以五十五對六十二票被否決。事後哈森克萊維爾解釋說：許多代表認為國民一詞使要求的詞意隱晦，因而反對我的建議；李卜克內西表示相似的意見說，他由於

文詞的原因(两性)反对我的建議,就事情本身而言,他是同意我的。此后,还有些我們提出的小修改建議被接受了。在最后表决时綱領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原則性的条文是: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通常只有通过社会才有可能,所以全部劳动果实应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应按照平等的权利、按各人合理的需要分配而归社会全体成員所有,并且人人有参加劳动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資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資料轉变为社会公有财产,并要求在按照公共利益来使用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情况下集体調节全部劳动。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291

2.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这些原則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資劳动制度連同其铁的規律和任何形态的剝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意識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定履行工人运动加在工人身上的一切义务,以便实现全人类亲如兄弟的关系。

3. 为了开辟解决社会問題的途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設立依靠国家帮助并受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的生产合作社。無論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大规模地成立起来,以便能从这中間产生出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組織。”^①

下面接着是要求国家民主化和其次的社会要求。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十九—二十八頁。——譯者

由綱領中可見，合并后党的名称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哈森克萊維爾作了关于所建議的組織的报告，照原案略加修改，一致通过。根据这个建議，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組成的理事会。为了监督理事会管理业务，任命七人組成監察委员会，該会地址由大会决定，其人选由該会所在地的党员选举。此外，选举散居德国各地的十八个人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临时裁决机关，决定党理事会有关事項，遇有特別重要事項，应理事会方面的邀請参与討論。地方的业务领导由党理事会委派一个由地方成員提名的代理人担任。人們希望借此可以避免因协会的违法联合而遭到控訴。不久就显出来，希望落空了。

党的理事会的所在地，照我的建議，决定为汉堡。还通过了我建議的理事会五位委員的工資，依此，执行业务的主席每月应得六十五塔勒，他的代理人十五塔勒，两位秘书每人五十塔勒，司庫三十五塔勒。这些数額是我們事先商量好的；我也以爱森納赫派名义建議，在新的理事会中选举三个拉薩尔派和两个爱森納赫派，也被通过了。于是哈森克萊維爾当选为第一主席，哈尔特曼（汉堡）为第二主席，奥艾尔和德罗席为秘书，盖布为司庫。監察委员会的所在地是萊比錫，由我担任主席。

党的正式机关报是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萊比錫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报纸都轉为党的财产。

五月二十七日夜晚十一时半，會議結束，大会在高呼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万岁和接着高歌馬賽曲的歌声中閉幕。

白拉克因健康关系未参与代表大会，大会閉幕后他对大会的結果表示滿意。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給恩格斯說：

“我个人还不能有所奉告，因为在作判断之前，必須先明了所決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決議不是荒謬的，那么我們也不要制

造荒謬。(暗指李卜克內西寫給白拉克的信中的話。)無論如何，李卜克內西、蓋布等是有誠意補救所犯的錯誤的。大會的經過表明，草案為了工人所必需而作的讓步，遠較由於照顧個人而對哈森克萊維爾等人所作的讓步為少。到現在為止，就可能判斷的而言，我對大會滿意，因大會表明了，工人事實上比我所想像的進步得多。”

我到秋季才答复恩格斯三月底的信。我写道：

“萊比錫，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底的來信，我攔起來沒有回信，非常抱歉。但我可以向您實說，在被釋後的頭三、四個月沒有一個鐘頭的安靜時間來復您的信，就在今天仍難擠出所必需的時間。

293 我完全同意您對於綱領草案的意見，由我給白拉克的信可以證明。我也嚴厲譴責了李卜克內西的委曲求全，既然遭到災難，就應該儘可能逃出此難。代表大會決議各項是所能達到的極限了。另一方面卻表現了一種可驚的淺見和部分的怨恨，如果不願使這個大聲喧嚷中上演的合併代表大會給敵人稱快，給黨大丟共臉，鬧到無結果而散，那末就必須像捧小磁人似的對付這些人。雖然如此，我們最後，特別在選人問題上，卻還做到使我們能對於結果感到滿意。當然還要對淺見和個人利己主義作許多鬥爭，但我毫不懷疑，如果我們處理得當，就可以鬥爭到底而無損於整體，並且在兩年內那些現在還有些頑固的分子會充滿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

全部是一個教育問題。人們受了八、九年拉薩爾—施韋澤式的精神教育，不能馬上就習慣於另一種方式，在這裡重要的是耐心。

如果我們這裡能夠滿足從各方面涌來的要求參加集會和作慶祝會演說的邀請，我所說的教育方法也許可以大大省略。同這些人作些私人往來可以很快地掃除偏見和成見，但是我們能夠完成的較之所要求的差得不遠了。

我特別被我的生意弄得疲憊不堪，因而對於邦議會選舉的失敗沒有比我更高興了。李卜克內西和莫特勒雖然專在黨內任職，情況也并不比我好些；因為他們的經常工作同流浪的鼓動生活很不協調，並且我們對於這一點做得已經太多，對它不感到很大的熱情了。而且肺部和發音器官也有點意見。

一般說來，我們對於黨的活動是很滿意的，現在才看到，以往的鬥爭怎樣地分散了力量。現在黨的財務情況是以往所沒有的，雖然營業蕭條，會費却收得很準時和正常。

承您友好地邀我到倫敦去，照上述的情形看來，我自然是難以遵命；我很願意到古老的英國去一趟，但目前還不能作此想。明年我或許要到萊茵省，也許到荷蘭去做生意，那末到您那里的路程就不太遠了。

我所說，馬克思在卡爾斯巴德，但是我或許見不到他了；據李卜克內西說，他想取道巴伐利亞回去。我大約十四天後來到卡爾斯巴德，我想到波希米亞作業務旅行，但屆時他大約已不在那里了。馬克思如果回去，請代我向他表示致候。您不打算到德國故鄉來看看嗎？您住在英國好像鏽住了。

294

友誼的敬禮

您的倍倍爾。”

恩格斯給我的復信表明，他和馬克思對於我的信的看法與該信的內容不大相合。恩格斯寫道：

“倫敦，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親愛的倍倍爾！

您的來信完全證實了我們的看法：這種合併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是太輕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將來分裂的萌芽。如果這種分裂能推遲到下屆帝國國會選舉以後，那就很好了……

現在這個形式的綱領包括三個部分：

273

1. 拉薩爾的詞句和口號，接受這些東西是我們黨的一種恥辱。如果兩派要想在一個綱領上取得一致的意見，那就應當採納雙方一致同意的東西，而不涉及並非雙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誠然，拉薩爾的國家幫助也曾列入愛森納赫綱領，但是，在那里它不過是許多過渡措施中的一個，而且就我所聽到的一切來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要不是合併，它就會在今年的代表大會上根據白拉克的提案刪掉了。現在它卻被看做醫治一切社會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藥。讓‘鐵的工資規律’和拉薩爾的其他詞句強加在自己的頭上，這是我們黨在道義上的一次巨大的失敗。我們的黨改信拉薩爾的信條了。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認掉的。綱領的這一部分是奇恥大辱，我們黨就帶着這樣的恥辱匍匐於神聖的拉薩爾的赫赫聲名之前：

2. 民主要求，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黨的精神和風格擬出的；

3. 向‘今天的國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誰也不知道，其餘的‘要求’应当向誰提），這些要求是非常混亂和不合邏輯的；

4. 一般的原理，多半是從《共產黨宣言》和國際的章程中抄來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內容全部弄錯，就是變成了純粹的廢話，正如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中所詳細指出的那樣。

295 整個綱領都是雜亂無章、毫無聯繫、不合邏輯和給人出丑的。要是資產階級新聞界中有一個有批判頭腦的人，他就會把這個綱領拿去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話的真實含義，極其明確地指出荒誕無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經濟學上的錯誤（例如，勞動資料今天為‘資本家階級所壟斷’，似乎地主已經不存在了；不說工人階級的解放，而說‘勞動的解放’，而勞動本身在今天恰恰是過份自由了！），並且把我們的整個黨弄得非常可笑。資產階級新聞界的蠢驢們沒有這樣做，反而以非常嚴肅的態度來對待這個綱領，加進了其中所

沒有的東西，並做了共產主義的解釋。工人們似乎也是這樣做的。僅僅是由於這種情況，馬克思和我才沒有公開否認這個綱領。當我們的敵人和工人都把我們的見解摻到這個綱領中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對這個綱領保持沉默。

如果您對人選問題上所達到的結果感到滿意，那就是說，我們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當低了。兩個是我們的人，三個是拉薩爾派！因此，在這裡，我們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同盟者，而是戰敗者，並且事先就決定了我們的少數派地位。委員會的活動，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也不是令人快慰的：1. 決議沒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貝克爾的關於拉薩爾主義的兩本著作包括在黨的目錄里；如果能把這個決議撤銷，那就既不是委員會的也不是李卜克內西的過失；2. 禁止瓦爾特希接受宗納曼向他提出的擔任《法蘭克福報》記者的建議。這是宗納曼親自告訴正在旅行中的馬克思的。使我感到驚奇的，與其說是委員會的妄自尊大和瓦爾特希不是對委員會滿不在乎而是對它唯命是從，不如說是這項決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委員會倒是應該設法使得像《法蘭克福報》那樣的報紙到處都只由我們的人替它服務……

說這整個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義的試驗，它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還有希望取得極其有利的結果，在這一點上，您是完全正確的。這樣的合併只要能維持兩年，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但是，它無疑是可以便宜得多的代價取得的。……”

由此可見，要想同倫敦這兩位老人取得諒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我們所認為聰明的打算，靈活的策略，他們却看做是軟弱和不負責任的讓步，可是合併的事實畢竟還是主要的事情。從邏輯上來說，這個主要事情在自身里就包含着繼續發展，今後和以往一樣，我們的朋友和敵人都關心這件事。黨的理事會在恩格斯所指責的事情中所犯的局限性和偏狹性也不能改變這一點。這裡

必須說明，当时《法兰克福报》对于我们所代表的方向持着友好的态度，相反地，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宗納曼則吵鬧不休。所以不难明了，联合会方面对他和他的报非常仇視。

合并过程并不是到处都像我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順利。特别是在有哈賽尔曼和李希特尔(王茲培克)和他們的信徒进行挑撥的汉堡，这些人常常有激烈的互相冲突。奥艾尔作为党的秘书住在汉堡，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相当可忧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写信給我說，在党的成員中仍旧很不一致，是否会由于这一切可恶的瑣碎事而再鬧出分裂，很成問題。并且在九月二十五日他又給我一封信，重訴他的愁詞。后来在一八七六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李希特尔(王茲貝克)因为进行損害党的活动而被开除党籍。

一八七五年春天，在萊比錫当选为国会議員的斯台法尼博士辞去了委任。于是来个补缺选举，我又被提为党的候选人。五月十一日选举时，我得了四千零十八票，較上年普选时多三百六十七票，我的对手民族自由党的竞选人較保守党的少得一千多票。我同时也被提名为薩克森的美拉內一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的邦議會选区的邦議會議員候选人。这里我同样失败了，是以六百九十四票对我的民族自由党对手所得的八百九十九票。我很滿意于这次失败，如上面轉录的我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党在那时还很少致力于邦議會选举。而且选举法比起今天的現行选举法来，誠然是很有利的，它对选民的要求是繳納国家直接稅三馬克、薩克森籍和年滿二十五岁。如果要想被选为議員，即所謂被选举权，其要求是：至少納三十馬克的国家直接稅、年滿三十岁和获得国籍已滿三年。

虽然如此，我們的选举人还是为数很少，因为那时許多工人并没有繳納与每年收入六百馬克有連帶关系的三馬克國稅。到一八七六年施行了新的所得稅法，由于收入估計得較高，选举法才变得對我們有利。从該年起，我們才有成效地參加邦議會的选举。

297

为了使往日敌对的兄弟們越来越亲切深刻地感觉到已实现的統一，我們一致同意，由以前兩派最出名的人物到他們以往比較难达到的地区去举行集会。于是李卜克內西和莫特勤往北方和西方，哈森克萊維爾、德累斯巴赫等到南方和薩克森去，我到阿尔托那一漢堡，參加我在那里举行的集会的异常踊跃，在柏林的提佛里我所举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也是这样。在漢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各地，由于一八七五年十月一日創刊了《漢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运动有了新的据点。哈森克萊維爾现在宁愿脫离理事会而加入《漢堡—阿尔托那人民报》的編輯部。

当时的境遇对于我个人來說是不惬意的。营业与党之間的利益冲突使我痛苦异常，关于这，白拉克在八月底也写信向我訴苦。做一个营业的奴隶是悲慘的。但是如何摆脫？他意欲把他的印刷出版企业卖给萊比錫印刷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所顾虑。出版社和印刷所使他担负极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債務。我很詫异，他虽有不少煩惱而仍保持着愉快心情。因为我在那时获得了我后来的合伙人（合营是次年秋季才实行的，合营的消息却闪电似地在萊比錫传播开来），敌人就造謠說，我此后将要脫离党的生活了。这个謠言是一个阿尔登堡的同志首先告訴我的，他在八月三十日写信对我說，他在萊比錫的短時間內由各方面听說，我找到一个合作者，将成为一个大工业家，而后就要慢慢退出党。他在什麦尔恩的一个工人宴会上，也告訴了美拉內和郭斯尼茲的同志們，并且同他們說，他們必須克服我所給与他們的这一沉痛打击。但令人感动

298

的是，这些同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回答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不会有的事。同时他也认清了这消息不确。但是他答应他们，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并请我原谅他的冒昧，他说我可以公开地辟谣，我则认为不值得这样做。

在这时期（一八七五年九月）莫斯特还一直关在普略曾湖的监狱里。我给他一封长的慰问信并探问他的近况如何。我已经听说，他的待遇也比从前优厚了一些。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我说：

“亲爱的倍倍尔！如果我告诉你，我常常数月之久既没有从党方面，也没有从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字，那你就可想而知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请勿为我担忧，我固然是够懒的（完全由于我的俭约的生活方式），但还不至于颓丧。从幼年起，尤其是近七年以来，我一直过着下贱的生活，常常能够忍受非常多的东西……你传达给我的有关我们党的一切消息又重新证明了，对我们进行的一切迫害以往和现在都是徒然的。如果我出来了，我希望能感到愉快。至于我要说的东西，那自然还要忍耐一时……我做什么呢？现在我刻苦用功！第一，我为盖布写东西，第二，我努力于法文翻译，第三，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人们在今天，如果不愿作蠢汉就必须多多阅读……我的时间过得很快。盖布认为，我可以申请暂时释放，但是到现在我已拒绝三次了，因为这种乞怜是既无原则又无好处的。”

国会工作

一八七五年十月底，国会又开会了。在差不多三年半的间断以后，我第一次再参加国会会议。也在这次会期中，党的代表第一次以合并的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我们的党团的行动也立即比以往任何一次会期都更为活跃，更为自觉和更有力量。讨论材料的性质也是有助于热烈辩论的。

向国会提出的有一个关于修改工商业条例第八条的法律草案，连同关于互助基金的法律草案。我們在討論法律草案的各阶段都以全力进行爭辯。几乎党团全体成員参加辯論，一部分还反复参加辯論，并且对于各条提出相当多的建議。草案在工人界造成很大的不滿并招致一批請願书，特别是柏林的疾病救济基金委员会的請願书很仔細地研究了法律草案的各条規定。

議會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充当总辯論时的发言人。討論在十一月六日开始，还要在当天結束。多数派願意尽可能少辯論而迅速結束。我对于当前内容的草案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党团和党当时的立場是，疾病救济基金专属于工人，因为只有他們繳了費，所以應該有完全的自己管理权。保证金以及关于意外事故的一切后果的保证金要完全由企业主負擔。殘废保险和养老保险由双方出资举办。我說，草案把工人置于官厅和企业主的监护之下。草案否认工人具有一切其他階級在管理自己的财产上所具有的权利，这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财产的无限权利。如果我們在一个股份公司法或者合作社法中搞个这样的监护章程，国会会說什么呢！人們不从伟大的与帝国相称的观点出发而从渺小的和最渺小的观点出发。尤其是与保证金法第四条有联系的部分，草案是很有問題的，因为草案把救济基金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而該項基金是应由企业主的賠償义务保险来担負的。法律草案如果基本上保持它现在的性质，它在工人界中所引起的将不是滿意而是大不滿意，也就是与它的目的正相反。这个草案被轉交二十一个人員組成的委员会。在这決議以后，議員米凱尔走过来問我，是否准备任該会委員。我在逼詢党内同志以后，声明願就。但在就要选举时，議員米凱尔又到我跟前說，他十分抱歉地通知我，他的議會党团的大多数不願选我。他劝我去和中央党协商。这个我拒絕了；为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而去請求其他党派，有損我們的尊嚴。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当

时已经成立，该会按各党团人数的多少分配委员会的委员。每个党团至少须有成员十五人，而我们只有成员九人，不能认作一个党团。所以我不能参加委员会。最后我们因为我们的修正建议没有获胜，于是投票反对该法案；我们的建议全部被否决了。

我们参加讨论的第二个议案是刑法修订案，这个修订案把刚生效五年的刑法修改或新增不下五十三条。联邦政府要想用十四条新罪行的议案来保证刑法迫害。俾斯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个逞强肆暴的人；凡是感到不便或讨厌的时代潮流，他总相信，能够使用国家的暴力把它消灭掉。他对于天主教运动、波兰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虽然在他的晚年这种政策的彻底失败已了如指掌，他是个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的时候，他的这种观念依然未改。迄今用警察和法官没有做到的事，要想全靠刑法附则来促成。所以特别是刑法法典中所谓政治条款，例如：九十五、一百零三、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一、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甲、一百三十一等条款都相应地加重了。于是第一百三十条就包含如下的内容：凡是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公开挑拨各阶级民众互相对立者，或者以同样方式用言语或文字公开攻击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所有制者处以监禁。第一百三十一条也作了类似的补充。提案是用以前臭名远扬的普鲁士的那个关于怀恨和蔑视的条款略加修改来代替这一条。我们采取的策略，首先是观望，让对政府这个草案非常不满的自由主义者向前。这个策略证实是正确的。不仅进步党的海乃尔博士，而且连民族自由党的班伯格和拉斯克尔都阐明关于舆论自由的见解，使我们不必加以补充，他们这个见解却大不同于他们几年后对于第二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所持的态度。议案的一部分移交委员会，另一部分由大会讨论。第一百三十条列在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议事日程上，在讨论这一条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参加。普鲁士内务部长欧

伦堡伯爵的发言开始时說道：我的先生們，第一百三十条是針對社会民主党制定的。他发言的其余内容主要是引证《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报上的和一八六三年拉薩尔一篇演說中的大段碎句，他企图由此来证实我們对国家的危害性。最后他請求給联邦政府以必要的权力来对付我們，否則就只好滿足于目前不中用的法律条款，“直到用枪射击，用刀砍杀时为止”。这个演說絕沒有給人什么印象，所以哈賽尔曼在欧伦堡之后发言时，輕而易举地把他駁倒了。政府面对着社会民主运动而不了解这个运动只是現有經濟弊病的自然結果。社会民主党綱領中的要求是我們所建議的医治現有病症的良藥。对于控訴我們在民众集会中煽动工人的話，他提出质問說，人們为什么不到这些大会上去駁斥我們呢？階級斗争是敌人开始的，巴黎公社就证明了，他們是多么殘酷和血腥地进行斗争。他最后声明說，無論以怎样沉重的牺牲为代价，我們也要在合法基础上繼續进行斗争。辯論的結局是，在保守党的一个修正案被否决后，竟沒有一票贊成政府的建議，因而引起哄堂大笑。 302

党报对欧伦堡的演說表示感謝，因为它起了有利于党的鼓动作用，党的理事会决定把它广泛传播。第一百三十一条新修訂的条文在国会中也没有博得人們的喜愛，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关于所謂阿尔尼姆条款(三百五十三甲条)李卜克内西发表了一个簡短的、但很有作用的演說，引起国会多数派的激烈反对。

当修訂案第三讀时，俾斯麦感到需要再把提案的第一百三十条談一談。但因这一条已不存在，議員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又提起那个議案。于是俾斯麦馬上向我們猛烈开火。他要求，在国会里也应该反对社会主义鼓动。如果一个社会党的議員在議院中講話，就要照例在听他的話时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与国会无关的世界。人們必須極其广泛地宣传反对社会主义者那种空想謬論的理由；現在竟鬧到在这里国会中公开頌揚巴黎公社的杀人放火犯，而

无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是一种被诱惑者只能在诱惑者的遮眼灯阴影中才会看到的幻象；如果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不切实际和有罪的愚蠢就必定暴露出来了。

303 俾斯麦这个指责无疑是针对我在一八七一年会议为巴黎公社辩护的演说，因为自从那次以后，国会再没有关于公社的演说，于是我要求发言。温德荷斯特和俾斯麦又讲了一次话，然后拉本瑞的瑞代克男爵声明撤回他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俾斯麦侯爵在第二读时缺席，现在既已发言，他的建议就已达目的。当温德荷斯特坚持继续辩论时，因傅尔肯贝克不能出席而暂代议长的辛森反对。当宗纳曼为了要使我得以发言而又提起拉本瑞的瑞代克的建议时，辛森宣称，议员瓦兰丁已提议结束辩论。因此，瓦兰丁的讨论终结建议又早就储存在办公室内随时备用。于是断绝了我回答俾斯麦的攻击的发言的机会。我就企图用个人说明为自己辩护。我谴责人们不让我在首相对我个人激烈攻击时作答辩。（中间一再有人叫嚷。）首相的攻击无疑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可以指出一八七一年我的演说作证。首相诉苦说他本人时常遭到侮辱，因而他给议会这个首先应对我和我的党施行的妙计。他控告我为杀人放火犯辩护，我把这话作为对我的侮辱来驳斥。我所以为巴黎公社的人们作辩护，正是因为不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杀人放火犯，而应该看作是遭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人们。瑞士联邦、比利时和英国三个大名鼎鼎的政府曾认为巴黎公社的逃亡者不是罪犯而拒绝引渡，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杀人放火犯。说到这里，议长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陈述已不是个人性质了，我这样针锋相对地具体陈述，超出了个人解释的范围。我只好不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在莱比锡的一个集会上报复了，得以畅所欲言。

拘捕议员问题由于进步党的建议又提出讨论，但因这个建议有片面性，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正确建议作为对案。我

們的建議由我申述理由，沒有通過，但是進步黨的建議也以一百四十二票對一百二十七票被否決了。拉斯克爾根據他上次會議的態度，本來必定贊成這個建議，却竟弃权，馮·本尼格森缺席，還情有可原。

另一事件，在下次黨代表大會上還要談及並且受到攻擊，即關於我們對舒爾采—德里奇及其伙伴有關支付議員日俸的建議的表決。李卜克內西和我在這個建議二讀時棄了權，哈森克萊維爾則投票贊成，其餘同事在表決時都沒有出席，其中莫斯特在監禁中。在三讀時我以全體名義發言，並聲明我們全體弃权。我們已厭煩了，經常為聯邦政府委員會的字紙簍工作，國會在每次會期總接受下越來越多的支付議員日俸的建議，而聯邦政府委員會却也經常把這些建議丟到字紙簍里。如果國會有誠意支付議員日俸，就應該運用它所能運用的手段取得它。國會由是應該首先拒絕支付首相的薪俸。國會得不到德國一切其他議會都得到的東西，這是個恥辱。我們不願繼續參加這個遊戲，我們既不能對這建議投反對票，所以我們弃权。這個短短的發言給我招來了兩次遵守秩序的叫喊。會議於二月十日結束。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我在萊比錫同布倫諾·斯巴利希舉行了一次辯論會。他是萊比錫民族自由黨的主要鼓動者，在評論我對公社的態度的發言中提出了當時人們對公社所作的一切攻擊。那個集會由兩黨共同召集，每黨都分到一樣多的入場券，每黨各選主席一人，當一方發言時，由另一方任主席。我們這方面是尤利烏斯·莫特勒任主席，對方是波克爾校長。

我為了幫助讀者，把當時在萊比錫的發言節錄下來：

“波克爾校長：現在倍倍爾先生發言。（發言人在暴風雨般的掌

声中走上讲坛。)

305 倍倍尔：我結合着斯巴利希先生的刚才說的話來談。(騷动。) 斯巴利希先生声称，他还有那样多的反对公社的事实可供引证，足可以讲上十个晚上。(騷动。) 我的先生們，我在一开始就已向斯巴利希先生提議，如果辯論在一个晚上不能完結，应当在次日或者更晚一天繼續进行。所以我們可以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繼續辯論，我是随时都准备好了的。(大騷动，噓噓声。) 但是斯巴利希先生又声明，在一个晚上就足够解决这件事了。(好啊！噓噓声。)

我的先生們，首先我对我党同志有个个人声明，他們有一部分人认为我同意这次集会凭入场券参加的条件是违背民众集会原則的，所以对我严加譴責。我的先生們，假如我不是确信，不如此則集会决不能召开，我就絕不会同意这个建議。这是使我同意这个建議的唯一的理由，但是我不再会再一次同意，因为，虽然在我們协商时，斯巴利希先生說，为了免得看来‘不像样’，在进口处不要聚集多人，借以避免用入场券做买卖，可是斯巴利希先生方面却不守諾言，破坏協議，把入场券卖錢了。(大騷动。高呼：这不是真的！) 倍倍尔：您怎么能叫喊，这不是真的？(好啊！喝采。)

我的先生們！我首先請求我党同志不要用喝采来打断我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耗費我的時間太多。我只有点半鐘的時間。(被打断。噓噓声。)

主席波克尔校长：我的先生們，我請求您們，要制止一切像‘这不是真的’一类的喊叫。倍倍尔先生是按照協議講話的。我請求两党让倍倍尔先生安安靜靜地讲下去。

倍倍尔：我党同志极其安靜地听完斯巴利希先生的講話，虽則他們仍有表示不悅的理由。(自由派方面不断的騷动。)

我的先生們，我认为，我們今天給自由派证明了，他們认为一个敌人不能在社会民主党集会上发言的說法是不对的，相反地，斯

巴利希先生却能十分安靜地发言，而您們——（大騷动。喊叫：滾出去！自由派方面的喧嚷。）

倍倍尔：我的先生們！我希望，敵党的先生們不要鬧得使會議被警察解散。我差不多得出了上面这样的一個信念。斯巴利希先生說，我們抱怨国会封閉了我們的嘴，他又說，他不怪罪国会議員不願意老是沒完地听社会民主党的濫調。

我們在国会中是同坐在那里的任何別人一样的人民代表，我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遇到机会就在那里代表我們党的意見。306
如果我們有一次沒有出席国会的某一个會議，自由派報紙，特别是《萊比錫日报》就郑重地記上賬，第二天人們讀到：某次表决时某某社会民主党議員缺席！如果社会民主党議員发言，那就是：他們恬不知耻！甚至在我們被要求起来講話时，也打断我們的发言，而自由派報紙和斯巴利希先生却称許这种卑鄙的行为……

斯巴利希先生随后詳述德意志国会一八七一年的討論，在这里首先提到五月二十五日討論合并阿尔薩斯和洛林的會議。斯巴利希先生在这里犯了个日期上的錯誤：他把我四月十日的发言放到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的后面。在四月十日的发言中，我說明，我对于巴黎公社的行为虽然不是样样都同意，虽然这是由于手段是否适合目的的原故；可是我还为公社辯护，并且认为我更有义务为公社辯护，因为连自由派報紙起先誣蔑公社的某些行动为暴行，过了几天，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指責不对而把它撤回……

……斯巴利希先生企图把巴黎公社的活动描写成一长串連續不断的罪恶和暴行。斯巴利希先生援引枪毙克列芒·托馬將軍和勒康特將軍作为主要的丑恶行动，此外，他把枪决人质和下令焚毁财政部归罪于費烈。其他‘丑恶行动’他就不能尽述了。

但是这些所謂丑恶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月十八日，即枪毙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二位將軍的那一天，根据斯巴利希先生

自己的承认，巴黎公社还未成立。那末，它就不可能负这项责任了。

在枪决人质的那天(斯巴利希先生自己说是五月二十四日)公社已经不再正式存在了；公社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二日举行了出席人数非常少的末次会议，这一点斯巴利希先生也承认。如果真的像斯巴利希先生所断言的费烈和拉乌尔·里果在二十四日下令枪决人质(但是这一点并未证实)，那末也只是与组成公社委员会的九十名委员中的两个人有关系，所以只能由这两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公社负责。

(发言人在这里扼要地叙述公社成立、巴黎被围、民众不信任特罗胥、巴黎投降、宣布选举国民议会来批准和约等事的简单经过。)

宣布选举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德国人占领，大部分土地处于戒严状态，而且因期限短促不能对要选举的人进行了解，最后，波拿巴王朝的那些几十年来从事卑鄙贿选并习以为常的省长和官员大部分还坐在官衙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自由选举。

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多数派虽然不倾向于波拿巴王朝，却都是拥护帝制和反对共和的。结果，甘必大退位，梯也尔先生来领导政府。当时国民议会，大家知道，是在波尔多开会，并且本来言明只是为了决定和约条件而选出来，现在竟擅自决定法国的命运，因而严重违背了它的委任状。政府十分可怜，竟承认这种越权行为。在短短时间内竟至于把像茹勒·法夫尔及其伙伴那样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完全从政府里排挤出去。

政府趁着波尔多议会抱这种态度的机会采取更进一步反对巴黎的措施。政府要求巴黎国民军缴出武器，而这是违背和约条款的。自九月四日革命以来，巴黎被围状态原已解除，现在又恢复了。以反对共和著名的耶稣会首脑道累勒·德·巴拉丁将军被任

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可恨的波拿巴派維瑞將軍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其他一系列的仇視巴黎的措施也接踵而至。更早一些时候，由于巴黎被围，商业和交通衰落，曾声明到期的票据延期支付。政府在这期间已由波尔多迁到了凡尔赛，现在决定，虽则商业和交通仍旧很蕭条，所有到期的票据必須立即兑付。此外，还命令到期的租金（这迄今也同样是緩付的）必須立即付訖。同时，每份报纸收印花稅二生丁。这一切措施的结果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絕大部分巴黎民众、小商人、小販、手工业者都同革命分子携起手来。他們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接受现今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当政府看到了巴黎的情調，就企图进行偷襲，想以暴力侵占巴黎。在三月十七日夜里，勒康特將軍奉道累勒·德·巴拉丁將軍的命令帶着一支軍隊向蒙馬特爾出動，要想夺取巴黎被围时国民軍用自己的錢购置而安置在那里的几百門大炮。国民軍在前一天得到消息，因而他們警戒起来。軍隊到达后，发现一切进口都戒备森严。勒康特眼看不可能像他所預期的那样不战而把炮拖走；他下令开枪。在这种时候，国民軍旁边总有許多民众——男人、妇女和小孩，开枪时这些人一定会被波及。于是軍隊声明：‘我們不射击’。他們不把枪口对准国民軍而把枪柄向上，并同人民联欢。將軍下了四次开枪的命令，士兵拒絕了四次。

308

將軍現在开始狂怒謾罵。这就激怒了他的士兵，因而被他自己的人所逮捕，并在当天下午被枪斃。并没有一个国民軍中央委员会委員参与其事，而且巴黎公社在几天以后才宣布成立。

现在克列芒·托馬將軍出头干预这事，他一向以平民身份混在人民队伍中充当間諜，到他謾罵士兵时才被发现。斯巴利希先生却說，克列芒·托馬曾是个共和主义者。

我的先生們！在法国有一大批人，自称为共和主义者，但归根到底同我們这里的民族自由党人毫无区别。克列芒·托馬就是这

种冒牌的共和主义者之一。他原先是个军官，后来辞职，一八四八年初充当《国家》杂志的挂名编辑，同时也担任与别家报刊编辑发生争执时的决斗者的职务。二月政府又把他编入军队并提升为将军，当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时和在这以前他都是担任着极共可耻的刽子手角色，并且以他对工人的残暴行为留下了悲惨的纪念。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塔米西尔将军因巴黎没有履行选举市政府的诺言而辞去国民军司令之职的时候，特罗胥委任克列芒·托马将军为巴黎国民军的司令。这是一个直接的挑衅。克列芒·托马就任司令后，最急迫的事就是在一切行动上对来自工人区的国民军表示明目张胆的仇视。当人们极端恼恨勒康特将军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家伙却出来庇护勒康特。于是他被逮捕，并且同勒康特一样被忿怒的士兵枪毙。

309 我的先生们！这是个暴力行为，我绝不嘉许这种行为；但是人们必须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样一想，就一定会原谅这种行为。但是反动派方面所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更大的残酷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不是在像巴黎公社所处的那种人心极为激昂愤慨的时候，而是在安静的时候和冷静的心肠中做的。人们只要想一想，对待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巴黎公社人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空前残酷，并且在战后还持续多年。这样的残酷行为激起每个人道主义者的愤怒和谴责。

三月十八日，当在巴黎的政府机关看到了市民和士兵的情绪时，认为最好赶快逃走。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于是掌握了行政领导权。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必须谴责凡尔赛政府没有在三月十八日派可靠部队到巴黎去。可是这个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部队。所有法国境内的军队全都愤恨政府的态度而同情人民。唯一可靠的军队是：拿破仑的卫队、北非兵团和阿尔及尔军和虔信天主教的布列

塔尼軍，他們全都被關在德國的俘虜營里。當梯也爾先生和俾斯麥先生取得協議，俾斯麥對梯也爾表示好意，把上述的軍隊撥給他八萬多人，歸他調遣，這些隊伍有如野獸一般向巴黎沖去，好像要把他們在德國人那里所遭到的慘敗，報復在他們的同胞身上，在他們那可怕的屠殺中有三萬多人喪命。這些軍隊永遠負有惡名，後來常常聽到戰友們說：他們為巴黎人民的劊子手效忠，這對於他們是一種奇恥大辱。

由於國民軍中央選舉委員會的促使，巴黎人民在三月二十五日選舉公社。斯巴利希先生却說，選舉時有許多人沒有參加，好像由此可以推斷，凡沒有參加選舉的都是公社的敵人。

關於巴黎公社的選舉我可以找個証人，這人就是社會主義者的凶狠敵人約翰尼斯·謝爾，他現今在《涼亭》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辱罵公社上實在是無以復加。

現在，謝爾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報道，三月二十五日四十九萬選民中有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人前往票櫃投票贊成公社。這等於百分之五十七。我們在萊比錫的國會選舉或甚至在市參議員選舉中曾有过一次這樣踊躍參加選舉的嗎？在最近一次市參議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還不到百分之三十三。如果我們接受斯巴利希先生的邏輯聲明說，所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放棄選舉權的人都是社會民主黨人，那末他又該怎麼說呢？那他就會嘲笑我們，並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這却適用於他和他對公社的判斷。

事實上，巴黎的大多數民眾表示贊成公社；甚至連謝爾先生也 310
聲明，巴黎民眾方面以無比的一致和歡暢進行三月二十五日的公社選舉，必須把這一天算作巴黎最美好的一天。巴黎人民在這一天表現出它的十分光榮和最美好的一面，這在其他歷史事件中差不多是沒有的。所以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敵人必須批判公社！

此外，斯巴利希先生還批判公社的‘製造法律’。他說，一個法

令紧跟着另一个，而这一个法令却又把另一个取消或加重。

但是如果人們要想把像帝制下的巴黎这样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来个大规模扫除，还能有别的办法嗎？（大笑。）这里的确有很多要用法令规定的事。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能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在德国人方面必定准备得很完善，但是您試問一下參謀总长毛奇，是否万事順利，他将告訴您說，各处都还有阻碍。如果事情是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要創立一个新国家来代替旧国家，而当时还有几十万敌人——德国军队和凡尔赛人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从事于消灭新制度，情形就更是如此。

但是，斯巴利希先生所提到的法令，是他自己也不能认为足以損害公社的那种法令。他在談到公社的法令时举面包工人做夜工的例子說，他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安于早晨只有三分錢的陈面包来喝咖啡，这是一个浅薄的笑話，我不去深究它。在这个措施上并不是能否滿足资产階級养成的口腹之欲的問題，而是应否让广大工人階級永远遭受劳累的損害健康的夜工的問題。凡是稍微从事过这类工作的人都知道，面包店伙計由于夜工和一般特别长的工作时间（常达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多数早年丧命。

巴黎公社既然确实注意到这种情况，这就使它获得荣誉。（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繼續說，巴黎公社虽然废除了死刑，但又实行枪毙，他在这里所引用的法令，乃是用枪毙的刑法来威吓一切逃避国民軍兵役，也就是逃避保卫本市的法令。

311 巴黎公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任何常备軍都是政府手中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它要求撤消常备軍，实行全民武装。根据这个观点，每一个能服軍役的人都有保卫本市的义务。

这无損于任何人而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关于我們这种虽說有普遍兵役义务，却只武装了一部分人民的国防制度，自然不能这样

說。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肯拥护公社，虽則公社处在敌人包围之中，而且敌人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消灭它。

公社受到一切方面的攻击，被迫起而应战，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須采取任何应战的政党在这种場合可以采取的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它用枪毙来威吓每一个拒絕拿起武器保卫本市的人。

一八七〇年我党也有上千的同志不同意战争，但是人們并不問他們願意从軍与否。他們一定要参战，如果拒絕，就要被交到軍事法庭，毫不容情地被枪毙。

废除平民刑法訴訟的死刑同战时的軍事死刑有天淵之別，而斯巴利希先生竟把两者混淆起来。只要战争还存在，維護战时軍紀的死刑也就存在。

斯巴利希先生又提出一項公社法令，根据这法令，公社沒收雇主方面放弃的作坊和工厂，把它們交給一向在里面作工的工人們經營。此外，应选举一个委员会把作坊估价，以便賠償原业主。他很正确地強調說，如果公社有此权力，就要普遍实行这个法令。是的，他推測，我們只要能够，一切要照此办理，这也是正确的。我們想消除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对立，因为工人利益和雇主利益在今天处在敌对地位。雇主想尽量减低工資而尽量延长工时；工人想尽量提高工資而尽量縮短工时。这种階級对立将随着每个机器的发明，随着每个新工厂的設立，而更加尖銳。每修好一条路，每架起一根电报綫，都使知識传播更广，都使我們获得新的信徒。每一个为集中資本、为消灭小企业而采取的步骤，都增加分裂而迫使問題得到解决，到那时生产和分配将集体經營，这就是說，一切作坊，一切工厂，一切劳动資料必須掌握在社会的手中，并由它按照一切公民的利益和平等权利加以管理。每个人都必須劳动，每个人都有他十足的一份收益，当然也担負一份亏损。应当用社会主义的，也就是由社会来組織的，即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生产方式来代

替私人工业，代替野蛮的、无組織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今天的危机套到我們的脖子上。为此，公社已經实行了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有关雇主根本沒有坏处，因为他們可以得到补偿他們的作坊和工厂的全部代价。

按照我們的理解，社会有責任这样組織起来，即平均地照顧所有成員的福利，使它的每一个成員都能越来越多地共享文化和文明在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成就。敌人固然宣称拥护进步，但是一旦涉及整体生活的改善，他們这些錦衣玉食、大权在握的人們就喊叫說，我們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如果要改变它，那就是犯罪。

他們用一切手段保护他們所占有的特权地位，甚至对于一个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次要法令，例如救济基金法，也妄自叫嚷說这个法令对雇主不公平，誰拥护它，誰就必遭譴責（因为人們把这当做譴責）說，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們今天在《日报》上才看到的。这就极其露骨地表示出：‘我們不願对被压迫者作絲毫的让步。’

如果不論在小事和大事，在立法和社会生活里到处都表现出这种階級对立，那就不言而喻地会发生像巴黎那樣的革命。并且我确信，像我也曾在这里所引用的国会发言中說过的，只要再过几个十年，巴黎所发生过的一切将要在全欧洲重演。在社会方面是了解这一点，并尽力走立法的道路来調和現存的階級对立。

那么公社还做了些什么呢？它实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古老要求，这个要求几十年以来一直列在自由党的綱領上，但是自从該党执政以后就把它丢在垃圾堆里了。公社決議并且实行把教会与学校和国家分开，并且还決議沒收教会财产。

使我惊讶的只是，斯巴利希先生沒有提到这一点，沒有提出侵犯所有权的控訴。但人們却拿这一点对公社屢加責难。斯巴利希先生既然沒有提到，由我来提一下，作为补充。（大笑。）

遺憾的只是，公社所做的事情是別人早就做過的。如果說在一五一七年開始的宗教改革中許多公侯站在馬丁·路德方面，那並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豐富的教會財產可以塞滿他們的口袋。（大笑，鼓掌。）

十五年前，北美合眾國發生南北戰爭，最後北部廢除了奴隸制度，人們不可能想像有比這更嚴重的侵犯奴隸主所有權的行為。我們的敵人認為，凡是對他們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而對人民有利的就是犯罪和盜竊。

就是控訴巴黎公社侵犯所有權的這個政黨，在六十年代初期它對奧地利感情還好的時候，給它提供沒收教會財產來彌補巨大債務的建議，並且當意大利按這個方針進行時，它還鼓掌喝采。現在，宗教團體根據任何一個資產者所依以取得其房屋或土地的法權來取得它們的財產。那末結論何在呢？公社宣布把教會同國家和學校分開以後，它規定實行強迫的義務教育，不僅免去學費，而且也免去教員費。窮人和富人應享受相同的教育，國家借此給一切人同樣的保證，以免早在幼年的心靈上就種植了貧富之間的嫉妒和仇恨。請您給我指出一個做出哪怕只是稍微與此相似的成績的自由主義國家吧。（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還惡意地說道，巴黎公社聲明，它的政策和它的企圖都是有科學根據的。公社以此想說，它把現代科學有關國民經濟、有關司法和人民福利事業等方面的成就尽可能普遍有益地運用在立法上，並且不局限於固定的理論和定理。因此它確是站在現代科學的立場，這個立場不是由一定的假設和成見出發，而是企圖根據試驗和經驗考究出最好的東西來。

如果說巴黎公社只完成了一些零星工作，這是由於它所處的局勢和環境的關係。請您想一想，巴黎公社自始至終沒有一刻安靜，不斷處在戰爭狀態和戰爭中——如何能不是這樣呢？

斯巴利希先生特別譴責公社的是，公社據說希望最充分的出版自由，它却在封閉敵對的報刊時取消了出版自由。這種措施也很容易用公社處於迫不得已的情況來解釋。各方面都向它進攻，處在戰爭和革命中間，它有必要除了不容忍站在城門口的敵人以外，也不容忍本城內的敵人。它必須封閉那些天天對它進行猛烈攻擊和誣蔑的報刊，這些報刊同站在城門口的敵人有聯繫，並且致力於顛覆公社。

一八七〇年戰爭爆發時，在德國所有被認為有危險性的省份都宣布戒嚴。反對派的報紙全被封閉，所有被認為反對戰爭的人都被監禁起來。那麼，我們也可以為巴黎公社要求同樣的權利。

斯巴利希先生也認為巴黎公社既反對間接稅，則控訴梯也爾先生方面奪去糧食稅款就不合理。公社這個控訴是有道理的。糧食稅是屬於巴黎市的，公社不能在戰鬥中間實行一種新的稅務制度。糧食稅遂成為唯一長流不斷的稅源，如果它要保持防禦和行政管理，就必須利用這個稅源。

因為梯也爾先生奪去了公社的稅款，它就必須倚賴法國銀行和羅特希爾德的貸款來應需要，這筆借款沒有被駁回而是得到梯也爾先生的同意，被批准了。但是公社的財政管理部門表現出連斯巴利希先生也無法抨擊的一種情況。那就是公社的非常節省儉約，即使敵人也對公社這一點推崇備至。

巴黎公社的財政部長茹爾德在凡爾賽的法官面前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說：‘我離開財政部時比我進去時更窮了！’（听着！）請指給我一個能夠說這樣話的君主國家的財政部長！（大笑，贊成。）梯也爾先生在一八三〇年以一個窮律師兼作家在路易·菲力浦治下進入內閣，到一八三六年以百萬富翁離開內閣。

巴黎公社的第一個措施是取消高額薪俸，它的工作人員只能得到比較好的勞動工資。一級公務員的年薪不得超過六千法郎，

即四千八百馬克。萊比錫市長每年的收入是一萬五千馬克。(大笑，听着!)公社的一級將軍也只有六千法郎，但是梯也爾先生剛就任總統時，他最迫切的事却是使人撥給他三百萬法郎的文官薪俸。(听着!)

巴黎公社樹立了節約的典型，可以作為一切政府的榜樣。這甚至社會主義者的敵人謝爾先生也承認。斯巴利希先生自然不提它，所以我來提一提。(大笑。)

現在我來談談槍決人質和放火的事。斯巴利希先生在提到放火時說，他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十四天，在巴黎親眼看見劫後的慘狀。他竟至告訴我們說，有一所人們要燒掉的私人住宅，並不在防綫以內。他自然沒有向我們說，這座房子確實是放火燒的。在戰鬥時他不在場，他怎能斷然判斷，什麼是在防禦上必要或是不必要的呢？他引用給他的口頭保證。在我眼裡，這些保證毫無價值。凡爾賽人的迫害狂和他們野獸般的忿怒非常猖獗，在公社滅亡後，不僅幾個星期之久，而是幾個月直到幾年之久，還在迫害每個對公社說過一句同情話的人。恐怖如此之甚，不僅沒有人敢庇護公社，而且有許多入辱罵他們，以免自己受嫌疑。在這裡資產階級的卑鄙性也完全暴露出來。在公社滅亡後的幾天內凡爾賽人那裡收到的告密信不下三十七萬件。當時巴黎資產階級的行為與一八六六年萊比錫的資產階級一樣卑鄙，一八六六年，萊比錫的資產階級向普魯士將軍呈遞的告密信非常之多，以至使這位將軍感到厭煩，說這事他不願再過問了。

斯巴利希先生現在拿來一封據說是由費烈簽名的放火證明書，上面蓋着陸軍部長的印信，不過梯也爾先生的陸軍部長也同樣地蓋上這種印信，所以這證明書在我看來等於廢紙，應當撕碎。(發言人把證明書撕碎。好啊。騷動。)我的先生們，許多關於放火、槍決人質、所謂劫奪財產等的文件，在法庭上將證明都是偽

造的。

費烈就是根据这里所提供的文件而被控放火焚烧财政部，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否认这个文件是真的；他找出某些字体证明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凡尔赛方面派来的笔迹鉴别人断定是真的，費烈遂被判罪。他也被控枪决人质。他自己說，他没有下令枪毙他們，而是下令释放他們。其他的报道，特别是一个英国医生的，都与此相符，并且同样证明，有些曾被逮捕去作人质的教士后来在法庭上作证人，因而不可能曾被枪毙。六十个人质中固然有一部分被枪毙，不过据说只是在他們离开监狱后拒絕街垒人員要他們协助防务的要求的时候发生的。于是他們被枪击了。拉烏尔·里果也被控枪决人质。现在，拉烏尔·里果已死，他战斗得像一个男儿，并且在战斗中死得也像一个男儿；控告他是容易的，他已經死亡，不能答辯了。

316 逮捕人质有什么目的呢？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在法国抓了許多人质，那是因为法国的狙击兵或其他居民在大道小路上謀害德国人，襲击运粮队，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襲击和杀害单身的崗哨，总之，竭力进行破坏。狙击兵所做的就是一八一三年普魯士民兵对法国人所做的，而且我还可以給您們宣讀一下当时的民兵条例，其中規定，不論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加害敌人，消灭敌人。

德国人不願承认这样进行战争合乎战时公法，于是命令所有軍官說，在兵士受到上述方式的伤害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囚犯，就逮捕人质枪决，决不寬宥。此外，还向村庄居民征收战时稅，有从房屋或村庄向軍队开枪射击的，这种房屋或村庄無論有罪无罪都要被烧毁。这些命令常常見于实行。成百的人这样丧了命，許多房屋和整个村鎮被烧毁，关于这些，我在自由派的报纸上沒有看到譴責而只有贊揚。

公社对凡尔赛人所处的地位，与德国人对法国狙击兵的非正

規戰相似，至少在法律上一樣。凡爾賽人在對巴黎的幾星期戰鬥中，違反了一切戰時公法，任意屠殺落到他們手里的俘虜。公社的杜瓦爾和佛路朗斯將軍以及許多其他軍官都是這樣犧牲的。是啊，凡爾賽人竟敢射擊綑帶站，並且把俘獲的女護士姪污後槍殺。這只有像借助於德國人從俘虜兵中撥給梯也爾先生支配的那種畜生才做得出來。

為了對付這些丑惡行為，公社決定逮捕人質，並且有一個國民軍被害，就槍斃三個人質。但是這停留在紙面上，當終於有一部分人質被槍決時，如斯巴利希先生自己所承認，公社已經不存在，因而它也不能對此負責了。

現在，凡爾賽人在為他們掃清入巴黎道路的德國人的幫助下侵入巴黎（沒有幫助他們是難以成功的），在巴黎市街上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所有落到凡爾賽人手中的人，不論是男人、婦女和小孩一律被殺害，把數百個俘虜排列在拉息斯神甫墓園里，用霰彈炮掃射，並且在痠瘳的屍體上澆灌石灰和煤油，拋入壕溝。

凡爾賽人怎樣瘋狂，從沒有留下一個受傷的人這個事實，可以證明。根據一致的說法，在幾天內就有一萬五千到二萬人喪了命。 317

在這種情況下，公社除了盡一切可能自衛到底之外，別無他法；人們慣於把失敗者完全合理的行為描寫成丑惡行為。請您們讀一下羅克爾敘述他在瓦爾特亥姆的監禁一書，書中也描寫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頓的五月起義，您們在那裡可以看到，人們跟着反動派方面對五月起義戰士的誣蔑，正是今天人們對公社的誣蔑，所不同的只有德累斯頓的五月革命是個資產階級革命罷了。請您們再讀一下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十月起義的歷史，在它失敗後羅伯特·布魯姆被槍決；當時溫第式格瑞茨侯爵向世界發表的關於維也納局勢的宣言，同凡爾賽人向世界所報道的關於公社時期的巴黎局勢絲毫不差。

我这里有布魯姆写的一篇文章，文中他用坚决的态度評論溫第式格瑞茨的宣言，并且憤怒地喊道：‘如果人們竟敢对曉得事情的我們說这种話，那末世人会对他們所不熟悉的維也納如何想像！’

在这里我却也要提一下布魯姆当时如何理解革命以及他一次在大学礼堂中演說时如何声明：‘我們不能半途而廢，我們要對我們的敌人一直斗争到底，毫不怜悯。’并且到了今天，自由派还在紀念罗伯特·布魯姆，而且是合理的。

巴黎的公社对凡尔赛人的情形同当时維也納市民对反动派的情形完全一样。公社必須斗争到最后的一息，并且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所不能否认的。就像人們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在維也納、拉斯塔特和曼海姆按軍法枪燒了我們最好的人那样，公社的男儿們也这样被杀害，其中大多数臨終时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現在我来談談放火事件。

凡尔赛人对巴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战斗，他們并不是用糖豆来射击，自然会留下一片荒涼。在最后八天內，他們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占領了蒙馬特尔高地和五十門重炮，他們用燃燒彈以至煤油彈向房屋射击，于是不出所料，引起許多处大火。所以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由凡尔赛人造成的，而他們竟拿这事归罪于公社。现在巷战发生了，并且凡尔赛方面野蛮殘酷地进行巷战，公社为了防禦起見，不得不燒个别房屋，借以暂时阻擋凡尔赛人。难道說这种办法这样不正当和未曾有，竟被认为是杀人放火嗎？德国人在包围斯特拉斯堡时只为了要强迫城市投降，毀坏房屋五、六百幢，虽則他們并不是对老百姓作战。当索阿松要塞投降时，形形色色的新聞記者都証实，城里沒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街道全部被毀，几乎所有的屋頂都被打穿，但是要塞的城牆却完好无损。人們炮轰民

房，杀害平民，使他們有必要迫使軍官投降。我沒有看到自由派的报刊反对这种作战方法。梯也尔对付巴黎就是照德国人对付要塞的办法，而人們却把公社在可能中采取的自卫行动硬算作罪行！当一八四九年在德累斯頓起义时，博伊斯特先生要求应邀来援的普魯士人放火烧城，若不是司令官瓦尔德錫伯爵声明，他希望不这样办也能消灭叛党，那就会实现了。不过人們当然还不乏其他野蛮行动。例如人們把一批俘虏从易北河大桥上推到水里去，当这些人企图握住栏杆，人們就用軍刀砍断他們的手指。凡尔赛成队的匪徒在巴黎进行与此类似的甚至更殘酷的暴行达数星期之久。

所以最大部分的火灾是凡尔赛人炮轰巴黎时引起的，这有意大利使臣巴特魯塞利·德拉·加第尼亚亲眼看見为证。他二十年来一向住在巴黎，当时他正在那里，他曾在《意大利报》上作了公开的声明。他写道，人們必須承认，遭到焚毁的房屋十分之九确是凡尔赛人的炮弹所引起的。公社放火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放过火的和焚毁了房屋大約有二百幢，照这算来属于公社的只是比較小的一部分。

我的先生們，給我講話的时间已經过了很多，我只有几分钟了，关于我所列举的证件，我将在下一次答辯时或在有繼續举行必要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我所說的一切，我都能用敌方的报道来证明是真实的……”

随后我又讲一下据說是費烈所促使的枪决人质，并且接着說：

“公社的办法是按照当时局势不得已的办法，人們即使不同意它的办法，也至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理解而加以原諒。

斯巴利希先生以控訴費烈为結束，我現在也要結束了。确实无疑的是，公社沒有做任何感到慚愧的事情（并且我希望还有机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至于它所做的暴行，欧洲各君主政府在类似 319
情况下沒有不做得更厉害百倍以至千倍的。（暴风雨般的、持久不

息的掌声。)

主席莫特勒：我的先生們，我們必須把事情縮短些；方才警察长先生来通知，他只能让这个会开到十二点钟为止。”

接着是斯巴利希的簡短而无关重要的答复，然后我又发言：

“我的先生們，斯巴利希先生对于我的发言沒有回答，雖然我們在今天規定的時間內已經不能完事，他也沒有声明願意举行第二次集会。我現在有必要略談一下斯巴利希先生講話中最后的几点。斯巴利希先生自夸他敢同我們对陣的勇气。同一个被认为只是由一小撮空想家組成的党派对陣，是否具有巨大的勇气，姑置不論。

斯巴利希先生接着表示，希望今天的集会能有助于踊跃参加选举；这个也是我們希望的。(大笑。)这对我們沒有害处。(同意。)迄今每次竞选都表现出，我們一次比一次要多得到几百张票，我希望，今天的集会将促使下次国会选举也正是这种情形。(大笑，好啊！)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以布魯姆的继承人名义，抗議我把布魯姆与公社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斯巴利希先生何以有全权就一件沒有发生的事情提出抗議。(大笑。)我同任何人知道得一样清楚，罗伯特·布魯姆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这就比斯巴利希先生强了。(掌声。斯巴利希先生鞠躬。哄堂大笑。)我只是說明，公社所处的境遇类似一八四八年十月間維也納的境遇。当时罗伯特·布魯姆在維也納，表示了繼續进行革命的決心，即使公社方面也不会比他更堅決了。因为我在不久之前曾提到罗伯特·布魯姆在那时的一次講話，所以我在这里說明一下，这是引自阿图尔·弗賴为了致敬于布魯姆而出版的一本书里，他在书中努力叙述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和政治家的罗伯特·布魯姆。講話中的有关部分說道：

‘不要不彻底的革命！向前迈进，不惜流血，在已打开的道路上前进，首先，对于拥护旧制度、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渴望安静的人决不宽容；对于这些人要进行毁灭性的战争。’

即使最坚决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比罗伯特·布鲁姆在这里对革命的敌人所表示的更为坚决吗？（掌声。）

现在请你们也听一听温第式格瑞茨给维也纳人的宣言中的一段：

‘城市受了恐怖事件的污辱，这种事件使每个爱荣誉的人义愤填膺！……维也纳处在一个渺小而鲁莽、不惜做一切丑行的党派暴力之下；生命和财产掌握在一小撮罪犯的手里！’

这不是字字同梯也尔先生关于巴黎和公社所发表的宣言都一致吗？（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又说，只要社会民主党拥护国际主义幻想，就不能得到他那个党的重视。我们不要受重视。（大笑。）但是国际思想真正是幻想吗？由家而成族，合许多族而成国家和民族，最后由于民族间的亲密联系遂发展为国际。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站在博爱和友爱的立场上，由于它为停止民族的战争和挑畔，为使各民族在和平劳动和促进文化中共同前进而奋斗，社会民主党代表着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高的文化理想。（掌声。）

因为我们党反对狭隘的民族立场，因为它反对种族斗争而拥护各族亲睦的思想，所以人们现在对它进行诬蔑和迫害，它的遭遇正是先驱战士随时会遭遇到的。我的先生们！比如说，你们今天去到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国家里，听听他们以何等的无知来批判马丁·路德！世界上一切代表进步的政党都是如此，自由党也不例外。在今天，自由党掌握政权和统治的地方，它就认为它的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就会遭到他们自己在将近二十年前从封建党派那里遭到过的待遇。这完全是很自

然的事！

我們不要被这种指責所迷惑，我們知道，我們的时刻就要来到，形势對我們有利，随着階級对立的加强，随着被投入工資工人行列的中間階層、小資產階級的消灭，社会民主党就日益壮大，直到最后它掌握政权。（热烈的鼓掌。）

321 斯巴利希先生感到快乐，因为开姆尼茨最近一次邦議會选举沒有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議會。这种快乐不久就会成为泡影。（大笑。）但是这却給他表明了，他所表示滿意的选举法是一个只以共反动的規定阻碍全民选举的选举法。（掌声。）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將仍然进入邦議會，即使这一年不进入，下年一定会进入（好啊，大笑），如果开姆尼茨的市議會像它开列捐稅名单那样开列选举名单（这两件事，在萊比錫也尽人皆知是驴唇不对馬嘴的），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列在其中了。（哄堂大笑和鼓掌。）

最后，当斯巴利希先生乞援于在这里出席的保守党报界代表的时候，他以为現在保守党报界大概看得清，民族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这一点肯定还没有人真正相信，并且那些写过这話的人是我最不相信的。（大笑。）

事实上，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間的爭执，只能看做是一对不满意的夫妇之間的爭吵。如果有第三者参与其間，他們就成为一致了。（大笑。）……几个星期以前在《萊比錫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号召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敌人說：‘我們大家組成一个单一的正規的大党。’現在，我們祝賀您們达到这个目的，您們將有必要这样做。（大笑。）最近我們也已經在开姆尼茨看到这个現象了。起初，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那里打架，两党都要提出候选人，因为都不願把地盘让給对方，但是当他們听說一个社会主义者要被提出的时候，爭吵就停止了，現在是：‘大家都来对付倍倍尔’。（哄堂大笑和鼓掌。）”

这个成績輝煌的集会以我的讲演为結束。

新的迫害

一八七六年一月初，薩克森的本党同志在开姆尼茨举行了一个出席者很踊跃的全邦集会，会上已为可望在一八七七年一月举行的下届国会选举提出候选人。不顾一切迫害，情緒还是非常好的。这一年年初，柏林的同志們在《柏林自由报》上創辦了一个地方栏，它逐漸获得了朋友和敌人的重視。现在也已經觉察到国家整个政策要轉变的初期征兆。四月底，內閣秘书长德尔布律克被免职，官方开始轉向保护貿易方面。普魯士的貿易部长馮·康普豪森不久之前曾在国会中为企业主降低工資以摆脱危机作辯护，并且因此博得欧仁·李希特尔的頌揚，“謹向竟敢說出这样不得人心的真理的部长致以崇高敬意”，后来他也因此遭到冷落。在这期間，連續不断地对我党同志进行迫害，特别是由于侮辱首相的罪名。俾斯麦采用了一种慣例，他使人把他的刑事起诉书大量复印出来，送給那些指出了侮辱者姓名的檢察官来提起訴訟。

322

他不断提出这种公訴，直到他一八九〇年二月离职时为止。这种案件数以千計，被判罪的人使監獄中的人口大增。这种办法当然不是他寬宏大量的明证，就連崇拜他的人也有許多不贊成的。

此外，台森多尔夫遵照俾斯麦的意旨繼續迫害工人組織。他控訴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违反一八七五年二月的普魯士結社法时，建議对該联合会实行鎮压，他的理由是，“我們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組織，社会主义的政党就不再存在”，这句话证明他对运动完全不了解；现在他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类似的手段。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鎮压，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在哥达的建立而被抵消了。现在輪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受鎮压。他也办到了要求柏林市法院參議室作出決議，宣布把党在柏林的党支部以及党本身在普魯士全境

內暫時封閉。黨理事會以一封告黨員同志書回答這個決議，書中要我黨同志不願這個決議，為下屆國會選舉進行鼓動。黨應該表現出絕不讓像柏林市法院參議室那樣的決議給吓住。現在各個同志才真正有必要為黨盡他的全部責任。對台森多爾夫這個“消滅社會民主黨”的手段必須用“社會民主黨萬歲”這個對策作答復。

此後普魯士各處在黨組織被解散的地方都成立起地方組織，這些組織當然必須隱蔽它與德國其他地區繼續存在的中央組織有聯繫的任何跡象。台森多爾夫這個行動確實成為一場空，因為這些地方組織在發展黨員、推銷黨報和募集資金等方面所作的事至少與被解散的中央組織一樣多。

自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再召開以往那樣的黨代表大會。但是我們不願也不能缺少這種會議，於是國會黨團和黨理事會聚在一起，討論應該怎麼辦。我建議，由國會黨團召開一個社會主義者全體代表大會，會期是八月二十到二十三日，地點是哥達，會議代表由公開的集會選舉，這建議大家很快地就同意了。另一方面，為了使普魯士的黨員同志能以無法駁斥的形式來繳納黨費，決議每月出版一張大約有手掌大小名為《選舉人》的小報，定價二十芬尼，銷路極好。

但是台森多爾夫的迫害狂並不以解散普魯士的黨組織為滿足。他隨即也處置一些職工會的中央聯合會，使它們作為“政治組織”而遭到與黨同樣的命運。對於其中的四個，他達到了目的。被解散的中央領導機關現在遷往漢堡，那裡的結社法並不禁止政治性團體的聯合。

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特在受了二十六個月的監禁以後，由普略曾湖釋放出來了。在同一天，白拉克公開宣布出版莫斯特所著的一本小冊子，名：《普略曾湖的政治犯監獄》，他在書里敘述他的經

历，并且描写了他和其他的人如何在官员的背后做了各式各样有利的事情和欺骗这些官员。这本书的出版是不智的。书刚一出版，内务部长就要求那个不識不知的普略曾湖監獄长报告所描写的事情。结果是許多官吏受处分和革职，并且从现在起执行監獄規章远較以前严格。还有，从现在起（当我也不得不迁入普略曾湖时，人們把我作为例外，关于这事，下文再談），大多数的政治犯被隔离在所謂蒙面区中。当莫斯特在一八七八年又被判处住六个月普略曾湖監獄的时候，他的輕率举动受到报复。他現在被严格地单身禁閉起来，每当他离开獄舍时，必須同獄舍中其他住客一样，带上黑色面具，免得有人认出他来。

处罚也同当时对党越来越凶的迫害相适应。原先判几个星期或仅仅几个月徒刑的，現在判得加重三、四倍。判決十二、十五、十八个月甚至更多，已成通例。个别党报，像《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經常有許多編輯在坐牢。例如塞維克（开姆尼茨）因为瀆君罪（人們把这看做瀆神罪）被判处二年監禁；由于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奥格斯堡刑事陪审法庭判处 R. 弗兰茨徒刑三年，E. 罗特曼諾和 E. 科伯尔各二年，这些判決引起全党暴风雨般的忿怒。在其他案件中，托馬斯（奥格斯堡）被判二年，劳夫（开姆尼茨）被判一年零四个月。次年，瓦尔特希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十八个月監禁，并且在再下一年，《德累斯顿人民报》編輯格·馮·福尔馬尔被判了同样的处分。到后来，这些判決在党内几乎引不起惊异了；誰作編輯或鼓动者，誰就必须把坐牢算作他的职位所必不可少的属性。因为福尔馬尔是《德累斯顿人民报》的編輯，我和他发生頻繁的书信往来。他被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所牵累，于是发生了一个迫切問題，即在判罪以后他作为德法战争中重伤員所領的年金是否因而取消，他为此征詢我的意見。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对此答复說：

“……关于您的年金的事我还没有能够同夫賴塔格談起，我也难以相信，他会能够比我告诉您的更多些。

我查过了国會議事录。法令第三十二条关于军人的年金和生活費在乙款中規定，經過法律上有效的司法判决能够导致年金的丧失，并且还規定：

年金的增加却不能因司法裁判而予以取消。

議事录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在何种情况可以取消年金。在討論的时候曾注意到，在帝国刑法典中，凡是能够取消年金的規定一律删去了，这对巴伐利亚自然也是有效的。一八四五年普魯士的旧军事刑法典却与此相反，其中包含有这样的規定。但就我所知，这些規定对于巴伐利亚是不适用的，于是問題就在于巴伐利亚的军事刑法典究竟包含有哪些有关的規定，这就是現在应该考虑的，这法典您大概是不难找到的。

我劝您在写作方式上要特别小心，我害怕人們会使您大上其当。但是因为这种判决万不能招致丧失公权，所以問題在于，这种褫夺公权是不是取消年金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您也許能得到保护。統治势力把您当作一个‘叛徒’而对您特别仇恨这是确实无疑的……”

使人大大滿意的是，这时觉得知，不伦瑞克大公国的最高法院因为呂森事件判决孚格尔·馮·法尔肯施太因將軍賠償在一八七〇年秋季所逮捕的同志的損失，計付給白拉克二千一百馬克、格拉萊一百零八馬克、彭好尔斯特一百零五馬克、獨立經營工商业者埃萊尔斯每天七點五〇馬克、工人曲恩每天三馬克。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會

我們擬訂的哥达代表大會(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的議事日程是：

“1. 社会党議員的活动；2. 德国社会主义組織的行动和地位；3. 当前的国会选举；4. 确定社会党候选人；5. 德国的社会主义組織；6. 党报。” 326

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对这种安排大肆叫嚣并威胁說，人們將設法确定，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是一个規避法律以免随后被封閉和解散的行为。但是我們对这个威胁置之不理。我們必須表示，我們不受威吓，并決定利用环境所容許的一切手段来招架對我們的打击。

會議仍由盖布和哈森克萊維爾主持。出席代表九十八人，代表二百九十一個地方的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四人的委托。李卜克內西和我由于私事在開會的第二天才出席。在奧艾爾所作的報告中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從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到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總共收入五萬三千九百七十三馬克，開支則是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馬克。所以稍有虧空，這個虧空用《選舉人》小報高達四千三百三十馬克的盈餘來彌補。黨在那時擁有二十三個政治性的機關報和新創刊的消遣性附刊《新世界》。機關報中每星期出版六次者有八種，出版三次者八種，二次者四種，一次者三種。由國外社会主义組織寄來了一系列的祝賀黨的勇敢行動的信件，這對一個德意志的黨代表大會說來還是第一次。我因業務關係曾到瑞士旅行，湊巧參與了在伯爾尼舉行的國際會議，于是我帶回了國際會議的祝賀。為了表示兄弟般的國際團結，決議為極端困苦的巴黎公社社員適當地籌措款項。卡爾·希爾施代表巴黎工人出席大會。哈森克萊維爾作關於黨團在國會里的活動的報告。我利用這機會為我們大受攻擊的在議員日俸問題上棄權一事作了辯白。莫爾肯布爾反對我們棄權，發言說，他認為，棄權的辦法損害了我們的鼓動工作，這種策略使同志們吃驚。黨團對一個議案贊成還是反對，必須總是態度鮮明並連續參加投票。在長時間辯論以後，A. 卡培爾

 327

和德累斯巴赫建議，应声明我們对議員日俸問題投票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建議遭到否決。相反地，勒文施太因的一个建議通过了，他建議略去这个問題，因为社会主义議員当然贊成日俸，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弃权，只是证实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議員所犯的欺騙罪行。

进一步的討論表现出，在新合并的党里还存在着人事上和事务上的强烈对立，这些对立現在爆发出来。弗罗梅說，許多党报并且还有李卜克内西和我从宗納曼（法兰克福）那里領取金錢津貼，于是引起了激烈爭辯。結果证明被提到的報紙沒有一家是从宗納曼那里領取津貼的，对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在我坐牢期間，宗納曼曾再三說，我出獄后如果为了恢复营业需要借款时，他願意帮助我，已借給我六百塔勒，利息五分，分期归还。这更是无可非議，因为我自从一八六五年以来就和宗納曼有了交情，而且这件事完全是純粹私人的事情。宗納曼自己不謹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法兰克福的同志，这件事就被传播出来。辯論的結果是，以全体对七票通过白拉克（他多年来第一次又出席代表大会）的建議，譴責了这次存心与我为难的行为。我于是在本年内还清了宗納曼的借款。

另外还有一次爭論，当时也很激烈，爭論的問題是，今后是否需要有两个正式的机关报（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萊比錫的《人民国家报》），如果只要一个，那么要哪一个。最后，贊成萊比錫的有四十九票，贊成柏林的有三十八票，六个代表弃权。并且还決議，中央机关报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为《前进报》，每星期出版三次。然后，两位編輯的选举又引起热烈的辯論。哈賽尔曼向来不喜欢合并，声明决不迁往萊比錫，并放弃編輯的职位。根据盖布的建議，哈森克萊維尔声明願与李卜克内西共同担任編輯。此外，大家一致同意，党在普魯士被解散后，另設立中央委员会代替汉堡的党的理事会，中央委員計有奧艾尔、布拉士、德罗席、盖布和哈尔特

曼。經我建議，秘書月薪定為一百五十馬克，司庫一百零五馬克，兩位副手每人四十五馬克。

此外，黨代表大會初次對當前的經濟問題表示了意見。自一八七四年起發生了工業危機，並且一年比一年加重，它使得工業界關於保護關稅還是自由貿易的問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並且最後在數十年來一直是自由貿易制度的主要支柱的農業界，也得到了擁護者。首先是鋼鐵工業家，他們早在前幾年就已對從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起取消鋼鐵關稅的決定非常激憤並與之作鬥爭。和他們聯合的還有其他工業家，特別是棉業工業家。因為現在美國的糧食競爭日益顯著，使糧價也不能保持所希望的高價，反而落了價，易北河以東地區的糧食生產者在美國的競爭下，他們國外市場的銷路日益呆滯，就是在本國也感覺到這種競爭的影響，於是他們轉入保護關稅派。廣大階層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看法的這種轉變也必然引起黨內的注意。所以在本年內奧艾爾、弗里茨舍和麥克斯·凱塞爾都表示贊成一種或多或少帶有保護關稅性質的政策。因此，代表大會不得不对這次轉變了的潮流表示態度；它的確表示得不充分，而且有些不清楚。由於白拉克、弗利克、弗里茨舍、格利倫貝格、哈賽爾曼、李卜克內西和莫斯特的建議，大會未經討論即通過一個決議案，其中說道：“德國社會主義者不過問有產階級內部所發生的保護關稅和自由貿易之間的鬥爭；採取保護關稅與否的問題只是實際的問題，而必須按照個別情況來決定；勞動階級困苦的根本在於一般的經濟情況，但是政府方面所締結的現行通商條約既不有利於德意志工業，就要求改變。”要求黨報勸告工人，不要為在要求保護關稅時求國家幫助的資產階級火中取栗。並且因為那時還有鐵路應歸私有還是歸國有的問題，而且俾斯麥還力求由帝國壟斷鐵路，所以決議案對這個問題也表示了態度。大會表示贊成鐵路國有，但反對帝國的鐵路計劃，因為這種計劃是為促

进阶级国家和军事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并且这笔收入会用在非生产的目的上，帝国由此获得一种与人民为敌的新力量，并使人民的财产大量落到交易所投机者的手里。

温柔善良的白拉克未能忘怀他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从它那方面所受的种种屈辱，在八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到代表大会的经过说：

“讨论得非常好，弗罗梅—宗纳曼事件，还有关于議員日俸的表决，接着是中央机关报应放在柏林还是放在莱比锡的问题，这是三个主要项目；拉薩尔派认真地相信，运动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在组织中的胜利是无疑的了。—他们有一切根据来这样想。有一次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拉姆（莱比锡，莱比锡党的印刷所领导人。——奥·倍·）同意迁往柏林，而盖布因孤掌难鸣，也就不再反对。但是倍倍尔和我，以及奥艾尔声明，迁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也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并且重新鼓起了李卜克内西、盖布和其他的人们。于是这一仗打得也很漂亮。我们在宗纳曼事件和与議員日俸有关的事件中得到胜利以后，拉薩尔派（现在柏林企业的经济利益却在为他们帮忙）作孤注一掷。双方都非常激烈；于是打了一个真正的议会战。首先登记发言的有四十二人，在前面的除了倍倍尔外尽是些柏林人。我们以一些适当的建议使这个名单失效，因为出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方面的人首先上了名单，现在可以大方起来，最后李希特尔（王茲培克）还为我们出了大力。人们特别激动，双方都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敌人却激动欲狂，他们发出暴躁的喧嚷，来充分利用那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同时我们却保持安静并且个个都缓缓稳重地发言。其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好极了。

哈森克莱维尔终于被盖布说服到莱比锡去参加中央机关报，这就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因为不这样，人们就会与弗利克（不来梅）

一同說：新報紙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位先生的机关报。这样一来，統一就得到了保证……”

哈賽尔曼于一八七六年十月一日辞去《柏林自由报》的职位，回到巴門—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担任《山地人民之声报》的編輯，并创办一个表面上只以传单形式出版的新机关报《紅旗》。但是不久就表现出，哈賽尔曼创办这个报纸，是追求分裂的目的，这使他对党和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并在次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引起了不愉快的爭論。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号召，展开竞选。由于該委员会和許多同志的要求，我又写了一本名为《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德意志国会和邦議会的議会活动》的小册子。这个著作此次是以我的名字在柏林印刷合作社出版，也就是在台森多尔夫注視之下出版的，我不久就由我所遭的損害体会到，他适当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国会的末次会期在十月三十日开始。但会期只能很短，而且因为各法律草案对我们也沒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们很少从事于国会討論，却更多从事于选举鼓动，在那几个星期我由莱比錫到科伦，由科伦到普魯士的哥尼斯堡，又从哥尼斯堡到布勒斯劳等地。在哥尼斯堡，我必須在座无虛席的集会上演讲两个晚上，因为我的报告所引起的討論要到第二天夜晚才能結束。在第一次集会上約翰·雅可比也出席了，人們推举他为大会名譽主席。我到这时才認識他。他仅仅是中等身材，整个态度显然是謹慎的，只有为环境所迫才肯明显地干預公众事务，他給我一个非常亲切的印象。我在第一次大会之前到他的寓所去拜訪他，他在一个很寬敞的书房里接待我，里面的书架和櫥柜直到天花板都装滿了书籍。我真

羨慕他这个布置极好的房间，这个房间的舒适安排简直诱人工作。雅可比在次年春季因患结石症施行手术而去世；前一年十月弗兰茨·齐格勒在他之先死去。

回到莱比锡以后，我召开一次民众大会，议程是：“妇女在现今国家里的地位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虽然我们使用的是莱比锡最大的会场，但还容纳不了大批潮涌而来的听众，许多人因为没有隙地而不得不折回。听众中妇女很多。我分析给她们听，她们对于眼前的国会选举也必须加以如何热烈的注意；但因她们暂时还没有选举权，她们的任务就是参加竞选的鼓动，并且催促她们的丈夫和有选举权的男性亲属参加选举，而且要拥护主张她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社会民主党。集会进行得很如意；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妇女参加政治性的竞选活动。

我从莱比锡急急忙忙赶到德累斯顿去鼓动，在这里我被提为党的候选人。第十七薩克森选区（格劳绍—美拉内）也又提我为候选人，该区有组织的同志们预先声明，如果我在另一个选区当选的话，他们就准备来一个补我的席位的复选，因为他们在第十七选区仍会得到胜利，全世界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也就是如此。

我在德累斯顿的三个候选人中间首先得到了相对的多数票。我和自由派的候选人麦侯夫教授进入复选，并以一万零八百三十七票对九千九百二十票取得胜利。在选举的次日，我接到通知胜利消息的电报时（我曾请求不要在选举的当天夜晚打电报告诉我选举结果），我问我妻，地下室里是否还有一瓶酒，在她答应“有”之后，我说：“好，那末让我们今天中午用它来为我的德累斯顿选举人祝福吧。”谈话时我的小女孩在旁边，问道：“爸爸，麦侯夫教授先生今天中午也要喝一瓶酒吗？”我笑着回答她，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授先生的口味如何。在第十七选区是威廉·白拉克代替我当

选了。

选举结果对于我们非常有利。虽然哈森克萊維爾在巴門—愛北斐特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五票对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票失败了，但是邻近的索林根区以一万零六百三十六票对七千四百五十三票把李廷豪森选进国会，并且格利伦貝格在紐伦堡也几乎当选，但是以一万二千零八十九票对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票为敌人所败。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当选为議員的有十二人：奥艾尔、布洛斯、白拉克、宫廷建筑技正德姆勒（石威林，第十三薩克森选区——莱比錫乡区）、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爾、A. 卡倍尔、李卜克內西、莫斯特、莫特勒、李廷豪森和我。

年老的德姆勒偶然談起，他当过梅克林堡公爵的宫廷建筑师，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石威林宫，他有个习惯，如果要离开石威林時間較久，就要到公爵那里去辞行。这次当他要起程到柏林入国会时也是这样。大公爵趁这机会同他說：“我祝您一路平安，但是亲爱的德姆勒（于是他笑吟吟地伸出一个指头警告着），您在柏林只不要搞得太过分了。”这里应该提一下：德姆勒是没有通过工头独自和工人訂立合同把石威林宫建筑起来的，并且对所达到的结果非常满意。

333

二月二日，我写信給德累斯頓我們的党报发行人施吕特尔同志，告訴他，我已通知选举委員接受德累斯頓的选举，并且附帶提及：

“我觉得很愉快，我这个手艺伙計走到异乡以来整整十九年了，当时自然不会预料到在十九年后的同一天里我把接受薩克森首府的国會議員委任的声明送給一位选举委員。老拿破侖有一次曾說过，每个兵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支元帅的手杖，今天可以說：每个手艺伙計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柏林国會議員的全权委任书。一切在前进。我們的朋友，那些敌人，都应活下去。”

敌人对选举结果怒形于色，因为我們所得选票的大大增加远

一八七七年的国会

比所获得的几个委任状更使他們震惊。党的票数由一八七四年的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增加到一八七七年一月集結在我們的候选人名下的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計增加十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七票，即百分之三十六。在薩克森我們得到了相对多数的票，即三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票中的十二万四千六百票。

台森多尔夫制度曾逐渐越过普魯士边界，在大多数中、小邦中成为榜样，这次选举結果证明，这个制度悲惨地崩溃了。即使此后再对社会民主党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組織猖狂泄忿，并且对党的代表人物判决得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酷，也无济于事了。即如俾斯麦遇到幸运，终于得到他长期渴望的严酷的非常法令来对付他所深恶痛絕而又那样害怕的党，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二月二十二日开幕的国会會議中社会問題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不断增长特别使中央党惱惱不安，該党現在第一次在加伦伯爵公司名义之下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完全适应自此以后中央党越来越拥护的社会政策上的蛋間舞。以往中央党对于社会問題一向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这个草案要改善小企业家以及工人的状况。针对着这个草案弗里茨舍和我拟訂了一个对案，要求修改工商业条例中的一、二、七、九和十等項重要規定，使其有利于工人，党团也表示贊成这草案。这个法律草案要求調整監獄中的劳役，監獄劳役应以为国家劳动为限。此外还要求：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工作；如果有的地方办不到，就应当在一星期中給工作人員一天休假；一个标准工作日是九小时；对于女工、十八岁以下的男工和学徒则为八小时；禁止夜工；如果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可能禁止夜工时，就应实施八小时的輪班制。孕妇和产妇的休假期应相应延长。每个工作場所应实施一种由劳資双方約定

的工作規則。此外還要求：對礦工也取消工作登記簿；只有在工人要求之下才填發證明書；規定雙方相同的解約通知期限，禁止實物工資制^①，對於女工和學徒應有更嚴格的保護辦法；設置同業公會和勞資仲裁機構；在國家衛生署的領導和監督之下實行一種國家勞動檢查制度。最後我們要求保障和擴充集會結社權。

中央黨和我黨同時提請討論的法律草案，由黨團方面的弗里茨舍開始辯論。辯論漸成為社會黨人的辯論，我於是得到機會對所提出的譴責予以最有力的駁斥，並對中央黨發言人所代表的所謂基督教世界觀給以應得的批判。我的演說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萊比錫印刷工人協會特予翻印，並送給我一份裝訂精美的演說辭。

這些建議的討論並沒有實際的結果。

在四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國會宣布，哈森克萊維爾在柏林第六選區得三十票多数的選舉應作為無效，因為很奇怪，無意中在把一張選民名單訂入選區時弄錯了，以致有一批選民未能參加選舉。進步黨希望重選時能再贏得第六區；它卻錯了。我們把全部精力投入選舉鼓動，於是哈森克萊維爾現在以多一千多票的優勢而獲得勝利。

在討論鐵的關稅問題時白拉克發表了一篇關於保護關稅和自由貿易的好演說，但是到了表決時，黨團的票分散了，只有少數票贊成保護關稅。

要修改議事規程第四十六條的措辭，以便防止繼續任意提出終結建議的企圖，沒有成功。這個建議不再付討論。相反地，國會却同意了停止對我提出刑事訴訟的建議。台森多爾夫為了我的國會小冊子在柏林市法院建議對我提起控訴，因為那小冊子大大地得罪了首相和觸犯了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條。這一條是：“凡是

① 實物工資制：全部或一部以實物（貨物、生活資料等）代替金錢付工人工資。

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的，而仍公开主张或者传播，因而使国家机构或是上级命令受到蔑视者，处以六百马克以下的罚款或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台森多尔夫建议在三月十二日在《柏林自由报》发行所进行搜查，只查到我的作品十二份，加以没收。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一八七七年同往年一样，国会党团召集全德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自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哥达开会。议程是：1. 关于国会议员的活动报告；2. 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动态和现状的报告；3. 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4. 党报；5. 党的纲领。

从再度由奥·艾·尔作的报告得知，党在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三百九十七名。党报的数目增加为四十一种。此外成立了十四个党的印刷所。党的收入是五万四千二百七十七马克，支出是五万零六百三十五马克。

因为李卜克内西在家患病未到，关于党团活动的报告由弗里茨舍代作。我因为营业缠身到五月二十八日才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达哥达。

关于组织问题由特耳克作报告，他以当选的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鉴于普鲁士当局以空前的大胆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团体在普鲁士完全非法，代表大会不拟再设立党的组织，以免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对它使用现行的结社法；代表大会听任各地党员同志们各按地方情形和需要来进行组织。”

这个决议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差不多全部自由派报纸，进步党的也不例外，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局对社会党组织肆行骚扰、压迫和强暴，而很少听到一个字的批评。当

局自然把这事只看做是对它的非法暴行的鼓励。

哈赛尔曼的行为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哈赛尔曼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取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同意由他发行只为支持选举而出版的传单——《红旗》报。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却完全背着中央选举委员会向官厅呈报为正规出版的周刊，他的追随者借此到处排挤《前进报》。毫无疑问，哈赛尔曼是在使党分裂。这一点在辩论中也由大多数发言人表明了。最后我的一个建议只有五票反对被通过了，建议说：“代表大会请求哈赛尔曼同志，一旦《山区人民之声》报（他任该报编辑）能够维持，就把《红旗》报停刊。”但是他早在十月初就不得不声明《红旗》报停刊。该报入不敷出，使他不可能继续办下去。

另一个争论的不愉快程度不亚于对哈赛尔曼的争论，这是莫斯特谈到《前进报》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杜林教授的连载文章所引起的。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我也认为，由于鼓动的理由，凡是像杜林那样猛烈攻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文章，我们都应加以支持和利用。由这个立场出发，我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已经由要塞监狱里写了两篇论及杜林的作品文章，题名为《一个新的共产党员》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有关的书籍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寄给我的，当时他同莫斯特、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是热心追随杜林的人。不久杜林由于他的学说与政府机关和大学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一八七七年六月柏林大学对他的处分，这就在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更加增高他的声望。这一切促使莫斯特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如下：

“大会声明，有些文章，例如近数月内恩格斯对杜林所发表的批判，使《前进报》绝大多数的读者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发生极大的反感，今后不再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

诚然，此后不久杜林的威信在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心目中

就遭到彻底的破产。这个人的态度这样专横和狂妄，致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

在这次大会上，福尔马尔（他当时第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通过了：

“为了表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团结，大会决议，派遣代表一人参加今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

格利伦贝格支持这个建议，相反地，李卜克内西警告大家提防比利时境内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潮流，它将企图操纵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没有派人去；在这期间，党内发生了更严重和代价更高的问题。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一八七七年九月在邦议会选区之一的莱比锡乡区（第三十六乡间选区），我们得以使李卜克内西当选为议员。党员同志最初请我为候选人，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期望我的合伙人和营业让我除了接受国会委任之外再接受邦议会委任。选举委员会审查资格时提出，李卜克内西入萨克森籍还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当选为议员。选举宣布无效。于是选区的我党同志提出莱比锡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同志，他也当选了。——

339 从九月一日起，瓦尔特希在兹维考服刑十八个月，次年福尔马尔继之入狱。十月一日，在柏林出版了一种月刊，名为《未来》，由卡尔·赫希伯格（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儿子）出资经营。赫希伯格，我可以说，是出于感情主义的动机而参加运动；爱德华·伯恩斯坦辞去柏林银行业的职务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个月刊，就其创办人和代表运动一切方向的撰稿人的世界观而言，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暧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引

起伦敦两位老人的猜疑，当事件的进展和党遭到的经济困难大大要求赫希柏格愿受各方面的经济牺牲时，猜疑就更加深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从远方观察事物，对于人物和情况没有深入了解，认为赫希柏格的这种甘愿牺牲是一种诡计，是一个冷静考虑出来的把党引入歧途而使它背离它的任务的计划。

这是彻头彻尾的误会。赫希柏格从来没有企图把他的财力用于我们所疑惧的目的，或者把支持所疑惧的目的作为他的援助条件。他的资助是出于好心好意和对事业的兴趣，并且从来没有遇事不同我或其他朋友，如盖布、李卜克内西等高议。但是后来我决定在一八八〇年秋末为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真相，同伯恩施坦作了一次党内著名的“卡诺沙之行”，解除伦敦人对赫希柏格的猜疑的尝试才得实现。这件事见下一册。

我自己为《未来》月刊写了許多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很少讨论。这种选举制度我认为是必然要实行的，而且事实上后来也实际应用了，开始时在拥护这种选举制度的主要国家瑞士，遭到我们那久经考验的同志卡尔·比尔克里的一些反对。但是当我在一九〇一年秋季在苏黎世道代尔教授那里吃过午饭向比尔克里告辞时，他说：“倍倍尔，我们不能再见了”（他那时已七十九岁），“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您，您那时在《未来》月刊上所作的实施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的建议是正确的。”几个月后比尔克里死去，他准确地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340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我也终于以一个被告人身份站在柏林市法院的臭名远扬的第七庭之前。台森多尔夫在我的小册子里发现侮辱俾斯麦的地方不下三个，此外，如上文所述，还找到了一个违背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地方。俾斯麦是热心于提起公

訴的。不錯，我对首相的态度是有点欠温和。当我写这本小册子时，想起了一八七六年初他在国会中当面侮辱我的发言，而且多数派通过了一个討論終結的建議使我不能答辯，我还愤愤不平。如果我当时能暢所欲言，就非常可能免于这次侮辱首相的罪名，我的小册子里对俾斯麦的攻击就指的是国会中这件事。此外，当我有一次攻击民族自由主义者时諷刺他們，說他們受首相奴仆般的待遇，而絕沒有想要侮辱俾斯麦。这事发生的时候，正是班伯格議員因为首相对他和他的朋友的待遇而忽然有了可佩服的自知之明，說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話：“我們簡直是狗！”

我对军国主义所作的尖銳批判被认为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可是这批判却完全符合我們所代表的观点。人們控告我，說我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了的而仍公开主张或传播，要借此使军国主义的机关遭到蔑視，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是符合我的立場和我的信念的。

台森多尔夫作为公訴人很容易尽他的职务，他对第七庭知道得确很充分。他若无其事地站在法庭前面，一只手插在浅色条子的夏服褲子（现今所流行的制服是后来才兴起来的）袋里，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黑礼服，好像私人談話似地作了几乎还不到五分钟的发言以后就提議，侮辱首相罪应判九个月，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应判五个月，一共十四个月監禁，他建議合在一起作一年監禁。

台森多尔夫这种办事的方式使我本已激动的感情更加激动了。我自作辯护。在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我把起訴各点逐一加以辯駁。如果人們要由我的小册子里搜集侮辱首相的字句，那就必須考虑到我写稿时的情况，就这种情况來說，則所提出的判刑标准太高了。况且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事根本是沒有的。我认为，根据这一条来控告我是荒唐的，因为法庭一定深知，我格外以事实与

引自科学和軍事权威的文字来说明理由的演說，只是同我党的立場和信念相适应的。

我认为，我这次的讲话很好，但是，即使法官們的注意力沒有被突如其来的冰雹敲打窗玻璃的风暴所吸引，我的讲话也不能給他們什么印象。法官对窗玻璃何时会被冰雹打破的問題显然比对我的很好的讲演更为重視。台森多尔夫认为不值得答复我，就退庭了，在簡短商議后宣布，無論如何，我的判決是九个月監禁。

我提出上訴，十月二十八日，案件由高等法院審理。这里由檢察官格罗叔夫进行公訴。他在讲话中主張，由于我是再犯不能从輕判刑；他建議維持初級法院的原判。

342

我仍自作辯護。針對檢察官的起訴詞我講了一個鐘頭。他认为，我似乎因为是再犯就必须从严处罚，这使我特別忿怒。我抗議，人們把一個为了他的信念而奋斗并一再同刑事裁判官打交道的被告人和一个普通犯人——一个屢犯的小偷或騙子——同样看待。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因而由于利己而犯法，政治“犯”却是为了捍卫或者宣传他的見解而违法，乃是由于理想主义。对不屈不撓地維護自己观点的人，不应该从严处罚而应该表揚。沒有一个政治“犯”会由于捍卫他的信念而与刑法发生抵触时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被社会所鄙視的。而且政治犯甚至还会因此在他的同志的心目中贏得威信。

我在繼續讲话中，把重点放在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控訴上。我因而取得了法庭的首席法官的許可，宣讀我那包含軍国主义批判在內的长达七頁的文章。結果：我被免去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罪名，但是由于侮辱俾斯麥，被判監禁六個月。

我要附帶說明，几个月以后，在十二月間，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魯道夫·梅耶尔也由于侮辱俾斯麥被高等法院判處監禁一年。那个也对我提了公訴的檢察官格罗叔夫現在說，他希望，这是最后

一个侮辱俾斯麦的案件。但是，这种案件一直到俾斯麦不再做首相时，就是說过了十三年才不再发生。

343 考虑到我的家庭和生意，我非常盼望能在莱比錫服刑，但是按照部里頒布的法規，这里只能处理最高不超过五个月的徒刑，于是我向主管机关詢問，是否可能准許我在莱比錫監獄里服刑五个月。等这里批准以后，我往柏林向第七庭庭长賴希請求，准許我在普略曾湖服刑一个月后把下余五个月改在莱比錫地方法院監獄里服刑。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他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并且表示同意我的建議。

于是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普略曾湖服刑。入獄的手續很是繁瑣討厌。当我被引到劳役监督官的面前时，他用这句话来迎接我：“现在，倍倍尔先生，普略曾湖政治犯監獄的情形如何，您大概从莫斯特的作品中知道了。”我回答說，我固然看过这作品，但是为时已久，我請他告訴我有关情形。于是他那显然抑制已久的对莫斯特的憤怒突然发作起来。他說，他懂得，囚犯把官員看做敌人，并且背着他們尽可能設法图謀占便宜，但是随后公开叫嚷他們怎样欺哄官員、怎样誘使他們让步，这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他接着叙述，莫斯特的作品发表后，在普略曾湖的官員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后果。他結束他的激动的談話說：“莫斯特只要再落到我們手里，我們要向他报复他那泄露机密的行為。”

不久他就又落在他們手里，并且他們給了他充分的报复。莫斯特到普略曾湖監獄来会我时，曾立即遭到拒絕，这就使他預感到一旦遇到机会什么事情在等待他。

344 我获得了可以从事写作并且在夜晚灯火可以点到十时的权利。我的馬克思《資本論》和各种其他社会主义著作都被沒收了，好像我还有什么会被腐蝕似的。由于劳役监督官絕對地要求我，不但要从事讀書，而且也必須拿出点作品来，于是我便写了一本

以《十八世紀的法国》为名的小册子。

膳食不能自理，只有那些因为欺詐而入普略曾湖的交易所投机者才可以自理，政治犯是不准的。但是这种粗劣的伙食即使不說使囚犯厌恶，也特别使囚犯苦恼，它的菜单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說，在一个星期內，早上、中午和晚上所供給的膳食按次序地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循环着。我在普略曾湖将近两个月，体重大减。我不懂，監獄的医生怎么会准許这样的伙食制度。由于我的要求，医生准許我吃所謂病号飯。于是我每星期有三次午飯可以得到一份确实不错的肉湯和一份插在尖木签上的麻雀肉（因为不放心让犯人用刀叉），还有洋芋和蔬菜。麻雀肉这个名目的来源是这样，这一小块肉在形状和大小上看起来，很像一只拔去了毛的麻雀。

我打算在圣诞节前由普略曾湖迁往莱比錫，这样我就可以到家里去欢度佳节了。我的女孩迄今共过了八个圣诞节，其中有四个我都是在監獄里度过的。我希望不要第五次在監獄中过圣诞节。但是事情竟然如此。我向莱比錫監獄管理处請示，我可否在圣诞节后到那里开始服刑，該处回答說，暂时还不可能，因为牢房已經住滿了。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我才迁往莱比錫。

当我在普略曾湖服刑时，監獄牧师曾屡次找我来談政治事件。我被准許看《福斯报》，这个报照例在每周末，即星期日我才能全部收到。莫斯特那时开始用他的全副热情作退出邦教会的公开宣传。他所发起的民众大会拥挤不堪，而且情緒激昂。当現在新成立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宫廷教士斯托克尔領導之下也举行集会，并且这政党的演說家也去参加莫斯特的集会，但在那里，如所预料，这些演說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吃了亏时，这种激昂情緒高涨起来了。这种鼓动使得国内的信徒大为震怒，監獄牧师也很激动。这甚至使年老的皇帝在一八七八年三月回答邦議會議长祝賀他的寿辰时說：“宗教必須为人民保持着。”

內部事件

当我在監獄里有時間作各种各样的思考时，党内党外发生了一系列特别重要的事件。柏林的同志們在十一月間创办了一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协会，以代替被解散了的組織。基督教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创办一个周刊《国家社会主义者》，撰稿人有沙夫萊教授、馮·舍尔教授、銀行家沙姆特尔、Ad. 瓦格納教授、托特牧师、彼得曼博士（德累斯頓）等人。福音派社会政治家不願意让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独占陣地，而要在社会民主党面前把那些还可挽救的福音派工人挽救出来。

在重大政策方面似乎也面临改革。帝国的支出不断增加，需要新的收入。向各邦摊派的弥补帝国亏空的款項日益增加，但因各邦本身在内政方面需款日增，所以各邦就越来觉得困难了。俾斯麦最不願与開用直接稅来弥补日益增加的开支。他痛恨直接稅，并且他自己也在可能范围内設法逃避納稅。早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国会里闡明他的稅收思想时就说过：

“我从来就根本贊成尽可能用間接稅来筹措一切款項，并把直接稅看作一种又苛刻又拙笨的应急办法，类似摊派稅款，唯一的例外是我可以称为体面稅的稅，这是我永远要維持的一种直接稅；也就是富人的所得稅……大家彻底了解，这指的是确实富有的人……我几乎迫不及待地要加重烟草稅，虽然我很願意让每个吸烟人都享受这种快乐。与此类似的还有啤酒、燒酒、糖、煤油和一切这类的大量消費品，可以說是广大群众的奢侈品。”

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以同一办法来弥补超額开支。因为当时俾斯麦同一部分保守党人冲突很大，另一方面同中央党仍是敌对的，所以他有心联络那时同亲密盟友形成国会中最大党的民族自由党人来拥护他的政策，因此，他同他們的領袖馮·本尼

格森先生談判他入普魯士內閣的事。本尼格森願意如此，但是他認為有必要取得其他領導同志對這一步驟的同意。在拉斯克爾的影響下，大家一致認為，如果除本尼格森之外還有巴伐利亞的斯陶芬堡男爵和馮·傅爾肯貝克先生也可以進入內閣，才可以同意本尼格森參加內閣。本尼格森獨自一人對付不了日益增漲的反動的保护關稅主義的潮流。俾斯麥對於這個條件，尤其是对拉斯克爾大為震怒，并斥責他說，总有一天再让他嚐嚐滋味。后来老皇帝听说要邀請本尼格森加入內閣，認為他在一八六六年对汉諾威王室的態度可算是半个叛逆分子，表示堅決反对本尼格森担任普魯士的閣員，于是全部計劃付于流水。俾斯麥不忘記民族自由黨人所干的他认为得罪了他的事，他不久就对他們进行報復。

一八七七年年底，奧艾爾由漢堡迁往柏林，与莫斯特等人一同参加《柏林自由报》的編輯工作。奥古斯特·盖布力求使尤利烏斯·莫特勒接替奥艾爾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但是一八七六年由于私人原因已脱离了莱比錫印书业合作社领导机关的莫特勒加以拒絕。

347

此后不久，柏林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广大群众紧张起来。一八七八年三月七日，柏林联合印书館的經理奥古斯特·汉士去世，定于三月十日安葬。汉士不是演說家，却是个杰出的組織者，柏林运动的一切綫索都汇合在他手里，他不顧身患疾病（他死于肺癆），还是尽其所能进行帮助和策划，从不厌倦，因而获得了柏林工人最广大的同情。他的葬禮形成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空前大示威。警察局长对于运动的理解表现在他禁止游行队伍携带旗帜，即使是隐蔽起来的旗帜。

示威游行进行得又安靜又有秩序，使敌人非常佩服，《喧声周刊》甚至刊登了一首诗：

“給社会民主党

他們近来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就他們这次游行而言，我們承认。
如果我們也作这样大的游行，
希望能保持同样的纪律精神！
我們乐意为他們鼓掌喝采，
只有白痴才认为这不公平。
不願意向敌人学习的，
就有败无胜。”

几星期后，柏林发生了第二次，或許还更为盛大的葬礼。《柏林自由报》的責任編輯保尔·邓特勒也死于肺癆，但是他死时的情况令人气恼，于是党在柏林和全德国掀起了一阵憤慨的风潮。邓特勒和汉士一样，是一个年紀还輕的人，他为我的官司热心地做了不少的琐碎事情。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皮肤細嫩晶莹，这是癆病患者常有的現象，他的为人非常和藹可亲。

348

一月十八日，邓特勒被控在《柏林自由报》上犯了多次瀆君罪以及其他罪行，在重病中被拘押审讯，并在二月七日被第七庭判决二十一个月监禁，他声請上訴。于是邓特勒申請鉴于他身患重病免去他上訴而不变的待审拘押。法院要求監獄医师核定病情。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列文大夫（这位贵人的称呼）屈尊到囚舍来看一次，問邓特勒觉得怎么样，随后就又无影无踪了。邓特勒終于获得的是他在死前不久从市監獄被送往慈善医院的囚犯科。

邓特勒从这里写信給《柏林自由报》編輯部說：

“我的情况日益恶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提請注意（請求暫釋），沒有效果。第二个星期开始，又結束了，在这个星期的末一天——我申請以后的第十四天——医药顧問烏尔夫来了……烏尔夫先生作了很仔細的检查以后，說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走

了。——自从那次检查以后又度过了整整八天，我仍旧不明白我的命运如何，第七庭以后开庭三次，并且我——我今天下午散步时吐了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将在短期内跟着来的更厉害的肺出血的预兆。我现在一次肺出血会像以往经历过的两次那样幸免于难，我简直认为不可能。”

所预料的大吐血发生了。四月二十四日，邓特勒逝世。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殓葬，送葬的人非常众多；这是对他所遭受的待遇的一种激烈的抗议。为邓特勒送葬的人那么多，又使资产阶级既惊讶又害怕。《马格德堡报》在描写这种惊骇的情形时这样说：

“看见这次送葬，谁还能说柏林工人营？这是团、旅、师，甚至还要多，这是整个军团，向确实为他们的事业立了大功的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此后，柏林还出现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送葬行列，规模比汉士和邓特勒的还要大，这些是向资产阶级大声说出的警告。 349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在这期间，国会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开幕。我又因坐牢不能参与。我的请假建议和以往一样仍遭拒绝。

我们的议会党团很勤于提出提案。它建议：修改宪法第三十一条（议员即使在徒刑中也应释放），修改国会选举法，实行封套制，选举规定在星期日，根据每次户口调查规定选区的数目和范围，修改刑法典有关操纵选举的规定；有关结社和集会权的法律草案，建议修改迁徙自由法（限制驱逐出境），对于委员会设置劳资仲裁机构的报告的建议，对于政府所交议的有关修改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的建议。

那时期常发生社会党人的辩论，有一次俾斯麦开了个玩笑，他愿意把波兰的一个地区给我当作社会主义实验示范区。我因为被

关在牢獄里面，对于他的这个玩笑不能作适当的答复。

我听说莫特勒想讨论工厂童工问题，在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说道：

“昨天格拉特斯台恩博士告诉我，你托他搜集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材料。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用工商业条例附则来限制童工，则以不涉及数字材料为宜，因为就我所知，没有可用的材料。儿童死亡率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也是如此，但须注意的是，除工厂劳动以外，恶劣的住所、恶劣的饮食和病中恶劣的护理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把一岁婴儿大量死亡归之于母亲在工厂中工作，则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闹棉花恐慌时，母亲们缺乏工作，婴儿能够不离母怀，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显著减少，这无疑是在再好没有的实例了（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认为，你最好在这里干脆指出这种劳动本身在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害处，并且连带指出，母亲在工厂工作必至破坏家庭生活，并且诉诸敌人的感情，如果他们的妻和孩子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该说什么。此外，政府为了使厂主能作更多剥削的阴险举动，也应受到相当的指摘。

可是这里有一个新的解决一切的好意见。如果外国竞争使厂主难以完全禁止童工和基本限制女工，那就应该采取政府业已在其他范围内采用而有成效的方法，締結各种有关的国际协定。如此，则政府不仅使德国的舆论站在它的方面（这在其他问题上几乎是沒有的），而且也能博得国外劳动阶级的同情。这种措施的道德压力之大会迫使每个政府都接受这样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用这张王牌可以赢得很多胜利。

对于舒尔采—德里奇关于合作社法的建议（第十一期印刷品），你们可以再提几个补充建议，例如实行有限制的赔偿义务，类似以前薩克森的合作社法。舒尔采的建议也有些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我提出我的一份报告备用，在报告里我对题材加了几个注解，可据以发挥。奥·艾·尔或者誰有兴致，可以担任这一章。

我遇便就把报告(第十一号文件)交出去，但請代我保存，将来仍予賜还。”

在萊比錫獄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我利用獄中閑暇来写作，其間也为《前进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創設党的总图书馆(档案館)。数月后发生的事件阻碍了計劃繼續进行。我后来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重新提起这个意图，这时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书店工作的施吕特尔同志答应实现这个意图。党的档案館随即建立起来。

351

此外，我完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次年发行第一版。我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国家卫生局及其綱領》，其中討論社会卫生問題，据我看来，国家卫生局必須能解决这些問題，才符合它的名称和地位。

我这次在萊比錫服刑，使我有机会帮助一部分同獄者来稍微改善他們的情况。当时獄中的高級领导是一个老年的典獄官，据說他在他的职位上用下列手段致富，他以获取高額利潤的价格把食物和飲料卖给有錢的囚犯。此外，我的看守者(他很高兴同我閑談)在私人談話中告訴我說，典獄官还用其他方法在囚犯身上作弊。他克扣囚犯的手巾和肥皂，囚犯必須把規定的使用時間延长一倍。囚犯們用瓷碗盛午飯。当然有时会有一个被打破。但是典獄官不予补充，于是必須等待一部分囚犯吃过飯，才能用未經洗滌的碗把已冷的食物盛給另一部分囚犯。

这个消息激起了我的忿怒。我現在想出一个办法来阻止典獄官的这种行爲。法院院长当时兼任監獄的總監，我坐下来写給他一封申訴书，描述全部非法行爲，但是我以剛离开監獄的囚犯身份

来叙述亲身经历的典獄官的不法行为，这样我就不至于受牵连。这封信自然必须是匿名的。

352 我妻下次来探问我时(每次都是当着典獄官的面)，我秘密地把一张纸条塞在她的手里，纸条上写的是請她在一個約定的夜晚正九時半从我的囚舍窗前的街上走过，我将丢给她一封信，再由她用辨識不出的笔迹抄写一道，而后送交法院院长。事情就这样办了。当我妻带着小女孩在街上出现时，我由三楼上丢给她一封相当厚的信，很响亮地落在寂靜的街道碎石路上。我妻急忙拾起信来，同女孩赶快跑开，她以为听到有人从后面来，怕是来追她的。几天以后，看守人很激动地冲进我的囚舍，对我說，院长和典獄官在上午大鬧了一場。老头子——他是这样称呼典獄官的——被院长叫去，并且根据一个释放了的囚犯所写的一封信，列举了他一切的罪惡，把他大加申斥。老头子非常生气地来到他們看守人这里，命令立刻革除惡規。看守人非常得意地叙述这件事，我自然慎防他发觉写信人是谁。

五月初，中央选举委员会号召召开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间是六月十五日到十八日，仍在哥达举行。議程中的第三項：討論社会民主党对国营和地方經營的企业态度，登記的报告人是我同李廷豪森。討論这一項目的起因是俾斯麦的計劃，即铁路国有以及实行烟草专卖的計劃，烟草专卖計劃当时虽未公开討論，但已泄露出来，說烟草专卖在俾斯麦同馮·本尼格森先生的談判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党的李廷豪森同志公开表示贊成保險事业国有化，但在党内并未完全取得同意。

353 但所筹划的會議沒有实现，当时发生的事件使它不能举行。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五月十二日，我在囚舍得到一个使我驚訝万分的消息：前一天

下午三时，萊比錫的某一名霍德尔的人，据說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刺老皇帝，但老皇帝沒有受伤。我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名叫霍德尔别名萊曼的人，我是知道的。霍德尔前一年出现在萊比錫党内。我不認識他本人。因为他沒有工作，也許是他不願工作(他曾学过錫匠)，就从事于推銷我們萊比錫地方机关报《火炬报》和出售社会主义书籍。但是不久就证明他是个騙子。他侵吞了收进的錢，这使《火炬报》发行所早在四月五日就已公布，撤消霍德尔銷售报纸的职务。而且在数日后萊比錫党支部作出决定，建議把霍德尔开除出党，事实上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五月九日，也就是在他行刺以前两天，在《前进报》上宣布，霍德尔被开除出党。

霍德尔不可能留在我們这里，于是轉到民族自由党鼓动者斯巴利希和民族自由党的《萊比錫日报》的編輯部，并且为了金錢供給他們一系列假的夸张的对党的控訴，《萊比錫日报》企图以此對我們进行敲詐。他在萊比錫完成了反党的使命后，斯巴利希及其伙伴設法甩掉他；他們給了他往柏林的旅費。到柏林以后，他脚踏两只船。他加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协会，同时也参加宫廷教士斯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当时在斯托克尔的周圍集結着各阶层大批的危險人物。还有个裁縫格伦貝克，二年前他在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因为行騙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格伦貝克后来也离开了斯托克尔，他透露說，除了霍德尔之外，还有諾比林博士也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成員，这个人就是后来第二次行刺皇帝的人。格伦貝克遵照宫廷教士的囑咐，开列了一份新的党员名单，其中却沒有諾比林的名字。霍德尔在柏林既推銷社会民主党的，也推銷基督教社会党的报刊和作品，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传单《热爱国王与祖国》。当他被捕时，在他的身边还搜出李卜克内西、莫斯特和我的像片，他也拿这做生意。关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不問可知的了。

俾斯麥在弗里德利希斯卢合一听到霍德尔行刺的消息，馬上

打电报到柏林說：“以非常法令对付社会民主党”，由此可见，他如何迫切期望有个机会尽可能給这个可恨的政党以致命打击。起初公众和出版界对行刺的消息相当冷淡。当个别报纸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来負行刺的責任时，半官方的《汉堡通訊》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七十八年內对出名的政治人物发生过三十五次暗杀和暗杀企图，而且凶手是属于各种不同的政党的。政治暗杀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孕育下产生的这种控訴，是不能成立的。国会起先对于这件事也还是很冷靜，所以五月十四日我們要求暫停对莫斯特进行刑事訴訟的建議未加辯論即予通过。

355 在第一次审讯时，霍德尔反駁他有意向皇帝射击的說法，宁可說他是意图自杀，作为迫使他出此的我們悲慘情况的标志。作为佐证，在被捕时他口袋里連一分錢也沒有，并且他所用的手枪是件劣貨，这支枪，据造枪工人在检查后确定，在几步以內都不能命中。此外还确定，霍德尔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和一个姓萊曼的結婚，所以他有时也姓萊曼，他受的教育很坏。虽然人們在他的脑子里塞滿了教义問答和聖經格言，可是他不能写出一句正确的話。此外还确定，他患有花柳病。他在被帶去受审时，傻笑着进入法庭，在判決后同样笑着离开。他給他的双亲所写的信末尾署名：麦克斯·霍德尔，行刺德意志皇帝陛下的凶手。还确定了，他从小就是个騙子和小偷。这个人的整个品行，据判处他死刑的法院确定，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陷于混乱的人的品行。而由于一个这样的人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釘在十字架上。

霍德尔想請奧托·夫賴塔格律師做辯護人。夫賴塔格也表示願意担任辯護，但他要求把案卷送他那里，給他八天研究時間并准备辯護。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被拒絕了。人們非常急忙从事于对霍德尔的起訴和处決。現在霍德尔得到了一个义务辯護人，这个人不会做別的，只是請法院原諒他抽中了簽而必須担任这个謀

反者的辯護人。霍德爾的頭在劊子手的斧子下落了地。維爾周教授請求把霍德爾的頭給他作解剖研究，也被拒絕了。

死刑的文書須由弗里德里希皇儲簽署，因為當時皇帝遭到六月二日諾比林的行刺而受了重傷，由皇儲代理。此後皇儲在他攝政期間，即使是雙料凶手，他也沒有再簽一張死刑判決書。還有其他徵象表明，他對整個事件有如何不同的理解。

第一個非常法

俾斯麥所要求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不久就實現了。俾斯麥的非常法的草案早在五月十二日就到了柏林，於五月十四日由他的秘書處制定好並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早在十六日，它即由聯邦議會批准（薩克森政府對這最為熱心），五月二十日草案連同緣起被送交國會，二十三日即已列入議程。 356

民族自由黨人在全部進程中心情不佳，他們本能地感覺到，俾斯麥在背後還另有反對他們自己的計劃。普魯士政府也有變動，預料決無好事。代替本尼格森和傅爾肯貝克參加內閣的是兩個極端保守主義者，歐倫堡的包圖伯爵和司透耳堡—維尼該羅德的烏都伯爵，即那個在一九〇九年擔任國會議長時去世的人。自由貿易派的自由主義者財政部長馮·康普豪森也只得辭職，由意志薄弱的民族自由黨人霍伯瑞希特繼任。自由主義的文化部長法爾克，即反對中央黨的五月法令和文化鬥爭期中唯一開明的法令（實行民事登記法）的起草人，也必須讓位，這些都意味着對中央黨的極大讓步。所以民族自由黨人有一切理由感到懷疑。

根據共有六章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提案，聯邦議會可以禁止追求社會民主黨目標的印刷品和協會。一旦國會開會，就必須把禁止事項通知它。如果國會要求取消禁令，則禁令即行失效。警察局可以臨時禁止在公路、街道、廣場或其他公共場所散發印刷品。

但如果在四个星期以内联邦议会方面没有禁止这项印刷品，则警察禁令即行取消。禁止和解散集会权完全由警察掌握。对于这，是不准上诉的。违反禁令者处以五年以下徒刑。印刷品即使没有法官的命令也可没收。被禁止的协会的主持人，被禁止的集会的召集人与领导人以及供给被禁止的协会或者集会以会场的人，至少应处以不少于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法令的有效期限是三年。

预料在讨论提案时议会党团将通过它的发言人激烈反对这个法令，我在五月二十日由监狱写信给莫特勒说：

“因为实施非常手段是事实，那末，我们这方面为此发言的人就不应忘记，必须把他的发言散发出去几十万份。也要注意，如果议案被否决了，国会就要被解散，那末，我们就处在竞选的前夕，这个发言将发生它的效用。所以首先要把我们手里有关这个发起人的一切材料，逐项加以研究。

《法兰克福报》的星期日晨刊有一篇很好的社论，请你们注意。法令草案近于疯狂。”

但是议会党团经过长久讨论后决定，通过李卜克内西发表一篇声明，今后不再参加辩论。

国会的辩论由歌伦堡伯爵的简短讲话开始。接着由李卜克内西发言，作了以下的声明：

“在法院审讯还未结束之前，就想利用一个疯人的行为来实行蓄谋已久的反动计划，并把还未证实的对德意志皇帝行刺案的‘道义上的主使’归罪于一个政党，而这个党是批判任何行刺的，并且把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理解为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企图本身在每个公平人的眼里都要受到充分的谴责，因此，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代表感到不得不作一声明，

我们认为参加今天提交国会的非常法令的辩论是与我们的尊严不相容的，并且任何挑逗，不管来自何方，都不能动摇我们这个

決議。但是我們的确要參加表決，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有義務盡我們的一份力量來防止一場史無前例地摧殘人民自由的行動，用我們的票決勝負。

不論國會表決的結果如何，慣經鬥爭和迫害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將以正當的不可戰勝的事業的意識所賦與的具有信心的鎮靜態度正視未來的鬥爭和迫害。”

繼李卜克內西之後，由本尼格森發言。他的發言我認為是他直到那時最好的一次發言；這個發言表現出，他也能換一個樣子，他能用比以往流行在民族自由黨發言人方面的觀點更高的觀點來判斷事物。他在發言中說，政府的見解已明白顯示出來，即明知法案會被否決而仍交議。他希望，這種見解要糾正。他指出政府的不安定和動蕩，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內閣危機在普魯士是永久存在的。如果人們想要獨裁強權，首先必須知道，誰來行使強權？像所要求的這個非常法令，他的黨不能同意，歷史指出，這個法令引導到哪裡去，而且毫無好處。他為此作了長篇的歷史考據。此外，他在發言中還主張停止文化鬥爭。他是個厭倦的人，他希望看着鬥爭的結束，在這鬥爭中雖然他和友人曾一度為這在俾斯麥領導之下的鬥爭喝彩歡迎和奮鬥到底，這些所謂文化戰士却迄今沒有獲得絲毫好處。最後他自願明年在普通法典的基礎上幫助通過一個議案，使公民自由同公眾生活中的合法秩序和牢固權威為一切階級統一起來。

那末，他現在自願效力於他和友人二年以前用充分理由所反對的東西。這又是完全民族自由主義的。但是，事與願違，本尼格森及其友人卻被迫來作他們目前所拒絕的事情。

經過兩天討論，法案的第一章以二百四十三票對六十票，六票棄權，而遭否決。中央黨全體投票反對這個議案；民族自由黨人有貝塞勒、格奈斯特和馮·特賴奇克三教授表示贊成。根據這結果，

政府把議案撤回。

非常法令既暂时搁置下来，欧伦堡伯爵就于六月一日給警察机关一个訓令，要它严厉对付党。“应当負責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并且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法律手段，要謹慎遵守法律所画定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要使用到所許可的限度。”

一开始就不需要这样的要求。警察到处表现出他們极热心于救国活动，檢察官和法官也不亚于警察。

諾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我于五月底被释出獄。六月二日，一个星期日，我同妻子和小孩去散步，下午七时以后回家。我們才到家，夫頓塔格律師的妹妹急急忙忙地到我們的寓所来，很激动地問我們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們住在郊区，所以消息传来不快，特别是在星期日。我回答她說：不知道。夫頓塔格小姐接着問：“您認識一个諾比林博士嗎？他今天下午行刺皇帝，皇帝受了重伤。”我啞口无言，好像触了电。我回答說，諾比林这个名字我不熟悉，但我认为他决不属于我党。这位年輕的女士才放心而去。

次日早晨，我急忙赶到《前进报》的編輯部，去听一听那里有什么消息，以及人們对这事如何看法。公布的一个电报并没有一个字提到諾比林属于社会民主党。我松了一口气，走进編輯部說：“吶，他們不能拿这个人牽連我們了。”李卜克內西、哈森克萊維爾和其他在場的人也和我的看法一样。沒有人認識刺客，就是他的名字以前也沒有人听說过。我心情坦然地离开了編輯部，但是几分钟后我又必須轉回去，因为这时又公布了第二个电报，說諾比林在第一审中供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有同謀者。我們大家都啞口无言。

后来证实烏尔夫電訊社的这些报道，也和其他許多当时故意

传播的这类消息一样，乃是大大的谎言和捏造。但是这些却最圆满地达到了目的。舆论原已为了六月一日得到的消息，说当时德意志舰队一艘最大的“大选侯号”军舰在大白天和一艘载有乘客约五百人的船只相撞而沉没在英国海岸附近，而极为愤激，现在听到第二个暗杀消息，就沸腾起来。

当俾斯麦得到这消息时，他欣喜欲狂地叫道：“现在我抓住了这些家伙（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我要把他们逼得尖叫起来”，然后他才问到皇帝受诺比林猎枪重伤后的情况。现在解散国会和因而重新选举已确实在望，由此他可望得到所需要的多数，这个多数就可以批准反对我们的非常法令以及由实行保护关税获得的新收入。

诺比林是从菩提树下街他所租房屋的窗子射击皇帝的。射击以后，他曾企图自杀，连放两枪都没有成功。皇帝被刺后，许多人闯进诺比林的住所，一个军官用军刀把他的头部砍伤很重。诺比林一时失去知觉，已完全不能受审讯。可以确定的是，他多年前曾在莱比锡学习农业，并且在我們最凶狠的敌人比恩包姆教授的学院里的辩论会上表现为我們党的激烈对头。他从莱比锡到德累斯顿，进入伯麦尔特教授的学院，这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对头。在德累斯顿，诺比林曾屡次在集会上发表反对我們党的演说，因此，我們在那里的同志，如福尔马尔、施吕特尔、巴士基等都认识他。这些人后来在对诺比林的审讯中作证，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头脑非常混乱。他和党的关系比霍德尔更少。许多人发表意见，认为：由于新闻界大量报道霍德尔这个消息，有一家家庭问题报刊登了他的精美木刻的肖像，这引起诺比林去干这件事。认为诺比林是精神病患者的意见非常广泛。就连始终对社会民主党仇恨最深的敌人、自由保守主义的《邮报》也写道，诺比林在回答一切问题时嘴上都带着奇怪的笑容，由此可见他神经错乱。并且审问诺比林的法官曾对《日尔曼尼亚报》的主编马容克说：“报纸为

諾比林所描繪的形象完全不切當，他絕不是個有理智的人，他比霍德爾更為愚蠢。”到了九月十日諾比林死在監獄裏的時候，絲毫沒有取得證據能證明社會民主黨直接或間接同凶手有聯繫或者對他這行動有所影響。

對於那些要不惜任何代價利用這兩個暗殺案來成立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非常法的煽動者來說，一切這些確證都是不存在的。俾斯麥濫用他借助收買費造成的對於大部分報紙的強大影響來激起民眾對社會民主黨的狂熱仇恨。凡以社會民主黨失敗為有利的人，特別是一大部分企業家，都附和這些報紙。在敵人的陣營中，黨被稱為暗殺黨，使群眾不信上帝、王權、家庭、婚姻和財產的毀滅一切的黨。這些敵人認為最光榮的事是對這個黨作鬥爭，如果可能，就把它消滅掉。幾千又幾千被當作社會民主黨人的工人被拋棄在街頭。各報的廣告欄里刊登着聲明，工人們負有義務，此後既不隸屬於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也不保存和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也不為社會民主黨的活動捐錢。企業家的恐怖政策是這樣厲害，我們的黨報要求黨的擁護者，他們可以在任何聲明上簽字，但是過後他們還是可以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對於這樣的恐怖政策不必守信。恐怖政策和與此相連的抵制政策還有發展：愛國的房東通知他們的社會民主黨的房客搬家，還有多年來喜歡把社會民主黨人當作主顧的酒館老板現在也要求這些人回避他們的酒館。萊比錫的《前進報》和《新世界》的主編——李卜克內西、哈森克萊維爾、蓋塞爾習慣於每天下午編輯工作結束後到一個固定的酒館喝杯“早酒”。老板現在讓人告訴他們，不歡迎他們來臨。《柏林自由報》和其他地方的編輯人也屢次碰到類似的事情。

在石威林，年老的德姆勒的窗子接連兩夜被搗毀，這使七十四歲的老人異常忿怒，一時離開了石威林，並且拒絕充當國會議選人。但是，一切這些狂暴行為和政治癡癲還不足以滿足“愛國人

士”的迫害狂。真真假假瀆君罪的告发潮涌而来。經法院证实，許多告发人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損害，复仇心切，于是进行告发。但是这并不妨碍宣判最严厉的处罰。大部分的法官也被迫害狂所感染，于是，他们就宣判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这些是法律所許可的最重刑罰。以往絲毫不能惊破檢察官的宁靜的言論，现在都被看做重大罪行而受到最严厉的处罰。

七月初，进步党的《福斯报》写道：“在我們报道各地判決（因为瀆君罪）的徒刑的总額高达五、六百年以后，我們不願把悲慘的名单繼續发表下去。”但是，法官既已完全忘記他們的职责是什么，对他们还有什么可說呢？在两个月內計有五百二十一人被判徒刑共約八百十二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警察机关，一如往日遇有这类机会时一样，也似乎丧心病狂，搜查住宅，并根据不可靠的揣測妄加拘捕。极大多数的被捕者在短时期内又释放了。

363

早在五月，汉堡市政府就已禁止举行全德职工代表大会，哥达市參議会在六月初也禁止举行德意志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各官署也屢次反对各协会和集会。統治集团屢次使人向我們传話說，要如何堵住社会民主党的口和逼它抗議，就可以开枪了。《柏林自由报》因此发布通告說：“謹慎小心，有人要开枪了。”虽然如此，还有一批党报宣布从七月一日起訂戶增加。《柏林自由报》的訂戶由新年的一万份增加为一万四千份。但是一八七八年九月底，《柏林自由报》的六位編輯也被关起来，其中有理查·費雪尔，他还是个年輕小伙子，因为加入流亡者同盟而被判七个月監禁。

这种普遍的迫害对于我和我的营业非常不利。我在长期監禁以后有必要来作一次业务旅行。这次旅行应当到德国西北部和萊茵河下游一带去，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我以往还没有去做过生意的

地方。这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的幸运。我在那些地方熟人极少，在旅館中可以冒用假名，因为我若使用本名，人們決不容我作客的。我天天在餐桌上所耳聞目見的，是客人們如何对党，也特別对我个人表示无比的仇恨。如果我被认出来，就会发生极严重的事件。但我在向商人推銷我們的出品时，也遇到这类事情。我首先在薩雷河畔的哈雷訪問一个商人。他认为我們的出品合意，并給我一张值得重視的訂貨单。但是我一把我們商号名片遞給他，他看到商号的名字，就粗暴地声明：“我不同这家商号作生意，請您取消我的訂貨。”这样的事我常常遇到。有些人不作任何解释，就拒絕訂貨。我这一趟生意做得非常坏，在六个星期后回到家里时，我因結束了这段經歷而欣喜，因为我所售出的貨物还不足以补偿我的旅費，虽然我企图把旅費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有些地方，不管雨天还是烈日之下，我自己把九公斤重的样品箱在街上背来背去，来节省搬運費。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回家后，我就投入选举鼓动中。俾斯麦在这里也懂得趁热打铁，并且两次暗杀事件使他摆脱了內部的各种糾紛，遂向联邦議会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議，联邦議会在六月十二日接受了这建議。选举定于一八七八年七月三十日举行。

如果俾斯麦只为搞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則不解散国会也可以达到目的。在諾比林行刺以后，民族自由党的全部报纸，并且在各种时机还有該党議員們也都保证，他們现在准备批准反对我們的严厉的非常法令。

但是单用这个已不再能事奉俾斯麦。他决心要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他声明說，他們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府都不是正当的。然而这些要求却向来是如何有节制。他促使公布一个正式的綱領

宣言，他在宣言中完全背弃了盛行的、所谓为自由貿易服务的經濟秩序。其中說：法学家、官吏和学者，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們迄今所占的优势使議會走到不切实际的方向。政党間的仇恨，各党团的爭权，党团领导人的野心使人把時間都浪費在雄辯表演上。大多数人沒有生产性的职业，他們既不从事手工艺，也不从事生意，既不从事工业也不从事农业。經濟的利益却由那些依靠薪俸、酬金，議員日俸（这在当时国会还没有。——奧·倍·），新聞事业或有息証券为生的人們来代表。

这个激烈的攻击不仅是极其清楚，而且也粗野透頂。对竞选能发生影响的官員們现在认清了他們应办何事，并且依此办事。

竞选以空前未有的激烈发动起来。俾斯麦的选举口号不妨碍一切資产階級政党把对我們的斗争看做它們最主要的責任。“社会民主党必須离开国会。再不准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也成为进步党报纸的口号。虽然人人都看得出俾斯麦的阴谋何在，他不仅要消灭我們，而且也力图削弱自由党，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同保守党候选人在爱尔福特选区进入复选的时候，进步党領袖欧仁·李希特尔把选举口号打电报告訴他的同志說：宁要魯西烏斯（保守党人），不要卡培尔（社会民主党人）。他对我們的仇恨，竟使他不見选举策略上的自然規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党人同样是俾斯麦經濟政策的敌人，而将来的国家是沒有考虑到的。

我又在德累斯頓和萊比錫候选。在德累斯頓和我竞选的是馮·弗里森男爵（一个退职部长）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我在初选时得到九千八百五十五票，馮·弗里森七千二百六十六票，瓦尔特（进步党人）五千四百一十票。我和馮·弗里森进入复选，复选由选举委员会定于八月九日，即馮·弗里森庆祝他的七十寿辰的日子举行。显然人們預料我定会失败。但是我竟以一万一千六百十六票对一万零七百零二票胜利了。在萊比錫，我得了五千八百二



CICIR 179584

366

十二票，較上次选举多六百票。除我以外，我党最后当选的还有：白拉克（格劳紹—美拉内），弗里茨舍（柏林），哈赛尔曼（巴門—爱北斐特），凱泽尔（奥德朗—夫賴堡，薩克森），李卜克内西（司透耳堡—卢泉），賴因德斯（布勒斯劳），瓦尔特希（米特維达—里姆巴赫），維麦尔（安那堡—曹堡，薩克森）。这样一来，共有九位議員，其中只有二人，即白拉克和李卜克内西，是在第一次投票中当选的。

因此，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国会的打算落空了。而且票数也比我們遭到凶惡迫害后所敢希望的更为有利，因为在一批选区中，敌人的恐怖政策非常厉害，使我們无法进行鼓动。党在第一次投票时共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一八七七年一月选举时共得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这就損失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和三个委任。敌人对这个結果非常不滿。

选举的全部結果，果然不出所料，是俾斯麦的胜利。民族自由党由一百三十七个席位降为一百零六个，进步党由三十九个降为二十六个。保守党的委任則相应地有所增加，中央党也稍有增加。

现在俾斯麦为了推行他的政策有两个可供支配的多数派。一个同意反对我們的非常法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多数派，还有一个贊成他那关税政策的保守党和中央党再加上民族自由党右翼的多数派。剥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和通过关税政策加重群众負担的新紀元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要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作出决定的新国会定于九月九日在柏林召开。

这一幕戏可以开始了。这是一出悲剧，注定了社会民主党要为君主—资本家的利益的牺牲品而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次也同以往经历过的許多次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位要用棍子打死我們的海格立斯^①，在同所仇恨的敌人作了十二年对他很不名誉的斗争以后却自己倒下来，陈尸在曠野上。

^① 古希腊神話中的一个大力士。——譯者